



上饶集中营

22

3)

上 饒 集 中 營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赵宜生

上饶集中营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31,000

1949年11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8版

1981年4月第33次印刷 印数 293,001—393,000

书号 10074·2 定价(六) 0.80元

重版说明

本书曾在解放区出版过。全国解放后，由我社先后出过修订第一版和修订第二版，这次与读者见面的是第三版。

这次重版，除了一些文章作了必要的修改外，又增加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记叶挺军长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生活片断》、《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炼狱散记》、《浩气长存》、《特别班》、《重返党的怀抱》等六篇；删去了原书中《西北特种拘留所》等附录五篇。

本书这次重版，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谭震林同志和粟裕同志还为本书题了词。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也作了部分工作。

向上饶集中营坚贞不屈
的战友们烈士们致敬。

谭震林题

谭震林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为重版
《上饶集中营》一书的题词。

在皖南事變中
為國家為人民
而英勇獻身的
新四軍烈士們
萬古常青永垂
不朽！

粟裕

一九七九年八月

粟裕同志一九七九年八月為重版《上饒集中營》一書的題詞。

目 录

上饶的集中营	长 江(1)
炼狱杂忆	一 青(5)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记叶挺军长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生活片断	
.....	叶育青 王聿先(61)
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	林秋若(69)
上饶集中营罪行	陈念棣(82)
炼狱散记	陈安裕(89)
如此“三民主义”教育	黄迪菲(105)
集中营生活散记	陈念棣(112)
卑劣的统治群	
——上饶集中营群丑像	陈念棣 孙秉泰(123)
进“茅家岭大学”	季 音(132)
站铁笼	赖少其(139)
记茅家岭两个月的生活	庞斗华(145)
茅家岭暴动	李 胜(151)
逃出茅家岭	李 胜(158)
茅家岭地狱	宿士平(165)
赤石暴动	陈念棣(196)
赤石暴动以后	孙秉泰 黄迪菲(208)
浩气长存	秦 烽(212)

抗日囚徒的旅行

- 集中营第三队移闽途中……………干戈 季 音(220)
- 集中营在福建 ……………孙秉泰(228)
- 特别班 ……………吴可仁(233)
- 重返党的怀抱 ……………陈 平(239)
- 流浪散记 ……………叶钦和(252)
- 哀施奇同志 ……………叶钦和(274)
- 怀念孙锡禄同志 ……………陈念棣(279)

上饶的集中营 长江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东南各省的千万青年和革命民众最憎恶的地方是上饶。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方，同时也是万恶的东南各省特务大本营。指挥东南各省特务的最高反动机关是三战区的情报专员室，情报专员是戴笠的重要杀人凶手张超。

上饶集中营对外的名称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集训总队（内分军士大队——在铅山和军官大队——在周田，大队长张超）和特别训练班（主任张超）两个单位；四月以后，改编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和国民党在西安的另一集中营“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西北分团”遥遥相对。西北分团属于蒋介石最亲信的干部胡宗南管理。

上饶集中营主要的分为下列几个部分：第一是七峰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岭，第四是李村。还有一部分在石塘，其性质与周田村大致相同。这些地方都在上饶城的附近。

七峰岩可以说是政治软化所，周田村是苦工营，茅家岭是活地狱，李村是高等软化所。被捕入集中营的大致先经过七峰岩，然后周田村，最后便是茅家岭；上了茅家岭，纵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余生，奄奄一息了。

这个集中营，在一九四二年六至七月浙赣路战事以前，里面关着许多有名人物，除叶挺军长外，还有冯雪峰、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新闻记者有四个：两个是国际新闻社的计惜英和谷斯钦，一个是创办豫东大众报的徐师梁，一个是浙江民族日报的编辑王闻识。华侨青年有暹罗的陈子谷、安南的黄迪菲。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有几百干部被囚禁在这里。还有一部分是浙赣路一带教育文化机

关中被国民党特务认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物，如玉山县城某中学教员，上饶民众教育馆的艺术主任等。还有不少是由国民党部队机关中捉来的思想犯，这其中有一些是国民党军队里服务团的团员，有一些是国民党的政工人员，这一点和四川綦江县的集中营不同，那里是专门囚禁重庆国民党高级党政军机关中被认为思想犯的。

上饶集中营的主要部分在周田村，其中分为“军官大队”与“特别训练班”。军官大队共分为五个中队，其中第五中队的—一个队为女生区队。“特别训练班”为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分子，由张超的亲信干部王寿山负责，此人阴险狠毒，新四军在皖南时代，他就在新四军的周围，不断进行奸细破坏工作，他们想把特训班的人训练成为革命的叛徒，作为特工的后备军。

在七峰岩中，囚犯是一律带脚镣，不许互相谈话，不许看书报，他们经常以所谓“情报员”的特工干部来进行个别谈话，实行欺骗。德苏战争爆发后，他们就说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就说抗战胜利已没有问题了，他们可以全力对内，镇压他们所谓“反动势力”。

他们自己捏造的小册子，如《新四军江南战绩》及《延安印象》、《抗大归来》等，强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强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个“情报员”为了夸耀他们“特工”的伟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归来》的来路说了出来，原来是宪兵第八团一个班长派到延安去作奸细，回重庆后写成的；《新四军江南战绩》，完全是张超这般家伙的伪造。

管理七峰岩的有三个系统，担任卫兵的是三战区特务团，监督“囚犯”行动的是宪兵，作思想欺骗的是特工——情报员。为了争统治权，三方面时常斗争，曾经为了想强奸女犯，特务团和宪兵团几乎打起来，而他们对于“特工”，一致骂他们是“吃冤枉”的东西。

经过七峰岩的软化阶段，如果还不能达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转到周田村，进入苦役阶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营，不管是“军官大队”，或者是“特别训练班”，脚镣一律不要了。这几百人都关在有铁丝网的大围墙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墙、修房子、开马路、平操场、挑水、煮饭，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总让你一天到晚没有丝毫休息，饭也不让你吃饱，饭里苍蝇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给你医药，使你疲惫不堪，日渐病弱。冯雪峰肚子上生一个大疮，愈烂愈深，每日流脓不止，他们也不许他医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请医生，所以他的病闹得非常危险。

对于“军官大队”的统治办法，比较更横蛮些，经常实行毒打。而对特训班，则苦工之外，仍然继续政治软化，不断派些所谓“教官”——特工——分别进行谈话，同时暗中布置内线，侦察“囚犯”之思想行动，往往最后还由张超亲自谈话一次；仍不能达到自首之目的时，他们最后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狱”茅家岭。

被他们判定为“顽固不化”的分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残酷的杖刑，由几个彪形大汉将手无寸铁的青年疯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后，然后用粪箕或者由几个人挟到茅家岭。

到了茅家岭，又上脚镣，二三十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完全成了待决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把这些人枪决，只让他们长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铁笼”，铁笼内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过毒打的人，站不了多少时间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过一天的；有些人被“针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连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剥光衣服去吹风，夏天跪在太阳里硬晒；有的经常拖出来毒打。至于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说了，有些特务团士兵也看不过，他们说：“你们如果有罪，就应该枪决，如果无罪，又何必弄得半死半活呢？”

李村是囚禁叶军长的地方，叶军长最初表面比较受优待些，没有上脚镣，顾祝同要他写一个文件，说明新四军行动完全由项英负责，他断然拒绝。他说：“新四军一切责任我完全负担，与他人无关，应将其他被捕人员释放。”他在墙上写了许多诗，都被特务涂去，

还看得出的两句有“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写的，后来特务要把他迁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双方争执，被宪兵缚起来送走了。

国民党特工所希望的“自首”，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而答复他们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与暴动。周田村集中营经常发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岭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来了一次大暴动，全部“犯人”夺了守卫的武装，冲出了地狱。

为了防止逃跑与暴动，“三战区情报专员室”以上饶为中心，三十里以内划为内层警戒线，密布军警，并强迫保甲长一律负责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岩寺、浙江金华、福建崇安则为外层警戒线，这里派人于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分逃出来的革命青年被他们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脱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攻占上饶，这个集中营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个队暴动出来，其余则到徐市成立新集中营。但是全国这样的集中营还有十几个，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还在水深火热中期待着解放呢！

炼 狱 杂 忆 一 青^①

前 言

许多同志集体创作的《上饶集中营》已经出版。他们写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故事比较多些，我少写了这一方面，多写了一些可笑可叹可愤可憎的东西。如果海内作家用这两方面材料写一个长篇，倒可成为一部反法西斯文学的巨著。

集中营里可以写作的材料实在太多，我不会运用、组织，真有何说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时也记不起许多，所以我只能把追忆得出的，零零碎碎凑起来，写成这篇“杂忆”。所写的都是我亲历亲见亲闻的实事，有许多难友同志可以按证。其中年月日、数目字、事件顺序，或有记错，但亦不过“或有”而已。

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确实忘记了，大多数是有意不写出的。我的许多朋友，他们对我崇高热烈的友情，我是铭感终身的，他们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样永不会忘的。只是他们现在都还在法西斯反动统治下生活着，未得他们的同意，写出名姓，他们或许会不高兴，而且于他们确有所不便之处。

1940年12月，我坐了五个多月的几处牢监之后，被解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西山牢监。一座庙里关着百多犯人，有

① 一青即郭静唐。他在被捕前，是浙江省参议会的议员，因所谓“思想左倾”而被国民党逮捕。全国解放后，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1953年逝世。他的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4月。

汉奸，有强盗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带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单衣裤整日蜷伏在禾草堆里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观。

其中有个和我同姓的难友，他本是少将军需处长，判了十四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过几个月就可用调服军役的名义出去，自由地依法去“戴罪图功”了。他很热情和我认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对我特别关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来通知我：

“你就要解到别的监房去哩！赶快准备。”

我问：“解到哪里去？”

“这可不知道。这里有三四处官司机关，每处不止一个监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岭的监房，依你的案情，恐怕会到那边去。”

我说：“已经换过五个监房，苦也苦够了，再苦也不过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边真叫苦！”他郑重地说。

“怎样苦法呢？”

他想了下说：“总之，别的监房还有监房中的自由，那边监房之中有监房。别处还是十八层以上的地狱，那边是十八层之下的。”

我问：“是不是特务机关？”

“正是！正是！是属于特务专员室的。你得赶快准备，东西不要多带去，尤其是笔墨书籍，全身要搜查过的。钱藏好，有钱总可以少吃苦，最要紧！最要紧！”

我感谢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东西检点了一下，把几百块钱分散藏在六七个衣袋中。不久，有两个带枪的兵来押送我。那个本家难友为我雇了个挑夫来，挑着衣物走。大路小路，绕绕弯弯，走了十多里。太阳快下山了，我问还有几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岭。一个兵点了点头。我的心沉下去，想此去即使侥幸不死，也从此堕入深渊，不知何年何月爬出来。翻过小岭，就见到山下的一座孤庙，门口站着卫兵，我就被带到这里。

进门就有一个年轻的军官走来，把我的铺盖衣包随便掀捏了几把，指着凳子说：“好！你就在这里坐一坐，等一会。”我想那个本

家难友的话，有点言过其实，这个看守军官还不算凶狠。

我坐下来，看到左厢两间狭长的监房，五六尺高的石墙上，排着短木栅。许多苍白的脸孔，夹在短木栅之间望着我。右边也有厢房，门口有几个女的，探着头张着我。青年军官在厅上踱来踱去，想和我说话，又不说。

直等到上灯，卫兵才说：“管理员回来了。”门口跌冲进一个人。青年军官对那人说：“管理员，我给你收下一个犯人。”那管理员口中“好！”“好！”地应着，冲过来指着我说：“你把衣服解开来！”我一面解钮扣，看那管理员穿着一身新的草绿色的制服，军帽高挺在脑后，乱发下面一对三角醉眼，眼珠里满绷红筋，眼下一只鹰嘴鼻，鼻端歪在半边。他冲上一步，问我有没有钱。一股酒气夹大蒜气，直喷过来。我闭着气从罩衫袋里取出一叠钞票递过去。他问：“还有吗？”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几张钞票。“你这个人不老实，我不会要你的！”他说着又伸手摸我棉袄袋、衬衣袋。他把我周身捏了又捏，裤子袜筒都摸摸捏过。叫我脱下鞋子，他提着鞋子倒抖几下，反复验着。又叫我打开铺盖，他把被头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后丢在地上，再要我打开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钱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给他看。他哼了一声，叫我把衣服包好。他两眼盯住我看了一会，说：“钱、衣包都存在我这里，不会少你的。”回头对卫兵说：“×班长，开大笼子！”说罢拿起我的衣包跌冲进厅后面去了。

卫兵开了笼门，我挟着被头，低头侧身挨进笼门。在一条灯心的油灯光下，见到一间长不到两丈，阔约一丈两三尺的房间，左右两旁连高铺，睡满着人。两铺中间夹着一条空隙，是进出路，可是有不少蓬头发和双脚挂出在铺沿，排满那条进出路。我呆立了一会，看到里面墙角边，似乎有个空隙，想就在地上胡乱睡一晚再说。一阵骚动之后，好容易挨到角上，原来是摆着一只溺桶。我正在进退不得，一个人在说：“睡是没处睡了，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说。”一个青年坐起来招呼我，“到这边来！”我挨过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

好容易过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来。我见同室难友三十多

个，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有几个是文质彬彬的，有几个是粗汉，更有三个和尚。据说都是政治犯，异党罪。

我从难友这里探问了这监房的情形和规矩。知道那管理员绰号叫“狗头”，非常凶，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那青年军官不是特工，是守卫排排长，专负警戒之责，不管犯人的事，和狗头搞不好的。这监房有两个笼子，共有五十多个犯人。另有一个优待室，除了一两个政治犯之外，其余五六个人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纪律、或是闯了祸，到这里来坐禁闭的。那门口的一间房子，关着四五个女犯。我们的笼子终日关着，除了大便，不准到笼外，不象别的监狱，每天有放笼的时间。不准高声谈话，不准看书报，不准通信和接见亲友，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笼。那木笼就放在厅上，大小正够直立一个人身，木栅上缠着三角刺的铁丝，站的人如靠着木栅，便会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罚站木笼，轻则三四小时，重则一日一夜，甚至两三日，曾经站死过人。

上午卫兵来叫我到管理员那里去。进了厅后，左边一间房子，管理员坐在桌边，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提起笔写在簿上，我纠正他几次笔划，他写了多时，嫌我的名字不好，笔划太多。

“你是什么案子的？”他侧着三角眼问我。

“我不知道。”

“你这人真不老实！自己犯了罪，还说不知道！”

“我没有犯罪！”

“不犯罪！难道请你来做上客吗？哼！哼！”歪鼻子在哼笑。

我想告诉他被捕经过。他说：“我不来问你这些。你到这里要守这里规矩，不要看他们捣乱分子的样！”

我不响。

他看了看簿子又说：“你的钱存在我这里，要买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买来。你的钱是不是九十六元？数目要弄清楚。”

我计算至少该有一百五十元，但我说：“这没有关系，不过用完

了，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来？”

“你有什么朋友在上饶？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他探我口供了。我说了两个朋友的名字，一个是三战区经济机关负责人，一个是长官部的秘书，是三战区有声望的。管理员听到这两个名字，脸色和缓下来，带着不信的口气反诘：“是你的朋友？”

我答：“是要好的朋友，要钱要什么，只要通知他们，就会送来的。”

“这两个我也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帮你的忙？”

我说：“他们还不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哩！我在上饶的朋友还有几个，他们大概都在找寻我吧。”

管理员又问我那朋友的名字，在他听到几个三战区军政要人的名字，并且听到我说出他们的职位、籍贯、面貌之后，那青皮脸上装出笑容，叫我坐下来，又问我究竟为了什么案子。我把被捕的经过约略说了说，他同情似地说：

“有许多事也难说，你且安心在此，终能水落石出的。”

我要求他送信给一个朋友，他说：“本来是不准许的，但看你这人还忠厚，可以私下帮忙带出去。”我写了两三句交给他，他接受了（后来我知道他并没有送去）。我退出来。

不久一个卫兵来叫我移到一个小笼子里，据说比大笼子好一些。那小笼子比大笼子小一半，住着十七个人，却看不出有什么好一点的地方。难友们给我安排了铺位。有个立在铺上往外望着的难友说：“报告好消息，饭来了。”卫兵来开笼门，大家准备好碗筷。先拿进三瓦钵的菜汤，分放在铺上。以后拿进一桶饭来，大家围拢上去，用碗到桶里铲饭，有的满碗，有的大半碗。一个难友放了自己的碗，给我盛了一碗。我的饭量虽不大，但这样的碗至少吃三碗才会饱。但每餐吃到两碗的没有几个人，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我呢，从来没有吃过两碗饭。所以每天挨饿，那是不消说的了。

有一个专员室的组长来视察，到笼门外看了一看，叫大家都安

心，不久要办训练班，都可到训练班去受训，受训完毕就可以自由云云。大家半信半疑的听着。他又问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大家说：“饭吃不饱。”

他说：“饭怎么会吃不饱？”他答应调查。那组长走后，管理员就大发脾气，他说：“上面发下来每人每天八合米，那有不够吃之理？你们这班饿死鬼，不知怎样吃法的。我公家领来的米，照数交给伙伙，难道我来揩你们的油不成？你们不相信，以后可以每餐派一人来监督量米，监督伙伙煮饭。我是很公开的，你们却在组长面前告状。老实对你们说，各人管各人的职，组长也管不到这里的事，识相些！”大家挨了一顿骂，不作声。

第二天派了煮饭监察，到管理员的房间里去量米。按照每人八合的数目十足量到，又看着伙伙煮饭，一点不少。但煮出来的饭，仍没有多，我仍旧只能吃到一碗。

两三天之后，量米的监察人从厅后拿了斗桶和一块圆的斗底板出来，叫大家看。原来那斗桶是夹底的。大家哗闹起来喊：“叫狗头出来讲话。”守卫排长叫卫兵请管理员出来，排长叫大家打报告，他转上去。这一来那狗头威势杀下了一点，好几日不骂人。

我以后每天可以不挨饿。但又来了几个新“客人”，一丈五六尺长的铺，睡着二十个人，每人只有七八寸阔的地位，你压麻我的腿，我压痛了你的肋骨，挤得不开交。于是每人分好尺寸，钉上竹钉，免得乱挤。我在两钉之间，侧身而卧。患着失眠症，越睡不着，虱子越会捣乱，一转动就会戳在钉上。大家睡得骨头发痛。

半个多月后，我有个朋友由政治部派人陪来看我，并有专员室准我坐优待室的条子。从此我出了笼子坐优待室，但我未能从十九层地狱爬上一层。在笼子里虽然饮食睡眠苦一些，但一心一意坐牢监，和难友们随便谈话，倒也过得日子。在优待室里吃的睡的虽然好些，而且还可到门外晒太阳；但和几个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员排长卫兵等应付交际，一言一动须十分留心。那特工犯人都有向专

员室报告其他犯人行动言语的任务。我虽然十二分的留心，但管理员对我常常不满意，因为我时常同笼子里的犯人谈话，送东西进去，不得他的同意叫卫兵私下送信出去，买东西进来，知道他没有钱的时候，有意捣蛋向他索取存款。有一个姓×的难友是个小学教师，和我同时出来坐优待室的。他和管理员搞得很好。他当面称赞管理员年轻貌美，应该有个好妻子。他有个表妹品貌很好，他可以做媒，并且把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女人照片给管理员。这使管理员开心得三角眼眯成一条缝，把照片看了又看。他们的条件是管理员帮×先生的忙，×先生一出去就介绍表妹。过了几天管理员说已为×先生向专员室活动好，但须×先生写一张自首报告。×先生犹豫徘徊了整天，连吃饭也心不在焉。晚上他决意写报告，他同我说：“我并非共产党员，是冤枉的，写写，似乎也不要紧。”但他拿着笔仍在犹豫。我对他念了一句：“嗟乎！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他脸孔一红，撕碎了纸头。这事使管理员大大恼怒，说我阻碍别人自首，将不再优待我，如果再有这种行为，还要坐木笼。由我作东道主为条件，一个绰号叫二胖的特工证明我并没有阻碍别人自首，说管理员弄不到女人错怪别人，管理员才没有话说。

管理员的酒兴不错，外出一整天，总是醉眼蒙眬地跌冲回来。这可苦了女难友，他叫女难友到他房间里唱歌，不会唱歌，要讲故事，几个特工在一起，哄笑喝采。有一个难友几次三番地不肯唱，见到管理员从来没有笑容，不理睬，管理员说她不识抬举。有一天新来了一个女犯，生得漂亮些，管理员时常叫到房间里，问长问短，嘻皮笑脸，女犯回到监房里暗哭。那个“不识抬举”的女难友劝她不要哭，以后不要理睬“狗头”，“狗头”也没有办法的。这几句话适被狗头听见，大发雷霆地说她唆使犯人暴动，罚站木笼，而且要剥去棉衣，穿单衣衫去站。卫兵不肯执行，他自己去拖出来。守卫排长来劝他，说女犯站木笼不雅观，另外可以惩罚。“狗头”看到那排长也有些怕，于是在那女难友的颈上多肉处拧了一把，并罚她在中山透

像前立正二十分钟。

皖南事变发生，难友们的灾难更多了。各地捉来的人每天三四个以至十来个，笼子挤到坐无隙地。管理员的威风越来越有劲，每天要费好几个钟头来搜查新到犯人的全身，看他忙得很，也得意得很。

监房里发生了疫病，由两三人增至十余人，一样的症状，似恶疟也似伤寒。开始有一两个人病死了，要管理员请医生，他请了茅家岭村上的中医来，说是冬瘟。吃了汤药，也不见大效。天天有人发病，隔几天死一两个。整个监狱，弄得阴风惨惨，人人自危，管理员照常醉酒骂人，行若无事。有个晚上，一个卫兵活见鬼，说是一个黑影掠过，灯光发绿，大声惊叫起来。又在一个晚上，一个卫兵偷偷地跑到屋外，在管理员卧室的窗口，敲窗装鬼叫，吓得管理员不敢一个人睡。他买了香烛向弃置在庙角的泥菩萨烧点，化纸锭叩头。疫病越弄越厉害，大小笼子里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管理员才打报告给专员室。由政治部派来一个西医，西装革履，肥头白脸，诊视过病人，说是恶性疟疾。态度从容的指着一个江山人、厦门大学老教授，对管理员说：“这个有点靠不住，其余的不要紧，你看看我的眼力。”回头开了几张药方，挟起皮包去了。这晚上就死了三个。医生的眼力真不错，那五十多岁的老教授，吃不住死去了。未断气的时候，旁边的一个难友问他有什么话，他摇摇头说：“到此，有什么话可说！”他张着嘴断气了。旁边的难友惊叫起来，管理员起床披衣，骂他半夜三更大惊小怪，晚上没有人扛死尸，天亮再说。那难友只好靠死尸伏卧半夜。江山人一次被捕送来八个，至此时活着的只剩三四个。

那老教授有钱存在管理员处，第二天把尸首抬到庙后，管理员亲自去买棺材殓衣。棺材是七十五元，殓衣是二百多元，还有十几元多余，买了烧纸，管理员表示办事清爽，不要死人的钱，面有得色。殓好老教授，把棺材放在荒坟边的老柏树下，待家属来领。这是姑念斯文一脉，准他尸骨还乡。

晚上一个卫兵偷偷地对我们说，那棺材决不值七十五元，“狗头”揩了许多油。我们叫他到棺材店里去打听，并且要弄到证据。那卫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里要发票，要开实价，恐吓了几句话。那棺材实价二十八元，发票上附注着因来买的人，硬要他开七十五元的价，小店只好照办云云。

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难友前后已死了十多个，死的出去，活的进来，虽然放出去了三个和尚和几个粗汉去服兵役，大小笼子依旧挤不过来。

据说新四军干部千把人已解到上饶，训练班就要开始，茅家岭的人犯要审判了。于是每日有两三个或四五个押到专员室去受审。早上由卫兵带出去，日暮总有一两个一跷一拐，面如败灰地回来的，有一天管理员来通知我今天要开审了，他说可能有人在保我。卫兵带我和难友叶君同去。叶君是上饶火车站副站长，因为借了二十块钱给路过的朋友，那朋友寄钱来还他，信被检查。那信上具的名字，正和新在弋阳被破获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代名相同，于是被捕了。现在由浙赣路局长来证明，并由原逮捕机关浙赣路国民党特别党部派员来提审。到了专员室，叶君先进去受审，我在外面等着。许久，叶君出来，满脸通红，坐下来一声不响。我又等了两个钟头，不见传审。要卫兵去问，回来说：“你回去好了，没有事。”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同叶君一道回来，路上我问他怎样审问，他告诉我他和审讯者的一段对话。

叶君：“单是这点误会，你们似乎不至于立刻逮捕我，恐怕还有别的怀疑吧！”

审讯人：“老实对你说，我们对你是早已怀疑了！”

叶君：“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审讯人：“你是个有地位的副站长，赚很多薪水，你却不赌不嫖，不吃烟，不喝酒，与别的站长大不相同，你很有倾向异党的可能！”

叶君：“那我还有什么话说！难道烟鬼酒徒赌棍嫖客，才是

忠实的国民党员!?”

审讯人：“那也并不是这样说法的。好在现在误会明白了，你办好手续就行!”

叶君：“什么手续?”

审讯人：“写一张悔过书。”

叶君：“我无过可悔。”

“那你还不觉悟，去受受训也好。”是审讯人的结论。

以后我没有再被传审。两星期以后，我终于不经入学试验，而进特别训练班。而叶君呢，直到我出集中营时还在受训。

这两星期，茅家岭更不平静，更凄惨。未受过审的等待受审，已受过审的猜度着自己的命运。情绪不安，不免多发牢骚，于是管理员的叫骂声，一天总有几次。因为犯人多，押送来往不便，专员室派了组长到茅家岭监房后面的草屋里来开庭。施刑人的扑打威喝声，受刑人的惨厉呼叫声，夹着里面病人的呻吟声，好不使人凄凄惶惶!

这几天没有人死，更没有放出去的，而新客人来势更盛，监房里再也挤不下人，决定把已结案的送到训练班去。去的一共有五十个左右，还有二三十个留着，我们背了衣包被子，排了队，听管理员训话。他很客气地说：“在此大家熟了，同朋友一样，今日分别不免依依。到训练班之后，生活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兄弟可以帮忙的，没有不帮忙。”有一难友戳穿了他客气的原因，问他存款可不可以发还。他立刻板下脸孔说：“那自然会发还的，你不过十来元钱，要你着什么急?有意捣乱!”听完训话，我们便由卫兵前导后送地向四五里路外的周田村训练班走去。许多难友长久不走路，少见阳光，又因疾病在身，在管理员训话时，已有几个立不住倒下去，路上更有几个倒卧下来，走不动，一个难友仆倒在田膛上吐狂血。好容易扶的扶，背的背拖到周田村，关在一座大祠堂里。

我们从此要过正式集中营的生活了。茅家岭监房成为集中营的一部分，它是集中营的预备营和集中营的禁闭室。

二

在专制独裁者统治的天下，坏的事情总有个好的名字。上饶集中营自然也有个堂皇的名义。囚禁地方政治犯和一部分新四军干部的，叫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囚禁那整批新四军干部的叫长官司令部军官大队。一年后合并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全国有好几个这样的分团，据说在西安、四川的规模之宏大，为东南所不及。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囚犯而是“学员”，难友互称曰“同学”。

集中营的地址是在上饶周田村，离开上饶城十里路。四面都是大小荒山，只有三条路通到村外，是适宜于看守犯人的。集中营的房子，除了一个祠堂，一个庙之外，是把老百姓赶走了一部分，征用的民房。上下周田两村一百多户人家的房子，集中营征用了一半。把房子改造，拆壁掘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我们成为“学员”之后，终日被关在一座祠堂里，看守的是宪兵。他们对看守犯人是经验的专家。他们对于职务不象看守茅家岭的特务团士兵马虎，认真严密，无亏职守。“学员”夜晚小便，须先大声喊“报告”，等到宪兵回答“起来”，才能起来去小便。我这个失眠症患者，终夜可以听到“报告”“起来”之声不绝。

我们在阴暗潮湿的地上睡着，疫势又盛起来，病死了两个。茅家岭又来了二十多个“同学”。于是编了队，队长尚未到差，暂由宪兵连长代理。那连长虽然年纪不到三十，却是宪兵系统特工中的老资格。他态度俨然，老成持重，连走一步路也显出他的“高贵”。我们“学员”一见到他，须赶上前敬礼，否则即要被纠正为“不懂礼貌”。他给我们上课，每天两三小时，写了满黑板的摘要，要我们笔记。他真是“诲人不倦”，他自己满肚子的“学问道德”，恨不得立刻注入“学员”的脑子里。他也懂得教育法，时时把问题提问“学员”，有一天我被提着了。他问我“何谓八德”，我回答不出。他冷笑了一声说：“你是大学生，连八德都不知道！”他告诉我：“八德者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我说：“和平只是一德。”他笑了笑说：“连这点都不懂，八个字，难道不是八德。”我记起了“官长说黑板是白的，你就应该说白，乃是服从要义，军人美德”的训言。于是我懂得了，坐下来。

过了十多天队长到差了，我们重新又整编了一次。这时已有八十多“学员”，分为三分队，九小队。队长、队副、分队长都是大小特工，小队长（班长）是“学员”中挑选的。

这时疫势更猖獗起来。好人病人都晒在一床，病倒的有一半，几乎每天有死的。还未断气的活人，就被抬到后山土地庙里去等死。我看到楼绍洪君被抬出去的时候，张着口吐大气，眼睛还会看人的惨情，真是掩面不忍卒视，至今犹有余悸。楼君在土地庙里几个钟头死不去，晚上没人去看，尸体被野兽吃去了几个大窟窿。疫病传染到军官队，先后病倒二百多人。总算另辟了一所病房，把病人都送到病房里，医官还是当疟疾医。

死亡的每天不断。有一天，死了一个人，棺材店老板误送了两口薄皮棺材，叠在一起叫两个小工抬到周田村。特务长叫小工抬回去一口。小工不肯抬回，说横竖明天要用的，抬来抬去有二十多里。特训班一连死了十来个，军官队不知死了多少。官长们却仍在发布作息时间表，定教育计划。说这是冬瘟，天气暖和，自会消灭，叫我们不要恐慌。我们却不甘心死去，几次请求救命，要求隔离病人，延医诊治，毫无结果。可是疫魔是不分党派，不分青红皂白，一视同仁要传染的。后来连宪兵也有病了，这才引起了官长的“慈悲”，请了驻上饶的防疫第二队来检验，原来是回归热，六〇六是特效药。但总务干事说上面没有这笔医药费的预算。我打报告愿意出钱去买，经审核“尚无其他用意”之后，得到批准。买了十多打六〇六，大家又把虱子肃清，这才把疫病扑灭。

恐怖时期过去，我们“同学”死的虽多，来的更多，已经有了百余人。班本部布告，预备教育三个月，正式教育六个月，期满结业，可以自由。教育方法是政治训练，军事管理。第一步重要的课目

是修理整治营房。我们成为泥水匠、木匠、竹匠、石工、土工。营房四周筑起高围墙，墙外围绕铁丝网，里面东一堵、西一堵的隔墙。我们多是斯文手脚，不工其技，又是春雨连绵，筑好倒塌，倒塌筑好，筑了一个多月才把特训班的围墙筑完。又到石底村去筑，那地方是关新四军重要干部的。这样东筑西筑，筑了几个月才算完工。春蚕作茧自缚，我们囚徒筑墙自围。营房内外开辟大小操场和坪地，把小山开成平地，有的须削去半个小山，有的要把一棵棵合抱的松树根掘起填平。那军官队开的一个公共大操场，是扛去整个山岗填辟成的，直径有二百多米。

这种苦工虽然做得胼手胝足，浑身泥汗，但比起其他课目来，实在是第一等的。因为身体可以活动，嘴巴可以多说，眼睛可以看到四景。本来军官队特训班一共七队，各队围墙隔离，不准往来，只有早操、上课、做纪念周、听训话时在宪兵严格警戒之下集合在一起，但也不准招呼谈话，在做工时可以偶然有机会混在一处，偷谈几句话。

各种课目之中，我们最感头痛的是上课，听名人演讲。每次至少有五六百人，各坐在六七寸高、五六寸阔、八九寸长的矮凳上，挤在一堂听讲。教官在卖弄他的本领，却没有入耳之言。要我们专心听讲，不准看书报，不准记笔记（因为我们不记教官的话而记自己的话），不准看笔记簿或其他小簿册（因为里面抄的是英文或俄文生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打呵欠，不准咳嗽，不准眼睛旁看后看，不准俯首屈身，不准起立，不准移动位置，不准靠墙倚柱。偶犯“不准”之一，轻则当场挨骂，罚立正，重则下课后罚打屁股。我们在这十几个“不准”的不成文禁律之下，在六七寸高的矮凳上，虽然常常坐得腰疼背痛，两腿发麻，立不起来，但我们自有办法一小时一小时挨过去。千万的“不准”，没法“不准”到我们脑子里来。我们在做文章、在做诗、在写信、在辩论、在检讨、在明是非、在分恩怨，一小时也就过去了。我们有时也听听讲者的奇论妙说，看看教官们手舞足蹈的姿势。我们还可以做做游戏，那教

官们各有口头习惯词，我们记下来。例如：某教官一小时有一百六十三个“那末”，某教官一小时有一百十五个“这个”，某教官一小时有三十七个“这样下来”。

教官有专任的，有临时特请的“名流”。名流来讲课时，那场面是令人肃然的。特工头子亲自在讲台上督课，目光四射，队长们抖擞精神，往来巡视，你若是心神不注，便要晦气星照命。许多名流和教官自然也各有千秋，我还记得几个。一位是宪兵团长，真是无所不晓，无所不知的。他先引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九个湖北佬，不及一个九江佬”的俗语来自我介绍他有足智多谋的本质，他又介绍自己的职位。宪兵乃是陆军第一兵科，凡是党务、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农工商业、教育、司法等等都要管得，不具备这各种知识，不但当不了宪兵团长，甚至不配当一个宪兵。他讲到苏德战争，那时正值德国法西斯强盗打到莫斯科外围都拉地方。团长说：“这是一定的，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最多两星期之内失守，如果少一天可以打我耳光。”但团长对于世界战争是乐观的。他说莫斯科失守之后，苏京移到乌拉尔山以东，准备反攻力量，直要等到英美攻到比利时荷兰等处，苏联才能反攻莫斯科。最后德国退出苏境，苏联也筋疲力尽，非得十年二十年休养生息，不能恢复国力；那时已非战前的苏联，而是各民族的独立国家，自然更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什么世界革命了。他比喻各国，他说美国是奸商，英国是劣绅，苏联是土豪，日本是强盗，德国是土匪，意大利是流氓，只有我们大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是正人君子。他最看不起法国，法国民族性最不好，所以只好投降。他讲到法国女子不高兴生育而转到讲节育方法，再转到讲交媾姿势，眼睛看着前面几排女“学员”。小特工们听得出神，他越讲越有劲。最后他判断共产党的前途，他说：“有些人以为抗战胜利，共产党不得了，这，大家可以放心。我老实告诉你们：就算在抗战中，我们前线的兵都打光了，我们还有五十万大兵，足够对付共产党的。现在由他们去打敌人，由他们去做梦好了。”我听了，觉得这位团长爽直之可喜。他

一连讲了三小时，吹了下课号，还不肯歇。第三天又来讲了三小时，真是口若悬河，直讲得天昏地黑。

一个叫蒋先启的，是苏联留学生。他讲自己留学苏联的经过。他看不起苏联，所以襁被归国。他讥笑苏联警察一点没有用，两次搜查了他的寓所行李，竟搜不出他藏在箱夹底里的文件。他更看不起中国共产党。他骂：“共产党是什么东西？鸟！”说着当众指着他自己西装裤裆钮子。这个教官不久做了浙江的一个县长，几个月后刮了钱拖了枪，由日本人接他到南京做大官去了。

还有一个我们叫他“脆弱的灵魂”的，是个矮小的个子，年纪还轻。他上台很客气地说：“今天兄弟到这里来与诸位相见，非常荣幸，见到诸位英气勃勃的精神，使我脆弱的灵魂深深感动。”他客套之后，讲他的正文。他正在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坐在前面的一个女“同学”，在全堂肃静、鸦雀无声的严肃场面下，突然“啊……啊……啾——”一个响亮的大喷嚏，引得哄堂大笑。那教官满脸通红，勉强敷衍下课。他向教务处声明下次不来讲了。他脆弱的灵魂，经不起打击。那女“同学”一个喷嚏赶走脆弱的灵魂之后，第二天也不来上课，虽然打喷嚏是不在十几种“不准”之内的，但她被关到茅家岭去了。

值得记述的教官自然还很多。例如讲阴阳太极图是两条虫交尾的“辅基教官”^①，他自己说是大学生，但可惜外国名字常常颠倒念。讲鬼兽哲学的“唯生教官”，他说唯心论会把人变成鬼，唯物论会把人变成兽类，只有唯生论是唯心兼唯物的，是最进步的哲学。但可惜他没有说明唯生论会把人变成什么。也有敢于在集中营里说毛泽东是他的老朋友，公然赞美共产党的大胆教官。我以为也有坐集中营的危险，幸而他讲下去，说是他曾劝毛泽东到外国去办共产党，一定办得好，在中国是一千年也办不成的。因此他在集中营，不是“学员”而是教官。

^① 这教官把苏联的基辅念作“辅基”。所以得了这个雅号。

我当时不曾用心听，现在事隔多年，不能一一追忆。这一类的教官，何止我所记述的几个。那雌黄惊四座、信口尽荒唐的高论，又何止这几段。如果当时能笔记下来，着实可以做一部教官外传，令人读之拍案。但是这种教官并非对我们完全无益，使我们天真的“同学”能明白人世间尽多寡廉鲜耻之辈，认识了特工的天下原来如此。因此更深信不革命是没法澄清这种人类渣滓的。特工大头子也未始不知道这样的教官，感化这批“顽固分子”^①未必有效，于是使出特工手段，去邀请在特工黑单上注意而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士来上课，那被邀请的人士，为了避免特工的借口，无法推托，不得不应付，只好来不着边际、上下古今的敷衍一两小时。其中有一位后来对我说，他们讲的比我们听的还苦痛，当千多只眼睛集中射视到他身上时，真有“千目所视，无疾而终”之感。

集中营的特工们为了要做出一些成绩来，可以向他上峰报功。他们要把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的“学员”来证实是共产党员，已承认是共产党员的，要弄得他肯自首，不但要本人自新，而且须指证几个隐藏分子。自新之后就要你做特工的奴才走狗，做了奴才走狗之后，看你肯卖力、肯听话，才使你加入他们圈子外围，替特工头子去干风流无份、杀头有份的勾当。

特工们想出种种方法来磨折我们，想使我们熬不住生活的痛苦，肯屈服下来。一方面用集体磨折，一方面再加个别的细磨细折。那方法就是所谓个别谈话。队长、训导员、干事，甚至于小职员，为了能证实得出一个隐藏分子、使一个共产党员“自新”，就可得一份功劳，都在老板（小特工背后称他们的头子叫老板）面前显出他是一个得力伙计，于是各逞好汉身手。

个别谈话的方法有文有武，文的施软工，武的施硬工；也有文武兼施，软硬齐来的。或先软后硬，或先硬后软，或忽软忽硬，各有巧妙不同。那施硬工的，谈话比较直截了当。特工问你自新不自

^① 特工把意志坚定、坚强不屈的难友叫做“顽固分子”。

新，你回答不自新，几句问答，话不投机，就动“手术”。特工们讳言施刑、杀人，于是叫动手术。施刑叫小手术，杀人叫大手术。

最普通的是打屁股，做老鹰飞，坐老虎凳，水漫金山等等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国粹刑。施刑的所在并非普通地方，或在暗室，或在荒山。特工们也懂得心理学，布置成一个恐怖环境，使你精神先受威胁。打屁股是用扁担打的，也并不象前清老爷打屁股的规矩，有打的数目，有打的部位。特工们的打法，是提起扁担，大腿上、屁股上、腰部里、背脊里、甚至没头没脑的乱打。你不屈服，打得你死去，用冷水浇醒，浇醒再打。这种普通手术没法使你屈服，还有特别的，例如用大号缝衣针一枚枚刺入你的小腹，刺一枚，问一声，刺入几十枚，直到你昏死过去。或者半夜里突然叫了你去，绑好押到荒山，声言要枪毙，把木壳枪上膛，对准你，问你自新不自新。或者叫你自己掘好土洞，声言要活埋你，叫你爬下洞，问你自新不自新。或者把你悬空横吊在暗室里，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吊上一晚，再来问你。受过了酷刑，还没有口供，就把你关到茅家岭，或幽禁在秘密地方，永不见他们再回来的也有好几个。

但硬工虽凶，刑罚虽酷，我却从来也没有听到一个难友因受刑不过而屈服自新的。尽多慷慨从容，足以贯日月、泣鬼神的英勇斗争的故事。特工们也在私谈，做别种案子容易，做共产党的案子真是伤脑筋。捉到别种嫌疑犯，只要恐吓几句，就眼泪鼻涕齐来，跪地磕头求饶，什么都说出来了。那共产党员，嘴强态度强，越打越强，死不招供，常常弄得没有下台势，还要受上峰责备，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真不是人干的。

那软工又与硬工不同。特工叫了你去谈话，他对你表示同情，甚至为你喊屈。他恭维你，夸奖你青年有为，他是最爱护青年的，为你熟计利害，设身处地的考虑。他问你生活上有什么不舒服，精神上有什么不愉快，他可以帮助你。他问你班上有哪几个对你不好，哪个与你相知，他也骂有几个队长学识不够，只知用权力压迫“学员”，他为全体“学员”鸣不平。他说明自己对于现在的工作

也不感兴趣，你总有出去的一日，他愿意和你永远做朋友，现在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无不尽力。这样噜苏一大套之后，才缓缓说到正题。他劝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仁至义尽”地劝你，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事已如此，不如坦白承认，改过自新，前途无量。这样的谈话，一次不够，再来两次三次，越谈越表示亲密，甚至送你一点钱，一点东西，表示他的好意。这是一套谈话的方法。另外一套方法，是反激法。他先在无意中流露他对于现状的不满，他本来也是革命的，被特工陷害而弄到这地步，逐渐同你谈得深密起来。他骂国民党专制独裁腐化黑暗，深赞共产党是进步的、有为的、中国光明前途所寄的政党。他说就是按照法律，共产党也并不犯罪的，他提倡气节、人格，骂自新分子，朝秦暮楚，没有骨气，他更反对自首自新法，陷人于不义，他处处表现他是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如果你认为他是真话，对他表示同情，那你就可被指证是隐藏分子。他要你大丈夫光明磊落，坦白承认。

软工的方式大都不外是这样正反两种谈话，不过各有运用之方，要看那特工的水准如何。在这种比较高明的特工手段之下，固然大部分的“同学”洞识其奸，立场坚定，无动于衷。但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有动于“留青山主义”，逐步上当，终至堕入阿鼻地狱，永远不得翻身。让我来举一两个可怜的“同学”。

一个是女的，姓许的女“同学”，她从皖南被捕送到特训班里。起初颇受难友们的尊敬；但当特工们要“学员”自新的时候，她有些动摇了。她对我说：“这是骗骗我们的，自新之后，哪里会给我们自由！”我说：“如果真的会给你自由，你便怎样？”她红了红脸不答，然而她心动了。我们难友也有错误，对于这种动摇的人，应该好好扶助她，使她立得定，我们却处处去打击她，于是越弄越晒倒下去了。她经队长几次的个别谈话，就做了队长的耳目，把队里“同学”的行动言论去报告队长，一两个月之后，由队长帮忙，答应她出去工作。条件是指证了一个姓林的女“同学”是隐藏分子。这个姓林的，一

向倔强，不与队长接近，没有一丝笑容，队长说她是寡妇脸孔，顶不喜欢的，所以叫姓许的指证，那姓许的写了自新书，在《前线日报》登载了与丈夫离婚的启事。这样她被调到图书馆里做职员了。但她确是受骗了，她的自由只限于周田村。图书馆本来是冷清清的，里面也没有什么书，也没有看书的人，从此却很热闹了。副官、干事、队长们进进出出，欢笑之声达户外。据另一个女职员的统计，有一个副官，一天去了二十七次。因此不免闹出吃干醋、争闲风的事。闹得不成样，那姓许的后来又被调到剥削我们囚徒劳动力所开辟的农场里的农村小学当教员。过了几天那副官突然暴死在寝室里，死因不明。那姓许的自由无望，落得一身秽臭，悔之无及，不久跟了一个宪兵队长借逃出去。

一个是姓杨的，是教育界人士。他是个老实驯良的人，他见人诉说他的冤枉，他时常到主任那里去，据说他是去办交涉的。他说他是特殊的，他有理由要求释放。别人是犯了案，而他是没有犯案，是被诬陷的。他后来逐渐做了特工头子的好朋友，他在“同学”面前，小特工面前说，主任对他很了解，不久可以自由的。他每天很忙，热心帮助主任、队长处理班务，他带宪兵去追赶逃亡的“同学”。有一天他去追一个姓翁的难友，跑了一天，满头大汗，我问他吃力不吃力，他说：“吃力倒还好，只是追不到。”

我们全体推九个代表具名打报告给特工头子，六个月已期满，要他履行诺言。我们这位杨“同学”偷了报告的稿子给头子，指名告发宿文浩、项姓和我主动联名闹事，意图暴动。他这样诸如此类的卖力，头子看他忠实，叫他去办农场，那农场离周田村有四五里路。头子先命军官队特训班全体“学员”在刺刀监视之下，把一块大荒山开辟成规模宏大的农场。开成之后抽调身强力壮的几十个“同学”夹着自新过的人编为劳动组，由那姓杨的管理，宪兵监视，辛苦种植。这农场据特工传出消息，特工头子打算成为私产的，后来因日本军队来了，集中营搬到福建，这农场也就不知下落。那姓杨的“同学”直到半年多之后我已出集中营，有一天在崇安路上遇

到他。他仍穿了一身破旧军服，带了几十个“同学”到铅山县去。我问他怎样？他说：“我早已自由了，现在主任叫我到铅山去办农场。”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安徽去？”他说：“回去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主任的意思仍旧要我办农场，回去也没有事可做。”现在不知这位“同学”办农场办得怎样了。

像这样上当的“同学”，据我所知的几个直到集中营移到建阳徐市之后，他们还有一部分留在营中，或当勤务兵、伙夫，或仍当班长，或做小职员，和“学员”一样挨着不自由的岁月。有一部分分配到别的地方工作，如特务专员室，或其他特务机关。有几个在非特务机关工作，也有特工陪伴着他，他们在过着精神上无期徒刑的生活。

这种上课和个别谈话是政治训练，特工们算是感化政策。但这种政策施行的结果，收效极微极微。他们本想把囚徒们的头脑改变，思想纠正，帮他们去稳坐江山，却相反地感化成一批意志更坚强的革命健儿，使他们要更坐不稳江山。我看到有许多“同学”，本来是无所谓的人物，冤枉捉来，关在集中营里细磨细折，使他们认识清楚，脊梁挺直了。“玉不琢，不成器”，他们成器了。

现在再谈集中营的军事管理。依照作息时间表，从黎明即起，直到吹号就寝（不熄灯），紧张严肃。队长们不是黄埔毕业，便在庐山受过训，深得治兵之法，使你一天到晚忙不过来，你便没有闲心去作怪。要我们少说话就叫我们多唱歌。早起唱歌，早操前后唱歌，吃饭前唱歌，上课听训前唱歌，游戏唱歌，睡觉以前唱歌，天雨不出操，就整半天唱歌。真像训练教育机关，弦歌之声不辍。可是制曲谱歌，究竟没有造谣说谎般的容易，没有许多歌本给我们唱，于是大家自唱抗战歌曲、太行山上、黄河颂、八路军军歌。我们唱得响彻云霄，队长们鸭听天雷，虽听不出我们唱的歌词，但看我们唱得有力，他们也高兴。后来不知哪只狗去献功，知道我们唱的是“奸歌”，下令只准唱《党歌》、《三民主义青年团团歌》、《三民主义进行曲》之类的“官歌”，于是早也三民主义，“狐党送终”，晚也三

民主义，“狐党送终”。这可苦了宪兵，他们听到《国歌》是要立正恭听的，各队的歌声此起彼落，宪兵的脚步立正稍息，稍息又立正。

队长们治兵的心得，还可以表现在管理我们吃饭的方法上。军人饭须吃得快，限十五分钟吃毕。排队报数唱歌之后，每六人分围地上的菜钵子蹲下来，一声“开动”令下，我们就不管饭中的石砂谷子，把饭直吞下去。不准把谷子饭粒落到地上，一不小心，就得挨骂，拾起吃进。这还是因为特训班“学员”不是军人出身，特别原谅的。那军官队就更严格，限时更少，吃不好，罚立正，不准吃。有一个“同学”，吃得急，一条寸把长的淘箩竹丝，梗刺在喉，无法取出或咽下；喉头化脓，呼吸困难，只能喝些汤水维持生命，后来是死是生，不得而知。这虽然于我们“学员”的胃大不舒服，甚至有生命危险，但对于队长们是好的，一则可以表现治军有方，二则可以省下饭米，真是名利双收。

军事管理，最主要的自然是军纪。集中营的军纪特别多。不准在一起低声谈话，你如果和著名的“顽固分子”多谈话，便要受个别谈话。不准一个人坐在冷静的地方，独自寻思。不准和宪兵多谈话。非经特许，不准接见亲友探望。写信给亲友，要经严密的检查。至于其他一般军纪，如要绝对服从、要清洁整齐、要迅速敏捷等等，自然执行得更严厉。你偶然多说一句话，走错一步路，或排队迟误几秒钟，或吃饭不小心，或对官长失了礼貌，你就犯了军纪，你就该处罚。罚有轻重之别，在乎队长们的高兴不高兴，倒不在乎你过错如何。罚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

轻的是罚立正，要用正确的立正姿势，或在总理遗像前，或在人目共见之处，或在细雨中，或在烈日下，或在寒风里，站上几十分钟以至数小时。罚跪，也和罚立正一样。罚跑步，叫你一个人像驴子拉磨一般在场上跑圈子，几十分钟以至几小时。罚擎枪姿势，一名五岳朝天。两腿左右分开踏成马步姿势，胸要突出，屁股要翘起，两臂分开屈伸向上，两手作横擎步枪姿势，头颈伸出，仰面直视，做成这样的姿势历时几十分钟至一两小时，不准动一动。

重则罚坐禁闭，或关在营内黑室中短期禁闭，或关到茅家岭长期禁闭。罚打屁股，这不是个别谈话时的私刑，这是公刑。叫“学员”排队观看，把受罚人按倒在地，褪下裤子，或队长们亲自动手，或叫可靠的班长动手，拿着扁担用力打在大腿屁股交界处。打的数目先由队长宣布，普通是一二十下至五十下。受打的人必须叫喊呼痛，否则队长和动手的人要得到晦气，就须加打，打到受刑人出声为止。有一次我们上课下来，见到军官队的一队正在举行打屁股典礼，那受刑的任凭打得两腿发黑，默不作声。那队长气得青筋绽出，拚命地打。旁边一个班长向受刑人在叫“你喊呵！你喊呵！”到后来那受刑的叹了一口气“唉”！那队长才忿忿丢下扁担。据一个小特工说，那队长第二天头的确痛得很厉害。有时队长为严整军纪起见，或适逢彼之怒，那打法又不同了。把全队“学员”排好队，将受罚者俯按在地上，叫“学员”每人轮流打五下，要打得重，谁不肯打，或打得不重，就打谁。有许多“同学”，提起扁担，脸孔发白，手发抖，实在打不下手，队长们威迫着你快打。这为难情景，仿佛平剧上演出的“陈琳棒打寇承女”。也有“同学”宁可受队长的拳打脚踢不肯打自己人。也有打了一两下，丢下扁担自己倒在地上昏过去的。被打的人固然非得一两个月将息不起，而全队也死气沉沉的要好几天。

这是惩罚个人的办法。如果“学员”共同犯事，或一人犯事，而查不出是谁，就处罚全体，全体排队立正，恭听辱骂，几十分钟不喊稍息。有时突然吹哨子集合，甚至在半夜里吹哨子紧急集合，排好队一个口令喊跑步，跑两三小时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军官队四十多个女“同学”，被罚跑步。她们咬着牙齿跑，只管跑。队长喊“齐步走”口令，不睬，喊“立定”口令也不停，一直跑了四个钟头，一个也不下来。那队长前后督看着，也要上前落后地跑几步，着实吃力。起初还想拚一拚，后来自己实在挺不住，弄得无法可使，躲到场外树下休息去了。她们才自动停下来。此后女“同学”不曾再受全体跑步的处罚。

这样严紧的军事管理，这样凶的军纪惩罚，并不能磨折得我们“同学”屈膝，我们只有愤怒、仇恨。特工们要想缓和我们的情绪，用种种方法来欺骗。他们公开宣布三个月正式教育结束，就可出去。六个月期满了，又宣布现在要分配工作了。过了多少时候，又宣布再延长三个月的技术教育。三个月期满，又宣布现在有的要分配工作了，有的可以释放了。把自新分子集合在操场，听长官部派来的官训话，发给他们慰劳品，每人手套、袜子、毛巾、簿子、三民主义读本等。结果是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特训班军官队合并改编了六个中队，一个人也不曾出去。那手套、毛巾成为可耻可笑的记号，没有人敢公然把手套带在手上，把毛巾挂在公共挂面巾的地方。特工们一则想缓和我们情绪，二则想蒙蔽社会人士的视听，表示他们办的是训练机关，不是希特勒的集中营。因此叫“学员”组织了篮球队和剧团。各中队有一个篮球队，互相比赛。又把各队选手组成一选手队，名为“更新球队”，到上饶城里同外面球队去比赛。参加了“祝同杯”的锦标赛，三战区各地远至金华都有球队来参加，共有三十多队。“更新球队”大出风头，打败了许多球队，获得最后决赛权。特工头子们高兴之极，看球的人也在赞叹，“共产党真厉害，连打球都打他们不过！”

赛球的时候，集中营各中队“学员”被准许轮流排队去看，由宪兵监视，队长们带领着。有一次是女“学员”队去看，可闯祸了。特工头子的太太是富家千金，那头子未出山时，颇得贤内助之助，不免女权高张，那太太徐娘半老，烫发、华衣、高跟鞋、狮子鼻、高颧骨、翘嘴唇、黄胭脂、猩口红，飘飘过市，路人无不注目。女“学员”队整队在街上走，女队长见太太迎面来，连忙喊“向右看”，对太太行注目礼。女“学员”闻口令，开正步向右看。一看见太太的倩姿，大家嗤的一声笑。太太脸上立时粉底泛红，又不好当街发作。回到周田村，要丈夫立刻将女“学员”全体处罚，那头子觉得不好意思因太太事件而公开处罚，请她平气，缓缓再说。太太大发雌威，说丈夫转女“学员”的念头，拍台打凳吵了一顿，跑到办公室，叫队长集合女

“学员”大骂：“你们这些小毛头，女匪徒！你们不服从我。哪个不尊敬我太太！你们笑我，就是不服从我，不服从我就是不服从上头……”太太骂得够了，回到家里，还是越想越气，第二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周田村十多天不见太太的情影。这件事闹得周田村满城风雨，从此不准“学员”看球。过了几天“更新球队”的两个主要球员逃亡了，球也赛不成，“更新球队”解散了。

那剧团也“赐名”曰“更新”。“学员”中尽多文化青年，导演、演员一应俱全，一下子就组成几十个人的剧团。特别请准一笔经费，办了全套幕布，大小道具，化装油彩，做了许许多多软硬布景，着实化了一点钱。可是三战区没有特务剧本，于是剧团演出的是农村曲、麒麟寨，甚至演夏衍的作品。虽然有人说这种剧本是左倾的，但经上头审查认为尚无大碍，就公演了，起初集中营里自己看看，后来请外界人士来看，后来到城里去演，长官部去演。看的人都说演得好，比三战区政治部的剧团好，比军委会政治部派在三战区的演剧第三队好。于是“更新剧团”又大出风头，特工们面上好不光彩，可是麻烦又来了。

长官部的命令要“更新剧团”到铅山县去演出，于是特工头子们大为兴奋，叫剧团排演新剧本，置办新布景，鼓励演员要特别卖力，这是长官部的命令，可不是玩的。排演纯熟了，布景制得差不多了，决定演出的日子，报告了长官部，长官部通知了铅山的军政机关。突然发觉布景的负责人赖少其有逃亡的企图，于是把他关到茅家岭去。可是布景还有许多未齐备，有的只画了一半，设计、装配，没人可以代替。“更新剧团”又一向以布景之出色，为观众所叹赏，长官部是知道的，这真为难了特训班主任，他既不敢向长官部报告中止演出，要演出又不可无布景，于是叫赖少其悔过，仍出来工作。赖少其却宁可关在茅家岭，也不肯悔过。那主任几次授意部下们去劝赖少其，没有效果，又落不下面子自动放他出来。演出的日期一天迫近一天，再不放出来，戏演不成功，如何向长官部交代。终于只好放他出来，叫他先工作，将来再悔过，说是给他一个

戴罪图功的机会。剧团在铅山演出，赖少其他他们穿了化装衣服打扮成老百姓，在最后一幕剧未演出时，同四五个“同学”一起逃走了，幸而是最后一幕布景已装好，总算不当场出丑。主任一怒解散了剧团，但长官部并不知道剧团的解散，不久又命令“更新剧团”到广丰县去演出。只好重组剧团，把认为靠不住的旧团员都剔出，加入了认为靠得住的“学员”，剧本又在排演了，布景又在装备了，过了不久戏剧已排演成熟，要预演了，预演的前一天，八个团员逃走了，主角演员少了好几个，最出色的女主角也逃走了，剧团垮台了，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导演兼布景的“同学”，痛哭了一场，特工头子们垂头丧气，再也隐瞒不住，只好老实报告上去，得到“管理欠周”的批语。

三

我万分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在外边竭力奔走营救我，每隔一些时候总请得要人的电报信件，或地方人士的公禀来保释我。在上饶的或路过上饶的许多朋友，时常到集中营来看我。他们始终不懈，非把我弄出去不止。虽然一时没有办法拉我出深渊，但因此也得到大小特工们的另眼看待。

当我进特训班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茅家岭的那个管理员来私下告知我，他说：“恭喜你你可以出去了，有×将军打电报来保你，司令长官已批准，公事已发到专员室，就可转过来。”我知道这消息之后，心里一上一下，究竟不知可靠不可靠，天天等着这消息的实现。坐牢者心里最难过的是初进牢狱，和将出狱而未出的两个时期。我那时真有一天也等不住的心境。等了一星期，班本部来传唤我谈话。由总干事和我谈，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你的案子弄明白了，委屈了你许多时候，现在可以自由了。”我听了这话，喜从天降，几乎喊出“好了！好了！”他又继续东扯西牵，问长问短。说到后来，终于说到“主任很看得起你，请你在我们这里工作。”我兜头被浇了一桶冷水，神志清楚了，知道原来如此，答他道：“我这人心直口快，

不适于做你们的工作，请让我回家去。”

他仍和气地说：“不要你去做外勤工作，做机关内勤工作好了。”

我起初还同他说情说理，后来知道没用，就决绝地说：“我不愿意做这种工作，请转告主任勿必费心。”

他就拉长脸孔，放落下巴狞笑着说：“那你还要在此，不得出去。老实告诉你，莫说一个总司令的电报，就是委员长的命令，也须经我们审核，才能决定。”

我说：“那也只好听天由命！”

从此之后，朋友们各种营救的办法都无效了。虽然每隔若干时总有消息传来，说我又有的出去的希望，但上面公文转下来，到特训班审查呈复的结果，我还该受训。总算为了保人的面子，后来特别优待我，免去上操和劳作。

那总干事办法多，他是读书人出身，对于文化人，“特别爱护”。要我们七八个文化囚徒负责编辑壁报，稿子须由他审查过；但我们的队长反对由总干事来管，他说：“这是队上的事，队上管。”他又说：“总干事的用意是想抓势力，所以笼络这七八人，给他起作用。”队长对于办壁报也赞成，但稿子要由他审查。我们心中也赞成队长的主张，因为他是武人。我们开始筹备出壁报了。

这可恼了总干事，他集合全队“学员”训话。意思说特训班除了主任，就是总干事，他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队部只能管队员的生活，一切教育设施，都要由班本部管理。他大发其牢骚，言语之中，当然大部分是指队长说的。

队长过了晚饭后，也把我们召集训话。他说：“你们要弄清楚，上面派好职务，各有所司，队长有权管队上一切的事，班本部人员自有班本部的职务，管不到队上来。”他讲到他有来历的，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他要做官，着实可做得大了，他不希罕这个队长位置。他什么都不怕，叫我们仍赶紧办壁报。

总干事虽然除了主任他顶大，但他并非主任的嫡系，他是请来

的客串。队长乃是跟主任多年的部下，军官队各队长以及大小特工都是一系的人，那总干事除一两个教官和几个小职员之外就没有亲人。他的确想要我们给他起作用，使“学员”都对他听话，就制得服那队长了。结果惹了一场气，又自知实力不及，只好忍气吞声。

队长要做给总干事看看，使他也知道我队长虽武人却也懂得文事。于是叫木匠做壁报板，买纸张，备笔墨，经费不向班本部报销，由他设法。要我们把壁报办得很出色。

我们请“同学”们写稿，一星期出一次。第一期稿子齐了，交给队长审查。他慎重地看了一看说：“没有什么，你们出版好了。”于是壁报出来了，大家很高兴。第二期又编好给队长看，他翻阅了一下说：“没有什么，你们出版好了。”于是又是第三期。每期出版，壁报前挤满观众。壁报上着实也有一些可看的東西。赖少其的报头画，有些“学员”的诗。总干事也每期来细看。

壁报出了五六期，总干事报告主任说壁报有问题。他指出报头一幅画着集中营的背景，高墙铁丝网，两只老鹰在空中高飞，题曰“高飞”的水彩画，和一首咏普罗美休士偷火故事的诗，是大有问题的。他要求审查那原稿。队长知道了，把那稿子撕毁，总干事又落了一场空。他多方寻队长的岔子，队长也处处挖他的烂疮。

总干事究竟是读书出身的，计策多，用釜底抽薪之法，把我们七个人编为文化组，另外居住，不编在队内，看你还出得成壁报？又可以给我们看看他的手段，看你们还敢不买我总干事的账？他把我们关到距周田村三四里的石底村和新四军高级干部在一起，可是不准我们和他们谈话。调了那狗头来管理我们，十多个宪兵随时注视着我們。新四军高级干部十个人，我们七个人同住着一所房子，天天面面相觑，心心相印，却连招呼也不打一个。我们从板壁缝里笔谈，大家倒也过得好。

可是总干事还有计策来难我们。既是文化组，就该写文章。由总教官出题，要我们每两星期交一篇文章。各按所学，分题作文，学经济的写经济文章，研究文学的写文学文章，我没有专学，第一

次分到的题目是“科学与救国”，这题目还可应付。我说：“我不会写白话文，只会写文言。”总教官说：“文言更好。”于是我在对仗工整，声韵铿锵上面做工夫。创造了许多典故，又写了许多章太炎式的古怪字。做好之后，自己摇头朗诵几遍，心想着实可以考得进秀才。缴卷上去，我自己看不懂的文章，总教官却看得懂，他说：“写得很精彩。”其余六位“同学”，也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总教官说：“都还可以。”做教官的要分门别类同时出七个题目，实在也是难事。后来总教官索性叫我们自己出题目。我于是造的典故更多，对仗越工，连题目都自己看了要发笑。总教官真识货，他说我“国学有根底”。有个小干事读了我的文章很佩服。他是富阳人，和郁达夫认识，他说我的文章媲美郁达夫。郁达夫的文章真不差，可惜他是共产党，思想不纯正，否则文章一定更加好。

我们在石底村住了一个多月，不知什么原因又把我们移回周田村，住在特训班外面小屋里，有一个宪兵班长和一个上等兵副班长跟我们。准我们在周田村里可以随便走走。后来可以由宪兵跟着到村外去，后来可以到上饶城里去。宪兵知道我保人多，不怕我逃，还时常陪我到朋友那里去吃饭。总干事和队长两面使气不来管我们，文章虽然仍须做，但不来催得紧就不交，起初个把月交一篇。总教官在文章里实在也看不出我们的思想，无从来纠正，兴趣也淡了，不再来催索，我们就赖掉这小考。所以我们只要宪兵答应，或瞒过宪兵的耳目，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们成为集中营的特殊分子，“同学”们称为“七君子”。起初我们也觉得特殊，看见“同学”们难为情，后来也不觉得了。

我每天提了酒瓶到下周田村店里去买酒，老板优待常顾客，我去买酒打个八五折。后来这只酒瓶好似水浒传里草料场老军送给林冲的酒葫芦一般，老板认得这只瓶，见瓶便打八五折。我这只酒瓶，不但结识了村店的老板，而且混熟了好几个爱喝酒的队长、教官、宪兵，以及小职员们。我好似《聊斋志异》里的人物，日与落水鬼为伍，知道鬼的伎俩脾胃，也不觉得鬼之可怕，而且引得有

几个小鬼动了想投胎人身之念。

从这些鬼友里,我得到别个“同学”不易知道的事情;集中营里只要有些小风波,我便得到了消息。甚至某队长打太太,某副官送给某队长太太一件旗袍料,而某队长吃起醋来撕碎了,我都会知道。队上的“同学”们也从我这里得到外面的消息。营里将有什么新花样,特工又有什么鬼计使出来,某人已经变了狗。特工们瞒着不给“同学”们知道的新闻,敌人已打到什么地方,以至于上饶城里被炸死了多少人,“同学”们都能知道。那队长时常还要我给他写公文,和班本部打笔墨官司,有时要我帮他同特务长算账,因此特务长措了多少油,队长吃了多少余米余盐,“同学”们也都会知道。一个好消息或重要的恶消息立刻会传遍全营。而我呢,听消息,传达消息,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特工们也奇怪,“同学”们消息为什么这样灵,查不出根来,怀疑是宪兵走漏的,因此常引起队长们和宪兵间的争闹。

主任嫡系的特工对于宪兵不大看得入眼,宪兵队官兵也极看不起主任系特工,他们俩同行,不但在我们囚徒头上各显英雄,他们自己也你做我的工作,我做你的工作,常常互相碰痛头。有一次,不知哪个主任系特工授意一个自新分子,有意向一个守哨的宪兵接洽逃跑,想把许多“学员”逃跑的责任推在宪兵身上,证实宪兵引带“学员”开小差。那宪兵也想把那人引到外面逮捕,以证明主任系特工的无用,连自新都是假的。就答应了那人一同逃跑,演出贼捉贼的把戏,闹到大头子那里。

原来集中营的警戒由宪兵负责,训练由主任系特工负责。但有许多分不开责任的,尤其是“学员”逃跑的责任。发现一个“学员”逃走,队长骂宪兵警戒不严,要宪兵去追回来,宪兵骂队长们饭桶管不住“学员”,要队长们自己去追捕。

我们“同学”在集中营里,过着不是用“苦痛”、“不自由”、“囚犯”、“非人”、“奴隶”等普通字眼所足以形容的生活,在绝望的岁月中,除了设法逃亡之外,是难等得到自由的。自从集中营开始以来,

“同学”就不断的逃亡出去，或一个人逃，或两三人以至七八个人同逃。到后来逃亡的事件越弄越多，那特工大头子甚至下命令，如某一队在一个月內逃亡五人，那队长就要受撤职处分的连坐法。队长们把“学员”逃亡，看做威胁他生命般的严重，但仍无法减少我们“同学”的逃亡。逃出去之后被捉回来的是少数。这固然由于逃亡者的计划缜密，行动勇敢和机警，但两个特工派系间的矛盾空隙也不无帮助。

使我记起一桩逃亡故事。特训班有个队副，年纪还轻，未曾娶妻。他平时扮着笑面虎的角色，对“同学”似乎很肯帮助的样子，尤其见到女“同学”，更是笑逐颜开。他想吃天鹅肉，对一个姓孙的女“同学”转念头，那女“同学”也属于“顽固分子”之类的。但队副在主任面前说了许多话，要求允许他负责做这女“同学”的工作。在特工道中，如果能把这样的女子做得如愿以偿的话，在他是不特可以奉旨成亲，夸耀侪辈，而且可以在老板前显得他青年有为而博得青睐的，这是两美的喜事。于是他先把这女“同学”弄到剧团里，后来假造了那女“同学”的自新报告呈上去。那女“同学”除了逃亡没有办法，在剧团里和同志们布置好逃亡的准备。那天在大操场由长官部派官来慰劳自新分子的时候，那队副矫了主任的命令，骗这女“同学”到大操场里去，女“同学”问他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女“同学”再三不肯去，他现出真身，翻下面孔恶狠狠地威迫她。女“同学”一边走一走哭，队副跟在后面劝，还未到大操场，她对队副说：“杀了我也不去！”突然向后转，跑回来了。

这时癞蛤蟆大为尴尬，哭笑不得。于是他的同事们答应帮他忙，务必使姓孙的就范，喝杯喜酒。那女“同学”知道祸事临头，决定当日和几个“同学”一起逃出去。我要他们等一天，以便我可以到外面再多弄些钱来给他们。她说大家计划定当了，冲出去再说。到了黄昏，她和同走的“同学”公然经过宪兵哨岗，以奉令借道具的名义出去，几个宪兵在路上遇到他们，见是剧团里的人，也不十分盘问，剧团里不久发觉他们逃亡了。这八个人一起逃跑的大

事，使主任系特工们和宪兵们大伤脑筋。宪兵说剧团在营外另居，他们可以不负责任。队长们说剧团门口有哨岗，出去又是经过哨岗的，要宪兵负责。几经折冲，宪兵只好出发一个班去追。他们在往上饶城去的路上走了一趟，不到两个钟头回来了，说上饶方面的一路没有踪迹。

那癞蛤蟆痴心不死，骂宪兵不分头去追，敷衍塞责。他自告奋勇，连夜向广丰县去的路上追。到天亮走到一个凉亭里，坐下休息一会，抬头看见壁上有粉笔写着的诗句，具名的是那八位“同学”之一。他断定他们从这条路去了。又到一个凉亭，壁上又见有“我们去也！再会”等字句，下面又具着八位之中的另一名字。他向这路起劲追赶，到了广丰城里寻觅了一昼夜，毫无线索。再过去追赶，没有信心了。懊丧而归，好几日不见他笑面。

宪兵的特务组织，自成系统，直属中央的宪兵司令部。宪兵都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反共教育。他们的任务，正如那位九只九头鸟的团长所说的，什么都管得到。实际上是以反共为中心的。一切有关“党政军警法，农工商学兵”的宪兵任务，都绕着这中心。他们知识水准比较高，初期招募的士兵多是初中高中程度，至少也是小学毕业。他们脑子里都已训练有一套东西。都有一知半解的知识，能讲讲歪曲的、荒谬的理论。这确是为只知蛮干的队长特工们所不及的。

每个宪兵都为特务组织所控制，但我们说个个宪兵是特工，却又不尽然。他们原都不想做鬼的，而是中了鬼王的鬼计，套入吊索，打入森罗殿前，地狱门口，当那牛头马面的职司，干那鬼卒无常的差使。除了几个官长和少数班长以及极少数的士兵在孟婆亭喝了迷魂汤，忘了人世间之外，其余大多数，多未失去人心。他们在黑漆的鬼域里，切慕着人世间的光明，谁不动投胎人身之念？但他们要想得到鬼王准许放回阳间，那是千难万难的事，他们在望乡台上不知流了多少思亲念友之泪！

看守我们的宪兵，起初自然装着鬼脸孔，煞有介事，后来逐渐

和我们相熟悉，讲起人话来了。许多宪兵下班后没有事便蹓到我们这里来闲谈，我们那屋子成了宪兵的俱乐部。他们觉得我们的屋子虽窄小，却嗅得到人气息。有几个简直除了吃饭睡觉上差之外，一天到晚和我们厮混在一起，亲昵得和朋友一般，我称他们为无常伯伯（鲁迅先生谈目莲戏的一文中，曾说过无常鬼是人们最熟悉亲近的鬼），他们也不生气。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见到他们赤热的人心。这种人心他们是不好到处随便显示的，一不小心，便要祸事临身。我们同情他们的不幸的遭遇。他们原是好人家的子弟，年纪轻，身体强，都受过相当教育。抗战初期或为爱国热诚所激，投笔从戎，或因失学失业，慌不择路，或因家乡沦陷，穷无所归。也有为了逃避抽壮丁，宁愿当宪兵可以不上前线。当宪兵机关到各处招考的时候，堂皇的招考章程上，写着动人的条文，其中规定四年可以退伍。待遇特优，饷银之外又有津贴。他们去应试了，当时还恐怕考不取，甚至开夜车预备考试用的课目，然而他们都录取了。

找到保人，填上保证书、志愿书等手续，他们由各地送到宪兵队里，做了入伍生。过着“三操二讲堂，青菜豆腐汤”的一般军队的小兵生活，接受了“宪兵乃陆军第一兵科也”的应有的教育。当了一年半载的入伍生，能够成绩合格准予结业之后，分派到宪兵团各连队里服务，才算是正式宪兵，初进去是二等兵，过了一年二年以至三年，看你的成绩尚可，遇到上等兵出缺，才提补你上去。由上等兵而下士、中士、上士、准尉，一级级一层层提升上去，如果要想升到少校阶级的话，就到胡须白也未必可能。看守我们的一个班长是抗战以前入伍的。他还是高中生，七年了才升到中士班长。我们取笑他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上等兵”。他们也承认，不过要求把“得”字改为“尽”字。

宪兵的军律比别种军队严得多，一般都要罪加一等，从重处罚的。而且极容易得罪，宪兵之间互相监视，一言一动，上面都能知道。稍有过失，就受惩罚，轻则打军棍，坐禁闭，重则徒刑枪毙。犯

了罪，很难得送军法机关依法判决，连枪毙也可以由宪兵队自己执行的。他们的饷银比别种士兵多，班长以上就有所谓“宪兵津贴”，但在物价高涨之下也不能不经常吃青菜豆腐汤，他们要想请假，服务时期照律不允许。依照章程规定的四年已期满了，请求退伍，说是国难时间，延长服役，不准所请。就是有了特殊原因如重病、残废等，请准长假到家里，还不能离开宪兵队的关系。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实在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的相差。有个班长说：“我们还不同你们一样，不过你们是被捉来的，我们是被骗来的，这一点不同罢了。”他们精神上的苦痛且更甚于我们。因为我们明白自己为什么，为了什么要坐集中营，他们却不明白自己真的为了什么当宪兵。

他们也落在深渊里，他们要想出得这深渊，除了逃亡也没有别法。但他们的逃亡，比我们更困难，更危险。因为他们入伍时填着三代履历，家乡亲属的名字，更有一个保人，你逃跑了，就要连累亲属保人吃官司。宪兵自己的法律规定，宪兵逃跑被捉回，就不要经审判手续立即枪决的。我们被捉回的逃员，虽也有被枪毙的，却不是用逃跑的名义枪毙的。宪兵们在这样严厉的管制下，他们为了要做人，却仍能冲破困难，不计生命危险，时常有逃跑的。集中营里一百四五十个宪兵和我们这许多囚徒，日日为伍，嗅到的是人气息，听到的是人话，这给他们的刺激是不小的。一个人上了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倒也视为当然，等到自己觉得上了当之后，那是追悔不及，苦痛之极的。记得有个鬼故事，一个吊死鬼挂好了绳劝诱一个人上吊，那人不用头颈而把腿套进绳圈去。吊死鬼说：“你弄错了。”那人说：“我没有弄错，你弄错了，才有今日。”吊死鬼闻言大哭，立即不遵守找替死鬼的合法手续，做了个“偷来人身”投胎而去。宪兵朋友们正和那吊死鬼一般情境，他们不按合法请长假的手续，不断地逃出鬼门关而去。他们独自逃、结伴逃，也有同我们“学员”一起逃的。起初还多限于家乡沦陷，或家属保人不易追究得到的人，逐渐连来历可查的也逃跑了。宪兵和“学员”在逃跑的竞

赛上逐渐超过了“学员”的比率。后来我在浙江某一个公营贸易机关里遇到一个逃出来的宪兵，他见了我热烈地拉住我的手，问我还认识他不。他现在改名换姓在此做会计工作。他又告诉我，他是集中营撤到福建后逃出来的。那时他们一连宪兵剩的不到四十个了。

至于主任嫡系特工又不同了。他们的本质不象宪兵单纯，出身也比宪兵复杂得多。他们吃这碗饭时间也久，大都是官的阶级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喝透了“孟婆汤”，不但忘了人世间，而且对于“人”已经有成见，嗅到人气，听到人话，觉得怪不舒服了。他们所受的训练也不同于宪兵。他们在庐山也学过反共的一套理论，但这不是他们的主要功课，所以在这门功课上，除了几个头子之外，实在不及宪兵。他们所学的主要功课是属于反共的实践，如何钉梢，如何偷窃或抢劫文件，如何绑架，如何进行暗杀等等的技术，他们都有心得的。他们有一本宝贵的书，大概是讲义吧，里面讲的都是这类行动技术。每一种技术都举有实例说明。讲暗杀术的一章，举的实例是在上海某医院暗杀一个人（名字已忘），这人已被暗杀一次，枪伤不死，正在医院里医治。举例很详细，如何计划，如何准备，如何进行，如何脱身，都一一说明，并附有一张图，画着医院房屋的平面，用红黑虚线指出暗杀者的出路和进路。这一本两百多页的书，真是他们传媳不传女的秘本。他们的全套本领，全在这书中。不过如何打屁股，如何使毒刑，书上没有说，倒是他们无师自通的。至于如何颠倒是非，造谣说谎，挑拨离间，含血喷人，恐吓威胁，放刁撒泼，罗织诬陷，拖人落水，张冠李戴，武断歪曲，吹毛求疵，指桑骂槐，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包庇诱惑，招摇撞骗，装腔作势，吹牛标榜……这一整套本领，他们也来得一两手，却非其所专。这套本领在集中营里要算总教官、总干事、教官、训导员等一批“文人”比较高明。但这批文人，比之于“双钩钩”^①特工系统里的专家

① “双钩钩”，CC也，象形。

们，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主任系的特工在三战区各地都有。据说他们的任务，不单是反共，也做反汉奸反敌人的工作。其实后两种表面上也在做，骨子里天晓得。在集中营里做队长队副等工作的，多是在外面搞不好，或犯了特工纪律，或被同行倾轧，被调来当这苦差使的。他们也都不很得意，满腹牢骚，不免时常发作。

我从他们的牢骚中，知道他们认为肥缺的一等差使是派到游击队里去工作，枪声一响，黄金万两，虽有危险，份头可派。如果胆子大些，自己搞到队伍，上面可以领饷，下面老子第一，为所欲为，那便肥了。其次是派到汉奸那里工作，既无危险，又多进账，工作情报自有汉奸帮忙。据说汉奸见他们，象爹一般尊敬，待之如上宾。其次是普通外勤，也可以帽子一戴，竹杠随来，花天酒地，任凭欢喜。再其次是办案子审犯人，只要手段灵活，外快可捞，遇得巧还可以弄个把“废物利用”^①。最苦的是被派到“匪区”工作，既危险，又无钱，出力不讨好。但还可以敷衍塞责，多造些川旅应酬费，实报实销。在集中营，那是末级苦差使了。每月只有规定的几个铜银，“学员”身上只有虱子疥疮，无油可刮，虽可以在余米余盐上措些油，也是有限，大头子又是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滴水不漏的。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老吊在队上，这批囚徒又是天上星宿，不易打交道，弄得不巧，就吃上峰的排头。有这百般苦处，也难怪他们在羡慕游击队肥缺了。

我记起在周田村菜馆里遇到的一个当游击队长的特工。

上周田村有个小酒菜馆，我是老主顾，有一天我在那菜馆里独酌，来了一个不曾在村上见过的人，在我对面坐下来，从脸色看，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叫老板拿酒菜来，独酌起来，并盯

① 据说某特工已判一女犯人死刑，执行的头天晚上，去诱奸女犯，答应释放她，奸后第二天仍把那女犯枪毙，一个同行说他缺德，他道：“这是废物利用啊！”

着眼看我。过了一会，他走到炉灶边去问老板：“那位是谁？”老板开玩笑地对他说：“他是这里顶刮刮的。”那人问：“任什么职务的？”老板说：“大秘书。”那人问：“是主任这里的？”老板一面回答他“对啦！”一面回转头来向我做了一个鬼脸，笑了笑。那人又叫了一个菜，坐下来，想和我说话，却又不说。他吃好，坐着剔牙齿，见我也吃好了，他立起付账，并把我的账也算在内。我连忙阻止他，他连说：“小意思，小意思。”硬给我付了账。第二天中午我在那菜馆坐，又见那人匆匆进来了。他招呼我，于是又叫酒菜，我想走了，他一定要请我同喝。他问我“贵姓”，我答姓张，他就张秘书、张秘书地称呼我，似乎很亲热。在谈话中，我知道他是游击总队的总队长，在江北打游击。我问他江北怎样，他说那边都是新四军。我说：“新四军不是早解决了吗？”他说：“江南的搞掉一点，江北的越弄越多，上次我来时新四军势力不到的地方，还有十多个县，等我领了饷回去，只剩得两三个县了。”谈到后来，我问他有什么事到这里来。他答是来见主任的。我问有没有见过。他说：“跑了两天还不曾见到。”我说：“主任确不在，你有什么事？”他说：“不要说起，上面也太不原谅人。”我问他怎样。他说：“不瞒你秘书说，我一个总队的经费，长官部已经批准五百人，符号也发了。上次我来时×参谋答应先发三百人的，结果只实领到一百人的。这次我来请求增加，主任要我报告实际人数。不瞒你秘书说，我人数的确增加了不少哩！”我装得懂事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上面做事也有上面的难处，这不是一个子可以撩得落的，有一百人的实发下来，也算不错了。”他似乎气平下来，点了点头说：“张秘书！你的话也不错。不过我下面还有大队长、中队长，这点数目实在不够分配。请秘书帮一下兄弟的忙，向主任解说。”我摆着认真的样子问：“你们究竟有多少人呢？”他嘎嘴地说：“一百总要多呵。”我说：“恐怕没有吧！”他似乎说老实话的样子回答我：“不瞒你秘书说，上次已经有二十多个哩，现在确增加到六七十了，这些数目，实在不敷分配。”我说：“司令部恐怕没有照批准数发下来吧！”他说：“不会错的！不会错的！我已打听过，确照

发了。”最后我答应帮他说话。这位冒失鬼，武装特工小头子表示非常感激，又抢着会了钞。

集中营的队长们所渴慕的肥缺，所谓自己搞游击队伍，原来就是这样搞法的。这种奥妙，是我偶于无意之中得到的。其他奥妙手法，秘密把戏自然多得很，我也不需要多去探听，因为这于我除了满足好奇心之外，别无用处，而且如果给特工们发觉我知道的太多，不但永不会放我出去，弄得不好，性命都要不着实。

特工们对于我也识不透。说“顽固”不大象“顽固”，说不“顽固”又不大肯妥协。说老实却是拉一发全身动的，说不老实又有些老实相，于是他们认为是“无所谓”分子。我也乐得无所谓，假痴假呆，装聋作哑。每日喝酒剥花生，借酒遮面，高谈阔论，满口孔夫子道理。拉出“我的朋友”某某长某某员，吓唬吓唬小特工。只是那总教官看文章的眼睛虽然有些那个，嗅觉倒比较灵敏得多，他对我的考语是：“假装糊涂，实属可疑。”然而不过是可疑而已。

我们“七君子”在这几个月里，生活倒也可以过，吃得饱蓬蓬，穿得暖烘烘，又有宪兵保护，安全有保障，只是缺少一样紧要东西，就是“自由”。我们好似动物园铁丝网里面的七君子（鸟名），看得见天，却飞不上天。然而比之于象笼中鸟的队上“同学”已是特殊的囚徒了。

说起特殊的囚徒，倒记起一位道士“同学”来。这位“同学”年纪已经半百零，面庞象甘地，瘦也象甘地，两耳聋得很。他家乡就在江西，离开周田村，不过五六十里。他是道教协会会员，开会不懂手续，未经县党部允许，擅自秘密开会。有人告发他有共产党活动嫌疑，因此被捉来关在牢里，不审不问，解到集中营当“学员”。他不大认识字，两耳又聋，但仍须上课听讲。原谅他年老腿硬，又听不到口令，学洋操实在要不得，准他在旁边见习。其余还是和其他“学员”一样生活。他听不见别人的话，他也不说话，不会唱歌，不会游戏。特工当他玩物一般戏弄他，他也一概不理睬。上课感化，个别谈话，到他这里丝毫不起作用，特工们对他也没办法。

后来叫他当伙伕，又不会烧饭、挑水，只能做做打饭送菜等等下手工工作。

他家里很穷苦，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儿子十四岁，是他妻带来的前夫的儿子。平时靠他拿妖捉鬼度日。现在他自己被捉，一家五口就要饿肚子。他妻子写信来说，家里东西都卖光了，问他几时可以出来。不久又来了第二封信，说已把大女儿卖了，但又吃光了，打算卖小女儿，问他几时可以回家。他要我代写一个报告请求释放，报告上去，没有批示。第三封信又来了，是大儿子送来的，他妻子说小女儿又卖掉了。但是他没有回去。一天他妻子抱了三岁的小儿子，带着大儿子跑到集中营来，要求接见丈夫。宪兵不准她进去，她坐在特训班门口哀哀啼哭不止，特工才准道士“同学”出去接见。他妻子带哭带诉卖女儿的经过，两个女儿的身价只吃了两个多月就完了，现在只好卖儿子，已说好户头，五十块钱价钱。她舍不得母子分离，哭了一夜，决心不落，跑来商量。她讲话的声音并不十分高，可是道士似乎都懂得，他呆立着，把儿子抱过来，仔细看了一眼，又交给妻子。他叫妻子等一等，自己跑进里面，到队长面前，扑地跪下，泪如雨下，请求队长救救他。队长叫他起来，对他说：“你再打一个报告，我给你转上去。”他要求再去见妻子，却不准许了。他妻子坐在特训班外面墙角里哭到晚，被宪兵又劝又拉的赶出去。报告转上去，仍没有批示。

过了不久，集中营发生一件大事。有一个小头子养得一个独子，还一周岁不到，突然生起病来。医官看不好，请了外面中西医来看，也不见好，毛病只是天天重起来，急得他夫妇俩喊皇天。老百姓说一定触犯了什么，鬼怪在作祟，太太也以为然。说也奇怪：集中营的特工们，未曾娶妻的不算，大小官儿数十人多没有一男半女，据我所知，那时有儿子的只不过两三人而已。也许以后已有生育，也许另外有儿子，我可不知道。特工们只有在这点上还有些人性，他们没有不想急于生个儿子，也只有这点在他们唯生哲学阴阳太极图的因果观念上，有些难言之隐。现在靠祖宗福泽养得个宝贝

儿子，竟又生起病来，药石无灵，那得不挖出心头肉般的痛。就是他的同事们也为他着急、可惜。这为特工们所重视的消息，传入营中，连聋子也知道了。他对队长说，恐怕是野鬼乞食作祟，他会得捉。那小头子本来早想请道士来禳捉，只恐怕别人说他迷信。既然“学员”会捉，那最好没有。他说：“不妨试试，明知迷信无用，但也可慰太太之心。”于是买了香烛纸锭，鸡鹅鱼肉，用演剧需要的名义，借得了道冠道袍画角法剑全副行头。请拢村中七八个妇女老百姓。我们这位“同学”，仗剑禹步，作法念咒，整整忙了一天半夜，一靠那小头子的祖宗有灵，二来也是我们这位道士“同学”运道转，否极泰来，那位小公子竟渐有起色，不几天会吃奶会笑了。从此我们这位“同学”得到许多特工太太的好感。他从笼子里放到铁丝网里了，住在伙伙房，可以在周田村自由。他又得到太太们的赞扬和宣传，村子里的老百姓知道训练班道士很灵验，家人有病，就挽太太们请他来作法。第一因为我们这“同学”有求必应。第二作法念咒认真，他是聋子，只恐别人听不见，咒语声念得特别响亮，而且始终不懈。第三他不要钱，只照例请他吃几餐饭，拿些照例须拿的请鬼的酒菜。有这几种便利，老百姓乐于请他。他把拿来的酒菜送给太太队长们吃，更得特工们的信任。起初准在近邻村子去作法，逐渐十多里路外的村子来请，也准他独自去了。训练班道士名望更大起来，他索性叫大儿子设法向同行借了些行头来，住在周田村一同帮忙，生意好得很。可是等到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的时候，这位年老的道士也变成了战时的青年。自然青年不宜于迷信，不准再做迷信的行当。集中营从上饶撤退，不知他的下落如何。

我们“七君子”过着特殊囚犯的生活有十个月之久，但我们要得到自由高飞，也除非冲开铁丝网飞出去不可，我们也只有逃跑。我们七个人估计，有的冲出去之后，还不得一干二净，解决不了问题；有的体力不胜，跑不动路，有三个只要跑得出就是胜利。他们早计划了，有机会决定冲出去。他们走的那天，天气骤转春暖，我

们绒线衫绒线背心都脱在床上。我们四人同一个宪兵班长到下周田村店吃酒。我吃得兴致起，酒一杯杯的要来，上下古今地瞎扯，吃了两个多钟头，我还想吃些，宪兵班长再三催促回来，黄昏才醉醺醺踱到屋子里。副班长打好篮球回来，班长问他们三个人呢？副班长说：“在老百姓家吃东西”，班长叫他去找。我们要装镇静，摊开棋盘下棋。宪兵找来找去没有，发觉他们走了。我们也大惊小怪地发觉绒线衫衣服不见了，说他们不该偷了难友的东西走。宪兵队立刻大批动员分头去追赶。我们在默祝三个朋友一路平安。到了夜里，宪兵连长到我们房子里来问那班长“这里谁同他们要好？”那班长指出是我。连长叫着我的名字“起来！”他问我：“事先知不知道他们要开小差？”我说：“我们四个人同他们三个闹翻脸，不同他们说话已经几个月了，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们怎肯告诉我们要开小差！”问答中他捉不到一点把柄。他忿忿地自语：“看他们逃到哪里去！逃得出便是他们的！”立起走了。第二天宪兵们嗒然回来。我们的朋友已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去了。他们已是自己的，而不是那连长的了。

我们四个不逃的“君子”，当然依法连坐，总算还客气就关在住所，足不准出户，禁闭十多天。以后不准随便在村中跑，到村外更不必说。不过酒仍准我吃，菜也准我拿进来。菜馆店老板做了我临时通讯员，他们断绝不了我和外面朋友的联系。

特训班军官队合编为训导团已公布了。外面朋友又来设法营救。据说这次我无论如何可以出去。特工头子又叫我谈话，问我回到哪里去，要多少路费。我想这次无论如何可以出去了，在打算出去以后的计划。然而改编的一天，我不是出去，而是进去。我们四个人被改编到第六队去。这一队是特工们称之为文“顽固”队的，就是后来在福建赤石大暴动的一队。第三天又把我们四个人分编到第四队和第三队。第三队是武“顽固”队，诗人、报馆主笔，一变而为武人。特工们大概因为我虽属“可疑”，但还不够“顽固”，编在四队。上操、上课、劳作、唱歌不能再例外。感谢许多难友的

帮助，替我代做吃力的苦工。上操上课，体力还可应付，只是唱歌只会唱三民主义头两句，以下就做南郭先生随众口开合了。

过了个把月，又得到朋友的营救，总算仍给我特殊，免去了工作上操。靠了我的法宝——酒，很快混熟了队里的新官长们，逐渐我又可以在村中跑跑，在老百姓家坐坐。靠了那临时通讯员的交通，和宪兵朋友们的耳报，我仍旧做着广播事业。这样直到几个月之后集中营从上饶撤退。

四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金华，报纸上还在刊载着我军杀敌数千人，金兰固若金汤。日军攻陷了衢州之后，报纸上登载着我军决战衢州，又杀敌数千。日军已占领江山，报纸上是说我军予敌以重大损失后，战略转进江山。但日军不管报纸上几千几千的重大损失，还是向西进来。报纸上登载南昌日军有蠢动的消息没有两三天，日本侵略军就沿浙赣路向东推进了一大段路。这消息使我们又怕又喜，怕的是特工乘乱杀人，喜的是我们或可毕逃难逃狱于一役。

一天紧一天的消息在营中普遍传布。大小特工们虽然显得慌乱，他们却有“临难不苟”的精神，外面风声越紧，管理我们越加认真。他们天天传出消息，我军如何胜利。甚至肯泄漏秘密，说出长官部的作战计划，调集了十多万大军，诱敌深入，一鼓歼灭，要我们镇静。

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想到外面去，门口宪兵对我说：“今天你不要跑出去。”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明天告诉你。”我探头往外一望，宪兵站着双岗，队长们心慌意乱地把所有劳作用的工具，杠子锄头之类，掬到一个小天井里。叫我们晚上安静睡觉，外面有什么声响不要起来。我们知道一定有事故发生，但不知什么事。提早吹了就寝号之后，茅家岭解来三个女犯。第二天我们从新来的女“同学”那里知道了茅家岭暴动的情形。二十多人夺取了卫兵的武

器冲出去了。一个难友丢了个手榴弹打死了一个正在拔枪的班长，自己受了重伤。我们在心底里庆贺、敬佩、羡慕他们的英勇行动。我们又从宪兵口中知道当晚有三连兵去追赶了一天，惊得沿途老百姓逃难，只捉回了一个跑不动的病人，其余的连踪影都没有。但队上的官方消息说，只跑掉三个人，其余统统捉回了，并且开过火，当场打死了四个难友，全部武器被缴回，说得活龙活现。可是我们相信宪兵有资格人士的消息。

那个被捉回来的病人，以及受伤的难友，两天之后，被拖到荒山岔里，严刑审讯，要他们说出逃跑的全部计划，以及逃往的目的地。那两位的答复是用尽最后生命力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他们被乱棍打死，还没有断气，踢落在一个预先掘好的洞里，盖上泥土。同时有一个女“同学”也被枪决。她只有十七八岁，当在皖南被捕时，被野兽强奸，梅毒入膀胱，卧在床上，吃饭大小便不能起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地活受罪一年多了，她挣扎着，只希望能出去自由。因为这并非绝症，只要好好医治，是可以痊愈的，但特工们只怕她把自己受病的经过说出去，几次请求出外医治都不准。这次枪毙她，特工说是做好事，使她免除苦痛。

那新解来的三个女犯人之一，是三战区某剧团的女主角。据消息灵通方面报道，她因为不懂得做女戏子的门槛，却要自重艺人的身份，得罪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特工。他竭力替她捧场献殷勤，而她却冷冷淡淡地。每当他到后台来时，她的点头招呼不能满足他，竟动手动脚起来，有一次她发了点脾气。于是被戴上美丽的红帽子，关到茅家岭来。那特工初意不过是给她一点颜色看看，叫她肯驯服，那知茅家岭是捕虾笼，易进难出，一关已关了半年零。她被解到集中营时，却已怀着身孕，薄薄的夹衫已掩不住她的高肚子。当暴动之后那茅家岭姓王的管理员（狗头早已调升他职）被解到长官部法办。长官部接到无头状子告发那姓王的强奸女犯。军法处传那女演员去审问。集中营里有许多特工是姓王的同学同事，预先威胁她不许承认。但当她被军法官讯问为什么被捕半年多，怀孕还

不到四个月，她低头不语了。据说那姓王的管理员，两罪俱发，被判死刑，后来究竟死不死，不得而知。对于这件事，集中营特工们的舆论分两派。一派骂那不大不小的某特工，下井投石，手段太辣；一派说自己花了许多心血，得不到手，却眼看被别人顺手牵羊，安得不气愤，不报复。两派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当早晨队长宣布上饶绝对安全的一天，晚上我那临时通讯员通知我明天要撤退的确息。第二天队上果然宣布，为防备万一，保护“学员”安全起见，立刻撤退。我们好在早就打好草鞋，准备好了一切，说走就走。每人背了背包，抬着队上的公物箱子、麻袋包、大小锅子、炊具、米，以及官长们太太们的大小箱子、衣包、铺盖，每杠说少也有百斤左右。各队集合在大操场，整队出发，有几个队连床、桌、椅、茶几以及官长们府上的全部家具都一杠杠由“学员”抬着走。宪兵前后护卫着。宪兵后面跟着教官干事之类的文官和太太们的混合队，浩浩荡荡向着讳莫如深的目的地出发。

那条路是上饶人们逃难的唯一的公路，经过分水关高岭可直通到福建。当它有最紧要用处的时候，却被大水冲断了几条大小桥梁和好几段路基。在如山的军令督责下，拉着伏子在抢修，杀了几个抢修不力的乡长之类的人员之后，修得勉强可以通车。这时老百姓还在信赖固守金兰、决战衢州的话。虽然人心惶惶，却未见有何行动。老百姓也只有信赖这样的话，方能把自己镇静下来，因为现在还未到老百姓被允许逃难的时候。抗战期间，军事第一，后方的部队当然先行撤退，其次是机关。我们是属于机关一类的，应该比老百姓先走。

路上已经显得很热闹，各式汽车在路上竞赛。酒精车追过木炭车，汽油车追过酒精车，小包车又追过了大卡车。大卡车上有的挤满着男男女女，连车头上、护轮板上、脚踏板上都挤着人，有的满载货物、箱笼，有的杂堆着眠床桌椅等笨重家具，洗脚盆、马桶也在车上张开大口向着拖了两条腿走路的人们笑。独轮羊角车在汽车喇叭的叱喝声下，在路边吱吱吱地急叫。敌机沿着公路，在找

寻它轰炸目标。当隆隆的飞机声自远而近，队长们伏在路沟里喊口令叫我们坐下，却不准散开伏倒。我们仍排队在原地呆坐着，看敌机在头上盘旋。它如果愿意生下几个蛋，我们就是肉丝或肉酱。敌机的轰炸，似乎也分几个时期，这时它还在轰炸汽车时期，等到它轰炸行人的时期，我们已经到了一百五十里外的地方暂时安营了。因此我们没有在残暴的敌机下伤亡一个人。

我们队伍每天走四五十里，第一天我还可勉强跟着走。第二天脚上被草鞋轧破血泡，准许我跟着病员一起走。可是我一瘸一拐的还跟不上，后来别人都赶上去了，只剩得病弱的三个女“同学”和我，由女队长押送着。那女队长真是“巾帼英雄”，她的架子和威势比男队长还要煞有介事，一路似怨似骂地说我们拖害了她，赶不上队伍。第二天我撕了破布把脚包扎了一下，和三个女“同学”拚命在前面走，那女队长气呼呼地在后面追跟着。我们走一程坐下来休息，等她将赶到时，我们又立起走。上半天她还能拚命赶，下午走了十多里之后，不见她追上来了，直到宿营地，还不见她回来。后来知道她追赶我们不上，又恐怕我们逃脱，仗着身穿一套军装，喝住商人汽车强搭上去。汽车不等她立稳就开动，她被摔出车外，跌断了一只脚骨。

我们走了两天，路上又遇到大雨，坐在公路旁的一所小茶店里躲雨。见到后面有三个宪兵押着四个人走上來。那四个人淋得象落汤鸡，我认得其中之一是林植甫。他一向不知关在何处（新四军高级干部分开几处地方关的，石底村也是一处），到撤退的前几天才解到周田来。现在我见到他，想起石底村的几个人不知怎样。关在石底村的十个人，在我们七个人解回周田村之后，王聿先、王传馥、陈治国等四人也被送到特训班里。王传馥又被关到茅家岭，暴动时丢手榴弹重伤后被杀的就是他。有三个人逃出去，因为不认识路，被宪兵追获，一个当团长的（已忘其名）中枪后落在岩坑水潭中溺死了。那五个人的消息不知道。我正在想着，一个相识的宪兵走过来招呼我。闲谈中我问到石底村的几个人有没有解来。他

说那边发生逃亡事件后，上面不信任宪兵守卫，改由奋勇队^①负责了。我问“现在不知怎样了？”他看了看旁边有人，摇了摇头说：“不知道。”雨止了，大家都走了，我们也起身走。那宪兵有意放缓脚步，我走上去，他轻轻对我说：“黄诚、李志芳他们早被用毒药搞死了。”这是非常秘密的，叫我不要对别人说。我还想问一问真实，他加紧脚步上前去了。我听到这消息，追忆同住石底村的情景，黄、李他们的面影，那时心里难过的情状，现在已形容不出了。

我们到了驻营地方——铅山县石塘镇。我的妻子带了十岁的女儿已在那里找我。她母女在金华失陷前两天，冲出危城，逃到上饶友人处，曾来周田看过我一次。这时她搭了友人机关里的车子先到石塘来。她告诉我时局紧急以来，朋友们更着急，无空不钻的在想法营救，现在已经有了把握。她一路跟来，为的怕我在路上被人不明不白的搞掉。她喜慰我一路平安。我对于她所谓把握却仍不相信。

在石塘过了三四天，妻又来通知我，明天有人来保我出去，叫我准备好。我对于妻子的乐观，并不在心。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个朋友从铅山来，他带了长官部的公文，先去见主任后再来看我。他告诉我挽得了一个全国闻名的特务要人，直接写信给三战区的特务最高负责人要求保释我。他拿了这信件往返衢州至铅山间，涉过几处齐膝的大水，才找到了那负责人，签字批准了。他充当那要人代表来接我出去。我可以立刻出去了。话还未完，团本部来叫我去。我那朋友还有要事先回去了。我去见了主任，他说：“现在某某主任委员来保你，你出去好了。”随手写了一张条

① 奋勇队是那时新组织的武装特工，当浙赣路沦陷时，他们就在沿线各县抢掠、杀人、烧房子。老百姓把“奋勇”两字作为强取硬夺、偷盗、奸淫、烧杀的代用词。例如：我的衣服被“奋勇”去了，某人的妻子被别人“奋勇”去了。

子，要团本部给我一张差假证（集中营从来没有释放过人，没有准备着释放人犯的文件和手续）。这是出于我以及许多难友的意料之外的。前后不到一个钟头，我竟跳出深渊，成为集中营里合法出去的第一个自由人了。我那时的心境，现在只能笼统地用“悲喜交集”来形容。我脱却死囚服，穿我旧衣裳，到十多里路外的朋友那里去。路上碰到三个宪兵，点了点头已经走过去了，但其中一个宪兵却又追回来，叫我停止。我知道他以为我开小差出来，所以追来，就回头问他“什么事？”同时加紧脚步只顾走。他跑步追上，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回浙江去，给他看过了差假证。问他是不是以为我开小差，他红了红脸说：“不是！不是！不过曾经也有人象你这样从容混出去的。”他贺我得到自由。他说他也是浙江人，这次日军流窜，家乡沦陷，他的母亲和一个十二岁的弟弟不知怎样。他早想脱离这不是人干的工作。要我帮助他，将来给他觅一个职业。我答应了他可以想法，转身就走。走了十几步，回头看那宪兵还呆立着出神地望着我。他见我回头，又招呼我等一等，赶上来要我告诉他我的住处。我问他什么用意。他要说又不说地停了好一会。终于说：“我决心不愿再干这行当，准备去请长假，跟你回浙江去。”我说：“你怎么能请得准长假？”他说：“不管他妈的准不准，今晚或明天先到你这里再作计较，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带我出去，无论如何要请你救我一救。”说着眼圈有些红了。我考虑一下，对于这个被骗陷在火坑的青年的要求，非常同情，但一则我对于他并不十分了解，二则恐怕弄得不巧，又惹是非。我就回答他：“我自己到什么地方去，也无着落，当此兵荒马乱之时，无法给你找一个存身地，不如暂且忍耐，待将来有机会再说。”他听到我的拒绝，知道事实上的确困难，就双手热烈地牵着我的手说：“那末，我将来跑出来到你那里，你一定要给我设法的。”他两眼流露着象小孩子向人讨玩具般的热望。他等我给他满意答复之后才放下手。还送我到渡头，看我上了船才回去。

我在朋友的逃难住所里住着，心中只打算着到何处安身。我好

似一只久关在笼中的鸟，一旦放出笼外，反觉得天地茫茫，不知飞向何处才有林子可栖。这时前方的消息，越来越恶劣，国民党军“所向无敌”，往南“挺进”，敌在后面追踪而至。国民党军由于行动神速，使敌人望尘莫及。敌人未到上饶，国民党军早过仙霞岭、分水关逃到福建去了。但敌人在上饶火车站架炮向四面无目标的射击时，有许多机关还来不及撤完，许多大炸弹大炮弹还在拉伏子抬着丢到滔滔信水中去。起初撤到近地的部队机关，此时又立不住脚，要再往福建撤。老百姓虽未奉命逃难，到此时也只得扶老携幼，仓皇出走。这时公路上成群结队的难民、难员、难军昼夜拥退。各种车子：汽车、黄包车、手车、羊角车、土制的手推车以及小孩的摇篮车，满装着衣包箱笼杂物驰奔着。敌机肆虐更凶，沿公路扫射机枪，丢掷炸弹。死伤在敌机下的人不知有多少。沿途又没有食宿的地方，许多人都露宿挨饿。死于疲劳、疾病、饥饿的人，又不知有多少。慌乱、恐怖、悲惨，笼罩了这条几百里长的公路。

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杂在难民之中走，实在危险。我在集中营里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虎口余生，这条性命觉得格外可贵，要好好使用。于是设法把妻女挤上一辆货车先走，自己想多住几天从容的走。但敌人来势不容许我多停留，只好背了包裹作徒步长行。沿途所见真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大军过处，村屋的门板被兵爷们烧饭用了，或老百姓自己掳走藏过了。难民背不动东西，只好将空箱、棉絮，甚至棉衣等抛弃掉，更没人去拾来加重自己的负担。我行行重行行，背上的包裹也越行越重。正在弃之可惜背之太重的为难景况中，后面来了一个空手走着的青年汉子，我请他给我背一背包裹，愿意多出脚力。那汉子说：“好，我给你背，不要钱。”他满脸高兴，有得意之色，这是在无数难民的脸上所找不到的。我觉得奇怪，盘问他的来历。知道他是新兵队的壮丁，才跑出来的。他家离此只有五十里路。他说：“今天晚上还可以赶到家，家里的人会当我是鬼魂回去哩！”他很喜欢谈，一面走一面讲他自己进新兵队的故事给我听。

他先叙述了一番家境，以及如何被抽，如何花钱，如何被捆绑去，如何受虐待等等司空见惯的后方壮丁一般所遭遇的经过。之后，他说：“我被接收到新兵队里，还不到半个月，这条性命总算靠菩萨保佑，拾了来的。新兵队有好几个，我们一队因为上饶吃紧，留在铅山县境训练。共有三四百人，关在一座庙里，东洋飞机乱轰炸，大队长不准我们逃警报，七八天前飞机来了，大队长把庙里大门倒锁，自己和许多官长到外面逃警报去了。两架飞机在庙上盘旋，我们有的躲在屋里，有的伏在墙脚边、天井里。两架飞机穿梭般一来一往在头上低飞。有两个新兵吓得熬不住，爬上墙头想逃出去。这一来，不得了，两颗炸弹一齐丢下来。我伏在地上，只听到噓哩哩，轰隆，哗喇喇的声响，神志昏过去。醒来时见到一个弟兄，削去了半边头横在我脚边。黄黑的烟尘把整个脸罩得看不出，耳朵里只听到喊救命的惨厉声。有许多人已撬开大门跑出去，我想爬起来跑，两只腿已吓软，立不住又跌倒，等我冲到大门口，那大队长和十多个官擎着木壳枪、手枪，喝我们不要动。开了好几枪，打倒一个人，许多人只好退回来。叫我们排好队报数，站着不许动。这两颗断命炸弹炸去了三间大殿七间小屋，我们新兵死的伤的有一百几十个。逃走了一百多个，不死不伤又逃不掉的，只剩了百来个。当晚押到另外一个新兵队里合并去受训练。大队长召集我们训话，我听不懂，不知他讲点什么。有一个班长，胆子真大，他立正报告大队长，说官长们锁了门逃警报，害弟兄们死了这许多，实在太冤枉。大队长板了脸孔说：‘你懂得什么！飞机炸死人，不是我叫他炸的，如果我叫弟兄到外面逃警报，你们逃散了，我要砍脑袋的。你懂得什么，不许胡说。’我们弟兄听到，只觉得真气死人，却说不出道理。哎哟，先生！当兵的真比猪猡还贱！”

我问他这次怎样逃出来的。他说：“我不是逃出来的。日本兵到上饶，我们队上领不到粮，大队长、连排长、军需文书，都一个个溜掉了，没人来管我们，我们看看饭也没得吃，大家就走散了，先生！你看，我不是开小差的，保长总不能再捉我回来的吧！”他的谈

话又转到保长身上。我们谈着走着，走了二十多里路。看见前面有座炮车陷在路泥中，有十多个兵拖的拖，推的推，炮车还是深陷在泥沟里不动。汉子对我说：“先生，我不过去了，他们要抓住我拉炮车的，拉拉炮车不要紧，只怕抓住不放我回来。你是文弱的先生，不要紧的。”他把包裹交给我，急急的跨下公路，我叫他等一等，给他钱，他摇手“不要！”“不要！”从小路里向山边一个村子跑过去了。我走上前，那炮兵已拦了四五个逃难人在帮拉着，要我放下包裹也拉。幸而后面来了一辆大汽车，炮兵叫汽车挨到炮车前停住，乘客下车，把索子缚在汽车后，汽车前面拖，我们后面推，炮车很快的拖出泥沟。汽车司机下来解索子，炮兵不允许，要他直拖炮车到福建崇安。司机说车子载的人货过重，无法再拖。炮兵说出一篇军事第一、军民合作的大道理，说大炮很重要，乘客可以跑路去的。司机再三求情，炮兵只是说“不行！”“不行！”汽车里下来一个押运员，对炮兵说：“兄弟们，车子实在太重，拖不动。请你们自己多辛苦些，这点，买包香烟吃吃。”说着把一卷钞票塞到一个挂中士领章的炮兵手里。押运员挥手叫乘客上车，解了索子，汽车开走了。我急步走了十来里，才敢歇下来。到了宿夜的镇上，见到那几个逃难人由炮兵押着拖着炮车也到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包裹分成两包挑着走，出镇不到半里路，后面有个老兵挑了一只小包裹和竹筒子上来。他和我攀谈起来，听到我的口音，认做同乡。他说他要到浙江龙泉去，可不可以允许他替我挑行李。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要钱，只要认做自己人就好。他老实告诉我，他是××师出来的，那师部就在这镇上。他说当兵四年了，年纪已经快五十岁，实在吃不消。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跑到山边凉亭背后，很快地脱去军服，抛在墙角，换上预备好的老百姓装，挑起担子走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走到一个村子边，村旁有条溪水，见到那溪滩上有人聚集着，还听到有女人哭喊声，牛的惨叫声。我们跨下公路去看，看到一只黄牛缚倒在地上，两个兵按着牛头牛颈，一个兵拿

着一把菜刀在割牛的颈脖子，黄牛呜呜地叫着，一个老妇人卧在溪滩上滚着哭着，头脸被石块撞破流着血。那割牛的兵一面割，一面回头看着老妇人骂：“你妈的！一条牛要值几千元，五十元了得事，有这样便宜的牛！你妈的还哭！”拿起刀子向老妇人恐吓着，不许哭闹。另外三个兵赶开看的人，“他妈的！看什么！”我那同伴对我说：“先生，没我们事，走！”我就回身走。有两个老头儿也跟着出来，我问怎么一回事。一个老者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世界还有什么话说，那头黄牛肚子里已经有小牛，是那老婆婆家的性命。那老婆婆和我们都是这村子里的人。这条路半个月来不知走过了多少官兵，我们这村子又在路口，我们只好把牛羊猪鸡以及稍值钱的东西，还有年轻的女人都上山去躲藏。那头黄牛真也该死，好好在山上吃草的，却寻熟路回到老家来。老婆婆不见牛在山上，连忙寻下来，那牛早被兵爷们牵到溪边四蹄缚倒了。老婆婆再三恳求兵爷还了她，愿意出五十块钱送他们买肉吃。真是老虎口里讨尸首，哪会成功？老婆婆的大儿子当兵去了，大媳妇小儿子和两个女儿全靠这条牛活命。唉！这个年头，还有什么王法，老百姓真有什么好说的！”说着摇摇头进村去了。

我们走了三天，翻过四十多里的分水关，到了闽北崇安。我那同伴要分路往东走了，我给他二十块钱，他千恩万谢而去。我再走十五里，到达武夷山下的大镇赤石。我准备在赤石朋友处住下来，看时局再定行止。谁知几天后集中营也移到了赤石镇。我起初满以为从此可以不看到地狱惨景，憧憧鬼影，偏是冤家难解分。我躲在屋子里少出去，想“眼不见为净”，但仍无法瞒住我的居处。敌人声言要从江西、浙江两路会师建阳，三战区的军政大机关在武夷山边几个城市村镇里徘徊，我几个朋友也在赤石镇徬徨。我离开朋友，兵荒马乱，无路可走。后来听说集中营不准备长驻赤石，还要移到别处去，我只希望他们快走。

武夷山乃天下闻名的好风景去处。内战时期，曾是红军老根据地，老百姓还讲得出当年动人心魄的掌故，虽然红军早被“剿”走

了，“匪”化的老百姓都化作刀头之鬼了（据说当时崇安城里老百姓，逃亡、屠杀之余，只剩下九十多个人）。现在武夷山重岩叠嶂，幽谷回溪，已是官爷们的避秦桃源，太平胜境了。但大官爷们惊魂甫定，到此“赤匪”故“巢”，想起当年，不免还有些提心吊胆，惟恐余恨不尽，冤魂复活，又来与官爷们作起难来。一天夜里，司令长官公馆里的传令兵被抢去了自行车和衣物，急报长官发现“赤匪”。长官亲督卫队兜捕追拿，捉到了三个抢东西的人。人赃俱获，却不是匪徒，更不是“赤匪”，而是长官的高足，中央军校三分校的学员。这种风声鹤唳，疑神见鬼的事也不止一桩。

大官爷们担心的事件，有一天终于“来了，来了，果然来了”。集中营移营出发，第六队难友，当渡过崇溪到彼岸山上时，全体举事暴动，用石块拳头和宪兵特工肉搏后，冲逃出去。当时枪声骤起，喊杀之声动全镇，宪兵立刻大队出动追击。经验丰富的官爷，断定这是有计划的暴动，外面必有当地老“赤匪”接应，那暴动者去的方向，又是原来“匪”化颇深的山区。于是号令四处戒严，并增调大军一面协助宪兵追剿，一面作战斗准备。镇上的避难客，本已惑于杀人放火神秘怪异的胡说，今又传闻某山头有好几百披头散发，手持红缨梭镖的“赤匪”集结着的瞎话，更看到官军比临大敌还要紧严戒备的事实，真觉得屋倒偏遭连夜雨，才逃出敌人炮口下，又穿进红军梭镖中，吓得草木皆兵，不敢安枕。幸而一夜没事。去追击的宪兵队也凯旋回来了，捉到三四个暴动者以及十多个老百姓。镇上空气缓和一点，但晚上戒严，断绝交通，直到集中营移走。

我听到这事件发生，也是尽年被蛇咬，见条井绳拔脚跑。我的住处和集中营近在咫尺，曾去看过难友们，又在街上同他们招呼过。弄得不巧，会被特工们疑为接应之接应，再被弄去做“参考”^①。在不做虚心事，夜半敲门也不得不吃惊的年头，我真心虚自疑，越

① 特工办理案子，把明知与该案无关，而又不放心的人捉来，名为“参考资料”。

疑越心虚。在屋子里再也不能坐立得定，于是跑到山上一个朋友那里住几天再说，明哲保身，免惹是非。

过了两天我妻来告诉我，集中营已移到建阳去了，昨天枪毙了许许多多的人。她说：“我在窗口看到押过去的有一百多个人，我还以为也是送到建阳去的。哪知这批人走过去不多时，突然听到许多枪声。大概是南面那块荒废的大茶树地发出来的。我吓得心惊肉跳，知道那走过去的许多人，一定被惨杀了。天呀！我亲眼看到活灵灵的人才好好走过去，不过一个钟头，想他们都无缘无故地遭毒手，性命没有了，天呀！真使人不敢想下去。啊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哩！要是你还未出来的话，我那时真会发疯哩！”妻的眼眶已噙不住眼泪，声音也哽咽了。我听到这消息，只是发呆，心里还想或许不至于一百多人都被杀死，或许杀了几个，其余是陪绑恐吓的。但妻听人说的确统统被杀了，尸体还暴露着，保长在叫伙子去埋葬哩！极度的残酷惨毒，使人反映的，不是悲痛而是愤怒！

第二天我回到赤石，晚饭后想去看百多个同志们的殉难处，认记他们的埋葬地。我从小路迂回远绕向那茶树地走去，偏不巧，路上遇到三个宪兵押着两个老百姓走过来，回避不及，那宪兵班长招呼我了。我问他到哪里去，他含糊答道“前面”。看那老百姓，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一个是老婆婆，都被绳索反手剪背地捆绑着，死灰色的脸上，毫无表情，踉踉地走着。前面就是那荒废的大茶树地，这两个老百姓大概就是特工们所说的“赤匪”，或“匪”化之民了。他们正被牵到屠场去，死神在等着喝血了。我不再走过去，绕转方向，等宪兵他们走得远了，立在高处，遥望那废茶树地，只是荒草老茶丛中，有几处新翻的赭色沙土，乌鸦在上面来往飞着，还有四五个老百姓在一处，不知在干何事，大概还未做完埋葬工作吧。暮烟渐渐笼上来，野风飕飕掠过枝梢，我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向殉难的同志俯首静默，回来写了几句似诗非诗的诗句：

愿你们安息吧！同志，朋友！
你们的事业必然胜利，必然成就，
你们将与你们的事业，同垂不朽。
武夷山赤红的岩石，灿烂悠久，
崇溪的滔滔碧水，昼夜奔流，
你们的埋骨处，我清楚记认在心头。
总有这么一天，
总有这么的一天：
千万人，胜利的旗帜高擎在手，
踏上你们鲜血洒透的，这块荒丘，
含泪欢呼向你们的英魂祭告：
“你们放出去的，我们已经全收。”
“你们的荣光永耀千秋，”
“你们瞑目永息吧，同志，朋友！”

闽北的气候很不好，烟瘴闷湿，疟疾菌很会繁殖，外来的人免不了一场恶病。我那一晚回来，就疟疾发作，晒了好几天。前回在石塘要跟我走的那个宪兵，寻到了我这里。他说已经请长假，决心不干了，要向我借点路费到别处去。我问他关于赤石暴动和屠杀事件的情形，他把自己看见的以及听到的告诉了我。

当暴动的时候，他不在场。宪兵队去追捕时他也被派出去的。他们追上去，暴动的人已分路冲跑，不知去向。他们到各村子挨家落户去搜查，盘问老百姓：暴动者有否到村上来？向什么方向去？村上有没有人把食物或便衣给暴动者等。据特工头子们说，那边老百姓全是赤化过的，所以老百姓答语含糊一点的，统统捉起来。有乡保长等来保的，就释放了，其余还有十多个认为可疑的都带来了，严刑审问了几次，审问不出什么，有几个倔强的就被干掉了，还有几个被关起来。据说这一带地方，潜伏着的老红军还很多，特工大头子们恐怕跑出去的人通了他们来，和营里的“顽固分子”里应外合，于是决定镇压一下，免得再出乱子。命令各队把“顽固分子”

的名单开上去，一共有一百五十多名，经过审查，把因有社会关系而杀了之后要有麻烦的名字圈掉了十多个，其余统统决定枪毙。那被捉回来的，当然不得活命，只有王聿先因为医术高明，为集中营里姓吴的医官所佩服。那医官与特务关系少一点，认为培养这样一个医务人才真不容易，起了怜惜之念，几次以身家性命去担保，还发动了几个曾经生病由王聿先医治好的队长及太太们帮忙说话，才留得一条命。

决定枪毙的一共是一百四十一个，内中有七个是女的。叫他们排队，点了名，骗说是改编为一队到建阳去。他们走到那茶树荒地时，见到宪兵四面包围布置好火线，才知道没命可逃了。带进包围圈中，把他们分开几处后，他们就一个个倒在木壳枪、步枪、机枪的子弹下。那宪兵讲到同志们牺牲时的壮烈情形说：“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流泪喊冤枉，其余没有一个不从容倔强，视死如归，高呼口号声中倒在血泊里。有的已中了子弹，还在血泊中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有一个女的名叫杨瑞莲的，中了三枪还在喊口号，中了七枪才断气，头颅都被打碎了。”

我问他：“你有没有打枪呢？”他说：“我们除了官长班长之外，起初并不知道把他们去枪毙的，也以为这批人都是所谓‘顽固分子’，特别警戒押送到建阳去的。直到向茶树地方向走去，才觉得形势严重，必有事故。一声令下，谁敢不开枪，然而不单是我一个，许多弟兄见到这情形，实在不忍下手，闭着眼睛开枪，不但手发抖，连腿都发抖哩！我只打了一枪，不知有没有打死人。事后想想我们这样瞎打，打不中要害，反使受难人一时死不去，更苦痛。我们回来后，大家心头不知压着什么重东西，连呼吸都困难，真似做了一场恶梦。这事变给我们弟兄的刺激太大，我那时下了决心，死也要离开这刽子手队，但连长已经注意我，直到前天才出来。弟兄们这次开脱一大批哩！”

他说：“这次撤退中，‘学员’死的真不少。除了赤石枪毙的之

外，上饶出发时被搞掉的就有二十多个，路上病死的也有十几个，到建阳徐市后，患痢疾、疟疾的很多很多，已经开始有死亡了。我看留下来的，如果不能早日出去，都有死的危险。”我提起石底村被毒药搞死的几个人，他说，那几个人吃毒药没有死。当时特工请他们吃面，他们觉得可疑，都不吃，只有李子芳吃了一碗，不知什么缘故，大概是毒药放得太少或药性失效，李子芳吃了之后，只泻了泻肚子，却不死。就把他们用绳索勒死，分尸埋葬的。这次撤退中，据他所知，新四军重要干部被秘密处死的，至少在十人以上。

关于我出来之后集中营里的许多情形，因为那宪兵急于要走，我病后也疲乏，没有多谈。后来我从各方面知道这次撤退中，我们难友除了整批暴动出去之外，个别逃跑的也有几十个。在赤石被屠杀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的一个姓秦的难友，因为宪兵慌乱打枪，子弹只擦伤他头部，他昏过去却不曾死，醒后也逃了出来。集中营在周田村时，人数最多时有千把人。前后被杀死病死的有三分之一以上，逃跑出来的也有三分之一，移到建阳还有三百不到些。等到两个月之后，我设法保释三个难友，到徐市去接他们出来时只有二百左右了。在徐市又死于恶疟痢疾的不少，所谓分派工作出去的也有几十人，保释出来的，不过十数人而已。这二百人之中还包括几十个未派工作的自新分子在内。到了一年之后（那时集中营已从徐市搬到崇安城），人数又增至几百，但其中初期的难友只剩得几十人了。

上饶集中营里的新旧难友，和以后陆续不断捉进出去的，以及另外关新四军战士的铅山集中营，前后有一二千人。那四川、西安规模宏大的几个集中营里不知有多少人，各战区、各防区、各军事机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集中营，中央、各省、各专员区、各县，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监狱里，各系各派大小特工机关的公开或秘密的禁闭所里，又不知关了多少人。这总共的数目，不但一般人不能知道，就连国民党各级政府也不会知道。不知那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这两个最高特务机关，有没有调查周

详，统计完备。这以万位计数的爱国犯，他们的命运也不免和我们上饶集中营的难友同样吧！

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自由，献身于抗敌战线，不被俘于敌，不被杀于敌，却被所谓“自己人”来惨毒虐待，残酷弄死，真叫做“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种是非罪过，现代人心中都能明白，虽然还有许多地区的人，只可心里想想，不可口上明言。后代人却不大明白，认为鸟兽虫豸类里都不会有的，人类哪有此事此理。但当他读了历史，自会知道他的上代人类，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变种，这样的歪理，这样的罪恶。所以我毋须再要写下一套文章来明辨是非，口诛笔伐了。至于这篇“杂忆”呢，不过想给现代人解除些“纣之为恶，不若是其甚”的疑惑而已。但有人看了之后，认为不够周详，不够全貌，不够细腻深刻，不够精彩生动，不够……这意见我也不反对。那后代人如果偶于冷摊上发见这小本子，花几个铜子（那时一个铜子不知是否值五六元国币）买了来，经考据家的考证，认为确非小说家言，乃是身历其境，亲受其虐者的真实报道，那末，也不无可资参证之处，或有助于历史之研究和写作吧！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叶育青 王聿先

——记叶挺军长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生活片断

1941年1月，国民党的军队悍然打响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罪恶枪声，震惊中外的“皖南惨案”爆发了。山色秀丽的茂林地区一片腥风血雨。一大批新四军抗日将士，被非法关进野蛮黑暗的上饶集中营。

就在那里，我们几个人曾和叶挺军长一起度过了数月的铁窗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军长开始了他漫长的囚徒岁月……

(一)

李村，是军长被囚禁的地方。

起初，我们几个人是关在七峰岩的牢房里，还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后来，叶育青、叶一舟等同志通过看守中的一个广东籍士兵，打听到了军长的下落，又巧妙地利用同乡关系，托其带信给军长。不久，传来消息说，军长知道我们的遭遇，勃然大怒，立即向顾祝同提出了强烈抗议（顾祝同曾经答应释放军长的随从人员）。于是，我们才被卸下脚镣，从七峰岩解到了李村。那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四月间了。

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见军长的时候，心情相当复杂，说不出是喜还是忧，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似的：我们不在军长身边已有好些日子了，敌人究竟是怎样对待他的呢？看管我们的宪兵声称，军长是让王聿先去治病的。莫非是军长真的病了，还是敌人在施展诡计？……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在我们的脑海里盘旋着。

我们由宪兵“带”着，到了李村南首的一座普通的院舍跟前。这

里，气氛异乎寻常。院子门口是全副武装的双岗，院墙四周有三三两两的流动哨。走进院子，只见那一排屋子，宪兵进进出出。忽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他不是军部参谋处的赵凌波吗？我们在七峰岩时，就听说这个人已经叛变投敌了。他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的心蓦地一沉，不禁相互交换着眼色。

“不许东张西望！快走！”身后响起了宪兵的吆喝声。

我们走进一间房里，顿时，军长高大的身影映入了我们的眼帘。他正背着手，面壁而站，象是在思考着什么，又象是在凝视着墙上的什么。我们的目光越过军长的肩头，猛然看见墙上几行笔力苍劲的字迹：“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们又向四周一看，发现屋里的门上、窗上，到处都写着这一类内容的词句。

军长许是听到了响声，回头看了一下，见是我们来了，便很快地转过身来。军长的脸庞消瘦了，可是他的神态还是那样从容坦然、气宇轩昂，仍旧不失一员名将的风度。军长紧紧地和我们握着手，一再地叫我们坐下。我们噙着热泪，讷讷地不知说什么好。军长说：“我真意料不到你们也被锁上了铁镣，吃了不少苦头吧？”王聿先同志焦急地问：“军长，是你叫我来查看病的吗？”军长淡淡地一笑，随即指着王聿先同志对门外的宪兵说：“他是个医生，你们抓他做什么？！你们把他放了，让他去看病吆！”顿时，我们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军长是在设法减轻反动派对自己同志的迫害啊。军长还关切地向我们打听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同志的情况。

我们看到军长的头发、胡子都很长了，问他为什么不理发？军长用手抚着自己的下颏，诙谐地说：“既然是囚犯，就得象个囚犯的样子，名副其实嘛！”说到这里，军长严肃起来，“不恢复自由，就不理发，不刮胡子！”军长忽然想起了什么，又说：“你们看到赵凌波了吗？他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是叛徒！”军长眼里燃炽着愤怒的烈焰。“那天他来这里，被我赶走了！”原来，赵凌波是顾祝同派来劝降的。结果“说客”还未开腔，军长就迎面赏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又

拿起烤火的火炉及茶壶，劈头盖脑地砸了过去，吓得叛徒从此再也不敢登门了。可是军长哪肯饶过他，只要在院子里看见他，就会怒不可遏地动手打他。于是，赵凌波只得整天躲在宪兵的屋里，出来还得让人“陪”着，活象一条丧家之犬。

军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做叛徒是最可耻的，终究要被人们唾弃的！一个革命者，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

大概是敌人慑于军长的威力，更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从那以后，我们几个人便以“随从”的身份，每星期里能有几天可以和军长在一起。照例是在上午由宪兵“带”过来，傍晚又由宪兵“带”回去。在这期间，我们从军长那里得到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教益。

（二）

长期以来，反动派一直企图拉拢叶挺军长。当他被囚以后，敌人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接踵而至。他们之中，有的是军长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有的是军长在北伐时期的同事，如顾祝同、上官云相、茅迺公、卢旭等，这些人都是来劝降的。结果无一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有一天，来了一个戴礼帽、著大褂、穿军裤的家伙，看样子官阶不小，还带着好几个马弁。他操着一口官腔，张嘴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此人自称是军长的“旧部”，显得刚愎自用。军长只是应付地“寒暄”几句。此时，我们几个就呆在隔壁的房里。

“这个这个这个……”听得出那个家伙在军长面前“口若悬河”。

“现在对我来说，任何话题都是空的。”军长冷冷地说。

“你的意思是……”

“恢复自由！”军长斩钉截铁地说。

“啊呀，蒋委员长不是早就有意恢复你的自由吗！”

“还要恢复我部下的自由！”军长的话里没有半点余地可留。

沉寂。

“这个这个这个……，你又不是共产党里的人，何必去代人受苦呢？！你只要申明一下新四军的事情是共产党干的，那么，副司令长官也罢，军长也罢，显官厚禄就是你的了！”

“不！我是新四军的军长，如果新四军要有什么问题，一切责任应该由我承担！”军长正气凛然地说。

那个家伙的声音低了下去，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嘭！”拍案声。“新四军是抗日的部队，有何罪过！倒是你们出尔反尔，玩弄阴谋，陷害旁人！我要求成立军事法庭，立即对此案进行公审，在全民族面前判个是非，断个公理！”军长慷慨陈词。

沉寂。

“这个这个这个……”又在喋喋不休了。

“算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我要说的都写在这墙上了。……你请回吧，如夫人在家里等着呢。”军长下了逐客令。接着，响起开门的声音。

那个家伙还支支吾吾地想赖着不走。

“咣啷”一声巨响。象是什么东西被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们不由自主地冲到门口。

有个宪兵排长歹头歹脑地想进来，却被军长狠狠地一把推出门外。接着，那个家伙也拿起礼帽灰溜溜地出去了。

我们互相会心地笑了：敌人又在军长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这时，我们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这样一幕情景：有一次，我们来这里时，发现地上尽是烟蒂，军长临窗而坐，陷入深思之中，他的脸色庄重，双眼充满血丝，显然一宵未曾合眼了。军长告诉我们：顾祝同在前一天特地“请”他赴“宴”，并且有意透露蒋介石来电的内容，表示对他的“关心”。军长从中感觉到蒋介石对他仍旧存在着幻想，企图离间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我们问军长准备作何打算，军长默默地看了我们一眼，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拿出一份稿子说：“昨夜，我想了许久，决定草拟这份代电，直接给蒋介石，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他

趁早死了这条心！”代电的大致内容是：严厉驳斥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无耻诬蔑，揭穿所谓“违反军纪”不过是欺骗人民的借口；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蒋介石必须立即停止反共，共同抗日；要求立即释放新四军全体被囚人员，坚决抗议对他的秘密囚禁，并且要求公开审判。电文最后有“临电泰然”四字。军长把这份代电装进一个厚实的信封，交给宪兵排长，叫他马上寄发。后来据说，这个家伙把代电交给了顾祝同。虽然代电落到了敌人手里，没有发出去，然而，军长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豪迈的革命气概是永远不灭的。当时，叶育青同志曾用一张小纸抄录代电全文，珍藏在自己的身边。以后当他被转押别处时，这篇电文就象一团烈火似地传遍了整个看守所，在许多同志中间燃烧、蔓延……

（三）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日军的战略进攻也在不断加强。不久，这一带的上空开始出现了日军的飞机，于是我们就得经常由宪兵“陪”着跑去防空。别看这些家伙在平常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到这时一个个都是失魂落魄、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孬种。可是，偏偏就在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刻，军长却是执拗不肯离开自己的屋子，弄得敌人十分狼狈。

一天，晌午开饭的时候，突然警报声大作。顿时到处一片混乱，哨子声、叫骂声、脚步声，此起彼伏。唯独军长一人纹丝不动。被派来“侍候”军长的姓向的“副官”，急得团团打转，忙不迭声地催道：“叶军长，赶快跑吧！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军长不理他。吃完饭，军长又拿起一本书翻了起来。飞机的隆隆声渐渐地逼近了。“副官”浑身哆嗦着，说话都走了调：“军、军长，炸、炸弹一响，我们就没、没命了！”军长厌恶地转过身去，干脆闭目静坐了。“副官”哭丧着脸，硬着头皮上前去拉军长。“啪”的一声，他的手背被军长重重地打了一下。天空中响起了一片刺耳的飞机呼啸声。“副官”几乎要跪倒在军长的跟前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顾司令长官是不会放

过我的！”军长冷笑了一声，他心里要比这个“副官”更清楚：顾祝同是要对蒋介石负责的。就在这时，飞机投下的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了，贪生怕死的“副官”一骨碌地钻进床底下。军长轻蔑地瞅了他一眼，起身走到窗前，一手推开窗户，望着外面一片弥漫的烟雾……

事后，我们曾问军长为什么要这样。他半晌才说：“我叶挺是回来抗日的。”我们懂得这话的含义：当初，军长远涉重洋毅然返国，一心想为抗日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如今，竟然遭人迫害，陷身囹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侵略军在自己的国土上横冲直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让军长被人押着去躲避轰炸，这对他来说不是奇耻大辱么？！

（四）

军长虽然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他始终是与我们的党心心相印，与战友息息相通的。

那时，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经常通过各种渠道送钱给军长，而这些钱都被敌人扣压下来。但是由于国共合作在当时还没有完全破裂，蒋介石还要用“抗日”做招牌、装门面来欺骗人心；又鉴于军长是北伐名将，声望很高，故不得不“让”他三分。军长正是利用了敌人对他所谓“优待”的方便，通过不同的方式争取到了这些钱，并把钱用在狱中同志们的身上。比如，军长经常叫那个姓向的“副官”去买猪肉，自己动手做腊肉和红烧肉，随后派看押他的勤务兵分送给同志们。有时，军长就叫我们几个人趁机写一些小纸条夹在肉里，一起送出去。纸条上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如“我在此一切很好”，“团结一致，斗争到底”等，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一字值千金，字字如千钧，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集中营里的夏天，牢房闷热，蚊群围攻，加上不能洗澡、没有换洗的衣服，这种生活实在使人难熬。于是军长就逼着敌人把周副主席送来的钱，给关押在牢房里的新四军干部每人做了两套替换衣服和一顶蚊帐。军长还特别关照，做好之后一定要给陈子谷同

志送去。陈子谷是个华侨青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新四军，并且还捐献了在国外变卖了的全部家产。可是他现在受尽了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军长就是这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关心着每一个他所知道的同志。

有一次，军长听说黄诚同志病了，肚子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却无人过问。军长深感不安，就问姓向的“副官”是怎么回事。那个家伙倒是讲了真话，说是因为黄诚不肯写自首书，所以现在要罚他。军长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副官”的鼻子怒声责问：“你们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为什么不给黄诚治病？！为什么见死不救？！我看你们上上下下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大概是敌人慑于军长的“特殊”身份，不得不派了他们的一个医官去给黄诚同志看病。可是军长依然放心不下，又把医官叫来询问病情，这个医官衣冠楚楚，派头十足，但却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个病由来。军长又是气又是急，恰好这时我们到了那里，军长立刻叫“副官”带着王聿先同志去给黄诚同志看病。诊断之后才知是患急性阑尾炎。后来经过王聿先同志的精心治疗，才使黄诚同志得以痊愈。

（五）

“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这是军长写在囚室墙壁上的又一名言。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记得我们刚来“陪”军长的时候，他几次都以沉痛的心情谈起了皖南事变。军长曾经总结了这么几点教训：一、行军的路线没有选择好，走的尽是山路。二、战斗打响之后，没有掌握好战机，该冲过去的，不敢冲过去。三、在部队突围的时候，我方有人在山头燃起火把，明显地暴露了自己。四、突围的方向没有选择好，应该是转向原军部的驻地云岭，那里的群众基础好，而且守敌是川军，与蒋介石有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可是后来却往敌五十二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位置突围，结果落入了敌人的口袋。军长讲的这些教训，对我们亲身经历过皖南事变的人来说，体会是很深的。

1940年6、7月间，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驱兵直入苏境，中国的反动势力趁机兴风作浪，鼓吹“苏联必败论”。李村的敌人叫嚷：“共产党的老家都快要完蛋了，你们还能坚持出什么名堂？！”甚至放出谣言，说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已经相继沦陷。面对这一情况，军长相当冷静，他用石块在屋外的沙地上，绘了一幅简单的苏德战争形势图，以此跟我们讲解战局，分析形势。军长认为：战争的胜负，并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弃守。在苏德战争初期，由于德国法西斯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仗着飞机加坦克的“闪电战”侵占了苏联部分领土，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战争史上，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德国法西斯越深入苏联国境，战线就拉得越长，就会处处受到牵制和打击，使自己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何况苏联幅员辽阔，在远东的重工业又有雄厚的基础，潜在的力量是强大的，最后德军在苏军反攻下必将全面崩溃。军长又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密信，传给狱中的同志们，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无耻澜言。

盛夏的一个黄昏，天穹云幕低垂，远处闷雷隆隆，连一丝风儿也没有，又闷又热，预示着一场暴雨的将临。按常规，再过一会儿，宪兵又要“带”我们回去了。这时，军长拉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我们又要分开了……他们很可能要在最近把我送到后方去，也有可能半路上就把我干掉。”军长顿了顿，眼神中闪烁着光芒，坚定地说：“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决不会做出任何对党不利的东西！”果然，在这次谈话后不几天，军长就被敌人秘密地强行押走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敬爱的叶挺军长。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军长当时最喜欢的话语。当年他出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特地请郭沫若同志将这句话写成一幅中堂。军长以“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贵气节，最后求得“在烈火和热血中的永生”。

在那以后漫长的艰难征途上，我们就是以军长的这种精神激励着自己，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1979年2月初稿

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林秋若

——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

我们望得见灵山，
一座不屈的山！
它显得多么伟美——
崎岖、峥嵘，
一连串的高峰直矗到天际。
有时它笼罩在梦一般的云里，
它自己也显得和云一般的奇伟。……
这地方的人又指给我，就在这灵山，
伟大的战斗者，重聚了大军，
坚持大义的血旗——
披靡着东南整个的地区，……
……

从这山，我懂得了历史悲剧的不可免，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奔赴那悲剧而毫
无惧色，而永不退屈！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生来就为世界的理想的
实现；
……

一座不屈的山，
我们这代人的姿影。
一个悲哀和一个圣迹，

然而一个号召和一个标记!

这是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里避开敌人的监视,忍着病痛,断断续续写成的诗——《灵山歌》中的一首。这首诗,是他在狱中为纪念江西苏区革命先驱方志敏同志而写的。冯雪峰同志在这首诗的“注”里说:“灵山在江西玉山与上饶县境,自玉山连绵至上饶北部,有九十余里,原是有名的山,其雄伟挺拔之美,令人神往。又因这地带即为1928年后工农民主革命军方志敏部的战区,而灵山常为其退守及生养之地,遂更有名,且为当地人民所隐秘地爱慕。……我们朝夕举首以望,遥遥相对,而难友中即有属于方军旧部的当地的农民战士。”

诗言志,这首《灵山歌》,也是冯雪峰同志抒发自己内心活动的歌。在当时面对着死亡,面对着国民党法西斯特务残酷迫害的黑暗日子里,他在诗里表达了自己决心以方志敏烈士为榜样,为革命“奔赴那悲剧而毫无惧色,而永不退屈”的坚定精神。

雪峰同志在狱中抱病写的几十首长短短诗,都是在离开特训班前不到一年时间内写成的。这些诗稿以及赖少其同志的多幅插画,曾于1942年3、4月间托人带给上饶地下党员廖卜三同志保管,由于白色恐怖和日本帝国主义飞机对上饶地区的轰炸,环境十分动荡,使这些诗、画全部散失。雪峰同志1943年到重庆后出版的《真实之歌》是他根据自己所保存的底稿整理而成的。后来他又从中选出十七首,题名《灵山歌》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过。今天重新阅读时,他那种对于已经牺牲了的和还活着的难友们的深厚的感情和真挚的怀念,依然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对雪峰同志更加怀着不尽的哀思和崇敬。

冯雪峰同志是1941年2月16日,在他的家乡浙江义乌县神坛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那时正是“皖南事变”后一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大肆搜捕各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月25日一夜之间,他们在浙江金华搜捕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浙江妇女》

杂志、《浙江潮》杂志社等进步文化组织的十多个革命同志。一位进步青年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冯雪峰，国民党特务当时正严密检查一切来往信件，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发现这封信有问题，于是三个便衣特务象三条恶狼，星夜扑向神坛村。冯雪峰同志当时已经知道形势恶化，早把一些文件和进步书报隐藏起来了，宪兵们扑了一个空，什么东西也没有搜查到，就把冯雪峰同志押解到了金华宪兵连。很快又转押到了江西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团部。

特务们立即对这个“要犯”进行了审讯，周围气氛紧张，如临大敌。

“你是共产党，还不快说！”

“不是。”

“你是新四军！什么时候去新四军的？”

“没有去过，我不是。”

“你和金华抓来的这些共产党是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们。”

“你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共产党一边的人！”

“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搞历史的。”冯雪峰同志随口编了一个履历，并立即向敌人反击：“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即放我出去！”

“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我们就放你！”狡猾的敌人改变策略以退为进。

“笑话！我同共产党、新四军本来就没有关系，登这样的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冯雪峰一口回绝，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审讯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当然，敌人是不会放他的。没有几天，冯雪峰同志就被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茅家岭禁闭所。

茅家岭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牢狱，特务用惨无人道的苦刑，非人的生活，折磨着“政治犯”，使得人们身体衰弱到极点。牢狱里时常

有疾病流行，不断发生死亡。雪峰同志到茅家岭不久，就染上了监狱里的流行病——回归热。连续的高烧，摧毁了他的健康，他躺在牢房的木板上，再也起不来了。茅家岭监狱的特务所长卫俊立，是一个既阴险又狡诈的家伙，他怕雪峰同志死在茅家岭对他不利，一天，他搞了一付担架，就把病得不能动弹的雪峰同志抬到了几里路外的周田村集中营“入学”。从此，雪峰同志就被囚禁到了上饶集中营的“特训班”，和我们战斗、生活在一起了。这是1941年4月间的事。

回归热从茅家岭蔓延到了整个集中营，它象是国民党特务的帮凶，向我们展开了残酷的进攻，一个又一个的同志被夺去了生命。雪峰同志也处在危险中。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病魔杀害呢？被俘的新四军军医经过确诊，断定“敌人”是回归热之后，郭静唐等同志自动筹款去买针药，就这样把“敌人”消灭了，包括雪峰同志在内的一些患病的战友才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

雪峰同志和其他病友一起，从医务所回来的第一天晚上，就受到一次惨不忍睹的体罚。由于这次送来的病友多，因此在熄灯前床位还未安排好，这本来是看守人员自己的责任，可是因为我们是“囚徒”，什么罪恶的鞭子都可以任意往你身上抽。敌人看到熄灯哨子吹了好几遍，牢房里还在闹腾腾地安静不下来，于是就吹哨子紧急集合。不管病人、老人、妇女，所有特训班“学员”统统集合起来跑步，深更半夜里一连跑了几个小时。雪峰等患了重病的同志，刚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就遭到这一场残酷的迫害，真是法西斯特务们兽性的大发作！

冯雪峰同志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不管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和套供，都没有在敌人面前泄露一点党的机密，并且还巧妙地把自已的身份隐蔽了起来。在监狱里他用的是“冯福春”这个老家的小名，并且编造了一套“个人经历”应付敌人。特务们面对着这样一个沉着坚定而又机智的共产党人，也无计可施，他们把冯福春写的“自传”丢进了火盆，知道这类所谓“自传”里，是一点有用的东西都不

会有的。

一天，特务总教官肖芬突然把雪峰同志叫去“谈话”。雪峰刚走进门，肖芬劈头一句就问：“胡秋原你认识吗？”

“我认得，”雪峰同志沉着地回答。

“哈，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胡秋原就是有名的共产党！”肖芬象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秘密，显得十分得意。

雪峰同志听了，不禁暗暗地发笑，这个特务居然还是一个总教官，却连胡秋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就告诉他：“胡秋原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以前他是陈铭枢一派的……。”

“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冯雪峰吗？”肖芬突然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使雪峰同志吃了一惊，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呢？但雪峰同志很快就镇定下来，沉着地回答：“是的，我在胡秋原编的杂志上写过文章，就用的这个笔名。”其实，雪峰同志从来也没有在胡秋原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肖芬只问了这几句，再也谈不下去了。雪峰同志走出来后，分析了刚才谈话的情况，十分明显，这个特务是个十足无知的蠢家伙，他对雪峰同志过去在上海文化界搞革命活动竟一无所知。但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呢？是不是有人要胡秋原打电报来保我呢？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庆才知道了底细。董必武同志告诉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董老当时不知道雪峰同志在集中营里用的是冯福春这个名字。

其实，雪峰同志的身份，在他刚到特训班时，我和极少数几个同志就知道了，以后其他一些可靠的同志也都了解了。当时敌人给我们“学习”用的反动书籍中，就有一本（忘了书名）书里写有雪峰的经历，说他是党中央六大候补委员（雪峰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敌人误传作党中央候补委员了）。我们自己的同志，知道他的身份后，对他更加尊重，有情况总是向他反映，遇到问题总是找他商量。从越狱逃跑这样的大事，到同志间团结那样

的小事都找他谈,有的要靠他拿主意。他和我们的珍贵友谊是在严峻斗争中结成的。他和我们少数几个人确是无话不谈,在那样苦难的岁月中,这种谈心是我们精神生活上最大的安慰和鼓舞。我们常常利用劳动休息的机会,找块石头坐下来和他一起聊天。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他毫不隐晦地对我说,在中国,他第一佩服毛主席,此外,他也十分钦佩鲁迅先生。1936年春,党中央派他到上海同各界救亡运动领袖联系,向他们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要他找鲁迅,把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告诉鲁迅,这是因为他和鲁迅先生彼此相知较深的缘故。他还告诉我,在他去上海之前,毛主席曾在瓦窑堡同他促膝谈心,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对他启发很大,因此,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坚决拥护的。我从他当时的谈话中还知道,周副主席对他也是很信任很关心的。1936年他离开瓦窑堡去上海前,周副主席交给他活动经费和通讯联络用的暗号,要他到上海设法建立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况尽快告诉中央。1942年底,我到重庆向周副主席汇报上饶集中营这个特殊监狱的残酷斗争情况(包括新四军高级将领受到的迫害以及狱中同志们斗争的经过,尤其是茅家岭和赤石两次有名的暴动情况)时,周副主席特别仔细地问我关于雪峰同志在狱中的一切,这也说明了周副主席确实对他是很关心的。

还有一件事要提及的,冯雪峰与瞿秋白的友谊非常深,在江西中央苏区分别时(冯雪峰是被批准参加长征的,而瞿秋白在王明打击下,没能参加长征。瞿就是因为没有参加长征,不幸在江西苏区被敌人逮捕杀害),恋恋不舍,于是瞿秋白就送冯雪峰一件灰色哗叽长袍作留念。冯十分珍惜这种深厚的友谊,一直把这件长袍留在自己身边,被捕后还带进集中营,以后又带出集中营。

有一次,我同雪峰同志聊天,谈到1939年5月我在新四军军部看到史沫特莱的情况时,他告诉我,1936年他刚到上海不几天,就在鲁迅家里会见了史沫特莱,他和她整整谈了两个下午,除了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外,更多的是谈红军长征的经过。后来我从郭

静唐同志那里听说，史沫特莱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消息的外国记者，她的这个报道，便是雪峰同志向她介绍红军长征经过后写成的。斯诺去延安，也是雪峰同志给挂的钩。这要从建立秘密电台谈起，前面说过，周副主席叫他到白区建立电台，从此，白区和中央的联系就方便多了。斯诺要去延安访问，最早是向宋庆龄先生提出的，通过雪峰同志向中央请示，总理代表中央表示欢迎，雪峰同志便将中央的意见请宋庆龄先生转告斯诺后，立即派一个人到西安，用“牧师”身份和斯诺联系（事先约定请斯诺住在西安禁烟委员会等候），这个“牧师”把斯诺送到预定地点后才离开。

我当时听到上面这两段消息后，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国民党虽然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中国人民知道红军英勇斗争的事迹，也不让中国人民知道中国还有陕甘宁这样的解放区，但他们封锁不了世界人民的耳目，通过史沫特莱和斯诺这两位国际友好人士的访问，全世界人民很快就知道了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也知道中国有个延安以及整个陕甘宁边区这样的革命圣地。

疾病不断地折磨着冯雪峰同志，他在治愈了回归热之后不久，又患了严重的肋骨结核病。有一天，因为做了一整天苦工，雪峰同志累得精疲力竭，回来后扑在高低不平的两块硬板上就睡着了，结果压坏了左胸的肋骨，逐渐红肿化脓，疼得厉害。特务们当然不会管你的死活，后来还是由特训班里的难友，原来是外科医生的毛鹏仙，用刻图章的刀动了手术，挤出脓来。因为刀和代替纱布用的破布，都没有条件进行消毒，结果感染了结核菌。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内，肋骨结核的疼痛一直折磨着雪峰同志，有时候脓血渗透外衣流了出来。就这样毫无人性的特务还逼着他跑步。我们经常看到他一只手按着剧痛的胸口艰难地蹒跚着，非常勉强地跟在队伍后面，有时实在支持不住，竟跌倒在地上。见此情景，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悲愤。

疾病摧毁了雪峰同志的健康，但摧毁不了他坚持革命的意志。

他到集中营特训班以后，很快与王闻识、钟袁平、项牲等党员（这三位同志后来都牺牲在狱中）分头建立了秘密联系，经常互相交换情况，研究对敌斗争策略。

雪峰同志和我们建立组织关系不久，就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尖锐斗争。当时国内外以至狱内形势都很紧张，敌人又在乘机造谣惑众，革命队伍内部也开始发生分歧。正在这时候，雪峰同志送一首鲁迅先生的诗勉励我，并让项牲同志替我写在扇面上作为纪念，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教益。诗的内容是：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他在此时此刻赠我这首诗，其含意的深刻我是十分理解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对外采取不抵抗的投降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的专政，祖国陷在灾难深重的苦境之中，我们这些戴着脚镣手铐信仰共产主义的战士，此时此地虽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仍要用至死不渝的斗争精神，以自己的热血，来表明我们是不愧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子孙。

雪峰同志不仅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来激励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难友，而且也表达了他自己忠贞不渝的浩然正气。

1941年5月间，特训班特务队长王寿山，为了表现他“管教”政治犯有方，向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邀功，在特训班里办起了一张壁报，要冯雪峰等五个人负责编辑。这件事能不能做？雪峰同志和几个党员进行了慎重的讨论研究，最后一致认为可以做，但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即绝对不发表反共、攻击新四军和颂扬敌人以及悔过自新的东西，相反，要利用这个墙报，以巧妙隐晦的手法，来教育和鼓舞同志们的斗志，讽刺打击敌人。于是，墙报很快就出版了，上面有歌颂自由、抨击黑暗的诗，有含蓄地讽刺敌人的散文，还有漫画、科学知识小品，等等。我记得有这样一些作品：《普罗美修斯偷火到人间》一诗，是借希腊的神话，鼓舞大家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应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进行不屈斗争；《逆水行舟》一文是告

诫大家在那黑沉沉的监狱里，不能销蚀斗志，仍要继续前进，决不可后退让步；《以不变应万变》一文则是叮嘱大家，在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敌人面前，要沉着地应付各种各样的不测风云。有的文章也不隐蔽我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和敌人斗争。例如反动教官姜移山在一次“讲话”中，攻击苏联，造谣说“莫斯科已经失守，斯大林和希特勒和解了，中共失去了依靠”。陈念棣同志在墙报上写了《世界往哪里去》的文章，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莫斯科不是巴黎，斯大林决不是贝当。”同志们看了都很高兴，集中营里别的队的同志闻讯，也找机会过来看。无知的特务队长王寿山看着花花绿绿的墙报，又见读者不少，十分得意，在其他特务队长面前神气活现，夸耀自己的“政绩”。一天，他还特地邀请了特务头子张超等人亲临观看，并由他在旁作陪。随同张超前来的，是特务总教官肖芬，这个人鬼得很，他和特务总干事杜筱亭一起，和王寿山有深刻的矛盾。王寿山把特训班当成是自己升官发财的一块肥肉，绝对不许别人染指。而杜筱亭是个空头总干事，没有实权，他老想插进手来分一点好处。他们比王寿山毕竟“高明”一些，当肖芬看到墙报上有赖少其同志的一幅画，画着一只雄鹰，在高空展翅飞翔，越过了铁丝网，向远方飞去，且署名“高飞”，就连连惊呼：“不行，不行，这画有问题。”特务头子张超也是个笨蛋，他开始也没有看出“问题”，经肖芬一说，才连连点头。这使王寿山十分狼狈，特务们一走，他就立即勒令墙报停刊，并且把几期墙报稿件统统烧掉，“毁尸灭迹”，免得杜筱亭再来找“问题”，给他添麻烦。

一场闹剧结束了。国民党特务又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在特务总干事杜筱亭主使下，他们把雪峰同志等七个人与大伙隔离，单独集中在一起，要他们写文章。特务想通过这个方法，来考察雪峰同志等人的思想，以便进一步迫害他们。雪峰同志写了两首谁也看不懂的古言诗给特务，杜筱亭拿了这两首古言诗，翻来复去嗅不出一丝“问题”，使他哭笑不得，只好作罢。

雪峰同志虽然经常处在被隔离的状况下，没能和大伙在一起，

但他对特训班同志们的斗争始终十分关怀。记得是1942年元月间，他被囚禁在石底（这里关押着被俘的新四军高级干部黄诚、李子芳等十几位同志），我在特训班里听说国民党特务在策划一个阴谋，要强迫特训班的同志集体自首，便偷偷写了一张条子，托到石底去送饭的翁元生（即郑丹甫）同志带给雪峰同志，把这个重要消息告诉了他。雪峰同志和王闻识同志研究后，立即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由他执笔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要我转告特训班的地下党组织，对特务的这个阴谋，无论如何都必须顶住，就是杀头也必须顶住。同时还要特训班的党组织注意团结自己的同志。当时，敌人为了分化我们，制造我们内部的不和，他们要少数几个同志担任“分队长”，带我们出操和做苦工。有些同志因此就怀疑这几个人是不是叛变了？并且孤立他们，甚至讥讽和打击他们。这使那几个同志十分苦闷，他们就把自己的苦闷设法告诉了雪峰同志。雪峰同志知道他们几个是好同志，便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团结，要体谅他们的苦衷，不要孤立和打击他们而中敌人的圈套。后来的事实证明，雪峰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在当过“分队长”的人中，有几个人都先后参加暴动或集体逃跑出去，后来也都回到了革命队伍。

特训班同志在得到雪峰同志通知之前，就进行了反自首斗争，不但拒绝签名自首，而且有部分同志还联名书面要求特训班头子履行他们的“诺言”，按期结束训练，以揭露他们所谓期满释放的谎言。为此，宿文浩和项牲同志都被五花大绑押到茅家岭禁闭室去了。但是在狱中党组织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团结斗争面前，敌人强迫大家集体自首的阴谋最后还是被粉碎了。

在狱中，雪峰同志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观察力，告诫同志们，不能对敌人抱任何幻想，必须坚决与之斗争才是出路。他被编到“文化组”去不久，就打算和王闻识一起逃跑。他告诉过我，他和王闻识同志共同在做宪兵副班长的工作，这个人姓梁，是广西人，王闻识的同乡，当工作进行得有点眉目时，恰好计惜英同志等三人逃跑成功了，敌人对留下的人加紧管押，雪峰同志也就无法实现他

们原来的计划。后来，他的健康越来越坏，使他不可能直接参加越狱斗争，但他鼓励和帮助同志们越狱。他被囚禁在石底的时候，特务禁止他们几个人和关在石底的新四军“要犯”接触，但雪峰同志借口看病，偷偷和他们接近，给他们传递过一些外界的消息，也曾在经济上给他们出过力。有一次，他告诉和黄诚等同志关在一起的陈子谷同志，要他们设法赶快逃跑出去，不能迟疑。因为他估计，敌人对这些“要犯”是早晚要下毒手的。可惜，石底的同志越狱没有成功而先后遇难。黄诚、李子芳两同志就是被特务惨无人道地用毒药杀害的。

在敌人的枪口下越狱逃跑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尤其需要党和同志们热情帮助和支持。在那黑暗的牢狱里，这种鼓励和帮助是最可贵的阶级友爱。当时赖少其同志决心要逃跑，偷偷地去和雪峰同志商量，雪峰同志积极支持他，把身边仅有的几十元钱送给他作路费，给他开了一张在浙南的几个可靠朋友的地址（这些人都是王闻识和郭静唐同志的朋友），使他跑到浙南以后，可以找到地方隐蔽下来。在雪峰同志的帮助下，赖少其同志终于顺利地逃出了魔窟，回到了新四军敌后根据地。在集中营中参加剧团、球队集体逃跑的少数同志，也曾同冯雪峰、郭静唐两人商量过，并由他们提供出去后联系的地点。曾和雪峰同志一起住过医务所的三位女同志，在集中营向福建转移前夕乘机逃跑，也是得到雪峰同志支持的。

和雪峰同志关在一起的计惜英同志等三个人的逃跑，更得到了雪峰同志的极大支持和帮助。早在1941年的冬天，雪峰同志就和计惜英同志谈起，说你们还年轻，不能在集中营里被敌人折磨而死，应该设法逃出去，为革命工作。雪峰同志告诉他们，在逃跑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和别人的几件好衣物都“偷”走，这样，一则可以解决路上的路费问题，二则可以减少敌人对留下的几个人有“参与共谋”的怀疑。雪峰同志还特别叮嘱计惜英同志，不要忘了“偷”走他那件家里才寄来还没有穿过的毛线背心，它可以多换几个钱

用。他们商定在傍晚的时候逃跑。这天吃过晚饭，雪峰同志策动郭静唐，要求看管他们的宪兵班长带他们余下的几个人到周田村南面半里路的一个小酒店去喝酒。到了小酒店以后，雪峰同志又尽量设法拖延时间，直到天黑才回来，这时宪兵们才发现计惜英同志等三个人逃跑了。这次事件发生之后，逃跑的三个人得到了自由，但雪峰同志等却遇到了更大的迫害，特务们把怒火发泄到他们身上，从此彻底取消了本来就很可怜的一点“自由活动”。

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里曾经写过一首题为《火》的诗，其中有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
你投掷在黑夜！
你燃烧在黑夜！

我心中有一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让它越燃越炽烈！

雪峰同志就是燃烧在上饶集中营漫长夜里的一团火，他和集中营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斗争火炬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堆熊熊大火，照亮了黑夜。

1942年5月25日，我国监狱史上的空前壮举——茅家岭暴动胜利成功之后，上饶集中营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了。特务们对雪峰同志的迫害也越来越残酷。他被分到六中队不几天，又和王闻识同志一起，被编到了集中营里以残酷虐待革命同志闻名的另一个“顽固队”——第三中队。如果说上饶集中营是一个黑牢狱，那么三队就是黑牢狱的最底层。杀人不眨眼的特务队长曾恭生监督着“囚犯”们整天做各种苦役，或者转车轮似地逼着大伙在广场上跑步，即使在晚上，还要在床前的一小块地上

不断运动,直到把你弄得精疲力竭为止。当时,雪峰同志的肋骨结核病更严重,但依然未能幸免。在跑步的时候,他一手按住胸部,连腰也直不起来,还得一步步的跟在后边跑,每次跑不了几步,就摔倒在地。

1942年11月间,集中营从江西上饶迁移到福建建阳县城南三十里的徐市,雪峰同志的病越加重了,经郭静唐、宦乡等同志的几经交涉,特务头子张超被迫答应“交保出外治病”,限期是三个月,“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就这样,雪峰同志终于在1942年底,被营救了出来。后来,愚蠢的国民党特务知道了冯福春就是上海革命文化人冯雪峰,并且出狱后又在重庆的文坛上开展了革命文化活动,才知道上了当,他们还梦想把雪峰同志再抓回去,但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了,雪峰同志已经回到了党的怀抱,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

1979年8月

上饶集中营罪行

陈念棣

“新四军的解散(?)，完全是一个军纪问题(?)，丝毫不涉及政治问题或党派问题(?)。”这是反动派头子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公开发表的言论。但新四军的成千有功无罪而被俘的干部和战斗员，在江西上饶集中营中究竟遇到怎样的“军纪问题”呢？究竟过的是怎样的“受训生活”呢？举军官大队第三队来作一个例子吧！

一 空前的残忍

“国民党中央‘宽大’为怀，对于你们这批新四军的干部，只要你们能认识‘错误’，‘悔过自新’，我们绝‘不咎既往’。”这是我们一到集中营后，集中营的最高负责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级情报参谋卢旭和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情报专员张超向我们“训示”的。但是所谓“宽大”的内容是怎样的呢？管我们的班长是特工；管我们的排长是特工；管我们的队长是特工；门口有宪兵；门外有围墙；围墙外面有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宪兵连的军事哨；军事哨的外围是长官部特务团的排哨和连哨。出外有宪兵跟；出操有机枪看；白天两顿粥；晚上宪兵防。卢旭又说：“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当俘虏看。”而事实上，我们的名单上就注着“匪犯”，连夜里小便都得要经宪兵批准才行。明明有病的人，硬要你去挑二百斤一包米。这些就是“宽大”待遇。而更惨的还在后面，举几个事实吧：

第一个是越南青年华侨黄迪菲同志。他参加新四军还不到两个月，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反动派晓得他不是共产党员，因此要他写一篇“新四军叛变经过”的论文；他不写。有一天，指导员叫他

去了，一进房间，立刻将黄同志的一千度的眼镜和上身的棉衣、衬衣脱下。这是十一月的天气，黄同志立正在那里，冷得发抖了。

“你论文写了没有？”指导员问。

“没有写！”

“为什么不写？”

“不会写！”

“怎么，你是一个大学生，不会写文章？”

“不一定个个大学生都会写文章的！”

“好！我问你，你读过三民主义没有？”

“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都读过三民主义的。”

“那么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呢？”

“你们那样的三民主义不信仰！”

“为什么不信仰呢？”

“你自称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拿这样的法西斯手段对付革命青年，叫我还要信仰什么东西？”

“好！你顽固！”

于是衣服全部剥光，送进一间幽暗、空洞的房间里，冻饿两天以后，队长、指导员又叫他去了，一进门后，队长就问：

“怎么样？”

“没有什么！”

“考虑过了没有？”

“考虑过了！”

“怎么样？”

“不信仰！”

“不信仰！”队长怒吼一声，当胸就是一拳。

黄同志被这一击，退到墙壁上去了。

“好顽固的东西，看你再顽固不顽固。”接着又是当胸几拳。黄同志被击得昏过去了，醒来时，已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围着几个自己的同志，黄同志觉得胸部很痛，喉咙一痒，口中吐出血来；伤重

了！

第二个轮到郭胜同志了。由于郭胜同志高度的坚决性和顽强性，使他尝受了两次非人刑罚。第一次是这样的：在十一月的天气里，把他浑身剥得精光，把四肢缚在一棵树上，活活的冻他，在冰冷刺骨的寒风里，郭胜同志死去活来数次，始终坚强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他放了。第二次是将他拖到山下，掀倒地上，四肢拖着。用扁担、木棍，浑身毒打，把郭胜同志的脚胫都打坏了，死去活来又数次，但郭胜同志仍同以前一样，死不屈服，敌人无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

第三个轮到了马潞同志。对他采取的是特别办法，既不打，也不埋，也不是冻，而是整天的出“特别操”。除了吃饭，就让你在太阳底下出特别操，九个班长，每人一小时，轮流喊口令。特别操的内容是：立正、稍息、跪下、卧倒、齐步、跑步、慢步、正步、原地跑步，既不让你歇，又要你操得好，动作一差，则当胸一拳，太热昏倒了，则用冷水浇醒后再来。不到三天，马潞同志变成了一个呆头呆脑的傻瓜，三天之后马潞同志疯了！

二 所谓“军事训练”

集中营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军官大队，一个是特别训练班，对外的名义是“受训”，吃的是沙米稀饭，无油菜汤，穿的是一式军衣，无疑的，当然是过着军事训练生活了。

但我们的军事训练，却与普通一般的军事训练有些不同，不同在哪里呢？

第一，班与班之间不准来往，当然更不准讲话。本班同志两个人讲话时，不准耳语或小声，应该大声的高谈阔论，声音之大，要全房能听得见。白昼空闲时，集合在操场上晒太阳、捉虱子，不许乱跑。目的是什么呢？怕你们造反、逃跑。

第二，晚上睡觉，挨次排好，睡下以后，不准乱动。假使有谁要抓一抓痒的话，班长看见，就得罚你光身站在床前，立正站一整夜。

要大小便，先得向班长报告，允许之后，才能翻身起床。有一次，有一个同志半夜里要大便，他在床上，一动不敢动，先向班长报告：

“报告，大便！”

班长只装不听见。

“报告，大便！”那位同志发急了。

还是装作不听见。

没有办法，大便又忍不住，只得拿一张报纸铺在床上，拉了后，将它包好。因为很臭，无意之间，睡在旁边的一位同志，轻轻的问了：

“怎么这样臭的？”

报告听不见，轻轻的耳语，班长却尖起耳朵听见了，他忙走过来，严厉地问道：

“讲什么？”

瞒不过了，只得照直说，结果大便的同志光身站了一夜。第二天，奉队长之命，在泥墙下部挖一个洞，将那包大便放在洞里，然后拖那位大便的同志过来，队长问道：

“是你拉的吗？”

“是的。”

“好！今天就处罚你跪在墙前，把你的鼻子塞进洞里，去闻你的屎臭，这就叫自己拉屎自己闻！”

“……………”

“怎么？快跪下去。”

第三，军事训练的第三个内容是处罚，其中有一种最普遍的处罚方法，叫三点成一线。什么叫三点成一线呢？就是当你有些地方，象内务不够整齐，公差不够努力，使班长对你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要你三点：后脑、臀部、脚后跟，紧贴墙壁，站成一线；这还不算数，而且还得要在你的膝弯里，加一块瓦砖，以作你是否紧靠墙壁，是否三点成了一线的标准，假使砖头落了，证明你三点未成一线时，则老拳相向，当胸猛击，打到你咯血昏倒为止；假使你老老实实，三

点成了一线的话，则不要一刻钟，也就可以使你受不了。

第四，军事训练的第四个内容，就是有名的四大周，且举清乡、迅速两周以示一例。

第一周是清乡周：

长期的集中营生活，在精神上是非常苦闷的，因此，大家都只得偷空抄些前线日报上的文艺和诗篇，学一些英文、日文，庶不致白白浪费了这一部分可宝贵的光阴。过去我们常常听说，监狱是学校，许多同志在被捕的时期内，理论上的修养提高了。但今天集中营的生活环境，已非昔日牢狱生活可比，反动派是狡猾得多了，不给你什么书看。要看书是有的，《尖兵》（反共专刊）、蒋介石的《总理遗教六训》、《抗战军纪论》（专为皖变而出版的，骂新四军的）一类；无可奈何，我们觉得，只有从语言学上来加强自己了。正因为狱中苦闷，因此一开始，学习情绪就非常高，以竹棒代钢笔，以沙地代黑板，有些聪明的同志，拿铁丝并起来做钢笔，或者以破碗片将木壳枪弹壳割破，磨成象G字钢笔尖一样，有些同志，甚至半夜梦里都在A A、B B地读出来了。

这种语言学上的学习，不久也就遭到了特工分子的干涉，而不幸“短命死矣”。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哨子一吹，不管有病无病，全体在操场上集合。中等身材，北方口音，圆圆面庞，活阎罗曾恭生讲话了。劈头第一句就是：

“鬼子要清乡，我们也要清乡！”理由是：“最近来，大家都是瞎抄瞎写的，弄得内务不好，上课不遵守课堂秩序，所以今天要把你们的小本子都清干净。”

清乡开始了，程序是：立正，一、二、三报数！

然后，衣服脱光，只剩一条短裤，接着，一数向前七步，二数向前四步，三数不动，由队长、区队长、班长分别进行仔细搜查，搜查结束，由队长率领区队长、班长进行室内搜查。

这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大家毫无准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毫无办法。也正因为这是一个突然的行动，因此，清乡的

结果很圆满，每一个人的钱、钢笔、本子、书，都给全部搜去，名为“保存”起来，从此各人身上光光洁白分文不留。清乡过后，曾恭生又出现了，结论是：“这次清乡之后任何一个人都不准有小本子，都不准学外国文，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外国语呢！以后谁要再写一个外国文字，用外国文讲一句话，那就不客气！”他的老拳，又举起来了。

第二周是迅速周：

望文生义就知道，迅速周要达到的要求，无庸说是“迅速”：起床要迅速、集合要迅速、吃饭要迅速、睡觉要迅速，除这些要迅速之外，还有几个特殊要求迅速的内容：

一、一到操场，跑步要求迅速，正在迅速跑步，口令来了：“卧倒！”迅速卧下，还未卧好，又叫“立起！”迅速立起了，还未站直，命令又来了：“卧倒！”又迅速卧下，又喊“立起！”了。于是“立起”、“卧倒”，“卧倒”、“立起”，弄得你头昏眼花，惘然不知所从，假使稍一迟慢的话，那么，老拳相向或“三点成一线”又降到你的头上了。

二、平常的时候，大便是先集合，再一、二、三报数，然后由班长分排分别带去集体进行的；迅速周开始，变花样了，哨子一响，接着口令：

“大便！”

一声令下，大家去大便秘了。

因为是迅速周，所以大家心急慌忙，面红耳赤，力求迅速，但实际上的迅速，是出乎一般估计之外的，正在拉得快近一半，较慢的还未到一半，大便还一条条拖在肛门上的时候，哨音响了：

“集合！”

集合又得迅速的呀！不迅速，又不得了。但大便呢？不用说还没有拉完，甚至还没有拉断，不去又不能，去又不能，真使人进退两难，哭笑不得。

三、迅速的要求还有一种，就是洗脸也要迅速，在集中营里，一年到头，都是到塘边洗冷水脸的。一队人，长长的行列，待先头一

到就不管后面，吹起洗脸的哨音了，于是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动作，最后的几个人才到塘边，哨音又响了：

“集合！”

集合当然又得迅速的呀！因此，脸也只得不洗了。动作慢一点的如王铁夫同志，甚至于连几个月都没有洗过一次脸。

总之，军事训练的目的，直截了当的一句话，就是要从日常的残忍的生活中来拖死你，弄得你筋疲力尽，奄奄一息，要你在他的变节政策下俯首屈服。但是，茅家岭和赤石暴动终于答复他们了。

1944年4月8日

炼 狱 散 记

陈安裕

一 政治指导员

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炮火，把皖南人民过旧历除夕的欢乐一扫而空。往年今夜，辞岁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但是今晚，只有刺骨的北风在狂暴地呼啸着。我和教导队的几个同志，就在这一夜，被反动军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押解着，来到泾县境内的一个三开间的民房。

这家农民已被反动军队赶跑，家俱洗劫一空。屋内囚禁着一批新四军同志，他们有蹲着的，有坐着的，有卧着的。

我的心突然紧缩，感到鼻子一阵酸。被俘的同志真不止我们几个！难道我们完了？！

就在今天来的路上，押解我们的士兵说：“你们的军长给逮住了，新四军被俘的不少，你们完了。”

我们回答：“谁信你们的？新四军完不了！”

同志们默默地看着我们进去，又默默地让出一块地方。我坐下去，只感到潮湿而且寒冷。

坐着不舒服，就起来走动，想碰上几个熟人，打听一些消息。突然，一只冰冷瘦削的手有力地抓住了我，

“陈安裕。”

“是谁？”

“朱诚基。”

“哦！指导员，你也被俘了。”

在患难中遇到老上级，感到格外亲切。我紧靠着他坐下，才发

现他的眼镜不见了，两颊下陷了。我们谈着在皖南事变中各自的经历，许多同志的遭遇……。夜深了，寒风夹着雪花从没有遮挡的门窗外向我们身上扑来，我们不能睡，也没有睡意。

我提出了盘旋在脑子里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遭到这么大的损失？”

“你看是什么原因呢？”诚基同志反问。

“敌我力量太悬殊了。”

“对。但这只是一方面。”

“难道还有别的原因？”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他的回答。我知道他调到军部工作后，知道的事情不少，何况他又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

他一时没有回答，或许由于悲痛，或许想把问题说得透彻些，好让我理解。

“罪魁祸首当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他们坚持反共、溶共、灭共的政策，走投降妥协的路线，配合日军南进，掀起反共高潮，在我们北上的道路上布置了多我们近十倍的兵力。”

“我们没有掌握敌情吗？”

“不，中央早就看清楚了，并且三令五申，要我们在敌人的包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以前，尽快突围北上。”他停了一停，显得很激动地说：“但是，项英同志对反动派的进攻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

我沉默了，听着诚基同志继续往下说，“所以，皖南事变进一步证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和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迁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原则”。

“那么，反动派今后怎样对付我们呢？杀光吗？释放吗？”

“不，我想不会这么简单。”他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想到有第三种可能呢！”我确实迷惑了。

“反动派决不会释放我们，也不会马上把我们杀光。最大的可能是把我们关起来，折磨我们，灌输反动教育，实行自首政策；这些

不灵，再来屠杀。”

“这么说，今后的斗争是更加复杂了。”

“对，我们过去读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受到党的教育，今后要以党性来坚持斗争，分析事变，使自己在同敌人作面对面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我的心亮堂了。我忽然想起，就在几个月前的一天，诚基同志冒着“秋老虎”的炎热，满头大汗，从二十多里路外的云岭，跑到清水湾来看我。他是听说我不大安心做教育工作，特地找我谈谈的。现在，我们都落入虎口，而他仍然这样冷静地分析事变，热情地教育同志，他是我学习时的指导员，工作时的指导员，也是患难时的指导员。

不久，诚基同志机智地逃走了。我把他的话告诉了一部分同志，有两个同志的反应，使我至今不忘：

一个说：“共产党员头可断志不可屈。”

一个说：“九九八十一难不回头。”

二 “民主讨论会”

果然，我们还没有到上饶集中营，反动派就想颠倒黑白，对我们实行政治迫害。

一天中午，我们被押到泾县东南一座山村小学的礼堂，进门就看到黑板上赫然几个粉笔字：

“座谈题：皖南事件应由谁负责？”

已经有一批同志先到了，连我们约二百人，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家席地而坐，周围有一批反动军队的士兵，刺刀出鞘，杀气腾腾，还站着十几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模样似政训人员，但摘掉了臂章符号。

一会儿，从里面踱出一个挂中校符号的军官，细长身材，狭窄的胸脯，一脸奸笑。他干咳一声，提高嗓门说：

“新四军违反军纪军令，理应解散，共产党不俯首认罪，还搞什

么抗议运动。好吧，共产党作兴开会，我们也实行民主，就由大家来说说皖南事件究竟应由谁负责？”

我们都为党中央开展抗议运动这个消息所振奋！这个笨蛋做了义务情报员。

站在周围的反动军队人员，纷纷抢先发言，无非是新四军不服从军纪军令，国民党军队是执行军纪军令这一套；只有一点倒有些新鲜，说什么“皖南事变不涉及党派政治问题”。

我和几位同志轻声交换意见：中央抗议，我们应当热烈响应。这些笨蛋以为我们年轻幼稚，想利用刺刀的压力，从我们身上捞些政治资本，我们要坚决回击。

我们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数说了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丰功伟绩，驳斥了那种诬良为奸的澜言，指出应受人民严厉制裁的正是那些假团结真反共、假抗日真投降的反动派。

那个中校焦躁不安了，一会儿龇牙冷笑，一会儿快步打转，没等我们说完，就拍案嚎叫士兵把我们押回去。这个实行“民主”的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

三 组织起来

一到上饶集中营，反动派就要花招：“现在你们到了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预备教育三个月，正式教育六个月，期满结业，分配工作。”记得前不久，在歙县的一个小市镇上，当反动军队把押解任务移交给宪兵的时候，一个“好心”的连长向我们打过“招呼”：“我们是大老粗，不懂政治，好对付的；你们要去的地方，都是文人，肚肠多，可要小心些，少说话，不吃亏，这是兄弟的临别赠言。”

这种“赠言”是多余的，我们早已有准备。当特务专员张超一出场，知道他丑史的同志就通知大家：此人是顾祝同手下凶恶的走狗，曾经用三战区驻新四军“联络参谋”的名义，进行卑鄙的特务活

动，这家伙的双手，沾满了烈士们的鲜血，是我们的死对头。

特务们想尽快摸清我们的底细，找我们去“个别谈话”，并发下履历登记表。特务张弘毅（当时的一队队长）宣布：“要老老实实登记，在新四军干什么，是不是共产党员，登记清楚，可以量材录用，有的还要破格提拔。隐瞒真实历史，查出后受严厉处分，还要延长毕业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应该选前面这条光明大道。”但是，我们却偏偏选后一条，跟他来个针锋相对。关于姓名的填写，有改名换姓的，也有照实写的。我填上真名，我的想法是：落入魔爪，不是死就是活着冲出去，用真名大家记得住，将来联系也方便些。

在狱中，和反动派一起迫害我们的，还有病菌。我们身上好一点的衣服，都被反动军队抢去，大多数同志只剩贴身穿的衣服，连穿几个月没有洗换，身上长满疥疮，衣上爬满虱子。不久，又传染开一种象疟疾又象伤寒的瘟疫。我得这种病时，体温螺旋式上升，身体好象腾云驾雾，慢慢失去知觉。幸亏有同志们的细心照料，十天以后才脱离险境。但是，死的同志很多，有几个眼睛还没闭上，就被拖了出去。从特训班传来惨痛的消息：楼绍洪同志还没断气就被抛弃在后山土地庙，被野兽啃了几个大窟窿。过了许久，才弄清这种病叫回归热，是长虱子引起的。

我们展开了抢救病友运动。原来，我们身上带的钱都被特务搜去“保管”起来，这时，我们提出要求将这笔钱买“六〇六”针药治病，而且每天中午要给我们两小时捉虱子的时间。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特务只好答应我们捉虱子。

那时，春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每天中午，我们都坐在户外捉虱子。铁刺网外面，送来一阵阵油菜花香，蜂儿蝶儿在自由自在地飞舞。我们赤着膊，三五成群进行捉虱子比赛。有的同志一面捉，一面吐唾沫，含沙射影地骂特务：“这批吸血的毛虫，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消灭干净！”引得大家哄然大笑。特务和宪兵听得笑声，显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他们不敢走近来，怕虱子爬到身上去。这种

时候，正是我们商量建立党组织的最好时机。

我们对当前斗争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反动派对我们展开了有组织的迫害，越往后必然越疯狂。我们应当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对要不要建立党支部，却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被囚禁的同志来自新四军的各个单位，相互之间很不了解，万一吸收了动摇分子，整个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同时，反动派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监视，已经发现有的特务伪装成新四军被俘人员混入我们中间，处在这种情况下，应以“人自为战”的斗争方法为主，遇到重大问题，再组织集体的斗争。赵禾野、刘尊、杨洁、林干等同志是另一种看法，认为“人自为战”应同党组织的领导结合起来，有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才能更好地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当然，处在集中营敌特监视严密的情况下，建立党的组织，必须采取隐蔽的办法，只有善于保护自己，才能更好地组织斗争。我们商定，先以我们几个人为支部成员，并用扎根串连的方法联系我们熟悉的同志，逐步扩大组织；同时布置一些同志越狱，寻找党的关系，争取得到党的领导。后来我们得知，在一队的丁公量、张世杰、汪海粟、洪雪村等同志也组织起来进行着党的活动。

我们见缝插针地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利用雨天打草鞋、下象棋，晴天捉虱子、洗衣服以及睡眠前的时间，找同志个别谈话，建立关系。在屁股大的地方进行这些活动，困难是很多的。当时，我被编在第七班，一个姓葛的“班长”管得很严，只要一发觉我们不在他的视线之内，就到处找寻，找到后，要狠狠训你一顿。此人一看就象是个国民党军队的“老兵油子”，一打听，果然是个下级军官，南京战役时，被日本人打垮，他走投无路，暂时寄身于新四军的。现在，他不忘故主，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但他多少又还记得一点新四军患难相救的恩惠，我们就利用他的这种两面性，进行软硬兼施的斗争。一面告诉他蒋家王朝并不牢靠，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新四军待你很好，如果忘恩负义，一定没有好下场；一面又警告他：再管得

这样紧，逼得我们来个集体越狱，你这个“班长”的脑袋也保不住。这个葛“班长”权衡了利害，到底管得松了些，我们的活动也自由了些。

一个雨天的中午，我和刘尊、杨洁躲在诸葛宗祠的角落里，用下象棋作掩护，讨论越狱的问题。五班的屠海明忽然来到我们跟前，他望了一下棋局，微笑着说：“你们下的什么棋，右卒子的位置都摆错了。”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明显的破绽。我也微笑着说：“摆错一只卒子，无关全局，你敢和我斗一局吗？”

此后，屠海明就常常主动来找我。他介绍自己是团的卫生队长，共产党员，现在苦闷的是失去了党的领导。我对他讲了形势，并且告诉他，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出路。由于我对屠海明的底细不够清楚，于是找同他在一个区队的赵天野。天野说：“此人十有七八是自首了。”我大吃一惊，连忙告诉刘尊、杨洁，不要同我接近，争取提前执行越狱规划。不久，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黑夜，刘尊、杨洁胜利越狱了。

我们刚为刘、杨两人越狱成功而高兴，张弘毅就把赵天野、汪海粟、林干和我传去，并且还有屠海明在内。张弘毅铁板着脸，劈头就骂：“你们这些顽固分子，胆子不小，敢在这里建立什么组织，而且指使刘尊、杨洁逃走。”我们问：“这是谁说的？”张弘毅冷笑了几声说：“这你们管不着。不过，我还是宽大为怀，先让你们到茅家岭去好好反省，再决定怎样处置你们。”

事情越来越清楚了：由于我的警惕性不高，在自首叛变分子屠海明面前表明了我的政治态度。但张弘毅还没有摸清我们的组织情况，仍把屠海明伪装成“顽固分子”混入我们中间，打入茅家岭狱中，以刺探我们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到时来一个一网打尽。张弘毅未免太聪明了，他的几句话已经暴露了屠海明的面目，我们决不会再让他们得到任何东西了。

监狱里晒不到太阳，我们只能看到小天井里的日光移动。早上一睁开眼，我们就贪婪地读着从对面笼子里传过来的书籍，开讨论

会,有时也在尿桶旁边做体操。傍晚以后,白天的热气稍退,黑暗降临,我们就纵情高唱革命歌曲。这样约莫过了个把月,从周田传来消息:集中营已重新编队,宣布了“第二期训练计划”。

为什么重新编队?我们分析后认为,特务知道我们建立了党的组织,通过编队,可以打乱我们的组织,拆散我们的核心,同时用编政治队和军事队的办法,来加强镇压和分化,进一步推行反动的自首政策。因此,往后的斗争将更加复杂和艰巨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敌人可以打乱我们的组织,重新部署反革命力量,对我们进行更残酷的迫害,然而,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性,却不论怎样锋利的屠刀都是割不破、砍不断的。我们一定要重新组织起来,并且接受以往的教训,加倍提高警惕。

四 针锋相对

第二次反共高潮打退后,在集中营的地洞里吹出一股风:国共正在谈判,国民党将要把我们同被新四军俘虏的国民党人员进行交换。

对这个说法,开始有个别同志是相信的,有少数同志则认为:“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看今后怎样吧。”党支部分析,这个谣言是特务们放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巩固集中营的统治,摸清我们的政治情况,为其实行血腥镇压和自首政策创造条件。支部决定,必须彻底揭露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让每个同志都懂得,蒋介石一贯实行的是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反动政策,我们决不可幻想反动派发善心。

揭露敌人,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种是秘密的方式,写传单,递字条,以及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工作。一种是敌人出题目,我们就针锋相对地做文章。

一天,那个睁一眼、眇一目的—队政训员苏诚出了个题目:“严格的军事训练是否必需?”指定我们几个人发言,由“值星官”罗世训负责执行。我们说,发言是可以的,但必须用辩论的方法,因为灯

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罗世训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

第二天，夕阳将要西下的时候，罗世训把全队集合起来，叫我们几个发言人站在小土墩上。我们按事先的计划辩论起来。

一个说：“严格的军事训练当然是军队所需要的。”

另一个说：“你说的是什么军队？有人民的军队，有帝国主义军队，有反动军队。”

“不管什么军队，都需要同样的军事训练。”

“不对。同样叫军事训练，性质和目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动军队的军事训练，是为了镇压人民，实行独裁。”

“这样说来，脱离政治的军事训练是没有的？”

“当然是这样。有些人妄想依靠法西斯的军事奴役，实现其反动的政治阴谋，还说什么严格的军事训练是必需的，这骗不了谁。他们这样做，必然遭到失败。”

场上响起一阵阵的掌声，气得罗世训脸孔发紫，知道自己上了当，但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赶快解散我们了事。有位同志看到他气冲冲跑到苏诚办公室，就悄悄在窗外偷听。只听得罗世训连声说：“失败！失败！”苏诚则咬牙切齿地说：“对付这批死顽固，非用严厉的手段不可！”

过了几天，队长张弘毅下令办壁报，十天半月一期，宗旨是“练习写作，交流学习心得”，并指定我们十多个同志撰稿。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是特务玩的一个新花样，于是我们决定利用壁报阵地来揭露敌人。

壁报成了我们的战场。他们出的题目是：《告共党改邪归正书》，我们写的题目则是：《警告汪伪汉奸书》、《警告顽固派悬崖勒马书》等。我则写了一首童话诗，原文已忘，大意是：一只凶残的狼，在森林中遇到一只受伤的雄鹰。狼张开血盆大口，要把鹰一口吞下，雄鹰毫不示弱，用如锥之嘴，如钢之爪，要把狼的双眼挖掉。狼

倒退几步，忽然露出奸笑说：“鹰啊，你不要误会，我是想把你抱到窝里去，让你得到将息治疗。”雄鹰哈哈大笑：“谁不知道豺狼虎豹凶残成性，贪得无厌，你休要口蜜腹剑，说什么同窝共处，倒不如决斗一场，拚个你死我活！”

这首诗，交给一些同志看过，但被张弘毅扣下不许发表。当天晚点名时，张弘毅气势汹汹破口大骂：“你们这批顽固东西，我们的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你们却写诗骂我们是狼心狗肺，谁再不识好歹，休怪我姓张的不讲情面！”

点完名，我被押到队长室。出人意外，张弘毅忽然又装扮白脸：“坐下来好好谈谈。你的诗，幸亏落在我手里，换一个长官，连命也难保了。”

我不答。

“有人检举你是共产党员，在新四军教导队做政治工作，你还不坦白吗？”

“谁说的？把这人叫来当面对证！”

张弘毅连连摇头，忽然站起来，冲到门口，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我一眼，又慢慢踱回来：“上帝说过，容许青年人犯错误。我就再饶恕你一次。”

“我们不但没有错误，而且对人民有大功。”

“不要执迷不悟了，论起信仰共产主义，我应是你们的前辈呢。”张弘毅忽然介绍起自己的“身世”。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年参加红军，看到共产党内部也有派别斗争，很不满意，因此，在民国二十二年向国民党投诚，但国民党不相信他，坐了三年监狱，读了三年三民主义，懂得了救国救民的道理。出了监狱，又在工作中被考察了三年，以后上级才完全信任他……。

张弘毅说得眉飞色舞，我越听越厌恶，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对共产党的诬蔑，谁都不会相信。”

“岂有此理！”张弘毅又露出了一脸杀气。不过，此人是出名的

笑面虎，一刹那，他那一脸的杀气又慢慢收敛了，说：“你这人倒还天真坦率，就是先入为主，受毒深了，应当多研究三民主义、总裁言行，有不懂得，或有了领会，可以随时找我谈。回去吧！”

押回囚室，有几位同志没有睡着，正在为我的凶吉耽忧呢。我把经过告诉他们，大家轻轻地笑了起来。有位同志说：“张弘毅在耍所谓‘现身说法’的把戏，伪造自己的历史。即使他参加过红军，也只能说明他是个叛徒。然而做国民党的走狗也不容易，要经过主子六年的训练、考察，稍不遂主人的意，随时都有被宰掉的危险。这倒是一个破除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反面教材。”

特务办壁报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出了二三期就宣告“寿终正寝”了。

认清了反动派的本性，还有一种单纯依靠外援的思想需要解决。大家通过反复讨论，看到了随着党的力量的强大，反动派在政治上日益孤立，对我们暂时不敢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这是党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使我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但是反动派的方针是溶共、灭共，所以绝对不可能立即释放革命志士，我们要想挣脱牢笼，办法只有一条，就是依靠自己团结一致的努力，同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伺机越狱，或在有利条件下组织暴动。

消除了对反动派的幻想，我们的行动就更加一致了。这时，天气越来越闷热，炎灼的阳光射在身上，好象一团火。风从牢房旁的厕所方向吹过来，充满了令人恶心的又臭又闷的气息。朝天看，天空没有半多云彩。什么时候才能变天呢？

人人都在盼望着变天，盼望着酷暑变为凉秋，黑暗变成光明。反动派却在妄想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变成法西斯的天下。

六月底的一个早晨，我们象往常一样，到“大操场”去受长时间跑步的折磨，只见周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宪兵岗哨，机枪、步枪、盒子枪都亮了出来。今天要出什么事呢？

特务们刚把队伍整理好，宣布完一套“不准乱说乱动”之类的纪律，就见张超陪着一个人，来到大操场的土墩上。

经张超的介绍，原来此人就是“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

邓文仪单刀直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德国和俄国打起来了。”接着，他大肆散布“苏联必败论”，说法西斯的秘密武器和闪电战术是怎样厉害，如何可怕。其中，有一条苏联必败的可笑理由：“希特勒的将军，都已经年过半百，胡须灰白，久征惯战；而苏联的将军，是没有经过大场面的年轻人。”邓文仪说得天花乱坠，他的一个走狗用一句话点了题：“共产党的老家都要完蛋了，你们还坚持什么？”

党组织及时地进行了消毒工作。从李村到周田“受训”的同志，转告了叶挺军长对苏德战争形势所作的分析，我们就根据叶军长的指示，开展了宣传工作，有的同志还编写了宣传提纲，组织大家传阅。通过这些活动，大家认清了：苏德战争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加强了抗日战争与抗德战争的相互支援。当年，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不能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现在，一个德国法西斯更不可能消灭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们的结论是：苏联必胜，德国必败，法西斯老巢快要覆灭了。邓文仪之流的法西斯匪徒，原来想用德国法西斯这只纸老虎来吓唬我们，可是适得其反，大家通过这次形势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胜利信心。

但是，能不能坚持斗争，冲出樊笼，归根结底，还是怕不怕死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支部组织大家进行了革命气节的教育，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革命先烈贯日月、泣鬼神的英勇事迹，也讲了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特别是着重宣扬了集中营许多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使大家受到巨大鼓舞。同志们决心向叶挺将军学习，向施奇同志看齐，纷纷表示：“头可断志不可屈！”不少同志为了勉励自己，表示决心，在小本子上，在内衣里，写下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支部还把坚持革命气节，概括成为简明的行动口号：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做党的好儿女；酷刑不惧，至死不屈；警惕叛徒，严守秘密；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等等。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赴汤蹈火，虽死不辞，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五 打球脱逃

不久，我和赵天野同志因叛徒屠海明告密，被囚禁在茅家岭。

夏末秋初，上饶的银行界准备在十月底举行“银联杯”篮球赛，并邀请东南几省的著名球队参加。特务头子张超和张弘毅，为了显示集中营是个“军训机关”，而且“训练有方”，就指定两个特务区队长负责从各队选拔球员，组成球队参加比赛。陈文全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开展了对我们的援救。他对特务们说：“陈安裕是球队的右臂，他不出来，我们不参加比赛。”此时，又正值集中营重新编队，特务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我和赵天野、汪海粟等同志从茅家岭押回周田村，并且把我编入三中队，陈文全仍留在一中队。三队秘密党支部给球队的指示是：打球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参加有损于我党我军政治影响的比赛。

说起陈文全，不少同志称他是“球鬼”。他就利用这个绰号，对特务们表示只对打球有兴趣，对政治、军事不感兴趣。他常常用请病假的办法，抵制特务的出操上课。特务们也说：“你陈文全只知捧牢一只球，球场上生龙活虎，操场上无精打彩，对你真叫没有办法。”

其实，熟悉陈文全的都知道，他身在球场，心在战场。他利用球场进行着革命活动。在开始组织球队的时候，我们一起商定了方针：通过比球，伺机越狱。确定球队人选时，文全坚持要叶育青同志参加。叶育青的球艺本不够选手的条件，文全要他参加，因为他是叶军长的侄儿，担任过叶军长的随从副官，对军部的领导活动知道得比较多，必须在特务没有摸清他的底细之前，帮助他越狱。以后，文全又向特务提出：“球队必须在一起居住，便于练球，不然是打不好的。”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组织集体越狱。特务们赢球心切，看到是由“球鬼”提出的要求，不怀疑有别的企图，倒还怕惹怒了这位

球队主力而影响比赛,只好答应了。尽管这样,仍有两个特务正副队长形影不离地监视我们,外出比赛时,还加派一个武装宪兵班。

出外打球,扩大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了解了不少有关时局发展的情况,对集中营周围的地形地物,反动军队的警戒布局,也知道得多一些。我们常常把这些情况告诉集中营的其他同志,以增强斗争信心,做好越狱准备。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新四军被俘人员而又欺世盗名的无耻行径,我们还利用外出打球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明白,我们是英勇抗日的新四军,而亲日、反共的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比赛时,观众都为我们鼓掌打气,大家评论说:“新四军真行,国民党连打球都打不过新四军。”“新四军守纪律,打球规规矩矩。”我们每到下半场,总是体力跟不上,攻击不猛。有些观众就叹息说:“这些人吃不饱,穿不暖啊!不然还要打得更好些呢!”

我们打败了许多球队,夺得了“银联杯”赛冠军。张超的脸上好不光彩,他亲自批准增加球队的菜金,并把我们找去说:“这次你们打得好,但只是初步胜利。明年一月,是顾司令长官坐镇三战区的三周年纪念,司令部和政治部决定联合发起‘祝同杯’篮球赛,我让你们参加,要好好的练球,对你们有好处。”

我和文全、育青研究,顾祝同是我们的死敌,以他命名的球赛决不能参加,我们要打破张超的计划,使上饶市民了解我们的政治态度,于是,决定在“祝同杯”赛前越狱。

十二月六日的晚上,我们利用到铅山表演球技的机会,冲出樊笼,奔向武夷山区。几年以后,从赤石暴动出来的同志告诉我,我们越狱后,球队也随着解散。到次年“祝同杯”比赛时,上饶市民没有看到文全和我,暗自为我们抵制这场为反动头子歌功颂德的球赛而叫好。

六 烈火真金

墙上草,风吹摇摆,霜冻枯萎,而腊梅,却傲霜斗雪,开出满树

繁花。集中营绝大多数党员和非党同志，好似严冬的腊梅，不畏风霜雨雪，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具有象腊梅一样品格的人是很多的，这里，我只谈其中的两位。

共产党员杨瑞年同志，原是新四军教导队的文化教员。她工作认真负责，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皖南事变被俘后，我们忽然看到她身上穿了一套黄色的棉军服，颇为显目。这套衣服，是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女政工队员——一个以前的老同学送给她的。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议论。这虽然是个细节问题，但杨瑞年同志毅然将这套衣服脱下了。

随着集中营斗争的深入，瑞年同志的态度越来越坚定。她是女生队的斗争骨干，敢于挺身而出和敌特展开斗争。她的弟弟杨万年也囚在狱中，为了不被敌人所利用，他们相约不暴露姐弟关系。从集中营成立剧团和球队后，我和她接触的机会多了，她不但是剧团的主要演员，更是剧团的主要政治骨干，坚持演剧的政治方向，参加过营救赖少其同志的斗争，对同志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只要我们一天不死，决不容许演反动戏！”当时，瑞年同志正患初期肺病，我担心她受到更大的摧残，影响健康，就劝她说：“在同敌人作斗争中，出头露面打头阵的事，让我们男同志多做些吧，女同志少做些。”她斩钉截铁地说：“女同志和男同志都是一样的，我们共产党员不站在前头，就不能带领更多人冲锋陷阵。”我敬佩她的斗争精神，但也对她可能遭到的严重折磨，更加担心。

在赤石大屠杀中，瑞年同志壮烈牺牲。敌人对她恨之入骨，连打七枪，瑞年同志临死不屈，高呼革命口号，大骂反动派，使刽子手为之胆战心惊。

瑞年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对党赤胆忠心，在困难时挺身而出，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严以律己，大是大非毫不含糊，她不愧是党的好女儿。

张一阳同志，是先烈张太雷之子，牺牲时才十七八岁。我和他

原在军部教导队同事近一年，常睡在一张床上，无话不谈。他身体瘦弱，带着浓厚的孩子气，说话时常红脸。领导上照顾他年小体弱，没有将他编班，只在队上担任文化干事的工作，让他多有一些学习的机会。他很聪明，学习进步很快。到上饶集中营后，我和一阳虽不在一个队，但出操上课常常可看到。一次，我们终于找到一个谈话的机会，我说：“对你政治上的坚定，我们是放心的，就是对你的身体不放心。”一阳笑着拍拍胸脯说：“吃得消，比过去结实了。”过了不久，出操时不见一阳，我向他队里的同志打听，才知一阳因为遍身生虱子而染上回归热，送进医务所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便想法去看望他，弄个治疗的方法。谁知第二天便传来噩耗：一阳病故了！我的胸口好象受到沉重的一击，心突然收缩，好一会说不出话来。这一晚，我挤在密密麻麻的同志们身体中间，不能入眠。我沉重地感到失掉一个战友的痛苦。据说，在一阳病得最厉害时，惨无人道的敌人不但见死不救，反而趁此机会诱他自首，说是自首了就给他治病。一阳毅然拒绝了。在连续高烧而引起的昏迷中，不断高呼：“同志们！冲呀，杀呀！去占领山头呀！去消灭敌人呀！跟我来呀！……”

记得在皖南，有一次，一阳在病中和我闲谈，他说起他的母亲本来不愿意他离开家，新四军挺进江南时，经他的姐姐张西雷同志的再三说服，母亲才允诺了儿子的请求。行前，母亲叮嘱一阳要好好接受党的教育，切莫玷辱父亲的名声……而今，广州暴动只过去了十四年，一对革命父子先后都被反动派杀害了！

次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追悼一阳同志。同志们说：“杀死一阳的不是虱子和回归原虫，而是豢养虱子和回归原虫的独夫民贼。”

如此“三民主义”教育

黄迪菲

从上饶向西南角走约十五里路，便是中国最黑暗的地方之一的周田村集中营，里面囚禁着近千个祖国优秀的儿女，他们中间，十分之九是新四军坚决抗日的优秀干部，其余都是进步报馆的主笔、新闻记者、文学家、年轻艺术家、店员、铁路工人和学生等，他们含着海样深的仇恨，弯着背，在皮鞭底下，无间断地做着苦工，受着极刑拷问、辱骂、鞭打，“罪犯”的生活把他们的时刻、日月、年岁，渐渐地划去了！

“你们都是共产共妻，穷凶极恶……”军官大队第三队长曾养生每天集合时总是这样辱骂着。这辱骂也和蒋介石的“军人读训”、“党员守则”一样，渐渐地变成为每天早晨必诵的“圣诗”了。

1941年11月19日早晨，我们这一批“囚徒”，在太阳才冒出地平线，照例又被赶上了操场。特别操、跑步、跪下、卧倒、两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三点成一线，这种种的活罪，又跟往常一样，用它的贪婪的黑手，无休止地剥夺我们的体力。收操回队后，第六班随即又被派去打墙。

打墙是集中营的一种普遍的“训练”方式，全部集中营的外围的围墙，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手，自己的汗和血，在敌人宪兵的枪刺底下，填打起来的。但三队打墙用的墙板，却要较其他队的宽一两尺，真象一口大号的没有盖、没有底的棺材一样，光挑满泥，就得几十担，更不消说要把泥打得紧所要花费的劳力和时间了。

“黄瑞祥^①，队长喊你谈话！”六班班长从屋子里出来，向那个

^① 即作者。

正在打墙的矮矮个子，戴着一千度的近视眼镜的黄瑞祥叫。

“在什么地方？”黄瑞祥停了手，掉过头问。

“在队部。”

黄瑞祥放下笨重的木锤，脸上呈现出极度疲劳的样子，从已经打有两板高的泥墙上跳下来，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一推就走了。

到队部门口照例“嚓”的一个立正：

“报告！”

接着，房子里面传出了粗暴的一声：

“进来。”

黄瑞祥走了进去。

那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曾恭生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一把胡琴，胡琴的淫荡调子，还隐约地在这间小房间里震荡着。黄瑞祥已经立正在他的面前，但又好象未被他注意似的，他放下胡琴，弯屈着腰背，慢慢地拾了一些木炭，投进在他面前的火盆里，看着炎炎的火光和丝丝卷升着的黑烟，半晌，才头也不抬的鄙夷地问：

“你是南洋华侨吗？为什么参加新四军？”

“为什么参加新四军？”这话是老一套，听得厌了，所以黄瑞祥很不耐烦地答道：

“是的，为了打鬼子。”

“老是这一套。”曾恭生突然把头抬起，凶暴地说。接着，就直率地问：

“你读过三民主义没有？”

“不仅读过，而且正为着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呢。”

“那很好，请你替《更新》半月刊（集中营自办的反动刊物——作者注）写点文章怎么样？”

他抽着烟，掉过身去，从卷宗里取出了一张上面写着“新四军叛国真情”、“共产主义批评”等题目的纸条。面上露出了丝丝胜利的狡猾阴险的笑容道：

“随你选择其中的哪一条写好咯，限明天交卷，至于公差勤务

可暂时免除。”

黄瑞祥接过纸条，整理一下眼镜，仔细地看着，脸颊立刻涨红了，颈筋急促地抽动，广东人的那种忠贞、刚直、倔强的性格，耐不住了。

“报告队长，我不能写，我是中国人，我不能说抗日就是叛国，这样的文章只有汪精卫之流才写得出。”他说完这些话，好象一个过分被压累的远路人放下他的重担一样的感觉轻快。他严肃地把纸条送回到写字台上。

这是出乎意外的，曾恭生用劲地吐一口痰，严厉而且粗暴地指着黄瑞祥道：

“你是军人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写，你就要写！”

“队长，假如有一个军官，命令他的部下强奸自己的母亲，你想，他也该服从吗？”

“混账，住口！”曾恭生脸色发青，拍着台子，气极了。立刻又向外面喊道：

“六班长，进来！”

随又指着黄瑞祥，命令道：

“把他衣服剥光，眼镜脱下！”

火盆里颤动地吞吐着火舌，偶然地爆裂出几颗火星，飞溅上下左右，但立即就熄灭了。已被剥得光赤的黄瑞祥浑身不住地发抖，乳头结凝成两颗小赤石似的，皮肤也象“牛百叶”似的起了无数的小粒。透过窗，透过门，透过墙孔钻进来的寒风，不断贪婪地向他的身上舔着。

“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曾恭生一面回到他烤火盆旁的原位，一面又下命令给六班长。

双手反缚着的黄瑞祥，当他被押出队部，穿过营房的时候，伙伴们怜惜而又带着愤怒的眼光注视着，互相低微地叹息着。黄瑞祥更激动了，他的心象火一样的炽烈，他忘记了冷风的鞭挞，他忘记

了寒冷。

所谓禁闭室，并不是茅家岭，乃是第三队特为附设的，是一间空空洞洞既无床铺也无桌凳的房间。

黄瑞祥一踏进禁闭室，他的脸色显得更黄了，一股潮湿、腐烂的臭气，象无数的毒蛇样的不断地钻进他的鼻孔。难耐的痛苦和寒冷，折磨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一阵阵打墙的木锤的沉重声音尚时时传来。他紧握着双手，在这狭窄的囚室里跳，跑，打转，借以取得暖气。

他想起他怎样抱着一股救国的热忱，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他想起他怎样因为厌憎于大后方学校沉郁的生活而参加革命；他想起他怎样艰苦地跋涉来到新四军；才两个月，才呼吸到真正的自由的祖国的空气，但立即就发生皖南事变了，想起这一切，他悲愤，透骨的寒冷以及无限的寂寞，暂时被他悲愤的心情赶掉了。

寒冬的日间是很短的，房子里的光线，渐渐地在暗淡，似乎已快到日暮的时光，黄瑞祥肚里觉得饿了，他一落身坐在地上，手托下颚沉沉的思想。

突然，通营房的那窗上的木板“括”的一响，一个同志的脸一闪，接着，一个手巾包捷速地象流星一样的飞了进来。他急忙拾起一看，是一包饭，杂着豆腐干。这是同志们在经常吃不饱的情形下挨饿节省下来的，这是同志们冒万难、拚大险而设法丢进来的，他为这伟大的阶级友爱精神所鼓舞，感激得热泪流下来了！

晚上十点钟，门锁开了，一个宪兵打着灯笼进来，向黄瑞祥道，“觉得冷吗？队长叫你到操场去读三民主义！”

他没有话，只是牙关咬得更紧。他不相信这屠手的话。他懂得这里的习惯，在这样的时分，曾打断过许多同志们的腿，曾摧残过许多伙伴们的青春，他想，他大概要秘密地走向刑场了，在这将奔向刑场的时候，他回想着生的愉快，依稀感到了些对于生的留恋，他睁大了那模糊的失神的双眼，似乎在想从这无边的黑暗中寻找他所追求着的未来的光明！

宪兵的快慢机，对准着他的背紧随着。出了营房门口就是操场，在操场的中间，设置着一盏被风吹得摇动的煤油灯，它的外面，披上了一层粘满灰尘的风罩，因此，显得更暗淡了。操场四围的高厚的土墙，在暗淡的黄色的灯光摇晃下，正象古狱城堡，隔绝了外界的一切。蜷曲、赤裸着身体的黄瑞祥，在这风尘飞滚的广场上颤抖着。押着他的宪兵把他交给了另一个宪兵，敬一个礼，就走了。看守他的宪兵，整理一下自己的手枪，摸摸帽檐，定神的走近黄瑞祥的身边，审察一下黄瑞祥的脸庞，用手指着摆在灯旁的一本三民主义道：

“队长命令，叫你跪下读！”

“可以的！”是黄瑞祥咬紧牙关的沉重回答。

黑夜更深了。天空显得更高，没有一丝儿云影。寒风更有力地在墙外呼啸着，奔跑着，跑上山坡，窜进墙泥，舞弄着场上的黄沙，摇撼着插入天空的光赤的树枝。

黄瑞祥挣扎着想把嘴唇合拢来，保持肚子里的暖气，但牙齿仍不住的打抖，两点泪珠从眼眶里迸了出来。一段残酷的悲惨的故事，又在他的记忆里面浮上来了。

那是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后的几天，他被打散了，一个人躲在山上的密林里。有一天晚上，他渴了，要找水吃。他侧耳听着，在山的右边，潺潺地流着水的声响，于是他循着透过密林的月色，象兔子一样的警觉，慢慢地往水声那边爬去。水声慢慢的近了，在月光底下，仔细看去，已可看出湍流的波光。他钻出树林，侧耳往四边静听和搜索着。

夜，是一个寂静的夜。有时打破这寂静的，是远远地划空而起的清脆的枪声。

他所渴望着的水到了，他欣喜地捷速地移近水边。

忽然，他觉察到，在他左面水涧的旁边，在惨白的月色下面，躺着两个呈现得更惨白的东西，象是两个人。他紧张，心跳动起来了。他定一定神，再用力仔细看去，是象躺着两个人。于是他走近过去。

呀！原来是两个赤裸的死尸！是两个被反动派军队强奸致死的女同志的死尸！

他陡的一阵害怕，一阵心酸，忘了喝水，重又爬上山去了。

风刮得更紧了。一本开着的三民主义一页页的被风刮过去。风刮得黄瑞祥颤抖得更厉害，同样，也煽起了他无法熄灭的仇恨火焰。

“我犯什么罪？”寂静的空气里荡漾起黄瑞祥颤抖的、沉重的、愤恨的声音。这声音，在空气里震荡着，萦回着，似乎是成千个无辜的被摧残的青年所一致发出来的愤恨的声音！

黑夜显得更严肃了，宪兵慢慢地低下了头，有时又抬起头来，仰望着高空，象有无数的心事袭击他似的，使他渐渐的失去了安宁。

“这是队长的命令，没有——办法。”他梦一般的低声说道。

“哪一个在说话？”在黑暗的边缘，突然发出一声猛兽般的吼叫，手电筒的光条划破了夜空，从广场那头照来，照过黄瑞祥的身体，照到宪兵的身上。

“你和他说什么？当这样久的兵，还不懂得规矩吗？”是宪兵班长查夜时的责骂声音。

无边的黑暗匆忙地赶着它的路程。哨兵一个一个的接换着，黄瑞祥赤裸裸的四肢也渐渐的失去了知觉，牙关咬得更紧了。然而，在这寒冬的漫长的黑夜里，一个革命者的斗争心是灼热的，一个革命者的坚定不移的意志是不可征服的！

黑夜赶完了它的路程，东方吐出了白色，天亮了。黄瑞祥又被叫进了队长的房子里。

一进房子，曾恭生劈头第一句，就严厉地问：

“怎么样？”

但一夜的冷风，并没有将黄瑞祥的愤火降低，他坚强而镇定地答：

“没有什么。”

“三民主义读过了没有？”

“没有读。”

“为什么？”曾恭生一惊，凶暴的脸相又摆出来了。

“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我在三民主义的教育下，早已读熟了三民主义！”

“那么，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呢？”

“不信仰！”

“为什么不信仰呢？”

“你们自称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今天拿这副手段来对待我，叫我还能相信你们的三民主义吗？”

“好！你顽固！”曾恭生怒吼一声，硕大的拳头，当胸击了上去。

黄瑞祥被这一击，站不住脚，退到了墙壁边。

“好顽固的东西，看你再顽固不顽固！”曾恭生一面怒骂着，一面跟过去在黄瑞祥的胸前拳击着。

背靠着墙壁，当胸遭着猛击，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铁石，黄瑞祥昏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围绕着他的是几个自己的同志，他们亲切地在照料他和慰问他。

“呵，祖国……”黄瑞祥被这悲痛迷惘的想法所激动，热泪不自禁地涌满了眼眶，他一翻身，觉得胸部很痛，喉咙一痒，吐出几口血来。伤重了！

一 我们的阶级友爱精神发扬了

我们一起在残酷的牢狱中生活，我们一起在残酷的牢狱中斗争，甘苦同尝，患难与共，因此，我们更友爱地团结在一起了！举例说吧：

第三队“学员”黄迪菲，在有一次“谈话”之后，被剥光了衣服，送到一间预先安排好的空空的禁闭室里去了。时令是十一月的天气，在上饶那带山地里，朔风起处，使人感觉到有透骨的寒冷。迪菲一个人关在那间房子里，既没有衣穿，又没有饭吃，刺骨的寒冷和无限的空虚、寂寞，汇集在他一个人身上了。当迪菲被禁闭的时候，活阎罗曾恭生曾集合队伍，厉声厉色，声势汹汹地宣布过一条纪律：

“若有人给黄迪菲送衣送东西者，查出后严办！”

并当场又下了一个命令给特工班长们：

“随时负责，注意防范！”

谁不知道这活阎罗的手段的毒辣，谁不知道这一次是他实施“以武力解决”的第一炮。谁碰上去，谁就该倒霉！谁碰上去谁就要有为同志而牺牲一切的决心！因此，黄迪菲同外界的关系，似乎暂时被切断了。

但当晚饭过后，黄迪菲正坐在地上，手托下颚，沉于深思的时候，突然，钉在窗上的那块木板“括”的一响，一个同志的脸孔一闪，接着，一个手巾包捷速地象流星一样的飞进里面来了，黄迪菲捡起一看，是一包饭，杂着豆腐干，饥不择食，他是多么兴奋呀！这是同

志们在经常吃不饱的情形之下挨饿节省下来的，这是同志们冒万难拚大险而设法丢进来的，他为这伟大的友爱精神所鼓舞，感动得热泪流下来了！

据他后来告诉我说：

“在当时那种激动的情形下，对于冻和饿已无感觉，对于面临着毒刑也无丝毫恐惧的心理，当时所想的乃是：如何更坚决更顽强地来回答敌人的镇压，如何更英勇地以牺牲的精神来报答同志们的友爱了。”

特训班“学员”杨文起，有一次在盛暑的时候病了，患的是重病，拉肚子日夜有四五十次之多，几天以后，瘦得不成样子了。眼见着这样垂危的情形，我们去报告了队长，要求他送医务所。医务所没有药吃，也没有人照顾，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想，睡得安顿一些对病人也是有帮助的。万不料队长的答复却是：

“医务所去，一则没有药吃，同时去了我也不大放心，还是住在队里的好！”

天哪！人快要死了，还时时提防他会开小差，难道真要“置之死地而后已”吗？

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斗争在一起，我们共患难已有一年了，现在，抢救一个同志的生命的责任，只有我们自己来担当了，因此我们确定了如下的切实帮助杨文起的办法：（1）抽出我们身上一部分秘密的存钱，买药买鸡蛋给他疗养和营养；（2）天才亮，替他將床铺搬到小花园里树底下去睡，空气好些；（3）轮流服侍他上马桶，替他搬凳子，脱裤子，结裤子，必要时擦屁股。这种热烈地为同志服务的友爱精神，特工也不能不为之惊叹。但，因此他们也就放出谣言来了，说我们是借此机会开小组会的。企图以此来作为阻止我们对病员护理的行动，企图以此来戕害一个同志的生命，但我们并不怕，只要能抢救一个同志的生命，我们是决不惜牺牲一切的！不久杨文起一条命，也的确在垂危中抢救过来了，这样比亲生兄弟还要热烈的阶级友爱，也大大地感动了杨文起，当敌人利用他年老

的父亲，含泪劝说他悔过自新的时候，他愤怒地拒绝了。

以上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我们的友爱精神，也贯彻到了日常生活中间去。为了使体强的同志帮助体弱的同志代做他力所不能胜任的工作，在每一个班里，我们按体力之强弱划分了有专出重公差的，专出中公差的，专出扫地和整理内务等的轻公差的三等制度，以应付敌人的苦役。至于有钱大家用，有东西大家吃，则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总之，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友爱精神，看来是似乎很平常的，但在一个共同被难的环境中，其感人至深，对于坚持斗争，实起了不小的鼓舞作用，因之，使敌人也不得不为之叹道：

“你们是团结的。”

二 两个特工的下场

从屯溪到了特训班，我编在第三区队第七分队，分队长是高啸峰，我们编队之后不久，有一天在闲谈时，他向我们说道：

“你们要认识这里的环境，应该沉着冷静一些，不要随便乱谈或发牢骚，否则是要吃亏的。”

当时，我们还属初到，对一切情况尚未了解，故对他负管理我们之责的分队长，不管该话的实质如何，不会因此而信任他乃是当然的。不久，有一个我所认识的同志告诉我道：

“特训班的分队长，大部分都是特工，你们三区队的高啸峰，是最精明而最得队长宠爱的一个，他过去是第三党，曾在江西临安破坏和打击过我们党的外围组织——救亡团体。”

这样，我们一方面特别加强对他的警惕，另一方面，因他负直接管理之责，故也就不得不注意到在有利于我们的条件之下的争取了。

的确，高啸峰是一个比较精明能干的特工，他对我们，除了日常生活上的严密管理之外，还以如下的方式进行一些活动：

第一，他监视我们的任何活动，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闲

谈或说笑的话，他就机警的装作凑热闹的样子凑进来了，目的是防止我们借这机会讨论或研究问题。

第二，有时就造谣或故意夸大说，某某同志怎样受刑，怎样在毒刑底下转辗呻吟，怎样在毒刑底下惨痛呼号，而终于无可奈何地屈服了。企图以此来威胁我们和动摇我们。

第三，有时，有些同志陆续开了小差出去，过几天，他就假装正经地告诉我们说：那些脱逃者终于全部被陆续地抓回来了。企图以此来夸大宣传反动统治的如何严密，要脱逃是如何无望，借以打破我们的逃跑企图。

但他是有点弱点的，第一个弱点是太爱钱。虽然充当了特工，但因为仍旧还在“戴罪图功”的期间，十元八元一月的津贴是不够用的，因此不得不钻空子向我们借钱用了。有时或公开或秘密在我们托他买东西的钱中间措一部分油，有时则直截了当地向我们开口借用。我们并没有揭破他或拒绝他，我们反利用了他这一弱点，来造成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的确，我们因此而可以在集中上课时，走去同其他队的同志短短地谈一谈（这是集中营严禁的）了。

第二个弱点是偷。正因为爱钱，钱又不够用，他就想办法偷东西了。第一次在阳历过年之前，八分队有一位同志的蜜蜂牌绒线衣不翼而飞了。奇怪，我们都关在铁丝网、围墙、宪兵哨的里面，东西会到哪里去呢？但可以堂皇进出、平素闹穷的那位高分队长，却在过阳历年时阔绰起来了。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但是没有证据。

过年之后，有一天近晚的光景，九分队一个同志的一条卫生裤又不见了，重大的嫌疑落在他的身上，我们决心利用这一机会来撵走他。因为在最近，他已经加强了前述的活动方式，严重地妨碍到我们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了。因此，我们就怂恿了另一个和他有着深刻矛盾的特工李广宽去进行调查工作，并同时报告了队长王寿山。下午，王寿山召集训话了，内中最激烈的几句是：

“想不到这里竟出贼了，贼是最不要人格的，在我管教之下出

贼，这是我莫大的耻辱，我们一定要检查，检查出来后，重重处罚。”

做贼毕竟是心虚的，虽在事发后高啸峰强装镇定，还时时间我们：“查出来了没有？”但当王寿山激烈地辱骂时，他的脸色在变，肌肉在收缩，帽檐压得更下了。晚上，检查结果发现衣服在厨房隔壁的一家老百姓家里，确是高啸峰所卖的，赖也赖不掉了。这，对王寿山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真想不到不要人格的窃贼，竟就是他的最能干的部下，上午辱骂的也竟是他所最宠爱的部下呀！事已如此，无可掩饰，于是只好一面不许全队再提或谈论这一个问题；一面也不得不将高啸峰戴上一个其他的名目，送上茅家岭去休息休息，以暂避“风头”了。

第二个特工是江汉，他是曾参加过新四军而于皖南事变前回去的。在屯溪集中营时，先曾以“左倾”的面目出现，有一次，他向我们谈起关于自首的问题。他说：

“革命是长期的，为了保留革命的力量，继续从事今后革命工作，我们不妨假自首，而这假自首，也是党所允许的。”

这是他自作聪明，其实是十分愚蠢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们特别注意警戒他和提防他，而以后的事实发展，也的确证明了他是一个特工。

到特训班之后，他编在三区队九分队，权充“学员”，以“学员”的面目来做我们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已经知道的特工，同时又未负直接管理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们起初还与他若即若离，相安无事，但他却自鸣得意，自以为有山可靠，火焰逐渐高涨起来了。有时，在墙报上写些文章，叙述他在大学里对农村教育有如何的研究，并不怕羞地郑重地提出什么关于全国今后农村教育的建议方案。有时，则因他与总教官特工头子萧芬过从甚密，故就放出谣言，说我们当中的某某同志与萧芬有特殊关系，企图以这样的手段来分化我们的营垒。但也正因为这样猖獗，因此，一方面引起了其他特工的不满，加深了他们之间在争功和争地位上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也就集中了力量，给他以应有的回答，大家不和他讲话，绝

对孤立他。处在一种集体的生活中间，在半年光景的漫长的时间中，没有一个人理他，没有一个人和他谈话，他走到哪里，人家就怕他似地离开那里，让他孤家寡人，独来独往，这种孤立寂寞的滋味，是足够他尝的。但我们对于他的还击，还有更甚于此者。有一次，他烂脚，病了。照例，我们照顾自己的病员，是多方设法，尽心尽力爱护的。但对他，却不同，每当他跛着脚，一拐一拐，手端一个碗，走到病号稀饭桶的旁边想盛一碗稀饭吃时，早已被我们故意抢得干干净净，桶底向天了。这样集中火力地孤立和打击，外加他在特工群中间的孤立而益形其甚，终于使这位“江兄”的气焰，不得不降低，到后来，真几乎象大家给他的外号“死猪”一样，消沉颓丧，愁眉从此难展了。

三 “辅基”教官故事之续

外号“辅基”的唐教官，工作是“积极”的。自他在时事讲话课上闹了“辅基”这一笑话之后，他又担任了“总理哲学”这一门课。据说，他的提纲，是张超批准的，内容是：从希腊哲学史到中国哲学史再到总理哲学，每次上课，不是抱了一本希腊哲学史来讲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那一套，就是抱了王阳明全集来讲：“王阳明是哪里人？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等另一套。而一直到我们离开集中营的时候，还没有讲到本题。除了上课之外，他还时常自告奋勇地找人进行个别谈话，想拿他那一套反动而又贫乏可笑的理论来征服我们。

有一次，一个同志被找去了。入门就座，已是常例，无须客气的。

闲谈数句，话入正题，第一句是：

“我问你，新四军是不是国民革命军？”

那个同志猜到了他那一套谈话的方法，想了一想，很有把握的答道：

“是的！”

“它是不是要受军事委员会指挥的？”第二句又问。

证实了，这是由于过去我们一贯不肯承认新四军是违反军纪之说，因而采用的“请君入瓮”的办法。因此，那一位同志很沉着的答道：

“是的，应该受军事委员会指挥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受军事委员会的调动呢？”

“应该的。”

“那么，这次军事委员会命令它限期渡江，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呢？是不是违反了军纪呢？”他以为中了他的计了，唐胖子的脸上显露了丝丝胜利者的笑容。

“我想请问唐教官一个问题。”那位同志很客气，然而又尖锐地提出反问了。

“什么问题？”

“就照你说，新四军算是违反了‘军纪’吧！那么按军纪条令，应该由其主管负责的，对部下处理，按你们国民党的规定，校官一级禁闭三个月，尉官以下，无罪释放，我们被囚禁已一年多了，到如今出狱还遥遥无期，这难道也是军纪吗？军纪是这样来处理我们这批下级干部的吗？”

唐胖子的胜利笑容，开始在变，变为尴尬而带有些气愤了。

然而那位同志还不放过他，尖锐的语句接着发射：

“因此新四军的问题光谈军纪是谈不通的。新四军并不是不肯在限期内渡江，因为在几条渡江的路线上，摆布着十几个师的中央军，企图并决心乘机一鼓而歼灭我们。因此我们无法在限期内渡江，请问，既要我们执行命令，而同时又要消灭我们，这难道就是军纪吗？因此，所谓新四军是军纪问题，只是你们的对外宣传和诬蔑之言，老实说新四军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党派问题，去掉这点是说不通的。”

“我倒只想说是军纪问题，不想牵涉到什么党派问题、政治问题，你硬要说这是党派问题，非军纪问题，那么，你要知道，政治斗

争是残酷的，假使你定要坚持意见，那我就要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来对待你，不会同你那样的客气了。”唐胖子气得面孔一板威胁起来了。

“新四军事件是党派问题、政治问题，是事实，至于说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那我是知道的。我决不能因此而抹煞真理，至于说，你要怎样处理，那就由你的便了。”

虽然这些话很刺耳，但大概由于他并未负管理我们的责任而只想图功报效吧，因此，出乎意外地又软下来了。

“你们真是顽固不化，心里只有什么共产主义，但你们却不知道，现在连苏联都已经恢复了私有财产制度了。”

“什么时候恢复的呢？”是一种明知而又假装并嘲笑的气。

“苏联的新宪法上，就规定了有这么一条——承认私有财产制度。”

语气很肯定，很有把握，真象新宪法上确实规定了有这一条，而又是他亲眼看见似的。

“哪一条呢？”

“好象是第二十五条。”有点迟疑了。

“我以前倒也曾仔细看过新宪法，条文虽记不得，但好象没有看见过这一条！”

“好！”咆哮一声，“你去吧，你这样顽固，你知道，是会吃亏的。”

那位同志含笑自若，毫不在乎地开门出去了。

四 一群华侨青年

集中营除了茅家岭作为它的禁闭室之外，还额外附设一个禁闭室。这禁闭室性质和茅家岭一样，是关一批在集中营里又“犯了罪”的“犯人”的。但和茅家岭也有不同，不整天锁门，但个个在脚上挂起脚镣来了。这个禁闭室里的人数不多，共五人，是不久前回国参加新四军，抱着一股抗战热忱的华侨青年。

铁镣很重，有八斤的，也有十斤的。两个铁箍，箍在脚跟上面的

螺旋骨那里，中联一根铁链，还不到一尺长，走路的时候，两脚一定要绷开，既得绷开，又要走动，既得走动，但又受铁链的距离限制，因此，走时就变成一跳一跳的了。但特别令人悚然的，倒是那铁链动荡时的声音。记得有一次还没有上课，大家正在喧嚷的时候，突然一种有节奏的凄怆的铁镣声音，逐渐的由远而近，从大门外面向响进来了，跟着这声音的渐渐接近，就有千百只眼睛向外面注视着，他们——五个本来在南洋晒得黝黑，而现在被关得变成苍白、瘦削的华侨同志出现了。这凄怆的有节奏的声音，这些苍白瘦削的同志的形状，象重锤一样打击了每一个同志的心，我们近千人的喧嚷声突然寂静了，下来，每一个人都愤怒地悲痛地沉下头去。

一天，我们都在挑水，大家中途在休息时，我问他们中间的一个道：

“你们带了镣，怎么还能够挑水呢？”

他一面指着下面的铁镣，答道：

“本来铁镣钉着，磨在骨头上，是不能走动的，但我们也有办法，就是用两根绳子，分左右两面，一头把铁镣吊着，另一头系在膝盖上面，这样，箍就不会磨螺旋骨，也就可以走路了。”

“那么，裤子是怎样换的呢？”

“先用裤子的两个脚管，在一只脚上的铁箍里套上来，然后将另一脚管从另一个圈里塞下去，再拉上来，就换成了，到什么山，割什么草，这是带了镣以后才学会的。”

“想不到你们竟象老犯人了，哈！哈！”我打趣地说。

“象吗？”他捋捋长得颇长的胡须，开玩笑地挑水走了。

虽然，他们带着铁镣，但他们还是愉快的，因为这正是他们顽强不屈，坚持斗争的象征！正是他们的崇高和光荣——为祖国民族牺牲奋斗的崇高和光荣！

集中营后期，因为“感化”教育不成，因此，又采取了所谓劳动教育，在离周田村一里多路名为庙后那里，在绵延不断的一带丘陵地带，由张超计划着一片三十年计划的大农场，造屋、打墙、锄

草、开荒、平山、填塘，都是由集中营的“学员”来干，而这一群华侨青年，虽带了脚镣，也仍免不了这一“教育”，每当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他们就被两个宪兵押着，肩扛着锄头，拖着铁镣一跳一跳的出发了。

有一天，当几个队的“学员”漫山遍野地在平山填塘，为“张超的三十年大计划”流血流汗的时候，在中间的一块上，一个华侨挖不动了。的确，由于他们两脚之间有了铁镣的限制，做这样的苦工，是要比我们格外疲劳的。

“报告，我想要休息一会儿再挖。”那位华侨向宪兵报告道。

“才休息了一会，你怎么又要休息啦！”宪兵严厉地答。

“我因为有些头昏，所以想休息一下再做！”

“大家都在挖，你偏要休息，不准，快挖！”

“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已经是哀恳的语气了。

“不准，快去做，不要噜苏！”怒喝一声，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左颊上。

“你打……人！”气得话都发抖了。

“哼，哼，”冷笑两声，“打人，打你怎么样？”说着，伸手就是一拳，打在当胸，那位华侨同志站不住脚，链条吭唧一响，栽倒了下去。

“喂，不要打人，大家都是中国人，不必那样凶狠的。”旁边另一位做工的华侨同志，冷冷的这样讲。

“你说什么？”宪兵迫近他声势汹汹地问。

“我说什么？”那位同志把锄头一摆，愤愤地答：“我说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不要打人。”

“打人怎么样？”

“我们是‘犯人’，能怎么样呀！不过不要迫得这样凶！”

“迫得这样凶怎样？打你又怎么样？怕你们吗？”口到手到，一巴掌又打上去了。

周围同在做工的几个队，本来早已眼含愤怒，默默地注视着这

一事件的发展，现在，再也忍不住了。虽然在敌人严密监视之下，无法作出暴烈的举动，但愤怒的话耐不住了。

“不要打人！好讲呀！打什么！”

“有本领的同鬼子打去，不要在这里逞凶！”

“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是陆续从四面八方来的愤激的声音，这是代表着成千个同志的仇恨和反抗的声音！

各队队长，眼见这样的情形，立即禁止道：

“做什么，不关你们事，你们只管挖。”

“不该打人呀！”

“打人，挖什么？”

“看不过，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又是陆续从四面八方来的愤激的声音，这是代表着成千个同志的仇恨和反抗的声音！

这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是蕴藏着可以推翻反动派统治的力量！

“好了，你们只管挖吧，挖好了回去吃饭，不要去管人家。”队长们已变得劝说的态度了。

气焰凌人的宪兵，也不得不强装着胜利的脸色退下去了。

这只是短短的一幕，但已充分的显示了我们的仇恨心理和团结力量。因此，以后敌人为了防止出危险，农场的苦工，再也不要集体去做，而且也少去做了。

当我1942年赤石脱险，浪迹闽赣，重过庙后一带时，这一片曾用我们成千个同志们的血、泪和汗灌溉过的农场，却又是满山野草，荒芜一片了。

1944年9月17日

卑劣的统治群

陈念棣 孙秉泰

——上饶集中营群丑像

上饶集中营一方面是酷毒的刑罚和非人的生活，另外在其所谓“感化”教育中也表现了顽固派统治群中的无知与卑鄙。

一 无知的“辅基”与“斯摩棱克斯”两教官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集中营的教官们接连来向我们作了几次时事报告。其实，正确点说，也就是读报，因为所报告的时事，不过是将《前线日报》（上饶国民党报纸）上所刊载的消息背诵一遍而已；但就是背报，却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具备一些地理上的普通常识，就容易会闹出笑话来的。有一天，正当基辅失守之后，一位胖胖的大个子，曾在大学毕业的唐教官来作报告了。一开口，大家都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声调，又尖又狭，俗谚所说“雌鸡声”样的，同他的大个子竟判若两人，假使不是亲眼看着他，亲耳听着他讲的话，真会不相信偌大的个子竟会发出那样细声细调的。序说一过，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张图，从右至左地写了“辅基”两个字，接着，他指着黑板向我们报告道：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德国军队已于昨天占领了‘辅基’了！”

话才脱口，哄堂都笑了起来，笑得他脸都红了。但他却仍以为是自己的声调关系，向我们解释了一下，以后，仍又“辅基”“辅基”的讲下去，从此，唐胖子在同志们的嘴里就易以“辅基”为名了。

“斯摩棱克斯”也是一样，他是军官大队部的指导员，有一次，在报告斯摩棱斯克附近激战的消息时，就一直是“斯摩棱克斯”，

“斯摩棱克斯”地讲下去，扬扬得意，一若他对于苏德战场有过大大的研究的样子。从此，当我们不论在哪里，远远碰见他的时候，就“嘘，‘斯摩棱克斯’来了！”那样地叫起来了。

二 所谓“做领袖的条件”

集中营聘来了一位教官，大名叫姜移山，是个托派。据他说，他是留学莫斯科的，他向我们作自我介绍时这样说：

“我在苏联，曾学了四年，四年学了些什么东西呢？就学了共产主义四个字。”说到这一句时，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力读着，脸上带着蔑笑，然后再继续说：“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方面，我比你们是晓得更多些，现在我还有许多列宁主义的原本书，这是国民党中央批准我看的。”

这一位对共产主义四个字学了足足四年，对共产主义晓得更多些的教官，后来却担任了“领袖言行”这一课。有一次，他来上课了，一开口就是：

“我们的总裁”，他必恭必敬地一个立正，我们坐着的也只好跟着挺一挺胸，因为这是国民党听见讲到“总裁”两个字时的老一套。之后，他继续说道：

“总裁之所以能成为领袖，是有他一定的条件的，没有一定的条件，决不能做我们的伟大的领袖，那么，究竟是哪些条件造成了我们的领袖呢？”他说着，就从讲台上拾了一枝粉笔，转身向着黑板，写字了。

黑板上显出白字来了。

“第一条：早起运动的习惯。

第二条：贤内助。

第三条：钢铁的意志，诗人的灵魂。”

才写出了三条，同志们都禁不住纷纷低声笑论起来了。

有的说：“我们集中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晨操，早起运动的习惯早已养成，我们都配得上做领袖了！”

有的说：“可惜我家里的老婆是土包子，只会做鞋洗衣服，不能替我当翻译，跑外国，勾通洋人！”

等到他写完十几条条件，开始作解释时，同志们都已毫无兴趣，偷偷地做自己的工作去了。

三 居然是“一个秘密消息”！

集中营的总教官萧芬，四川人，矮矮的瘦个子，阴险、狡猾，一望而知是一个三诀——吹、拍、骗的个中能手，他同我们进行个别谈话时，总常常这样说：“你们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象我这样的人，到共产党里去的话，起码当一个政治部主任。”当列宁格勒被围，莫斯科进行大战的时候，他就公开发表文章（登在《前线日报》），说莫斯科必失，而列宁格勒早已失守了。1942年4月，美国飞机突袭东京之后，有一天纪念周上，他作报告，照例带着那股吹、拍、骗的面容，向张超（集中营头子）敬礼之后开口说：

“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个极秘密的消息。”

全场近千的同志，听了“极秘密”三个字突然一震，神经一紧张，集中注意力，尖起耳朵谛听了。

“这一个消息是长官部高级负责人传来的，极秘密，我今天告诉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听了之后，不准向外传。”

长官部高级负责人传来的，什么消息呢？倒要听一听了。“不准向外传”，真好笑，倒好象我们不是囚犯而是可以自由出入似的。究竟什么消息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大家更聚精会神地听着。

“这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东京的时候，日本天皇吓得钻到床底下去了！”

大家掩嘴笑起来了，究竟当我们是什么人呢？日本天皇真会钻到床底下去的吗？而且这又竟是一个“秘密消息”，又是“长官部高级负责人传来”的秘密消息，又是“不准集中营的人向外传”的极秘密消息。在那样的场合，在我们这些“政治囚徒”的面前，郑重其事地讲得出来，真是“阿弥陀佛”！

四 “鬼”、“狗”、“人”

集中营有一课名为特约演讲，请的是反共的“名流”，如《前线日报》社长马曙礼、战区政治部秘书长戴鸿猷等都来讲过，有的讲些时事，有的讲些唯心哲学。有一次，据说请到一位大将了，是江西省的反共理论家张太丰，矮矮个子，穿着学生装，苍白的脸，头发很长，文质彬彬，倒真似乎有些象“学者”的样子。既是大名鼎鼎，又经张超郑重介绍（明知他不会离开“中国没有阶级”等老一套的论调），倒也想听听他的一套，因为据说，他对于谁是反动正统这一问题，是曾经同叶青展开过论争的。

他说了几句谦虚的客套之后，展开了他的理论演讲，他讲的是唯生哲学，他说：

“我是相信三民主义的，因此，我也相信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唯生哲学，陈立夫先生在《唯生论》的一本书的序文上，开头有两句很精辟的批评唯心哲学和唯物哲学的名句，我读给你们听一听，”讲到这里，他掀开带来的那本《唯生论》念道：“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接着，一面将书合拢，一面继续讲道：“因此，今天，我就从这一基本立论出发来谈一谈唯生哲学。”接着，他就展开了他那一套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批评，最后，他总结起来说道：

“总结以上，我来举一些譬喻，立一个公式来说明唯物哲学和唯心哲学的缺点和唯生哲学的正确。”他拿了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将公式写出来了，公式是：

唯心哲学，它只承认精神的存在，不承认物质的存在，因此，唯心哲学等于鬼。

唯物哲学，它只承认物质的存在，不承认精神的存在，因此，唯物哲学等于狗。

唯生哲学，它既承认精神的存在，同时又承认物质的存在，因此，唯生哲学等于人。

这公式，刚一写出，同志们既好笑又好气地骂起来了，

“一点也不错，国民党的‘人’就是等于‘鬼加狗的人’！”

这就是中国没落阶级精神武器的一例，他们竟妄想用这些愚昧造谣等手段来战胜真理！

敌人在集中营第一期教育结束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几个题目进行全体测验，以测验其“感化”成绩。有一个题目是：

“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是什么？”

我们同志，怀着极端仇恨的心情，用诙谐的笔调，一致在那测验的白纸上，用很大的四个字，作了如下的一个针锋相对的答复：

“抗战建国！”

五 张 超

张超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情报室专员、集中营的特务头子、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抗战初期还是个少校，皖南事变前曾充作第三战区巡视团团团长，到新四军军部作特务活动，终因反共有功，被上峰所赏识而现在也居然挂起少将衔的领章来了。他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集中营里的许多血腥事件，都在他的指示下造成。赤石暴动后百多个新四军干部被集体枪杀就是他的得意杰作。被兽军轮奸致病的施奇同志（改名周琳）在集中营移阆时因不能行动，遭他活埋。另一个女同志王洋，因月经期内行走困难赶不上大队，也被他叫宪兵带到山僻里枪毙了。

残酷之外是贪婪。一面不给我们吃饱，一面就把积存的军米食盐运到外省盗卖。领到建筑费和修缮费都落下私囊，一文不发，却砍伐老百姓的竹林松杉，强征老百姓的绳索箩筐、镢锯斧头等等工具，剥削我们的劳力，修葺房舍、打筑围墙、修马路、平操场，都重重地压在我们肩上；又滥用私人，贪污得贿，无怪近几年来日益脑满肠肥了。他将我们的口粮压缩得吃稀饭也吃不饱，可是他的早点珍贵得不是冰糖银耳汤，就是人参燕窝汤。

但他最怕他那个野鸡式的老婆，因此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一次张超到重庆去开会，她跑到办公室去，坐到张超的位置上，发号施

令，将总务股长杜筱亭、教育股长萧芬训斥一顿。她说：“你们不知道我是张主任的太太吗？你们不买我的账，你们目无官长，这是什么下属呀！”但她对队长杨国栋和白玉麟却言听计从，一点雌威没有了，原来一个是她的拉纤的，一个是她的湖北老乡，还有一次集中营请什么军风纪考察团吃饭，张超没回来，没有请她，她大发雷霆，几乎闹翻筵席，结果还是某大队长赔罪，另叫一桌酒席，送到她公馆里，才算了事。

六 曾 恭 生

曾恭生是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被蒋介石捧到天上去的曾国藩的孙子。他“克绍箕裘”继续做他屠杀革命志士的工作，我们叫他“曾魔王”。刚进集中营时，他还是上尉中队副，不到两年邀功幸进，升为中校队长了。在他管理下的就是“顽固”第三队，于是严刑拷打就成为家常便饭。丁公亮、王剑心两同志曾因组织暴动失败，被他打得死去活来。并用马刀斫丁公亮同志的肋骨，血流如注。但还是问不出什么来。预备第二天再拷打，再不讲就活埋他们。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逃跑了。

他还捉弄我们集体背诵三民主义的某一部分，战斗纲要第十九条，“党员守则”、“军人读训”及前言，背不出不准睡觉，再背不出，就罚你跪在小板凳上读。甚至强迫你跪在储藏室内的粪桶旁读（他们害怕我们晚上借大小便的机会逃跑，及便于他们的防守，将大小便桶放在房内小储藏室内，暂时禁闭我们同志也在里边）。

为着装门面，他曾拿我们的伙食钱买些针线，教大家把已穿了两三年的破棉军服缝补好，两小时后实行检查。结果有两三分长的裂口没补好，或是有个黄豆大小洞没补上，就一个个叫出来在细雨泥泞的地上上操，科目是“卧倒”与“匍匐前进”，爬得大家浑身是泥，而他却引以为乐。

七 刘士澄

刘士澄是个中队长，庐山特训班第一期学生，张超的心腹，是个鸦片烟鬼，好吃好玩好赌。但一个少校哪里来这许多钱呢？于是只有吸我们的血，吮我们的油。有些同志在被捕时掩蔽得好，应付得法，留下的金戒指（有四五只）、硬币（有二百多元）、毛线衣（一二十套）、手表等……都被他搜去，名义上是代为保存，结果一部分盗卖，一部分塞进自己的腰包。同志们的家有在大后方的，或者是华侨，家里寄来了大批款子，他去冒领。这些还不足，他还利用我们的劳动力，为他生产，挪移公款做他私人生意，温巨潮同志说他的公馆象赌场，经常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所以天天“高朋”满座，单论纸烟，一天也要三五十包，吃饭时，桌上满是鱼肉；而我们的菜则是“八块冬瓜，二十四根豆芽”，七人一桌。这话着了他的痛处，他便大为恼火，集合队伍打温同志的屁股，还嫌班长打得不力，自己拿起扁担狠命的打了几十下，累得烟鬼喘不过气来才放手。第二天温就逃跑了。

八 王锡恩

王锡恩是茅家岭的管理员，张超的得力喽罗，我们送他一个绰号叫“王八”。他残暴成性，动不动就打人罚立铁笼。吴必成同志因吃不饱肚子说了一句“他妈的，饭又这么少！”即被“王八”指挥痛打。我们因吴同志无故被打，都全体罢饭。“王八”见我们不吃饭，第二次又把他拖出去打，当时卫兵们都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坚持了两天，要求“王八”替吴同志买药医治，以后不再打人。“王八”见众怒难犯，于是玩弄手段，一口答应了，但事后全不作数。

他在作管理员时期，利用职权和女犯吴佩贞勾搭上了（是国民党政治部送来的案犯），结果搞大了肚皮。茅家岭暴动发生后，他得张超的庇护，仅仅是撤职留任。到福建后，因盗卖军粮，被他的情敌告发，于是三罪齐发（疏于防范、诱奸女犯、盗卖军粮），张超也

没法再包庇，只好忍痛把他枪毙了。

九 卢廷颺

卢廷颺是“顽固”三队的第一分队长，是个法西斯的信徒，天天在替德国鼓吹，辱骂共产党。他最会折磨人，冬天叫马潞、薛克伯、金科中等同志脱去棉衣单剩一件衬衫在雪地里下“特别操”。三步一跪下，五步一卧倒，一连两三个钟点操下去，个个滚成泥蛋。天气虽是那样冷，可是几个操作的同志，头上却冒着白喷喷的热气，不弄得你筋疲力竭，不肯收操。有一次他当值星官发牢骚，对全三队的人说：“你们这一批糊涂虫，混蛋东西，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看你们可能飞上天去，到处打听消息找报纸看，咕噜噜，咕噜噜，共产党怎样怎样，国民党又如何如何，我看你们能把国民党怎样？国民党是绝对存在的，共产党一定要被消灭！我可以和你们赌一赌，三年后看怎样？就是十年后国民党也还是国民党，共产党能够怎么样它呢？”这些话都深刻地印在我们脑子里，只要不被他们磨折死，或者被他们残害，总有一天可以看个水落石出。不要说十年，现在还不到三年，假使他敢于伸出头来正视一下现实，就可以知道国际的舆论如何？国内的舆论又如何？正面战场的情形如何？敌后战场的情形又如何了。然而他的眼睛却只看到集中营里的小天地，认为生杀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夜郎自大”起来而盲目与人打赌了。但也因此得到了上级的嘉奖，于是由上尉分队长而少校指导员，再由少校指导员而升为中校考核员了。

十 林贤良

林贤良是个上尉分队长，玩意儿可真多，在便步走时叫我们唱“游龙戏凤”，和着步子不准脱板。唱得不如他的意，就叫我们跑步唱，不唱好，不收操，不吃饭。这个唱好了，又叫来一个唱“捉放曹”，其中“宿店”里一句，是“一轮明月照窗下”，一个“轮”字要有十六个转折顿挫，这就更难于合拍合步了，合不好就让你尽走尽唱，非弄

得你嗓子腿痠不止。

有一次，在12月的天气，早饭后下大雨雪（在江西冬季下雪，天空飘的是雪花，落到房上、地面即成雨），他集合我们在大房间内以班为单位（九个班）九部合唱一个歌，没有唱好，再来一次也没唱好，他就集合出来，自己站在屋檐下叫口令，让我们在大雨雪下跑步，整整的跑了两个钟头，棉衣衬衣都淋透了还要跑。刘洁同志叹了口气，他就叫出他来，用扁担恶狠狠地打了几十下。对两个“顽固”的班，他手段更毒辣，大冷天指派他们在河沟上下流反复地实行打水仗，身体差的就都病倒了。

他没事做，总是想方设法算计我们，连病号也不让安闲。当全队人员出操时，他就找个狗腿子班长，带着病号们下小操、打猴拳。病号们受不了就昏过去了，他就说你装死，故意和他捣蛋，于是就让你受处罚，靠墙挺身直立，必须做到三点一线的要求——后脑、臀、脚跟为三点，全身挺直为一线，这样，用不了多少时间，受罚人就累得趴下了。

进“茅家岭大学”

季音

1941年1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皖南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为信号，全国又进入了第二次的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愈演愈烈，愈演愈露骨，政治暗流冲击着各地。国民党特务匪徒们更加横行起来，许多抗日爱国团体被无理解散，许多爱国青年宣告“失踪”。

“失踪”的命运也终于落到了我们的头上。1941年1月25日黄昏，一群国民党特务包围了我们的屋子，走进来逮捕了我们，虽然在当时我和计惜英同志都是合法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是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晚被捕的人，几乎包括了金华的全部进步文化团体。

1月26日，浙赣线上雨雪纷飞，我们戴着手铐，沿浙赣线西解上饶。

去茅家岭之前，曾在上饶宪兵八团的监牢里被关了两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监狱，黑洞洞的肮脏的一间屋子里，关着许多“囚犯”，脚上钉着镣铐，走动的时候就叮叮当地响。最使我惊异的是，关在这里的多数是宪兵团里的下级军官和宪兵，他们因为违反了各种法西斯“纪律”，被投入了监狱。其中最严重的是开小差被抓回来的，一律判处死刑。躺在我边上的是一个塌鼻梁的汉子，他从宪兵里开小差出去已经七、八年了，混进了国民党军队，在那里已当上了营长，但终于被发觉了，抓回来判了死刑，只等上头批下来就要执行。他脚上手上都上了大镣，囚室里一静下来，就听见他独个儿在那里引吭悲歌，他边哭边唱的那些词，我已经忘记了，只有那浮肿的死灰似的脸庞，和那呜呜咽咽的绝望的哀号声，我却

一直没有忘掉。虽然只在宪兵团监狱里关了一天多，却使我目睹了国民党法西斯政治制度黑暗的一角。到了集中营以后，我对国民党宪兵的黑暗内幕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一个当宪兵的浙江同乡，偷偷地给我们诉说了许多宪兵内部骇人听闻的罪恶。

两天之后，我们被押解到茅家岭监狱。茅家岭是一个小村落的名字，离上饶城十余里，离三战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地方五六里。村子小得可怜，不到二十根烟囱。可是我们所指的茅家岭不是指村子，而是指一间独立的小庙，离村子一里路光景，石砌房子年数已经不少，每次敌机炸长官部，茅家岭在剧烈的震动下，木栅子格格作响。

茅家岭在最初是三战区专门幽囚政治犯的一个秘密监牢，对外是不公开的，直属于三战区的特务机关专员室管辖。慰劳皖南新四军的上海代表吴大琨先生是茅家岭的第一个“囚犯”。茅家岭有两个大囚房，一个女囚房，一个“优待室”。大囚房外是密密的木栅子，特务团一个排担任守卫；还有一个管理员，是山西人，绰号“狗头”，对我们的剥削真是无孔不入，他发明一种“夹底板”的斗量米，装满一斗，倒出来只有六七升，使得我们每天吃不饱肚子。皖南事变以后，茅家岭随着整个三战区的反共高潮而紧张起来，人数激增了，形式也半公开了，可是依旧没有恰当的名字。“集中营”在不远的周田村成立，特务们给了它一个名字：“禁闭室”。我们给它一个名称：“茅家岭大学”。

在大牢房里关了几天之后，我逐渐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并且知道，这个纵横不过几十平方米的牢房，竟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世界，这里有医生、教授、农民、艺术家、工人、火车站站长、技术人员、职员、商人……形形色色，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很好的人，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有的并非共产党员，只是由于爱国和正义感，看不惯国民党的胡作非为，也成了这里的“政治犯”。有些人，则完全是糊里糊涂地被抓来的，抓来之后特务也发觉抓错了，但既然抓进来了，就是他活该倒霉，也就一直关在

这里，别想再出去。睡在我旁边的是上饶火车站副站长叶加清，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懂共产主义，只是因为特务在他住处发现了一封可疑的信，并且观察他平时言行正派，不赌不嫖，忠于职守，于是就“共党嫌疑”被抓了进来。被捕的时候，这位火车站副站长才结婚不久，他带到牢房里来的，还是结婚时用的红绸被子。在牢里他想念年轻的新婚妻子，但是在特务审问的时候，他毫不屈服退让，责问特务凭什么把他抓进监牢？这样，他就始终没有得到释放，和我一起从茅家岭又押到了集中营。1942年6月我逃出集中营的时候，他还被关在那里。

茅家岭是个杀人的屠场，在这里，特务们恢复了中世纪式的野蛮，什么“踩杠子”，“老虎凳”，“老鹰飞”（倒吊在半空），钢针刺手指，“火攻”和“水攻”（即用火焰铁烧身和灌辣椒水），真是金、木、水、火、土，各种非人的毒刑一应俱全。茅家岭的刑场有两个，一个在特务专员室，一个在茅家岭外的草房里，以后又在周田村增设了一个，他们在这里残酷地折磨“政治犯”、“思想犯”，无论是男人还是妇女，是成年人还是小孩，他们是一律相待，甚至对妇女和孩子还更加残忍。牢里有一个从铁路上被捕的人，受尽了种种酷刑，他脱下衣服来，身上全是可怕的伤痕；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他们几次三番地用毒打、“踩杠子”、“老虎凳”和“老鹰飞”等酷刑，打得死去活来，拖回牢房里，很久都不能动弹。

在敌人无比野蛮的折磨下，茅家岭里不断出现了“疯子”。有一个同志名叫陈峰（陈剑峰），他只身冲进特务的房间，一拳打穿了寝室的薄墙；站在特务的床上挥手大叫：“是共产党员都站到这儿来！”

我们都感到浑身热血上涌。结果他被送到茅家岭。1942年疯子参加了茅家岭暴动出来了。在医务所我又碰见一个发疯的同志。把浑身衣服扯碎，咬得自己浑身溅血，咬牙切齿地说：

“你（指特务）要我的命，我也要你的命！”

结果疯子被关在茅家岭的木笼里。茅家岭的木笼是一个特制

的刑具，木笼的大小高低吻合一个人大小，人站在里面不能转动一下，四周是密密有刺的铁丝，时间站久了，人就晕倒。疯子关进木笼子后，在木笼里拚命挣扎着，于是铁丝钩破了衣服，钩破了皮肤，最后钩得血肉片片，惨不忍睹。不久，疯子就死在茅家岭。

这使特务们不解，何以人既然疯了，心却依然没有转向，始终没有疯到在“自首书”上签名的程度？他们是永远不会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到茅家岭的期间，正是日军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活动的时期，日军采取了大棒与胡萝卜齐下的办法——既软骗利诱，又实行军事威逼，加紧对后方的轰炸。那些日子，只要是晴天，几乎天一亮，日本飞机的马达声便在天上隆隆震响。茅家岭附近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机关，目标显然很大。只要警报一响，茅家岭的“狗头”管理员、卫兵（除站岗的以外），都仓忙逃到外边钻防空洞了。我们这些囚徒们则在木栅子里恭听机枪在头顶上炸响，炸弹“嘘嘘”地落下来，在附近轰然爆炸，整个牢房为之摇动。等到高射炮声响了，我们知道，一场空袭又过去了。上饶的高射炮有一条“规律”：敌机临空时鸦雀无声，敌机走了才开始射击，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就称呼他们是“送行炮”。

日军加紧诱降和逼降，国民党反共就越起劲。他们在金华逮捕了我们之后，又继续在浙江、江西一带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们到茅家岭不到半个月，囚房人数增加了快一倍，而三三两两的“新犯”，还是跟着每天的黄昏薄暮一起走进茅家岭来。人多了，囚房仍然是这么大，于是地下、尿桶边也都开始铺满了席子，老年人吃不消挤，半夜里坐起来喘气。铺板上则打满了竹钉子，象梅花桩样林立着，人只能侧转着夹在其中“睡”，稍一动弹，尖利的竹钉便会给屁股大腿以刺心的奇痛。天未亮，无数的臭虫、跳蚤便把我们睡梦中赶出来，我们都睁着眼，透过木栅子，眺望天井里一块四方的天渐渐变成白色，转成红色，我们就这样等到天明。

茅家岭那个姓卫的“狗头”管理员，是我们极度贫困中的一条

大蛭，我们的菜，我们的饭，连“囚犯”死去的棺材，都变成了他身上的皮袄、皮鞋……。一天，“狗头”贪污我们口粮的“夹底斗”被揭穿了，全牢房的人群情激愤，使这条平时何等疯狂的恶狗，终于夹起尾巴。

由于高度的肉体摧残与生活的贫苦，给我们带来了普遍的疾病，不到半月，人死了五六个，囚房笼罩在恐怖的气氛里。一个江西老倭白天哼呀哼的，头上扎了一方白布，脸色苍黄，第二天同他睡一条被窝的“瘦鬼”去摸摸他已经冰冷，于是就用一条破席把他拖了出去。

牢房里有一个胖胖的穿着一件大褂的中年人，名叫徐宝兰（真名叫徐禄溪），他是一个画家，当过美术教员，被捕前在他的家乡浙江江山一带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为人温和，乐观，在牢里谈笑风生，和大家很合得来，对我们这些年轻的，更是充满了长者的关怀。听说他曾经受了不少苦刑，但他依然是乐呵呵的，毫不愁苦。有一天，他一直睡着没有起身，囚房里听不到了他的谈笑声，大家感到奇怪，过去一看，才发现他已经病倒了，没有几天，回归热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茅家岭牢房里，还有一个美术家，他叫林裕，是我最难忘的战友和老师之一。林裕真名叫林夫，浙江平阳人，是一个青年木刻家，共产党员。他身体有残疾，两腿走路不方便，说话的声音是沙哑的、低沉的。但是他的心一点也不残废，它象钢铁一般坚硬。他在193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木刻这种艺术形式为武器，鼓舞人们与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1940年3月8日，他不幸在平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转辗押解到了茅家岭监狱。他整天坐在大牢房的一角，沉默寡言，但从他那坚毅的眼光里，却透露着他那坚韧不屈的意志。回归热也曾经折磨得他几乎死去，后来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他经常给我安慰和鼓励，那沙哑的然而充满战友情谊的声音，使我终生难忘。1942年初夏，他被编到敌人称为“顽固队”的六队。在六队举行赤石暴动之前，秘密党支部

派人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立即赞同。这位同志问他：“你的腿能行吗？……”他笑着说：“没有问题，你们不要管我！”我们知道，林裕双腿残废，平时连操场上跑步都很艰难，怎么能参加暴动，抢登武夷山呢？但他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果然，赤石暴动的枪声响起之后，林裕没有跑几步就掉下了，被后边赶上的国民党匪徒抓住，枪杀在赤石河边。第二天，集中营其他几队的同志被押解着经过赤石河边的时候，在河边的一棵树下，看到林裕同志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还没有最后断气。同志们看着这惨不忍睹的景象，个个都低下头来，眼上闪着泪花。林裕同志早就对我说过，根据他的身体情况，越狱是困难的，他准备死在集中营里。他果然以壮烈殉难的行动，实践了他坚定不移的决心。

在牢房木栅子门口有一个瘦小的老头子，也病倒了，他是厦门大学教授，名叫张实，又名张元丁。老教授为人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绝不含糊。有一次特务“审问”他的时候，他同特务大声吵了起来，怒声斥责特务，老教授变成了审判官，狗特务反而变成了被审的。特务恼羞成怒，结果老头子挨了一顿毒刑，审罢出来，另一个人扶着他（他腿已不能动了），他声泪俱下地大呼：“你们这些狗东西……中国要断送在你们手里！”

我们听了，都为之恻然。

老头子一病，就非常厉害，在梦里哭号着：

“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你就把我拉出去枪毙吧！……害了我一个人没有关系，……害了中国呵！……”

他的侄子是江山国民党县党部的干事，在旁边服侍他。夜里老头子终于死了，我们转侧在床上，再也无法入眠，听着“狗头”在门外吆喝着“拖出去”；听着那侄子嘤嘤哀泣。第二天那个侄子也病了，不几天也在一个夜里悄悄死去，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一盏油灯摇摇欲坠，他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痰在喉头啞啞地响，断断续续地叫着：

“啊，啊唷，我要死了！……唔！一定的，啊呀，我的妈呀！”

我要死了呀！……嘎，嘎，你们不要睡呀，你们听我说——呀！……啊，我是国民党员，想不到我，我死在国民党监牢里，想不到，死在国民党手里！……唉，唉，你们不要睡呀，你们听，听——我说呀！……”

那侄子一直叫到深夜，我们确实都没有睡，我听到卫兵在门口刁刁着，我听到夜风在茅家岭的莽原上呼啸，我听到黑夜在屋外沉重地叹息。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早晨，我们一行十几个人被押出茅家岭监狱，爬上山坡，走往新的牢狱周田集中营。在昏暗的牢房里住久了，一旦走到外边，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双腿是那么沉重。队伍里有几个病人，边走边呼呼地喘气。我回头望望茅家岭那座破庙，已渐渐隐没在一片烟雾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返回茅家岭，但是“茅家岭大学”两个月的生活，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站 铁 笼

赖少其

1941年的深秋，在集中营感到格外的寒冷。

德国法西斯强盗，已经占领了基辅（无知的特务在大谈国际形势时却念作“辅基”），现在正兵临莫斯科城下。敌特们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什么苏联快要完蛋了，中国共产党也快要完蛋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蒋介石诱降，以便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积极地反共反人民，以便蒋汪合流，共同投敌卖国。集中营里的特务匪徒，一反过去的怀柔政策，更加残暴地采用拷打、站铁笼和活埋等酷刑，我们和敌人的斗争也更加尖锐了。钟远平同志指挥同志们唱《黄河大合唱》，当唱到“怒吼吧，黄河……”，敌人便被这歌声吓昏了，说这声音“怪异”，是“图谋不轨”；我因为画了一幅被围困在铁丝网里的老鹰，名为《高飞》，便被认为是暴动的讯号，不久我们两人同时被关进了大队部的小禁闭室，面临着严酷的考验。敌人以为用死可以威胁我们屈服，前一天晚上把我们折磨到半夜，第二天凌晨，天还模模糊糊的，特务头子张超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把我叫进去。他两眼发出凶光，用沙哑的声音发问：

“考虑过了吗？”

“考虑过了。”

“怎么样？”

“新四军抗日有功……”

“好哇！”他还没有等我说完便凶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东西一齐跳起来。

我又被带回昨晚被囚禁的那间房子里。

牢房里静得很，静得象死去了的一样。铁丝网的刺，在窗外发

着惨白的光。不久，听见由远而近的脚步声。进来的是胡须茸茸的队长王寿山。他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皱着眉头，停了很久，才慢吞吞地说：

“我昨夜在隔壁听得很清楚，唉！青年人太自负了，何必呢？你的前途很远大呀！……”一听，我就知道他是来“劝降”的。我气愤地说：

“抗日的前途当然是远大的。抗日也有罪么？”

“不是这些，我是说，你走错路了……”他急忙地争辩说。

“唔？！”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大概是发射着刺人的光芒吧，他把脸避开了。

他感到无话可说，便在屋子里兜了一圈，才若有所思地坐在一张破烂不堪的藤椅上：

“不错，共产主义是好的，不过，譬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就象这样的破屋子，破屋子只配放这张破藤椅，如果放一张漂亮的沙发，不行，不行的……”

我听了他这一说，才发现国民党原来是一张破藤椅，不由得咯咯地笑起来。这一笑，使他的脸由红变成紫。这个披着羊皮的狼，顿时现出了原形，狠狠地说：

“那么，你是死不改过了？”

“死有什么可怕？我昨晚就已经说过了，我们新四军抗日有功，有什么过？你们要投降反共，就把我们枪毙吧！”

“枪毙？”他狡猾地一笑，那一根根胡子仿佛都翘了起来，恶毒地说：

“死哪有那样容易？不生不死才痛苦！”他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加重了语气说：“恐怕你受不住吧？”他一脚把破藤椅踢翻，便扬长而出。

四个宪兵早已等在门外，手拿着快慢机手枪跑了进来，把我两手反剪着捆起，押出了门。集中营的同志有的发觉了，也只能用无声的抗议目送着我。

天气很不好，暗黑而深沉，还下着毛毛细雨。我感到一身寒冷，不由得抖了一下。出了集中营的大门，回首一望，同志们还远远的呆在那里，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我向前一看，一眼见到的尽是有刺的铁丝网，宪兵的岗哨布满了周围的小山峦。从小路爬过几个山岗，便可远远见到在山凹中有一间孤零零的石屋，以前是一座古庙，现在已被特务们改成集中营的牢狱——恐怖的“茅家岭”。

小河悲哀地倾诉着。我举目四望，前后左右都是荒山和野坟。无限的往事浮上心头，但即刻就消失了。

“茅家岭”越来越大，裂着血口，把我吞进去了。“号子”里的同志们都挤到栅门前，用热情的眼睛迎接新来的同志——仿佛忘记了自己也在受难中。

宪兵并没有把我关进“号子”，而是把摆在囚室旁的一个铁刺笼的门打开，把我推了进去，锁了起来。那个满头乱发姓王的监狱长，大家称他做“王八”的，咬牙切齿地举着拳头在空中晃了两晃，狠狠地骂了一声，那声音就象犬吠一样：

“共产党就是你们的祖宗？！”他以为这回把我们骂倒了，没有料想到我却响亮地回答：

“共产党是我们的祖宗！”引得号子里的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他恼羞成怒，对着号子里的同志大声叱责：

“不准说话，禽你奶奶！”然后才大摇大摆走进了他的房里。同志们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仔细地看一看这铁笼：共有四根大柱，八根小柱，人只能直挺挺地站着，稍一转动便会被四周的铁刺刺伤。我不由得想起了《老残游记》中酷吏把犯人站笼示众，死后不得收尸的描写，想不到我也身受了。

被关在这里的女同志，好象得到了特别的“宽待”，她们可以在牢内“自由”地跑动——虽然可以跑动的地方是很小的。号子里有同志带头唱起了《渡长江》，她们也和了起来：

薄雾弥漫着江面，

江水冲击着堤岸，
当这黑沉沉的午夜，
我们要渡过长江。

歌声越来越响亮，好象山洪爆发，洪水冲击着堤岸，
饥寒困苦算得什么，
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
长江是我们的，
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我们要渡过长江，
获得更大的胜利！

是谁阻止我们渡过长江呢？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共产党新四军坚决抗日，所以他们对我们才怀有刻骨的仇恨。因为这首歌的词是我写的，所以同志们用唱这首歌来鼓励我。女同志也放开嗓子高唱，但眼泪直淌下来。

“王八”以为又要出事了，惊慌地跑了出来，象犬一样嗅着空气，但见大家高声在唱歌，无可奈何地又缩了回去。

一位瘦弱得很的女同志，因为从集中营逃跑，不幸在火车上被抓回来。她很沉着地走近铁笼，向周围张望了一下，机警地递给我一张纸条。我迅速接过来捏在手心里，然后背着柱子很心急地拆开来，里面写着几行小字：

“同志！你的行动给了我们最好的教育。你要更坚定地斗争下去。你要吃什么东西，我们一定替你想办法……”

同志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鼓励我，我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我的热血沸腾，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很快把纸条捏成一团吞进了肚子里。那位女同志在屋角里瞧着，我用感激的目光向她示意，并摇头表示什么都不需要。

不多久，一位头发很长，眼睛黑溜溜的女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一个政工队员，因为思想左倾被抓进来的——故意装得很幼稚，一蹦一跳地跑近了铁笼，伸手塞给我一包

东西，又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走开去。站岗的国民党士兵看见了，笑了笑，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便把脸转过去。我大着胆子把这个小包拆开，原来是一包剥了皮的花生米。我紧紧地握着，感动得眼泪都要涌出来了。

号子里又慢慢地由低而高地响起了粗壮而倔强的歌声，曲调是《八百壮士》，歌词却已改过了：

中国不得了，

中国不得了！

你看那民族英雄坐监牢……

歌声还未唱完，“王八”这回气极了，从房子里直冲出来，跑进了栅栏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同志们头上乱晃，并且象恶犬一样狂吠：

“什么不得了，什么……”一阵乱棍子打在墙壁上，借以出气，然后才“嘭”的一声把栅门关上。这个狗东西，站在栅栏外，气得直喘粗气，两腿发抖，满脸通红，我看他那副样子，不禁发出了轻蔑的笑声。这笑声却使他象触电一样蹦了起来，手中挥着棍子，发疯般地冲着我呵叱着：

“禽你奶奶，把他吊起来，吊起来……”两个打手即刻把铁笼的门打开，用绳子把我的手反缚着，吊在铁笼里。绳子越吊越紧，身子也慢慢沉重起来，一丝丝的刺痛，从两腕蔓延到肩胛，直刺进了胸中；以后，又好象从骨髓里发出阵阵的剧痛，脑子也浑浑噩噩起来，大地好象旋风一样在旋转……

天慢慢暗下来，在迷迷糊糊之中，好象听见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把嘴张开，吃点酒散散气吧……”我吃了一口酒，全身好象散发着热气。

“你不能笑呀，他最恨你笑，君子不吃眼前亏……”这是站岗的国民党士兵的声音。他们用一片柴从铁笼的这边斜穿到那边，从正面看人还是吊着，其实我的屁股已经贴在柴上，身子也不悬空

了，这样我才慢慢清醒过来。

女孩子在黑暗中消失了，国民党士兵若无其事地躲在墙角里抽烟。“王八”出来查哨，看见那位士兵没有站在铁笼边，便大声骂起来：

“你奶奶的，站到哪里去了？”话还未落音，号子里又此起彼落叫了起来：

“把他放下来！把他放下来……”

“静一静，不准吵，奶奶的！”“王八”也用力大叫。

“不行，放下来！……”

“你们要造反了吗？”“王八”说完慌张地躲进了房子里，再也不敢出来了。但号子里还在叫着：

“不行，把他放下来……”

夜更加深沉了，监狱外的风和雨在旷野上嘶鸣。监狱里是多么黑暗呀。我好象远远听见鸡啼……

1942年春作于苏中

1962年春改于黄山

记茅家岭两个月的生活

庞斗华

茅家岭虽然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但它的确与现代史上最黑暗、最惨酷、最无耻的一页相结合着。它在集中营同志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切齿痛恨的名字。但同志们却幽默地称它“茅大”（“茅家岭大学”）。由于它同特务统治密切地相联系着，也就是与国民党的统治者密切地联系，因此，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能直接地影响它，使它也在不断的变动中，这是变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茅家岭在这世界上，是与外界完全绝缘的小天地，同志们在里面生活、斗争、挣扎，积累了经验，结果锻炼出了可歌可泣的茅家岭暴动。

我也曾在茅家岭生活过两个月的时间，这里写的只能作为茅家岭情形的一个片断。

被送到茅家岭，是一定有“罪名”的。我的罪名是“冒犯长官”。事情很简单，在集中营做苦工，因为脚底上生疮，不能行动，请假不准，去申述不能操作的理由，这样就算“冒犯长官”，于是竹棍子在身上乱抽，不久由手里拿着上红绳的驳壳枪的宪兵伴送到茅家岭去了。

当然，被送到茅家岭去的人，事前差不多每一个都要先吃些苦头，轻的象打屁股、灌水之类，重的就是老虎凳、踩杠子、灌辣椒水等残酷得难以想象的酷刑。这是很少能够幸免的，象我仅被竹棍子抽几下，这真是我的特别幸运，当时我身上只穿贴身衬衫短裤，其他东西譬如毛巾、牙刷之类，在特务们严厉的命令下，你是没有办法带的，衣服棉被更不用说了。

宪兵押着我走了两三里路，进了独立在山坡上的一个祠堂，我想这就是所谓茅家岭了。初次拜访，我贪婪地用目力要了解这屋子

的轮廓，但显然我不能够有即使是这样短少的一点时间。宪兵将一个纸条递给迎出来的特务管理员，他好象永远是在等待着宪兵押送去的“人犯”，他看了纸条以后，在身边掏出一把钥匙，走到一个屋角里，开了一扇什么门，他的动作是多么娴熟与迅速。

“来，请到这里休息一下！”狞笑在他脸皮上露过，他的手做了一个谦让的“请”的姿势。

这是什么玩意，在这样的匆忙中，我的官能简直没有时间来了解，即使是放在眼前的东西。我被“请”了进去以后，“嗒”一声，门又锁上了。我定了一定神才知道，这是不上两尺见方，比人高些的一个笼子，里外都密密地围着在战场上对付敌人用的有刺的铁丝网，站在里面是很难转动的。假使你想在腿上搔一下痒，那么头、肩膀、手臂都会碰到尖刺上面去。但是蚊虫和跳蚤就在这时候来替特务执行吸血的命令，可是你可不能“反抗”，因为它们有铁丝网保护着。因此它们对你是毫无顾忌的。

禁闭室里的同志们，从窗栅子的隙缝里，对我投出探问与同情的眼光，但彼此不能交谈一句话。在对视中，含着同样仇恨的血在交流着。

一个钟点以后，我从铁丝网出来，被送进禁闭室。禁闭室有大小两个，大禁闭室是院子的西侧厢，小禁闭室是厅西的一间，我被送进了大的一间，这房间的四壁，都是石砌的，靠东是高过人眼的木栅，东西两面搁下两排统铺，中间留一条进出的路，栅门是向北开的，南端有一点余地，放一个小便桶。这个小天地中，便是经常有十多个同志的活动空间。不可估量的宝贵光阴象黑暗中的翅膀，无声地逝去。

每个人都是憔悴和黄瘦，好象生长在屋角里的植物，见不到阳光，也没有人整理，但都满含着生意，向光明处抬起了头，好象从未意识到要想低下头来，回顾一下自己瘦弱的躯体。

一天两餐饭，但每餐能分到松松的两平碗的日子是很少的。由于悠长与无聊的时间，吃饭变成为使人兴奋的事情，然而这只是饭

在锅子里，当我们闻到香味的时候；但拿起饭碗，兴奋的情绪完全变了，砂子与米粒，也许有同样的数量，菜经常可以说是没有的，给一盆地菜汤，浮几片菜叶，在上面找不到一点油花，也感受不到一点盐味。

由于人数有变动，饭的数量，也在变动，里面人数增加，管理员是不大关心的，因为饭是不会增加的，但是人减少他却非常灵敏，饭立刻就减少了许多。在这样的场合，管理员常偷偷地站在栅下的墙外，在那里，我们不容易看见他，而他却可以完全听见我们的谈话。饭过份少了，愤慨的话从不同的口中吐出，一会管理员就出现在栅门口。

这已经不是那个“狗头”，而是一个自称为东北人，并不高大的个子，下巴经常光得象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飞机式的头梳得油溜溜的，薄薄的一张狗脸皮，能非常自由地活动，从微笑立刻可以拉长，也可以从拉长立刻转成微笑。两手喜欢插在裤袋里，装成学生的样子，在栅隙中现出一派笑容来，态度是怪客气的。

“今天饭不算少了。”

“.....”

“其实只有这么多，你们想，我哪里要措你们这一点儿油。”

“.....”

“你们算算看，领一包米，名说二百斤，实际上打八折，搬运还要漏掉，还要去掉四斤袋皮，二百斤就剩了一百五十斤，去了四分之一。你们规定二十两，你们看，实际上不到一斤，这许多饭，还少吗？”

反正指鹿为马是特务惯玩的把戏，难道真的和他去算米账吗？在他这样说了以后，我们经常都是沉默的，因为知道讲了也没有什么用的，但有时总忍不住。

“是，管理员措油决不会措到我们的头上来的，这一点，管理员也看不上眼。”一个同志这样和缓地说了。是真的，是讽刺，只有听的人去体味。在这样情形下，管理员一张脸只能维持他的笑容，板

不起来，不过多少没有刚才那样自然。

饭一天一天在减少，同志们一天一天在消瘦，忍不住了，我们决定“绝食斗争”。虽然热腾腾的饭放在面前，好久没有饱过的肚子在叫，我们仍然不吃，我们只是唱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整齐而宏亮的歌声，震动着整个的屋宇，小禁闭室的同志，立刻更加强了这歌声，同志们把肚子饿都忘掉了，军歌、高尔基囚徒歌、不知名的牢狱歌，一个连一个的，歌声也一个响一个。

特务管理员又在栅门口出现了，这次板足了脸皮，代替了他过去的“笑容”，严厉代替了过去的“客气”，我们停了歌声。

“饭为什么不吃？”好象吃饭都可以命令人家的。

“饭太少了。”我们的回答是齐声而严肃。

有点出乎意外，板足的脸上，显见有些紧张，也许还有点儿恐慌。

歌声又响了：“这杀人不见血的铁牢，究竟是谁所造，天下多少工农，在这里死掉……”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不在栅门口了，歌声不断地在空气里震荡。卫兵排长来了，我们又停唱。

“晚饭决定增加，他答应了，你们吃饭吧！”排长出来转圈了。

“保证以后不再减少。”一个同志代表全体的意见。

“当然，以后不再减少。”

以后在较长一个时期里，每人保持着两平碗的数量。

因为菜里面从未有一点儿油花，我们就想到了灯油，希望从灯油里面，偷偷地想一点儿办法，来安慰一下对油的渴望，然而从此我们全体都泻了两天肚子，“聪明”的特务管理员，已经在能吃的灯油里面掺下了桐油。

在夏天，禁闭室的温度是比任何地方都高的，因为房子的石壁，是很容易透热的砂石，而外面因为防空又涂上一层黑色，于是上午是东晒，下午是西晒，东西石壁便轮流成了巨大的壁炉，全部

太阳的热都好象要吸收到这禁闭室里来；我们在里面，一点也不差，是蒸笼里的馒头。在这样闷热的空气里，人是难以忍受的，然而吸血的虫豸们，臭虫、白虱、蚊子、跳蚤都大大地活跃起来，它们狼狈为奸地联合进攻，残忍地咀嚼着血液，一直到你没有血液为止，而它们自己却吃得油头肥脑，大腹便便。

这样热的天气，我们要五六天才得洗一次澡，我们的洗澡，几乎要惊动茅家岭全部人马，两挺机枪，另有长短家伙十几支押着我们，到一个小溪的旁边，两挺机枪，架在高岸上，对准溪心组织成了火力网，长短枪在周围巡逻着，我们就在火力网的范围内洗澡了。我们的洗澡是非常简单的，河边的沙泥，便是我们的“肥皂”，涂满全身，自己的双手，便是毛巾。虽然这样，但还是我们最兴奋的一幕，清凉的溪水淋着我们非常灼热的身体，昏沉闷乱的脑袋，也好象从恶梦中苏醒过来。这时间，同志们很象晨光中的林鸟一样快乐，但时间太短促，在押着回去的路上，沉重的铁链，又紧紧地压上同志们的肩膀。

秋凉以后，晚上睡觉，就成了问题，大多数同志身上只有一套衬衣，一到晚上，山间的气候直冷得人发抖，于是大家在硬板铺上互相挤得很紧，但还是不济事。我们向管理员要求发稻草，管理员口头总是满口允诺，甚至还讲“你们晚上是冷了”，好象同情的话。但是稻草老是不发，晚上同志们还是在战栗中挨过，幻想着稻草的温暖；无情的寒冷，直刺入人的骨髓，这是难以合眼的，同志们就决定白天睡觉，晚上在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下，讲着革命故事，谈着天，或唱着歌，以消磨这寒冷的永夜。已经深夜，一位同志正在讲一个苏联革命故事的时候，使人熟悉的管理员的声音，突然地从栅门口送进来。

“你们还不睡觉？”好象还很客气，但很阴沉。

“冷，我们睡不着！”一位同志用同样的音调回答。

就此，问题是好象严重了。管理员、卫兵们彻夜不睡了，哨长在栅窗外不停的巡逻，外面派了双岗，卫兵的枪尖上装上了刺刀，

管理员也时常来察看我们的行动，我们却仍讲我们的故事，谈我们的天。一夜、两夜，我们仍是这样，他们仍是整夜不睡，严密警戒，疲劳使卫兵们有了怨言，也使管理员觉得不上算，第三天稻草就送来了，于是我们垫的是稻草，盖的也是编起来的稻草，我们钻在稻草中间，只有被寒冷所压迫的人，才能体味到稻草的亲昵与可爱。

老百姓也常有被送到茅家岭来的，当然他们是被加上有“异党”嫌疑的头衔的。有一次，两个老倭（江西人）被扶着进来，很明显，已经遭受过特务的毒手，不能动弹了，为了这两位，特务们又想出一套“聪明”的欺骗把戏。

第二天一个青年模样的人，被宪兵送进来了，腋下夹着一本巴金的《灭亡》，脸上表示着对被捕的愤恨，态度怪象一个进步青年，同志们在最初的一瞬间几乎被迷惑了。但是一个新来的人，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进来？一位同志就向他提出问题，问他姓名、籍贯，在什么地方工作，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形势。在这一连串的问题下，他的丑恶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很清楚，他是一个特务。他的目的，也很快被我们拆穿了。他要想冒充进步青年，来引诱两位受刑的老倭屈服，为了要完成他的工作，他在里面过了一夜。由于我们已经拆穿了他的西洋镜，他的阴谋也就成了泡影。这一夜，我们让他睡在板铺的边缘，小便桶的附近。第二天他公开地也得意地，好象很有能力地做起管理员的助手来，以后“灭亡”便做了他的代号。

由于特务们认为对“冒犯长官”的罪名的惩罚已经够了，我又被宪兵押回周田村。现在是有了跳跳蹦蹦的机会了，然而在茅家岭可以高声唱自己的歌，讲自己要讲的话，因此在集中营里有时便会怀想茅家岭的生活的。

茅家岭暴动

李 胜

上饶城西南大约十里路的小山坡下，有一个叫做茅家岭的小村庄，住着几十户人家。这个从来没有人过问的小村庄，自从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在周田村设了集中营，把集中营里的所谓“顽固分子”押送到村西约半里路一个孤立的小庙里囚禁以后，这“茅家岭”的名字，也就成为恐怖和罪恶的代号而闻名于世了。

这个阴森而孤立的小庙，原名叫葛仙庙，是第三战区特务机关情报专员室关押政治犯的一个秘密监狱。四周是宽厚而又坚固的石头墙，朝南的正门、朝北的后门和西面的侧门都被堵了起来，只留了东面的一个侧门进出。紧靠东门的两侧筑有两面适用的弧形工事，由顾祝同的特务团一个排担任看守。他们在大门和禁闭室门口各设有一个岗哨，日夜不停地监视着大小禁闭室内的“囚犯”。情报专员张超手下的一名特务王锡恩（大家都叫他“王八”）负责管理这些“囚犯”。狱内有大禁闭室、小禁闭室、女禁闭室和“优待室”，还有管理员室、排长室、卫兵室等共八个房间。大小禁闭室在大厅的西面南北两边，墙的下半段用石头砌成，上半段则是粗大的木栅，顶上也用木栅封闭并加钉了铁刺网。在那被堵塞的正门里面，放着两个四周绕着铁刺仅够一个人站立的笼子，有几位同志惨遭毒打后还关在笼子里，丝毫不能动弹，稍一活动就刺得皮破血流。我们三十几个“囚犯”，就被关押在这个“铜墙铁壁”的牢笼里，过着非人的生活。

在这被监禁的三十几个“囚犯”中，多数是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他们原被关在周田集中营，特务们逼迫他们悔过自首，但他们忠于人民事业，坚信抗日救国无罪，决不“认错”，于是惨遭

毒打并被转押进了茅家岭；有的是从周田集中营逃跑出去，又被抓回来关押在此；有的是从社会上抓来的共产党嫌疑犯；还有的是第三战区政治部剧团的人员、三青团员、民教馆职员、玉山县中学教员等所谓政治嫌疑犯。

特务们对我们这些待决的死囚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并且克扣粮食，使我们终日不得一饱。冬天，雪花飘进囚室，少垫无盖，冻得我们彻夜难眠。即使这样，敌人还准备给我们钉上镣铐，“王八”曾数次到上饶县监狱去借，都因没有借到而未钉成。敌人的罪恶目的，无非是威胁利诱我们屈服自首、叛变革命，做千古罪人；如不自首叛变，则加以各种酷刑，最后置于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任敌人折磨，束手待毙；要么组织起来寻找时机冲出囚笼，重返抗日前线，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斗争。在这个严重的考验面前，每一个人都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在这特殊的战场上，共产党员的心连结在一起，革命志士们的心连结在一起，反抗的情绪象地火一样运行……

我们经过充分的酝酿，提出了组织狱中暴动的问题。根据有这样三条：

（一）国民党的部队派系纷纭，各不相顾，我们可以乘隙突围。

（二）此地距离福建的大山只有一百一十里左右的路程，到了福建即可找到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三）同狱的龚金福同志，曾从集中营逃出去找到过游击队，后来在战斗中左肩负伤又被抓回，福建党的关系他能找到。

经个别交谈后，大部分同志都表示同意了。但也有同志不同意举行暴动，认为中共参政员重新参加了参政会，时局有好转的可能，如果在时局好转条件下轻易举行暴动受到损失，简直是个罪恶。他们的结论是：还是等等看再说吧。

我们对这些同志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正确认清形势。我们说，时局纵有局部的一时的好转的可能，但根据敌特对我们一贯的态度，这个“好转”也不会轮到我们头上来，何

况这些“好转”的看法，还没有有力的事实根据，因此，“等待”即是等死，是要不得的想法。

另外还有的同志述说了种种困难，主要是：

(一)我们长期受敌人折磨，体力弱，而且军事人员又少；

(二)四面皆敌，我们被监禁在戒备森严的敌长官司令部附近，难以走掉；

(三)看押我们的卫兵有一个排，身强力壮，装备精良，难以对付他们。

当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重重，我们的力量各方面都差，这都是事实。象龚金福同志枪伤初愈，孙镜波(锡禄)同志被打得皮肤发黑，骨头受伤，李维贤、王传馥、杨才等同志都曾被打得胸口受伤吐血，宿文浩同志则更是刚被打不久，行动困难。但是，我们不怕牺牲的毅力和决心，也有参加过实际战斗的同志，我们还懂得缜密地研究和利用客观情势的每一变化，只要能够抓住时机，乘敌不备，突然行动，取得暴动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这时，适逢浙赣铁路战事日益吃紧，国民党部队调动频繁，并听说九战区已有部队调来，汽车声日夜不绝(离监狱半里多路处有一条上饶到铅山的公路)，呈现混乱状态。看守我们的卫兵也调动了，新来的这个排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较弱，而且大都是抓来的壮丁，不愿当兵，这给我们暴动创造了新的条件。王传馥、祝金祥、杨才、李维贤、孙镜波等同志，更坚持着非干不可，认为不能犹豫坐误。经酝酿由王传馥、宿文浩、陈子谷、吴惠生和我五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有关暴动的具体问题，作种种必要的准备工作。我和孙镜波等同志负责制订暴动计划。

为了使暴动得以胜利进行，首要的准备工作是增强我们的体质。陈子谷同志把一支犀飞利钢笔卖了一百块钱，王传馥同志的一件羊毛衣也卖了二十多块钱。大家把钱凑合起来，尽量多买一些黄豆和豆腐吃(这是我们当时的唯一滋补品)。同志们偷偷地练习原地跑步，或进行深呼吸运动，以使体力及早复原。我们还一面

派钟远平、徐师梁等同志向卫兵做政治工作，以争取他们的同情；一面假说准备回队受训，买来黄麻打草鞋。祝金祥同志把身上的一件破棉袄脱了下来，再加上几件破烂的衣服，撕成碎布条，一连打了五六双鞋，分送给大家穿。他还借来把小剪刀，充当理发匠，替每个同志剪掉那长得象毛毛虫似的胡须和头发，为的是暴动后的方便。同时，这期间，我们更用最大的忍耐力忍受平时所忍受不了的种种侮辱，并和平常一样镇静，不交头接耳，以防敌人的警觉。我们委员会的议论和传达，利用阅读、谈天的掩护下进行，避过了敌人的耳目。我们把龚金福同志所知道的地方关系暗地告诉大家，以防万一走散时好个别找到关系。恰巧这时有一个保长被诬为鼓动集中营的人开小差，和我们关在了一起，他因受拷打，非常愤恨，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作为的青年，应该想办法出去才好，路不熟我可以带你们。”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们组织暴动的事情。

其时，浙赣路战事正不断吃紧，国民党军节节失利，日寇已打到衢州。据说后方所有的部队都调到前方去了，连顾祝同的特务团主力第三营也调到玉山担任警戒，长官司令部已准备迁移。根据这些情况，大家认为暴动时机更成熟了。我们分析，我们所住的地方与集中营（周田）相距四五里路，如果利用黄昏时采取行动，敌人调部队来追赶，还需要一定时间，突围的动作迅速，完全可以成功的。我们有的人打过游击，善于夜间行动，而且还有带路的，到福建后即可找到游击队。有这许多有利条件，实不宜再行等待。况且反动派近几天来对我们看押又加紧了，特务团长还亲自跑来查看，并说：“禁闭室门口的锁太小了，要换大的。”这样看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于是，我们在充分了解周围情况后，更紧张地部署了暴动工作。

看守我们的卫兵排，每天黄昏时都要集合在离房子十几丈远的东北土坡上点名，而枪都放在室内。大门口的卫兵经常站在门边闲聊，我们分配两个女同志和他们瞎扯，使他们不到门外去（女同

志住的房间即在门边),以便暴动时夺他的枪。禁闭室门口的卫兵较马虎,可混出三四个身体较强的人,一个装作大便,一个装作打水,趁机夺取大门口卫兵的枪,再由房子里冲出去的人夺禁闭室门口卫兵的枪。同时,我们还决定,举事时由龚金福、李维贤等四同志冲到对面第一卫兵室夺枪(内有两挺手提机枪,一挺轻机枪及步枪、手榴弹),夺到后即出来镇压大门口的卫兵和策应其他地方;其余的人则到“王八”的住室与第二卫兵室夺枪(一挺轻机枪及步枪等)。我们按身体强弱编成三个班,其中有一个突击班。由孙镜波、龚金福、汪镇华、祝金祥等同志为正副班长,并推定我为总的负责。我们还规定了暴动后的集合地点,要求大家在行动前千万要保持镇静,不要慌张,以防被敌人发觉。

该部署经过大家缜密的讨论研究,又作了若干修改补充。考虑到如果在夺取大门口卫兵的枪时,一旦那些在外面点名的卫兵冲回来与我们搏斗,而我们又尚未把枪夺到手,以我们如此皮包骨头的体力去对付那些身强力壮的敌人,那是一定吃不消的,于是改为如果此时卫兵在门边,则可迅即把他拖进门内;若是卫兵站在门外,则不要他的枪,闪电式地把大门关起来,等到夺得枪后再集合起来打开大门或西侧门,以突击班为首冲出。要是遇到抵抗,则以手榴弹轰。这些部署妥当之后,我们就以全力注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待机行动。

1942年5月25日那天,由李维贤、杨才两同志站在床上从木栅的空隙处窥察敌人的动静得知,上午卫兵排长和几个班长到连部去开会了(多半是讨论警戒我们的事情),有的卫兵趁机到上饶城里去玩了。下午,又有几个卫兵送犯人到情报专员室去受审,有几个卫兵送犯人到集中营去受训(实际上是受折磨做苦工)。至晚饭后,庙中只有两个下士班长及卫兵共五六人,警卫显得比往日松弛。见此情况,我们派王传馥同志借口询问什么时候归队去探“王八”的行动。王传馥同志回来说:“‘王八’不在家。”大家都感到时机已到,情绪顿时紧张起来。很快地有的人穿上了草鞋,有的

人穿上了衣服。同志们一双双眼睛都望着蹲在床角不动声色的我，等待着我的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我见同志们这些举动，生怕被卫兵发觉，坏了大事，内心亦有些紧张起来。我抬头看看天色，见光亮已逐渐收敛，夜幕缓缓低垂，那些愚蠢的卫兵们仍如往日一样在大门外嘻笑。良机不能错过。于是，我当机立断，决定由李维贤、杨才两同志混出去关大门。突然，只听得“轰”的一声，大门关住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吓得卫兵面如土色，惊叫着：“你们做什么？你们做什么？”这时，汪镇华、孙镜波和我相继冲出大禁闭室。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对准我直刺过来，被我一下抓住枪柄，两人扭打起来。龚金福、李维贤、陈子谷等同志则趁机冲入第一卫兵室夺取武器。那个卫兵脸上虽被我打了两拳，但仍在顽抗，不肯放下枪枝。一会，陈子谷同志从卫兵室出来，手里拿着两个手榴弹，杀气腾腾地对准那个卫兵打来，吓得那个卫兵失魂落魄地把头一低，丢开枪撒腿向厨房溜走了。我夺过了枪立即冲进第二卫兵室，见室内轻机枪等武器都放在床上，有两个卫兵站在床前，一个正要取枪，我把刺刀一晃，命令说：“不要动，一动就杀死你！”两个卫兵吓得浑身打哆嗦，连声叫饶：“我……我……平常对你们没有错……”祝金祥同志一步窜上去夺过机枪，我则把两个卫兵逼到“王八”的房里。这间房里还有两个小特工，他们一看情况不好，脚骨发软爬到床底下去躲了起来，嘴里喃喃地哀求着不要打死他们。这时，只听得下土班长在窗外乱跑乱叫：“晓得你们要捣鬼！”他一面叫着一面打了几枪。

当时，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关押在茅家岭监狱里的政治犯，其中一个名叫关键，还有一个姓徐的，一共四五个人，也和我们一道，参加了这次暴动。就这样，我们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凭着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精神，凭着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夺的崇高革命气节，赤手空拳地共夺到轻机枪两挺，手提轻机枪两挺，步枪七八支，手榴弹三十九个，还有许多子弹。我们砸开了西侧门，丢了个手榴弹，便胜利地朝福建大山——仙霞岭前进。而反动

派直到下半夜才集结了一个宪兵连和一个特务营鸣枪追赶——算是替我们送行。

1944年初稿

1979年订正

逃出茅家岭

李胜

我带着从卫兵手里夺得的枪最后一个冲出西侧门，即转身向前门跑，一看，同伴们都不见了，于是就急匆匆往前追赶。忽然，听见石桥下有人在喊：“老李，我带花了，一点都走不动。……”我回头一看，原来是王传馥同志，于是赶紧跑过去把他扶起来，见他腿上正流着血。我问：“他们呢？”他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不由得心头一震。

情况十分紧急。我连忙拽着他往北面高坡上走。但是，我由于刑余体弱，走不到十几步连跌了三跤，到半坡上，王传馥同志已走不动躺下来了。我当时心里焦急万分，怎么办呢？留下他吧，实在不忍，他是在狱中斗争和暴动过程中，表现最坚决的一个好同志呀！搀着他一块走吧，我的体力难以支持，而且我手里的枪又没有子弹，附近又都是光秃秃的，找不到树林隐蔽，如果卫兵追来，不是要同归于尽吗？怎么办好呢？这时，只见王传馥同志喘着气吃力地对我说：“老李，你走吧，你是暴动队长，肩上的担子重哪！……不要管我，你、你赶同志们去！……”我噙着热泪把他安置在一处草丛里，叫他等天黑以后伺机再走。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王传馥同志。

往东走了没几步，碰到两个妇女，我问她们有没有看到二十几人往那边跑？她们指着西面说：“往那个方向跑了。”我掉头拚命地往西追，突然在离我二十多步远的地方有个卫兵从凹地里站了起来，对我叫着：“喂！你走，可不要把枪带走啊！”我听了一楞，心想糟了，于是哗啦把机柄一拉，假装推上子弹。一面强作镇静地回答他说：“好啊，你要枪，你过来拿！”看他不敢近来，赶紧回头又跑，

但因为枪膛内没有子弹，怕机柄滑下来被卫兵看见，连忙关上保险，一面还是继续往前跑，通过半里路的开阔地到西南方的庄子边上，把几个站在屋外的老百姓吓得躲进家去。我穿过村庄，回头来已看不见那个卫兵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掉下来。

这时，我脚上穿的草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跑掉了，两脚沉甸甸的没有力，四周虽有小山，但都不长树木，白天走又怕再被卫兵碰见。怎么办？我正在犹豫不决，猛然看见前面山脚下有口大水塘，心里顿时有了主意。急忙跑到塘边，把枪藏好，跳下水去，让头露出塘边水面，用草掩蔽起来，决定等天黑了再走。脑子里一直盘算着晚上如何走法。心想，暴动发生后，反动派对大小要道是一定警戒得十分严的，但是他们驻地附近的外围不会怎么紧，因为他们想不到我们敢从那里走过的。……

正思索着，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几个人边说边向塘边走来。天黑了，我也认不清是什么样的人，就赶忙屏声窒气地警戒着，一直等到脚步声渐渐走远了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但由于紧张和水气的侵袭，周身不由得打起了寒颤。

晚上有月亮，四周景物依稀可见。我怕目标太大，就爬出水塘，趴在塘岸的草丛里，等到月亮快落下了才动身，往福建方向跑去。山上光秃秃的，怕被岗哨发觉，便弓着腰前进。走不了多久，猛听得东南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人大声的问：“哪一个？”我马上卧倒，几个翻身往山左面滚下去。接着又听到有人在回答：“我！”原来是查哨的，才知道自己并未被发觉，于是急急忙忙转过那个小山，通过由上饶到周田的小公路，跑到对面的山上。

这时，天色已经微明，不能再走，但山上只有些小松树，不能藏身，后来看到一个悬岩，我就用刺刀把松枝砍下来堆成一个圆形，自己就蹲在里面。不一会天色大亮，从西北方向传来唱《三民主义》党歌的声音，知道离集中营不远。躲到下午，饥肠辘辘，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紧一紧裤带了事。大概两三点钟光景，从山上下来一个人，嘴里喃喃的唱着歌，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当兵的，于是

连忙把身体靠松枝卧倒，幸亏没被瞧见。

就这样，一直躲到天黑，我才跑下山继续赶路，可是绕来绕去找不到方向，心里非常着急。找人问路吧，我这时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背心及一条短裤，还赤着双脚，身上又背着支枪，若是被人一报告就完蛋了。但是不问又摸不清路，结果决定还是到前面村庄去敲老百姓的门，把情况弄清楚再走。开门的是个中年人，他一看我这副怪样子，仔细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为着防止他怀疑我是暴动出来的，我就从反面问他：“老倭，到周田还有多远？走哪条路？有岔路没有？”他听我这么一说，没问什么，就告诉我往北半里路有条石桥，再向左走不远就到了。我道了声谢就照着他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半里路果然有座桥，我即往右转弯，朝着周田相反的方向走，以为大概可以逃出虎口。大约走了两个钟头，猛抬头看到前面有个很大的旷场，即怀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再继续往前走不多远，仔细地朝四周一看，不得了，原来是集中营的大操场。我这才知道又走错了路，一个晚上白兜了一个大圈子。于是，我连忙卧倒在地，不顾一切地翻动着身子滚，滚，滚，一直滚到旁边的水田里，又拼命地朝前跑了一会，见右面有条小河，就跳下去蹲在里面，听听后面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放下心来。

这天晚上月亮很大，我怕又碰到危险，就没再走了。我已两天粒米未进，肚子饿得难受，没办法，只好掬起冷水来充饥。果然灵验，冷水一落肚，精神顿时振作了些。待月亮下山了，我继续循河前进，转过一座山爬上岸，通过水田，为了减少目标，乃靠着山脚走。再转过一个山时，发现前面有一个哨棚，赶紧回过头来绕到另一个山头继续前进。这时，东方渐渐发白，不能再往前走，看到山凹里有个茅草堆就躺在里面暂时避一下。天亮时，才发现这里离大路很近，但别无躲处，就只好随他去了。

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突然下起大雨来，全身淋得透湿，山上的水又从屁股底下流过，旁边就是大路，但不敢站起来，只有用草盖住脸部任它去淋。雨大约下了两个钟头才停，接着来的是火

样的太阳晒在湿淋淋的身上，实在难受。到了下午，从旁边的山上下来一个老百姓，手里拿着镰刀，边割草边向我躺的地方过来。我想这回糟了，这里离周田还不到半里路，只要叫一声就可以听到。但又不能换个地方，而那个人还是低着头一步近一步地割过来。他猛一抬头看到我，很吃惊地对我直看。我只好说：“老倭，你不要叫！”他问我：“你是庄子里（周田）逃出来的吧？不得了，捉回去要打死的。”我看他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对他说：“是的，请你不要讲，做做好事吧。”他答应不讲就走掉了，走了两步重重地吐了两口唾沫（意思是碰到触霉头的事情）。我一看这情景，心里不安起来，怕他万一去报告，怎么办呢？看看大路两旁没有人，就拿好枪一个翻身爬起来，飞快地冲过大路，跑到对面的一个高坡上，伏在一棵小松树旁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这已经是下午的三、四点钟了，直等天黑才又动身走路。

走到一个山头时，我又迷失了方向，一直在山头上摸来摸去。停了一下，听到西北角方向有问口令的声音，定神往四面一看，这才认清原来对面是集中营三队的驻地，于是，我朝着相反的方向往东南面走。半夜时来到一个村庄，正找不着路时，听见一家门口有人在说话，就壮着胆子走上前去问路。他们见我手里拿着枪，只穿着背心短裤，赤着双脚，就惊疑地说：“你是茅家岭跑出来的吧？茅家岭有二十多个人跑了，现在军队在追呢！”我听了不由吃了一惊，便谎说自己是从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想到福建去，找不到路。他们一听我说是逃兵，很表同情，原来他们中两个男的是夜里出来到山上去躲壮丁的。我诉说了已经两天没有东西下肚了，请他们做做好事给碗饭吃。一位老奶奶真好，怕我被人看见，把我拖到一堵破墙垣下躲着，回到家里端来了一大碗冷饭，上面还有两块霉豆腐。我两天没见到饭，觉着味道特别好，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肚子里霎时结实许多。临走为了改装，我又向老奶奶要了一套破衣服穿上，虽然上衣太小，裤裆也破了，但总比不穿好得多。另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叫我把枪丢了，并促我快些走，说被军队看

见不得了。于是，我谢了她们，把枪丢在池塘里，就匆匆顺着她们所指的大路向福建方向大步流星地走去。

走了一程，月亮落了，在黑暗中又走了岔路。走着走着猛听到不远的地方有许多号兵在练音，才意识到是走到长官司令部（皂头）了。这时天已发亮，看到右边有个小山，就拼命往山上爬，山里有许多荆棘也顾不得了。爬到山上，也是没有树，只好躺在麦田里。心想夜里尽跑错路，搞不好就会出毛病，还是白天走的好；如有人问，就说是逃兵，大不了被抓去当兵！这样下了决心，我就爬起来再走。但赤脚走了几天山路，脚底全是被刺划破的裂口，踏下地钻心的痛，只好一步挨一步地慢慢走。我一路上向老百姓打听到黄沙岭和福建去的方向，他们有的听说我是逃兵都很同情，并给我饭吃，指示方向，还告诉我什么地方有军队不能走。有的看我走不动，就送草鞋、斗笠给我。我走过了黄沙岭，在一个三岔路口被乡丁拦住，幸亏一个姓余的（他很同情革命，敢于反抗豪强，过去也曾救过我们逃难的同志）出来打招呼，我才免于被拉。他把我送到山里一家人家帮助做活，叫我躲几天再走。我在那里帮了四天活，他指点我行走路线，还送我两块钱，于是我又向福建出发。

在路上空着手走，容易被人怀疑，恰巧我跑到一间舂米的房子里去问路，里面无人，看到地上放着只竹篮，情急智生，心想不妨权当化装之用。我扶着竹篮，人家当我是去买东西的，果然一路上平安了许多。

六月三日，我到了闽赣边境的妙竹关（福建方面），想去找游击队关系，但周围靠山的房子全被烧光了，田里的草长得一人多高，真是满目荒凉。问问老百姓，回答说是在今年一月间，被国民党军队放火烧掉的，现在不准老百姓住了。

于是，我只得回过头来，第二天到焦林关去找另一个姓王的关系，却被他们认为是“土匪”的探子把我扣押起来。送到乡公所审问时，我只承认是逃兵，说姓王的是和我一起开小差的同事。结果被他们关了两天送到福建崇安去当壮丁。

在崇安县政府临时看守所关了五天，一点东西都不给吃，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幸亏关押在一起的老百姓，把他们家里送来的饭分一点给我吃，不然真会饿死。到了第六天，我被送到壮丁招待所。这里有木栅栏、大锁，设备同监狱一样。许多壮丁被绑在一起，手臂连着手臂，过了一天便被押送去建瓯。在路上有个壮丁跳溪逃跑，被押送的部队在后面一枪，就送了性命。

到了建瓯，我被分到保安第十团六中队当一等兵，半月后又调到大队部当传令兵。大队长吴焜，是个凶狠的反共专家。这家伙看见一个女人手提红钱袋在大街上走，就抓到队部来审问，问不出什么就秘密往指挥部一送。后来据他说：共产党人什么都喜欢用红的，这个女人拿红钱袋就有嫌疑。还有一次奉指挥部命令枪毙四个“土匪”（？），结果连一个“陪斩”的也糊里糊涂被枪毙在内了。真是把人命作儿戏！

自从暴动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设法尽快找到关系，回自己的部队去！当传令兵有一个多月了，但是线索一点也没有，心里急得火烧火燎。每当深夜，我常常翘首夜空，凝望着那天空的北斗，心里轻轻地呼唤着：党啊，您在哪里？同志们啊，您们在何方？此时此地，我真正体味到离开了母亲——党的痛苦！真是度日如年！一天早上，我到街上去买菜，忽听背后有人在喊“李传有！”我当时很怀疑，心想我这名字只有集中营里的人知道，而且声音很熟，莫非他们也跑到这里来了吗？接着又听得叫了一声，是从一家面店里传出来的。我转过身来走进面店一看：糟了！原来是集中营第三队的区队副洪朝华，是个最反动的家伙，我们的同志大部分被他打过。我想，这一次要是被他抓回去定没有命了。于是不等他开口，我就先发制人地问了他一连串：“你怎么到这里的啊？有事吗？现在哪里做事啊？”问得他来不及回答，随后我就把手里的钱亮了一下说：“我买了东西再来看你。”我一边说着一边匆匆退出店来向一条小巷子里溜走了。回到住处，我觉着此地不能再留，想起了有次在饭店中认识的一个老乡。他是在建延师管区司令部当

伙伙，目前没有别的出路，还是去找找他，想定当后，当晚就开了小差。

老乡不知道我的底细，就介绍我在基干团六连当文书。当了不久，就生起疟疾来，拖了四个多月才复原。这时，我想老住在后方不行，这样何日才能找到党组织！碰巧补充第二团调到江西去，我就要求同去。心想说不定沿途能够找到关系。在由建阳到崇安去的路上，我猛想到江西也是国民党统治最反动的地方之一，万一被发觉了再抓回去岂不太冤枉。又想龚金福同志曾告诉过我崇安与江西交界的明阳关有一个关系，决心去找一找，于是第二次开了小差。

到了明阳关，找到一个姓王的拐脚老头子，向他打听我所知道的关系，他很惊愕地告诉我：所知道的人有的被国民党枪毙了，有的已不知去向，并很同情地催我赶快离开这里，别被保长和军队碰到了。我看看墙壁上贴着几十条“通匪者杀”的布告，也就不敢久留，告别了老头。

以后，我又经过不少波折，受尽许多磨难，终于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下，又越过了日伪占领区，历经艰险，回到了自己的队伍。

茅家岭地狱

宿士平

一 茅家岭的前前后后

1939年下半年，沦陷后的三百万上海市民，惦念着祖国的抗战伟业，派遣自己的代表，怀抱着无限的希望与极度的兴奋，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到三战区——安徽屯溪来慰劳忠勇的将士，向司令长官顾祝同献旗致敬，顺便也到了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皖南。在这个代表团完成任务后，从皖南折回浙江想回到上海去的时候，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的吴大琨先生，突然在皖浙交界处给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皖南特派专员张超——国民党特务康泽系的驻三战区的特工头子逮捕了，理由是：“……慰劳新四军，思想左倾。”从此吴大琨先生就长期的被囚押在上饶。为着“优待”这个上海市民代表，避免敌机经常到上饶轰炸的危险，就选择了离上饶城南约十公里左右的茅家岭小村庄边的葛仙庙作为“优待室”。这就是茅家岭活地狱的起源。

1939年冬，国民党上饶师管区，有八个优秀的抗日青年——他们大多是在京沪线沦陷时流亡到江西去的无锡流亡青年服务团团员，因为在保安处及师管区进行抗日工作太积极了，被国民党特工认为“思想左倾”而逮捕，又送到茅家岭来“优待”，其中有个女青年孙子遂，就被长期的关在这里！

以后，陆军独立三十三旅的指导员杨良瓚，因为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参观了一次，也被国民党特工认为“思想左倾”，而关进了茅家岭。江西省政府创办的妇女指导处里，有两个女工作人员——邵忠、邵春两姊妹，又给莫须有的思想罪名，关进茅家岭。从此，茅

家岭从上海市民代表的“优待室”，变成名副其实的监牢了，并修筑了一间专门囚押“重犯”的大禁闭室。

1940年6月，当日军攻陷浙东的萧山、诸暨之后，浙赣铁路的工友们，在“努力工作，保障军运民运，改善生活，提高抗日情绪”的口号下，进行抗日护路的活动，竟被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的特工朱云生，会同三战区国民党的特工，诬以“企图暴动，破坏浙赣铁路”的罪名，从义乌到鹰潭一段长达五六百里的铁路上，逮捕了十一个优秀的青年工友，统统给关到这个茅家岭来。这批青年，曾被押送到磐石渡——三战区军法处受军法审判，当时的刘法官说他们没有犯罪，可是特工仍然把他们押到茅家岭。在以后艰苦的岁月中，这批青年工友除偶然的逃出一两个以外，统统给屠杀了。

从这时开始，茅家岭又增筑了一间小禁闭室，添置了两个绕满刺铁丝的铁笼——刑具。这个铁笼，比之《老残游记》上描写的一连站死十二个人的站笼还厉害，因为那时还没有刺铁丝呀。管理“囚犯”的管理员，也换了残酷透顶的卫俊立——大家叫他狗头，是特工头子张超的忠实走卒。于是，一幕幕的恶剧开演了：刑讯、秘密枪毙、疫病、饿饭、克扣囚粮、没收“囚犯”财物……，一切暗无天日的事情，天下最惨酷无耻的勾当，完全集中在这里，茅家岭变成了活地狱。

在全中国，在大后方，在三战区，一批人面兽心的“将军们”，掀起了滔天罪孽的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军部在北撤中被包围“消灭”，整个三战区的后方、前线的抗日青年，大批的被国民党特工逮捕，每天总有四五人、十多人被绑缚着送进这个人间地狱中来。先后被捕而押送到茅家岭的，有浙江省参议会的议员郭静唐先生，厦门大学老教授张实先生，江山县名医师毛鹏仙夫妇，浙西民族日报社社长王闻识先生，国际新闻社三战区特派记者计惜英先生，青年木刻家林夫先生，江山县名画家徐宝兰先生……以及其他青年八十多人，连同原有的“囚犯”合算起来，居然超过了一百人，大小两间禁闭室，挤得水泄不通，夜里睡觉，象扎木排一样

的挤着，身也不能翻，拿尺量一下，每人仅占七寸阔四尺长的一条板，虱子、跳蚤、臭虫……一齐向大家进攻，刑伤、痢疾、大肠炎、回归热……疫病蔓延着，最严重时，每天仅仅只有二十八个人能吃饭；不用说，医药不供给，开水喝不到，而且因为这里是秘密的，连“囚犯”的亲人来探望也不许；因此，先后死去的有十余人，有一回，一夜死去吴逢庚、吴元善叔侄两个。这时的茅家岭，真是阴风惨惨，鬼哭神号，尤其每到晚上，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挂在墙角边的尿桶上，发出微弱的黄色火焰，百来个被拷打、被折磨成骷髅般的青年，横陈地上呻吟不绝，栅门口的卫兵，荷枪实弹地徘徊、巡哨，卫狗头象偷食的野狗般地时时隐蔽在石墙边窥视，时或对着禁闭室内露着得意的狞笑。这种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工老郝、牛皋、老张等一班“光蛋”，每晚在卫狗头的寝室内，用象棋子作赌具，公然聚赌，大唱大喊，丑态毕露。半夜里，又烧起大鱼大肉，香味四溢，猜拳喝酒，吵闹不堪，使“囚犯”们无法入睡。他们榨取了“囚犯”们的膏血，以资荒淫无耻的麻醉。

1941年9月以后，茅家岭的一些汉奸、伪军犯，解送去军法处，有门路的就出钱买放出狱，主要的一批“思想犯”——五十多个抗日青年，就全部押送到周田村的上饶集中营去，成为集中营中的特别训练班。这样，茅家岭算来了一次“清洗”工作。以后，这个土地庙虽然还在继续吞食抗日青年，但已有些门庭衰落了。而国民党三战区的特工们，也正在以全力对付集中营了。

过了七八个月，上饶集中营的千把个青年——最大多数是皖南事变时被捉去的新四军同志——受尽了苦刑与苦役之后，其中有一部分被认为“顽固不化”、“脑筋纠正不过来”、“调皮捣蛋”的“家伙”，经过严刑拷打，再押到茅家岭去禁闭。从此，茅家岭又变成了集中营的“附属机关”。这时管“囚犯”的管理员，改由一个好吃、好色、好钻空子的王锡恩特工（大家称他王八）来担任，每天只供两餐吃不饱的饭，每餐只有两碗，无油缺盐，营养价值低到“大便

也不是肥田”的程度，而且动不动就是毒打、站铁笼，凶恶得跟卫狗头没有两样。可是，被认为“顽固不化”的“顽固分子”聚在一起，在最不自由的地方，倒反而自由起来了，大家可以随便的交谈，有计划的开小组会，偷偷摸摸地找书报看，发展到后期，茅家岭变成“大学”了，“茅家岭大学”，大家这样的称呼它。钟远平、徐师梁等几个同志，把中国的近百年史表画在粉墙上，这上面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到红军北上抗日，最后以百团大战为结束，成为讨论中国革命发展史的参考资料。又在墙上画了中国地图及世界地图，作为研究时事发展的工具。同时读英文、日文及普通识字、读书。自然，这一切是经过严重斗争得来的，为了反对打骂，为了反对侮辱女同志，为了要吃饱饭，为了争取唱歌自由……，这里曾引起几次严重的绝食斗争，在“顽固分子”的团结一致下，取得若干胜利，特工们不得不承认“顽固分子到了茅家岭更顽固了，不顽固的到了茅家岭也顽固了”，自己感到茫然的失败。可是，这一切并不足以减少他们的残暴，他们更进一步以打骂、饿饭、不给开水、不给食盐来威胁说：“什么是铁的新四军，铁的也要打到它软……。”同志们却以“我们什么也不怕，不怕死，不怕苦，只怕不要脸”来回答他。同志间的友爱团结高度地发扬：为了看护受刑的同志，照顾生病的同志，大家是尽一切可能的。大家学会了受了拷打用高粱酒按摩伤处；出血的伤口，用灰尘及黄烟止血；肚子痛吃生大蒜头；泻肚子、大肠炎吃锅巴灰和尽饿；患坏血症用青菜汁治疗……，自然，这是危险的残酷的医疗术呀！

这些工作，是够惊人的，有一次，讨论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感动了三战区××师政治部的一个职员——他被押在“优待室”的，他从墙边听了我们的讨论后说：“你们真了不起，关在牢里还在研究国家大事呀！我们政治部就从未讨论过一次时事。”以后他每天供大家一份《前线日报》看。另一次，又感动了一个犯了“特工法”而被拷打后押入禁闭室来的三青团团员，他对大家说：“这次坐禁闭，才真的看见新四军了，以前我们完全是给

长官蒙蔽着。”看守“囚犯”的卫兵，也很受感动，他们时常偷着跟大家学唱歌、识字和谈话，也时常秘密地代“囚犯”买些日用品——黄烟、肥皂、草纸等。

1942年春，茅家岭被押的“顽固分子”已是二十六名，差不多每个人都忍受过国民党特工的毒刑。同时玉山县某中学的教员、上饶民教馆的艺术主任、三战区政治部的演剧队员等，还在继续送进茅家岭的血口中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浙赣铁路进攻，从金华、衢州迫向上饶，进行打通浙赣铁路的计划。眼看上饶必然要给国民党丢弃，集中营必然会在宪兵“保护”下迁移，“顽固分子”一定会被机枪“点名”。在这种情势下，茅家岭禁闭着的二十六个青年——顶少坐了七八个月的病弱不堪的“顽固囚徒”，为了争取抗战的自由，在1942年5月25日的下午，以牺牲一切的决心，挣出最后一分气力，克服任何艰难，毅然决然地夺取看守卫兵一个排的枪支——轻机枪两挺、步枪八支、手提轻机枪两挺、手榴弹三十九颗，武装了自己，自动地跑上火线去抗战，这就成为有名的茅家岭暴动。

1942年5月25日的茅家岭暴动，是中国监狱暴动的壮举，它给国民党特务政策以迎头痛击，它冲破了警戒重重的上饶黑区——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也就打碎了那个吃人的茅家岭活地狱。

二 国民党特工审讯种种

人们被囚押在茅家岭，这里没有太阳，没有法律，也没有道理可讲。当国民党特工们逮捕了优秀青年以后，经常就在民房里、草屋中审讯，这审讯工作，常常在夜间进行，为了防止刑讯时“囚犯”的惨叫声给善良的人们听到，国民党特工们把附近的居民赶走了。

看看“法堂”的布置吧！“囚犯”站在一头，审判者往往坐在一张桌子的另一头，他右手握笔，亲自记录口供（有时也用录事），左手捏根扁担，随时准备打“囚犯”（大多亲自动手）。另外又陈列着一些刑具——麻绳、木棍、竹杠、水桶……，几个小特工在室中回旋，静

候审判者的命令。再另外就是若干荷枪实弹的卫兵了。一声“揍他”从审判者嘴里喷射出来，小特工及卫兵们就蜂拥而上，倒吊、踩杠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捆打、火烫……一切中国旧小说上所描写的毒刑，他们都很熟练地向“囚犯”身上施行，而且青出于蓝，比之桀纣酷刑有过之无不及。然而，虽然他们能做出竭尽人间的残酷，却依然吓不倒正义的青年人。这里只简略记下几件案情及审讯的情况来。

一 “原来不是汉奸，是共产党”

有个小裁缝——江西老俵，提了一只破藤篮，在广丰的大路上行走，病后的脸是黄的，穷人的衣服是破的，于是，突然给一个彪形大汉抓住：“你是汉奸！”就这样，这个小裁缝被捕到特工机关，以后关进茅家岭。

当小裁缝到特工机关——三战区皖南特派专员室（设在上饶的杨家湖村），便受审讯和检查。结果在小裁缝的破藤篮中捡到一张破烂的空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这是审判者的一个得意的发现，于是：

审：“呀！你原来不是汉奸，是共产党。”

裁缝：“不，我不是汉奸，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我是裁缝。”

审：“不要紧呀，汉奸要杀头的，你承认了共产党，就不是汉奸，我们晓得共产党决不做汉奸，共产党，没有关系呀。”

“好良心”的特工，居然也承认共产党内决无汉奸。

裁缝：“真的，我不懂得共产党呀。”

审（拿着那张破烂的空白的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证据确实，还抵赖什么？你的同志有哪许多？”

裁缝：“那张纸是我在路边拾来包五块钱钞票的……。”

审：“混蛋，不揍不行，揍他！”对小特工们下用刑的命令了。

于是，这个小裁缝，就被判定为共产党，长期的关在茅家岭，害过坏血症，几乎死去，以后又送到周田村的集中营特别训练班。

二 “放飞机、探消息、维持会，三者必居其一”

广西的侏侏族人梁鼎彝，抗战初期，随着广西军到前线打日军，在皖北的某次战斗中，给日军俘虏去了。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从日军那里逃出来，艰难地渡过了长江，到达皖南的屯溪附近，又给国民党的特工捉到了，送到茅家岭来禁闭，很久很久，他才被提审。

梁（一见法官就说）：“军法官，我是广西侏侏族人，是来抗战的，给我到广西队伍中去，给我解决问题。”

审：“你老实讲呀！我们好解决你的问题。”

梁：“我已讲过许多遍了呀！没有一句假的。”

又把他的经过，从头至尾地讲了一遍。

审：“你总得承认一件，是放飞机的（意即敌机来轰炸时放信号的汉奸）？是探消息的（意即替鬼子做情报）？还是做维持会的（意即在沦陷区替鬼子组织维持会）？三者必居其一，我们才好办呀！”

梁：“冤枉哪！我是打鬼子的侏侏呀！”

审：“好！调皮，打死你，揍！”下用刑的命令了。

于是，这个侏侏族人的屁股及两腿，打成紫黑色（这还算客气的）。一个多月后，这侏侏的刑伤好起来了，他很健谈，在禁闭室中，告诉了大家很多关于侏侏族的风俗和故事，他说：“我们侏侏最怕孔明（诸葛亮），凡是生人遇到侏侏人袭击时，只要翘起大拇指喊：‘孔明来了，孔明来了’，就好解围。”可是这个侏侏族人碰在国民党特工手上，不知要怎样才能“解围”呢！？

三 “要说左倾，那么我是先天就左倾的”

独立三十三旅的政治指导员杨良瓚，宁波人，原是比较热情和有些正义感的青年，他因为去皖南新四军参观过一次，就被押到茅家岭来禁闭的，他的审讯是怪有趣的。

审：“你去过新四军？”

杨：“是的，我去过一次，去参观他们怎样做部队政治工作的。”

审：“你看见的情形怎样？”

杨：“我看见他们的士兵在开讨论会，指导员在帮助士兵解释问题，他们在讨论着怎样打败日本侵略军，怎样实行民主平等。”

审：“胡说，他们会这样吗？你受了他们的欺骗了。”

杨：“不，确实如此，我不能骗人，他们真的是抗日高干一切，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审：“你的思想左倾，你的脑筋中毒了。”

杨：“不，我是相信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不能讲鬼话的，凭良心，那是实在的事情，不是什么左倾右倾的问题。”

审：“你这家伙，无论如何是思想左倾的了。”

杨：“假使要说左倾，那么我是先天就左倾的。何以见得？我父亲是开山货行的，店虽不大，可也不算顶小，我七八岁时，家庭送我进小学，父亲买了一个小皮包给我当书包，母亲又给我穿上小皮鞋，很阔气地走进学校去，到了那个小学校里，只见同学们都是石印牌的香烟匣子当书包，脚上穿的破布鞋，我自己感到不好意思，放饭学回家，就把皮包丢给父亲，向母亲要了两个铜板，买只香烟匣子当书包，小皮鞋也脱去，换上了布鞋，这才高高兴兴去上学。你看吧！这不是先天就左倾的吗？”

审判者给他说得答不上话来，可是这个“先天左倾”者，被判定为“思想左倾”，就长期地被关禁闭，以后也送进集中营特训班里。

四 “你的朋友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

浙赣铁路上饶车站的副站长叶嘉清先生，突然给国民党特工逮捕了，原因是叶副站长有一个姓李的朋友，据特工说是共产党，曾向叶嘉清借过钱，那姓李的朋友，为了还钱的事，写了封信给他，

不料这封信给国民党特工检查到了，就将叶副站长逮捕，也押到茅家岭，他的审讯问答是顶够玩味的。

审：“有个李××，是共产党，你借钱接济他，你也是共产党。”

叶：“有个朋友李××向我借过钱是真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

审：“那个李××是共产党，那我们完全清楚，当然你也是共产党了，毫无疑问。”

叶：“那才笑话，退一万步讲，我那朋友即使是共产党——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这里说的是‘即使是’，那么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呀！如果照你们的说法，那么汪精卫是投敌了的汉奸，这是大家知道的；蒋委员长与汪精卫是朋友，他们是正副总裁，这也是大家知道了的；那么，对不起，蒋委员长也是汉奸不成了吗？”

这一闷棍，使得审判者哑口无言，可是他到底是别有心肠的特工，眉头一皱，话就转了弯。

审：“据我们的调查，你当了副站长，收入不算少，然而你不大吃大喝、不嫖女人、不赌钱，对工作又很认真，与别的站长大不相同，这不明明说明你是个共产党吗，你还想抵赖吗？”

这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自供状，供得多明白而清楚呀！当下特工们就把叶副站长押入茅家岭，以后又送到集中营特训班。

五 “造谣也要合乎常识”

1940年6月，浙赣铁路上捉来了一批青年，其中有个张国威^①，是共产党员，国民党特工是在他房间中搜索到一些文件的，因此他直认不讳。他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就押到杨家湖的特工专员

^① 即本文作者。

室去审讯。当时大小特工二十多人包围了这个张国威，气势汹汹，几乎要把他吞下肚去，特工头子张超及其秘书高一生，亲自出马开审，照例地问了姓名、年龄之后：

审：“你是共产党，当然赖不了，你把共产党内部组织及你们做的工作，从实说来。”

张：“我不用抵赖，我是共产党员，你既已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了，那就什么也不用问了！你要知道共产党的组织，外面书店里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共产党党章》，可花四毛钱去买本看看。你要知道共产党做些什么，可去买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看看，也只要花几毛钱。”

审：“混蛋，还要你指点，我要你自己说。”

张：“我无话可说。”态度更倔强了。

审（态度缓和下来）：“喂！我告诉你，你不要上当，共产党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你当然知道新四军、八路军的，他们游而不击，搜括老百姓，专打中央军，私自扩大部队，造成毛泽东个人地位，牺牲你们这批小共产党，你何苦来呢？……”审判者无耻地说教了。

张（猛然的昂起头来，对审判者望了一眼，打断他的话头）：“让我说吧！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新四军、八路军的代表，不配跟你谈判；我也暂时推开共产党的地位来说这个问题，否则又是袒护了新四军和八路军；我现在以中国人的身份，中国老百姓的常识来说明这个问题。就依你说，新四军、八路军今天在敌后‘游而不击’；可是日军要打它，它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就不得不‘游’，那也就是说它不等于汪精卫的伪军，它跟鬼子一点联系也没有，鬼子是要打它的。它‘要搜括老百姓’，当然老百姓也痛恨它，要反抗它的。它要‘打中央军’，中央军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也一定要打它，试问这一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它处在敌人的后方，敌人要打它，老百姓要反抗它，中央

在雪地里打滚。

茅家岭土地庙禁闭室门口的卫兵，步枪靠在身边，身体倚着石墙，缩做一团，偶然回头，看见了那个人，头脑里一闪：“排长昨晚还说，这里是绝对秘密的，放哨要当心有人来窥探，这人一定是共产党派来的化装暗探，来探这个禁闭室的。”立即就去报告班长，班长报告排长，排长怒斥一声：“还不把他抓来！”于是三个丘八一冲而出，把那个人拉进茅家岭禁闭室，他就变成了该死的“囚犯”。

真的他该死吗？不，他原是广西人，这年广西有部队开往前线，拉了大批伕子送行，他就是被拉的一个。这支军队到达目的地以后，就把这个挑担挑得只剩半条命的人放走，一个钱没有给他，连一件破棉衣也没给他，这个倒楣的人，在那寒冷的风雪中，一步步地挨着走向家乡，他做梦也未想到会坐班房。

进了茅家岭以后，审问过几次，什么也问不出来，他讲的一口广西土话，审判者无法听懂，同样，他也听不懂审判者问些什么。他很寂寞，全禁闭室中也没有人懂他的话，只有以后那老梁来后，才能一句半句的懂他的意思。因此终天不开口地躲在禁闭室的角落里，默默地度过了冬天。

冬天过去了，春天也过去了，夏天已过了一半，他还是一动不动的，特工们也觉得无味了，决定把他释放。可是今天放出去，明天一早又回来了，他咕噜着：“还是这里好，一天还可吃两三碗饭，外边要饿死啦！”他不肯出去。第二次又押送出去，但是他又回来了，“我不能走啦！两条腿软啦！饭也没得吃呀。”真的，坐了很久班房的“囚徒”，没有一点钱，怎么叫他能回到遥远的广西去呢？一直挨到秋后，卫兵荷枪实弹地又把他押送出去。以后，就不再看见这个广西伕子回来了。

二 “疯尼姑”小史

“疯尼姑”，大家这样叫惯了，把她的真姓名也忘掉了。

她是杭州附近地方人，某大学的学生。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在西安中央军校×分校当什么教官的。杭州沦陷后，她不甘心当亡国奴，带了些金镯子金戒指以及一些细软，只身走向大后方，想到西安去找她的丈夫。

多少天之后，她到达了鹰潭——浙赣铁路的一个车站，战后这里成了一个热闹的市镇。在此她遇到了几个青年军官，探问起中央军校的西安分校以及她的丈夫的讯息来。他们很熟悉似地告诉了她，于是她和他们就亲热起来了。

有一个晚上，她吃了一位青年军官送给她的糖果及茶之后，忽然失去知觉，昏昏的睡着了，明日天亮醒来，她发觉自己的身体已被奸污，身边的细软物件不翼而飞，连手上的金镯子与金戒指也没有了，她急得直跳，大哭起来。正当她哭得伤心的时候，两个穿黑衫歪戴礼帽的家伙，冲入她的房间，握着手枪对住她：“这是杭州来的女间谍！”于是她被捕了。以后辗转关到广丰的监狱中。

最初，她还清醒，把她的经过与身世向法官陈述，可是法官没有理会，只问她如何做间谍，如何做汉奸等等，渐渐她气坏了，发疯了，真的疯了，在广丰牢中大喊大骂，卫兵去干涉她，她把全身衣服脱光，狠狠地骂。从此，她不再写一个字，不再讲什么正经话，只会乱嚷乱叫乱骂了。很久很久被押着，最后把她释放出去了。

1940年秋季的某个晚上，她不知怎的，又走到上饶杨家湖——有名的“黑区”附近的大路边，躲在树下大哭大叫，给国民党特工看到了就说：“这是杭州来的间谍，她装什么佯？”又把她逮捕起来，送进茅家岭禁闭室。她到了这里，终日哭叫与吵闹，被管理“囚犯”的卫狗头，绑在柱子上，抽了一顿皮鞭，全身都是一条条的血痕。

茅家岭女犯室的邵忠、邵春两姊妹，是在广丰监牢中跟她同过号子的，所以很熟悉她的身世，代她向管理员说明她是疯子后，才放下绑。可是她满身污秽，一头白虱，于是邵氏两姊妹就给她洗衣、洗澡，代她捉白虱，为了便于肃清她头上的白虱起见，把她的头发

剃光了；于是大家称她为“疯尼姑”，是为她的遭遇与身世而扼腕。

以后，这个“疯尼姑”由于哭与叫，又挨过几次打。特工们打得不耐烦了，也寻够了开心，又把她押送出去，据说是释放了。

这件案情的内幕，明眼人是看透了了的，究竟谁是间谍？谁是犯罪的呢？只有天知道。

三 国际友人——“他再不吃就是打”

1940年的7月间，茅家岭押来了一个日本人，当他一走进堂前，突然跳起来就跑出大门，两个特工，即刻拿出手枪追他，和尚班长（我们这样称呼那个看守囚犯的卫兵班长）即刻带了四支步枪追上去，在离禁闭室大门口数十步的土阜上，给抓住了，和尚班长上去当胸就是一拳，于是七手八脚地把那个日本人再拖进来。

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吴大琨先生，听到喧闹声，就从“优待室”中走出来：“大家不要吵，我来跟他谈谈。”于是他用日语和那日本人谈起来了。

原来他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在日本读过大学，参加日本的反战大同盟的，因为进行反对法西斯军部、反对战争的活动，给日本宪兵与警察追逐，在日本无法生存，就设法乘轮逃到抗日的中国来。进了宁波口岸，在宁波防守司令部的检查下，作为是日本间谍而逮捕，关下监牢。以后逐渐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就在防守司令部工作，用日文发表了好几篇反对日本军部法西斯的文章，在国际宣传上得到一些效果的。这个事情给三战区政治部知道了，就去一道命令，把这日本人调到政治部工作。这命令落到张超手里去执行，张超就叫手下人——特工去宁波要人。当这日本人随同特工到达上饶杨家湖时，张超刚去皖南，不在家，别的特工头子看见带来的是日本人，不问三七二十一，“这日本人一定是间谍，送到茅家岭去。”就这样，他又吃官司了。待这个国际友人发觉自己押入监狱时，才发了脾气，跳起来就走，结果是七手八脚被拖了进来，而且还挨了和尚班长的当胸一拳。

吴大琨先生把这情形向管理员卫狗头说后，卫狗头说：“不管他，且押优待室吧！”就算是给了一个大面子。

自然，国际友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是受不了这些侮辱的，因此在气愤之下实行绝食，连水也不喝。三天过去了，还是一口不吃，卫狗头开始发急了，“如果真是政治部的人，饿死了可不得了呀！”他计算着自己的前程，开始跟人商量：“他再不吃，怎么办呢？”大家笑笑不作声，他的歪鼻子嗅了两下之后，“我想只有一个办法，他再不吃就是打。”说到“打”字，他用奇腔怪调的声音，大家禁不住又笑起来。

这时候，我们重禁闭室的“囚犯”，关心着这个国际友人要吃“生活”，就站在矮石墙边，招呼吴大琨先生：“请你告诉这个国际友人，我们很欢迎他，我们不是普通囚犯，我们是抗日的青年，是政治犯。我们欢迎国际友人跟我们一同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侵略者。”吴大琨先生把这话告诉了他之后，当他跑出优待室来小便时，他对我们点头微笑，于是我们就唱了一支义勇军进行曲，又唱了一支国际歌。

我们的动作，发生了效力，国际友人不作无谓牺牲的打算了，他似乎明白，他不是孤单的，在他的旁边，有着许多伙伴，于是他开始进食了。我们看机会，就通过吴大琨先生跟他通话，我们之间的感情，融洽起来了。

半个月以后，这国际友人释放出去了。

一个月后，有个卫兵去政治部送“公事”回来对我们说：

“我看见那个关在这里的日本人在政治部办公室的桌子上写字。”

又过了一个时候，一个卫兵告诉我们：“那个关在这里的日本人，在政治部旁边的河中游泳。”

四 一只斗，两个底

每天米饭二十四两，大家吃不饱，常常抢饭，一次两次跟管理

员交涉。狗头竟“宽宏大量”，借了一根秤，把一斗米一称，有十七斤老秤，有多少人，烧几斗几升米饭，一点不差。然而烧出饭来，仍然不够吃。卫狗头更“宽大”了，准许“囚犯”派人去监视伙仗量米煮饭，并指定两个农民出身的老犯人——江西人，去帮助伙仗烧饭，但是仍然吃不饱。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大家怀疑着。

张国威是个“调皮”的家伙，他向伙仗进行调查，同帮助伙仗烧饭的老倌进行研究，找出一点线索来：“这斗是有问题的。”

1940年12月25日的早晨，伙仗到禁闭室来喊老倌去量米烧早饭。当时张国威早得了“耶稣的灵感”，很早就起身，对那伙仗说：“这时老倌还在睡，我去量米吧！我也是老犯了。”得到伙仗及卫兵班长的同意，他就出去量米。

张国威拿起斗来量，第一斗量得满满的倒在淘米的竹箩里，就用力将斗一拍，再一拍，可作怪啦，突然斗中掉出一块圆圆的，跟斗底一模一样大的一块木板来，足有七八分厚。于是，张国威马上提着那只斗和那块圆木板走到厅堂前，对着卫兵及大小两个禁闭室的难友们喊：“大家看呀！我们量米的斗有两个底，是只夹底斗，难怪我们吃不饱！”把夹底斗对桌上一丢，马上跑进大禁闭室去了。

原来管理员卫狗头，真是二十四两的黑心人。他领米或买米进来的时候，就将夹底斗内的夹底拿掉量进来，量米给“囚犯”煮饭吃时，就将夹底装在里面再量出来，这样，一进一出，一斗米要措油一两升哩！

一场风波掀起了，“囚犯”们众口一词地说：“这还了得，这种机关里自己犯法，……不要脸的卫狗头呀！”尤其是杨良瓚闹得更起劲。看守的卫兵也大为惊怪：“管理员好黑心呀！”卫兵排长为了管理员措油太多，自己又分不到肥，和管理员原有矛盾，看了这个夹底斗，也伸出了舌头。“优待室”的难友们，也在做鬼脸，一时禁闭室内混乱起来。

管理员恼羞成怒，走到大禁闭室栅门口，嗅嗅发红的歪鼻子，脸色死板，对张国威怒斥道：“张国威，你捣什么蛋？给我把这件事情

弄好。”这时群众也以愤怒的目光向他直射，张国威一点不示弱地对他大声说：“你自己犯法，你做的好事，这是你们国民党的好事呀！”

事态扩大了，卫兵排长跑到特工专员室去报告，专员室派了一个“大员”来调查。大员坐在管理员的房间里，喊几个犯人去问话，他不问饭吃饱吃不饱的事情，也不问夹底斗的情形，却只问“今天谁捣蛋？谁出的主张？”而且自始至终不让张国威和杨良瓚去讲道理。

大员“调查”过了，跟管理员一同走到大小两间禁闭室的门口，先向大禁闭室内的囚犯问：“你们饭吃得饱吗？”连问三声，没有人回答，于是管理员指定一个老和尚（也是逮捕来的犯人）回答，那老和尚两手合掌：“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计较这些，不吃五谷，就能升天。”大家笑了起来。于是大员又向小禁闭室问：“你们饭吃得饱不饱？”“饱！”只有一个卖草药的江湖汉刘英回答着。大员再问：“菜够不够？”“够！”仍然是他回答。于是大员在日记簿上记下了：“此次风波，是张国威捣蛋，刘英是忠实的。”

一场斗争就这样告一段落，从这之后，有一个多月，大家吃了饱饭，可是再过些时，非但饭吃不饱，菜等于没有，有时连盐汤都没有了。“囚犯的大便，不能肥田”——茅家岭村的老百姓这样说了。

四 记茅家岭暴动

在茅家岭禁闭室中，押着二十多个被国民党特工从周田村集中营内“挑选”出来的“顽固分子”，被认为“脑筋硬化”、“无法训练”的“捣蛋分子”，菲律宾华侨吴必成同志为了要吃饱饭，为了反对国民党特工的毒打，为了反对管理员王八——王锡恩半夜里打女同志，为了争取唱歌自由，……曾经几次争吵、绝食，在这些不断的斗争中，大家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1942年3月光景，江西玉山县某中学被国民党特工们逮捕了一批人来，其中有教员，有青年知识分子，王八把宿文浩跟他们一

起关在小禁闭室内，宿文浩这个久押茅家岭的“老犯”，为使“新犯”们了解国民党特工情况，懂得怎样对付国民党特工起见，将过去的国民党特工的一些行为及手段告诉了他们。这事给管理员王锡恩知道了，他久已蓄意又要毒打宿文浩的阴谋，终于找到了借口，于是，在某天吃过早饭后，宿文浩被绑着，拖出禁闭室，押在大门外的土阜上，由王八会同前管理员卫狗头执行刑罚，重重地毒打一顿，死去了三次，用冷水喷醒，两腿及背部受重伤，特别是膝关节上受伤更重，然后把他拖进大禁闭室，躺着有个把月不能起立。就在这刑伤中，他找了李昌有同志商量：“我们每个人差不多全给国民党特工毒打过了，只是这样给他们毒打，不想别的办法是不对的，……你们一起来的有军事干部吗？……”当时李昌有说：“等你好些再说，这里有军事干部，也有会打手榴弹的，也有会用机枪的……。”于是心照不宣，个别交换意见，组织集体暴动的方针，在同志中酝酿着。

为什么当时能提出组织暴动呢？根据些什么呢？

首先，各方消息传来，知道日本军队正在向浙赣路进攻，从浙东的萧山、诸暨直入金华、衢州，前线的形势，非常吃紧，九战区的兵马也已调来，国民党正在兵荒马乱之中，后方秩序日趋混乱，这是暴动的好时机。

其次，这批“顽固分子”受的苦痛实在太深、太残酷了，苦刑、毒打、饿肚子……身受着一切非人所能忍受的苦难，加强了以死求生的决心。而且，由于前线战事的紧急，根据国民党一贯拱手让敌的政策，估计鬼子必然会打通浙赣铁路，上饶必然要失守，集中营必然会迁移，在那迁移的过程中，国民党特工对这批“顽固分子”的处理，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脚上钉镣，编成一个“叮零当啷”队被牵着走，结果是折磨而死；另一种是爽爽快快地将大家用机枪“点名”，每人一颗子弹，当然也是死，与其白白死去，不如实行暴动来得有意义。

再其次，周田村集中营的同志们，在国民党特工的高压之下，

在不断的斗争中，在难于忍受的苦难中，千百只眼睛，注视着被押在茅家岭的“顽固”同志，“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他们这样地关心着。于是这批“顽固”囚犯，决定以行动来解答这个疑问。

这些根据是现实的，是关于每个人的生与死的问题，所以暴动问题一经提出，很快的在大禁闭室中展开了酝酿，当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比较审慎，说必须仔细考虑，否则暴动即盲动。第二种意见则主张只要三个人就能暴动，一冲出禁闭室，即使全军覆没，也是胜利。这两种意见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终于得到了一致的意见，推选李昌有、王传馥、宿文浩、吴惠生、陈子谷（有时孙锡禄亦参加）五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暴动计划。

这个暴动委员会，首先指出在国民党特工的监牢里，在集中营组织暴动，是打击国民党特务政策的正确行动，而一切等待、幻想，是“坐以待毙”的政策，同时又指出“三个人即能暴动”也是幼稚的轻举妄动，它非但不足以取得胜利，相反将遭致事情的全部失败。因此暴动委员会主张：要慎重的组织暴动，以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胜利，尽可能的做到少牺牲，使多数同志能够出狱，能够到达根据地。同时暴动委员会还估计到暴动之后，必然会引起国民党特工的更严重压迫与集中营同志的广大响应，一方面国民党特工会大批屠杀集中营同志，另一方面会引起集中营同志更巨大的英勇的斗争。

接着，暴动委员会研究并解决了下列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敌我力量的对比问题：要实行监狱暴动，徒手夺取卫兵的枪支，必须依靠相当强壮的体力。然而这里的人，顶少已坐了七八个月牢，差不多全受过重刑，很多同志吐过血，再加长期的饥饿，当然谈不上健康。反观负看守责任的卫兵，经常是三战区特务团的一个排，有两挺轻机枪，有时有重机枪，有时有两支驳壳枪，士兵全是老入伍，身体比我们强多了。尤其有一次，这个看守排，拖进一个宪兵来痛打时，更显得他们的气力是很大的。因此敌我力量的对

比，相差实在太大了。这样就决定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指派三个同志去进行瓦解士兵的工作，经常找士兵谈话，激发其天良，使他不满足于自己的职务而同情“囚犯”，以减少其战斗力。二是积极增强自己的体力。陈子谷卖去了心爱的自来水笔，宿文浩卖去集中营同志送给他的大衣，王传馥卖去自己的羊毛衫，拿卖得的钱，买些青菜、黄豆、豆腐——那是我们当时所能办到的最好的滋养品——给大家来吃。有的站在自己的铺位上做做运动，有的在墙角边练练原地跑步，有的互相比比臂力和体力，刚受刑不久的宿文浩，也经常练练他自己的腿。同时，跟女犯室的女同志取得联络，以为行动时的帮助。这样，使敌我力量逐渐起些变化。

第二，暴动时的行动问题：委员会从大禁闭室全体二十六人中，选出四个体力比较好的，政治上坚强的同志组成突击小组，要他们在暴动时，首先混出大禁闭室，担任突然袭击卫兵哨岗的任务；其余同志，则分成两个小组，各向指定的两个卫兵室缴枪。在决定行动时，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有个别同志虽然有比较好的体力，但对突击工作很少信心，因此曾再三商讨才下决心。同时也决定如果可能，两个岗位——大门口一个，房子内大禁闭室栅门口一个，一齐缴枪，如不可能，则关上大门，把大门外的一个岗位及散兵关在门外，只缴房子内的岗位的枪，其余的人就可去拿枪枝了。最后决定由李昌有担任总的指挥。

第三，打出房子后的行军路线问题：当时有两条路线可以进军，一是从上饶乡间，渡过信江，越过浙赣路，走上饶、玉山的西边，穿过马金岭，突入浙江的衢州。宿文浩是在浙江地方被捕来的，他对衢州一带比较熟悉；祝金祥是兰溪人，这条路也还知道。而且从《前线日报》上曾看到新四军“窜扰”泗安的电讯，那么到衢州后，可以直入浙西而达苏南，回到新四军的怀抱中去。另一条路是向闽北崇安一带山中，去找曾镜冰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里有个龚金福同志，从集中营逃出去到过那里的，因为在战斗中带了花，又给俘虏来的，故对那个地方是知道的。但这里必须穿过三战区的重重

封锁，闽浙赣边境还设有国民党的“剿匪指挥部”，路上是有困难的；但那里群众条件较好，武夷山、仙霞岭等山岭高大，便于藏身，这是有利的。暴动委员会更算计着渡过信江及越过铁路的困难，于是决定经由茅家岭东南方向，奔上高山，直向闽北行军，预计五天之内，即能到达预定地点。

第四，出狱后的队伍编制与掌握问题：根据平素的行动及各个同志的情况，暴动委员会估计在行军过程中，可能有个别同志会脱离大队而单独行动，这是很危险的。后经王传馥同志提出各同志的初步鉴定，经委员会的仔细研究，决定组织两个班，确定了军事上及政治上的负责同志，保证大队能到达预定地点。

第五，时间问题：当时大家把暴动的时间问题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根据我们的敌情调查，知道茅家岭四周的据点有四五处，其间距离最近的只有三四里路，估计敌人可能在暴动后三十分钟内赶到出事地点，或者是追上大家，因此，暴动的行动一定要非常迅速，而且一定要在傍晚时举行，可以很快地跑上高山，迷惑敌人的追击方向。并且决定，万一暴动失败，大家缴不下枪支来，那么无论如何要抢到一颗手榴弹，必要时，拉开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暴动委员会更提出：“第一秒钟，武器落在谁手里，谁就胜利”的口号鼓励大家。当时周田村集中营正在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利用这一机会，在“大家准备回队去”的掩护下，各人撕下破布，或买些麻，打成一双草鞋，以供行军之用。而且还自己动手，交替着用剪刀理了一下发，将和尚头改成西式头，在路上行动时，可以比较方便些。

这一准备时期，前后达一个多月（四月初至五月下旬），为着麻痹敌人，大家忍受着一切最大的痛苦，如羔羊般地不作任何反抗，大家极镇静地照平时一样的读书、谈天、说笑、弈棋，委员会的会议，就经常在这和平、嘈杂、谈天的掩护下，避过了卫兵及特工的耳目而完成。虽则如此，在这长长的一个多月中，曾有两次引起浮动，

青年人是急不待缓的。由于领导同志的灵活，同志们的警惕，及看守卫兵的“愚蠢”，没有被发觉，但那是相当危险的呀！

“万事俱备，只缺东风”，大家在等候机会，大家在唱裴多菲的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直到5月25日吃过晚饭，几个卫兵押了两个新犯去杨家湖受审，管理员王八，带了几支枪押送两个“犯人”去周田村集中营，排长早在上午就带了几个班长去连部开会未回，这是敌人兵力最弱的时候，也是傍晚的时候，真是“天赐”的暴动好机会，千万不能放过，于是大家坚决地执行了暴动计划，胜利地完成了暴动。

暴动经过是这样的：

先由杨才同志假装去大便（厕所在大门外），回至大门口，李季直借口打水洗澡（水缸在大门内），也至大门口，关上大门，女同志即出来帮助，撑住大门，把几个散兵及第一道岗位关在门外，使她们不能冲进来跟“囚犯”搏斗。祝金祥装作小便（尿桶在大禁闭室外），回至大禁闭室栅门口，孙锡禄站在大禁闭室的栅门内，两人准备一齐动手缴下第二道岗位的枪。李昌有站在矮石墙边，手中拿着白毛巾，举手为号，一齐动作。其余同志，依照计划，分成两个组，各到指定的卫兵室内缴枪。这时的情绪，万分紧张，大家准备着生与死的搏斗，几十只眼睛，不断地注视着李昌有同志，李同志看得真切，牙齿一紧，毛巾一举，那边大门“砰”的一声关上，这边就冲开栅门，一齐动作，缴枪的与卫兵扭作一团，拿枪的突入卫兵室，搜索的直入排长室及管理员室，杀气腾腾，龙飞虎舞，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股劲。站岗的卫兵大喊：“你们做什么？”同志们大喊：“不要动，动就打死你。”几个卫兵吓得抖抖嗦嗦地说：“同志，我待你们不错！”小特工吓得躲到床底下，“优待室”的一个生肺病的青年，向大家露出笑容点点头，表示“赞成”。不到三分钟，战斗、搜索全部解决，打开后门（后门原钉着，并有一个卫兵班长的床铺挡着），大队转过墙角，向东南方向奔去。

不料刚出房子，转过墙角，第一道岗位的卫兵，即用步枪瞄准

射击，钟远平同志当时跌倒在水田中，王传馥同志即回答卫兵以手榴弹。这一接触后，缺乏战斗经验的队伍，马上跟着一个同志折向西南方直奔。有个同志出狱后百步，即将一挺机枪丢弃于小河中，脱离大队，同另外两人向上饶方向而去。大队直奔五六里路，始得上山，同志们多已困极，宿文浩倒地不能行，由盛田同志挟着拖上山岗。略事休息，大家双手捧取稻田中凉水喝，不再计较其污秽与否。当时天色已黑，整理队伍，检点集合的人数及武器：计夺获轻机枪一挺（连丢弃河中的一挺，共计两挺），手提轻机枪两挺，步枪八支，手榴弹三十九颗，而集中的同志共有十八名（全部为二十六人，八个人未能集合），其中有两个是女的。这十八个同志是：孙锡禄、宿文浩、吴惠生、陈子谷、徐师梁、赵坤、白银、杨才、赵成、陈峰、龚金福、盛田、李季直、吴禧天、舒肇基、孙克伟、李彩芝（女）及陈××（东北人，女同志）。

五 打出茅家岭以后

上弦月或明或暗的挂在西方（旧历4月12日），天空中的乌云，向着西北方飞驰，北斗星在眨着眼睛，我们一行十八人，在山峰上蠕动，谁也认不得路，只是向东南方向直奔，逢山过山，逢水过水。有些同志身上穿着白衬衣，为避免反光，抓把泥土涂一下；每人原来都有布、麻草鞋，因为一阵跑步之后，全踏在水田中了，大家赤着脚，踏在尖锐的石片和荆棘上，刺破了脚底，跑开了脚跟，但没有人感觉到痛苦，因为我们已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了——自由了。

一阵乌黑云，遮住了月光，天是那么黑，五步以外见不到人影。前卫李季直、陈子谷、吴禧天、盛田四个同志不见了，他们各带有枪枝和手榴弹，不知走哪条路去的，既不能叫唤，又未约信号，只得由他们去，于是我们只剩十四人了。

忽然，我们走上一座山堡，走上了绝壁，前进没有路，向山下望去，漆黑一片，既不知山有多高，也不知下面是否深渊，回头吧怕有追兵。孙克伟同志攀藤附葛，依着悬崖荡下去试探，约有五六丈光

景，下面是一片水田（梯田），于是大家就由悬崖向下直跳下去，凭空落在水田里。赵坤同志跳下山堡时，落在—块大石上，只听得“咣”的一声，接着是“呼……”的喊了一声，他受伤了，动弹不得，派两个同志去挟着他走，可是走了两里多路，他再也不能支持了，就躺在乱山中，我们不得不和他分离。

沿着山脚，又匆匆地走了一阵，白银同志伏在水沟中喝水，喘不过气来，他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我心脏病发了，我不能走了。”我们扶着他走了几步，但终于跌倒了，“同志们，手榴弹拿去吧！我不能走了，让我落荒吧！”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又丢弃一个杭州的青年同志。

我们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道路，偶然碰到几家茅棚子，就冒着危险敲开了门，找到一个老百姓带路。他看见我们兵不象兵，匪不象匪的一群，是多么害怕呀！走了一段路，终于在分岔路口，他逃跑了。我们连一个向导也找不到。

时间过得真快，脚步死也拖不上，一会儿月亮下去了，鸡已经叫了，东方已发白了，我们的行动时间已经结束，找了一家独立房子住下来。想不到跑了一个晚上的路，此间离周田村，仅仅只有十五里哩！

这家独立房子找错了，它在大路边上，是一家杂货铺子，怎么能藏得住我们男女十二个人呢？那个房主人—见我们就很和气而尖锐地说：“呀！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坏你们的事，我给你们找个地方，到这种时候，大家应该帮忙的。”于是，只留一个人在他家中准备饭食，我们被领到深山中去休息。真糟呀，原来这个人是在上饶县政府当过军事科科员的，在地方上有点威望，他早已得悉“中集营有批犯人带了枪支逃出”的消息了。我们明知落在他手里了，然而人已困乏透顶，天又大亮，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到山沟边藏身，各人分站在各个方位上，准备万一。另一方面，当然只好向他作“政治”工作，百方请他帮助。从他的口中，我们确切地知道了金华哪天失守、衢州如何告急的情况。

下午四点钟光景，他从外面回来，告诉我们说：“今晚你们不能走大路，各乡公所在昨晚十二点钟以前全接着电话，说有茅家岭男女二十多人，带了枪枝跑出来，要各乡公所负责抓回，因此各乡都派了守望班、自卫队等在大路口守候着，你们得当心点。”就在他告诉我们这些消息的时候，忽听得隔山的西南方有手榴弹声音，意味着战斗的开始。当时，我们心中很为难，从消息中看来，走大路是一定不行的了，小路是可以走的，但必须要有人指点。再三跟他商量，他什么都肯帮助，可是他要我们的步枪，他说：“你们带着长家伙反而不便，我决不为难你们，这枪留给我们地方上用吧，日本军队来，我们好打游击呀！”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决定把四支步枪送给他，手榴弹可不放手；他给了我们一笔钱，一本地图和一张区公所的难民证明书，并指点了我们走小路。天黑以后，我们带着仅留的八个手榴弹继续前进，大家心头都很不好过，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武器。

这一晚，天不断地下着雨，我们在雨中前进，一道道的溪沟，一条条的山岗，向我们的背后溜过，既不知走了多少路，也辨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远远看见一点灯火，我们马上转折着避开去，山林中一阵大风，就怀疑有追兵。一方面苦雨难行，另一方面草木皆兵，谁也不敢作声，谁也不敢停步。吴惠生膝关节发炎，痛得难受，冷水里浸一下，仍然继续前进；宿文浩淋得泻肚子，粪便流在裤子上，还是不停步地前进。“跟上，跟上”，谁也不敢落伍！

天快亮了，我们刚好沿着山脚，顺着石路，靠着一条很阔的溪河前进，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向我们的背后驰去，可是找不到一家独立房子，又不敢进村庄去宿营，怎么办呢？我们硬拚着爬上高山，躲在松林下露营。天好象有意跟我们为难似的，不断的下着倾盆大雨。初夏的山中，气候本来是凉爽的，大雨淋湿了全身，更是彻骨的冷，加上肚子是空空的，身体是疲乏的，实有支持不下之势。我们只能利用一切可能，摩擦全身，搓洗衣服，作为唯一的取暖办法。然而，好几个同志因此冻坏了肚子，眼睛也发花了。

这天的傍晚，我们派了唯一的江西人龚金福同志，带了一颗手榴弹下山侦察。下去后不久，隐约看见一群人，在我们的山脚下走过，而且发出了争吵声。这之后，我们等候了半个钟头，不见龚同志回来，估计他是遭毒手了，可能给国民党的什么队伍抓去了。大家的心顿时紧张起来。山是那么高，飞越不过去，下面的大路不敢走，只有渡过山脚下的溪河，到对河的那座大山上才能隐藏，而河是那么阔，水流在大雨之后，格外湍急，怎能渡得过去呢？冒险吧！我们决心冲下山去，看看对河有两条船停着，广东人陈峰同志，自告奋勇地跳下水去，游过急流，把两条船叫过来，于是大家才渡过了“我们的大渡河”。在老百姓家里买了些饭吃，烤了一下衣服，继续向另一座大山前进。

这是出狱后的第三个晚上了，同志们困乏不堪，脚跟烂开了，腿都虚肿了，走起路来格外的慢，天又作恶似的，仍然不断地下雨。到天快亮的时候，宿文浩和赵成落伍了，大队不知隐藏到何处？这两个人就钻到茶叶树底下，隐伏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他俩才化装成难民——的确也与叫化子差不多了，冒着雨走出山来。原来这里是上饶去铅山、石塘的山道，路口还有家饭店，他俩象做双簧似的，口称是金华逃难的叔侄两个，向店主人诉苦要饭，承那店主人的慈悲，每人吃了两碗冷饭，并还烤了火。刚好大队派的联络员孙克伟同志在远处望见了，于是才得归队。

这一群狼狈不堪的“难民”，宿在两家独立棚子上，整整地休息了两天，问乡人知道，早一天三战区还派有宪兵在这路口等候的，刚刚回去哩！我们在这里整顿了一下，理一下头发，包了包脚，尽可能的向老百姓换了几件破衣服，重新布置了支部工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各人说好了关系，以备别人盘问，便以金华难民面目出现作为掩护。于是再继续前进，仍旧遵守晚上行军白天休息的原则。

夏季是多雨的，在江西的大山中，更是时雨时晴，也可以这个山头是晴天，那个山头是大雨。我们仍然在雨中前进，仍然是爬山

越岭，涉涧渡河，露宿野营。有一天，我们又走上死路了：两座大山的中间只有一条大路，路边非但没有独立棚子，而且全是悬崖绝壁，无法到山岭上去隐蔽。正当天亮的时候，我们徘徊在一个村庄后面的几家草房边，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很早就起床了，她打开门来，看见了我们，我们向她恳求以后，她马上将我们迎入她的堆柴草的屋子中，她出去后，把门反锁上。停一下，送来了许多干菜、冷饭、热茶、山芋等食物。从她的谈话中，知道她的娘家是在姚家山附近，她的前夫是当红军的，已给反动派杀掉了，以后才另嫁丈夫的。她谈到前夫的死，眼珠里水汪汪的。我们就告诉她：我们就是红军，给国民党围剿着哩！于是她告诉了我们什么地方有白军，什么地方有大河，什么地方应该怎样走。最后，她还叫她的丈夫送了我们一程。

另一天，我们走上了大山顶，没有人家，没有草棚，我们就在山顶上的丛草中躺着晒太阳，一股潮湿气，从背心上渗透过来，煞是难受。饿得慌了，我们就采些青松果吃，这东西又涩又苦。口渴时，就在山沟里喝些冷水，倒很有些甜味！从这山顶上向四下望去，群山都在脚下，一阵阵的迷雾，在半山中穿过，我们是在云的上面了。我们既不吃“五谷”，又在云的上面，飘飘然，竟是“游仙”了。

这样的行军，八九天过去了，崇山峻岭，羊肠小道，荆棘丛林，溪涧悬崖，不知有多少在我们的赤脚下过去了，我们才到达甘溪乡的姚家山，离上饶城刚刚只有九十华里，而且还是属上饶管辖。天哪！我们好象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似的。

不管我们的行军是怎样秘密，不管我们的宿营如何的隐蔽，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是无法生存的。我们唯一的江西同志已经牺牲了！剩下的全是江苏、浙江以及东北的同志，连江西人的话语也听不懂。因此，没有多少时候，群众传开去了：“山上到了一群土匪，不知什么地方来的。”于是，乡公所、自卫队，四面八方在捉“土匪”，甚至有的地方在打锣捉匪哩！然而这一切情形，我们完全不清楚，我们没有耳目！是昏昏然的。

大约是出狱后的第九天中午吧！我们在姚家山路边的一所房子中休息，同志们困乏极了，一倒下去就呼呼地睡熟了。正在大家睡得顶香的时候，突然一支武装，把我们的房子包围起来，冲门而入，我们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李贤海（杨才改名）和王荣生（宿文浩改名）两人立即起来讲话，一个充南昌人，一个充金华人，向守望班长说明：我们是金华逃难的难民，因迷途至此，并出示那张区公所的难民证书，作为有力的解释。那个班长说：“看你们也不象土匪，你们又没有枪，你们又是煮的稀饭吃，睡觉时又不放哨，不象土匪。”好危险呀，我们的手榴弹用破衣包着，坐在一个女同志的屁股下，没有被检查到。

交谈了很久，守望班长也相信我们是难民了，但他最后还是坚持：“你们无论如何得派一个代表去见我们的乡长，乡公所在甘溪，离此只十二里路，你们有什么困难，我们乡公所理应帮助。”再争论下去会出别的岔子的，李贤海便勇敢地担任了这个“代表”的使命，他为了同志们安全，英勇地到乡公所去了。

天快黑了，我们得赶快行动。马上召开全体大会，商量行动方针，最后作了一个结论：目前形势更紧张了，今夜必须脱离这个危险地带，大队必须迅速行动，凡不能走路的几个同志只能分散了。于是赵成、吴惠生和宿文浩三人留下来，其余七个同志，由孙锡禄和徐师梁两同志负责，率领着向闽北方向而去。临行时，徐师梁同志将一颗手榴弹送给宿文浩：“同志，这个给你，以防万一吧！”宿握住他的手回答说：“同志，勇敢些，这个还是你带着用，我们也许有更好的办法！”挥手道别时，依依难舍，不觉潸然泪下。

在大队走后约一刻钟，乡公所的队伍又来包围了，吴惠生同志跳下山沟，落荒而走，宿文浩和赵成给抓住了，他俩用尽一切方法，跟敌人纠缠着，使他们无法去找寻我们的同志，足足闹了半夜，大家才休息。第二天一早，这两个人就被押送去甘溪乡公所，沿途的老百姓说：“捉到两个土匪吗？这两个土匪怎么病得这样凶呢！”他们没有想到这就是茅家岭暴动出狱因跟不上大队继续

前进的“囚徒”。

乡公所那班“笨虫”，将李贤海、王荣生、王福寿（赵成改名）三人，一起关在一间臭气冲鼻的“壮丁优待室”内，这当然是不能放过的机会，这三个人立即开会研究，说好了关系，合好了口供，编造了一套如何从金华逃难以及一路上的遭遇等等；自然，在这里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是用不着说真话的。同时，各人又下定了决心，如果被押送回茅家岭的话，那就拚着一死，决不辱没光荣的革命战士的称号。就这样，他们在沉着地等待着一切恶运的到来。

乡公所当然无法处理这三个人，就押送到区公所去，区公所又照例的押送到上饶县政府去。这时，日本军队已占领玉山，正在向上饶进攻（玉山至上饶不到百里），上饶城中乱纷纷的。当这三个人被押送去县政府的时候，县政府的人埋怨说：“这种时候还送人来，真是不识时务。”立即又转送给上饶戒严司令部。到了戒严司令部，一个军官问了问口供，就把这三个人押进监牢里关着。

形势是那么紧张，敌机天天在轰炸，炮声也经常在耳边震响，监牢中有八九个难友，时时在惊恐着。忽然有一天的上午，看守监牢的来通知说：李贤海、王荣生、王福寿、×××（不记其名）四人一案，释放。天知道，本来只有三人一案，忽然变成四人一案，那另一个难友的名字认也认不得，横竖是释放，管他娘，出去再说。原来这时的上饶城已十分空虚，机关、部队已在慌乱中撤退了。

这三个人出狱以后，杂在难民群里，逃出了上饶，在路上还曾回头看见日本军队进上饶城时放的大火。这之后，他们曾当过扛包夫，也曾推过小车，也曾要过饭，经过了无数曲折与艰难，终于先后到达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到了亲人——中国共产党的怀抱里！

1946年3月

后 记

上文脱稿于1946年3月。出版之后，有些相熟的同志，和一些热心的读者常常问我：“你以后又怎么样呢？”要详细回答这个问

题，需要很长的篇幅，这里只简略地叙述于下：

我们三人离开上饶之后，趁着兵荒马乱，靠做苦工、吃野果、讨饭等办法，经过福建的蒲城，转向浙江的龙泉，到达云和、景宁，想在这里找到我的朋友。结果扑了空，我的朋友早已不知去向了。一天偶然在街上看到一张招贴，说有一个新建立的机关，要招雇煮饭、扫地、打杂的勤杂工。我们就试着去应招。他们嫌我年纪大——当时从外表看我已是四十五岁上下的人了，只留下了两个年轻的伙伴——杨才和赵成两同志。于是我只好只身继续前进，沿着闽浙边境的崇山峻岭，奔向泰顺，转而直奔平阳的鳌江。在这里，天幸找到了我的朋友、教育界人士黄叔民同志（全国解放后任平阳中学校长）。这时我已精疲力竭，一住下来也就病倒了。在黄叔民同志的帮助下，我又同平阳盐场的一位年轻工程师（崇明人）结伴同去上海。我俩乘坐木帆船，出鳌江口，漂过大海，到达温岭；然后又登陆去黄岩——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黄岩县路桥镇的一家酿造厂，又找到了我的朋友、该厂的工程师解若冰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结识了一群常到这家酿造厂来贩运酒、油的宁波小贩。我们化了装，混在这群小贩之中，帮着挑挑担、拿拿东西，经过了许多弯弯曲曲的山道，穿过了天台、奉化，终于混过了“阴阳界”——日伪军的封锁线，进入了日军占领的宁波市。这群小贩的首领，在解若冰同志的重托下，设法给我们买来了“良民证”——日军占领区的身份证和从宁波去上海的轮船票。于是，我们提心吊胆地到了沦陷后的上海。在上海，我找到了吴蕴珠同志——吴仲超同志的妹妹，在她的帮助下，我回到了无锡老家。这时，已是8月初了，离开茅家岭暴动已两个多月了。

在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了解了一些情况和去根据地的路径，便于9月间，当稻子黄熟的时候，穿过太湖地区，到达了茅山地区——新四军苏南解放区。当我看到我们自己的武装队伍，见到我们人民自己的天下时，内心的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于是，我这个“虎口余生”的人，立即投入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从事基层

工作,愉快地接受党的再考验。

到1945年的上半年,在党的关怀下,我参加了苏浙公学整风队的学习。在这里,党给了我充分的条件和时间,让我能够象久离母亲的孩子一样,向党倾诉我的经历,特别是关于被捕于上饶集中营的那段历史。党比我的母亲还亲,既精心地给我治疗身上的刑伤,又给我精神上莫大的鼓励;既认真地教育我,又严肃地审查我。最后,苏浙区党委给我作出政治结论,认为我还是一个“够格的孩子”,恢复了我的党籍。我深深地感到党的温暖!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随军北撤到山东。在路过淮阴时,见到了当时已出版的《上饶集中营》一书。心想,我也有责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罪行,把许多革命青年、爱国志士的遭遇,公诸于世。于是,就把我亲身所经历的,亲眼所看到的、亲耳所听到的,写成上面这篇文章。

1979年9月

赤石暴动

陈念棣

1942年6月17日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天才有一点儿亮，禁押在大房子里的这批“抗日有罪”的新四军的“囚徒”——集中营第六队的同志们，跟着哨音，在各个昏暗的角落里骚动起来了。

从上饶周田到这里大安镇，一路上已有整整的十天。在将近离开上饶向闽北移动的时候，我们对当时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作了下列分析：

第一，浙赣战起，战争的环境，战局严重；反动派的军事力量不够分配；行政机构土崩瓦解；警卫力量异常薄弱。

第二，我们已经有了团结一致的组织力量，全部党员同志与非党同志，都已有了可靠的突围的决心，加上茅家岭暴动成功所给我们的影响，决心更大大的增强了。

从而确定并进行了一些准备暴动所要进行的主要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工作，作广泛而深入的动员，达到大部分同志都有参加暴动的准备和决心。

(二)绝对尊重组织上的集体暴动的决定，反对个别同志乘乱开小差的行动，麻痹敌人，使反动派在防卫上疏忽些。

(三)推选军事干部，草拟暴动计划。

但由于我们在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上，缺乏预见性和周密性，因此，从上饶到石塘，从石塘到大安，我们的具体的准备工作还远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我们非但没有跑掉，相反地，有五个同志，却因目标暴露，被特工怀疑，而先于我们英勇牺牲了。

因此，在昨天晚上，大家向组织上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假使组织上没有把握领导集体暴动的话，那么，应迅速通知，好让各人自找办法，不宜再拖延下去，否则再等两天，目的地快到，怕个别逃跑都要无办法了，希组织上郑重考虑。”

支部根据这些意见，作了如下的新的决定：

(一)根据敌人对我们的态度来看，到建阳以后，一定会采一个残酷的镇压，枪毙一部分同志以示儆。因此，一定要坚决地进行暴动，否则面前就是一条死路。

(二)假使无法夺枪暴动的话，则找机会进行不夺枪的全体暴动。

(三)全队暴动不可能，进行分排暴动也好。

(四)假使明天以上几种暴动都不成，则后天就分别进行个别逃跑。

这是谁都不会忘记的，每一个同志都兴奋地怀着莫大的希望，怀着紧张而又坚决的心情，期待着这决定自由还是死亡的日子。

“老×，你看，今天有把握没有？”有一个同志低低地问道。

“不敢说定，要看具体条件。”

“你还有草鞋没有？”

“怎么？你都穿光了么？”

“有是有，新的，太硬，要走路，恐不大方便。”

这是不约而同的，每一个同志，都在做换上翻山越岭更轻快的草鞋、布鞋、胶鞋等的准备工作。

早晨六点钟，赶走了浮云的太阳，正放出它初升时炎热的锋芒的时候，我们也就跟着离开大安，在一、二、三、四、五队之后，在漫长的黄土的公路上列队行进了。

一边是陡峭的高山，一边是湍急的澄清的山涧，公路就躺在这两者的中间，有时公路跟着山涧，笔直的伸展开去，见不到尽头，有时迎见高山，似乎无路了，但一转弯，却又是笔直地伸展到了另一个山谷里去。

路呀！漫长的无穷无尽的路，什么时候才能走尽呢！

“茫茫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
多少的英雄豪杰，被葬送在这万里的途程！”

有谁在中间的行列里面，幽郁而又沉痛地低低的哼起来了！
将近八点钟光景，队伍一拐弯，蜿蜒的循着石级，攀登了一座

大约有一两里路高的山岭，是一段绕近走的小路。

这山岭是介在两座较它更高的山岭中间的。左右是很深的山谷，布满着一片有一个人深的莽草和疏落的几堆松林，满山遍野，蝉声四彻，象是鼓起我们的勇气的前奏，偶见莽草动处，有时也就传出了几声野鸡的啼鸣。

队伍蜿蜒地爬上山顶了，虽然气喘，汗流了满脸，但因为每个人都沉浸在待机而动的紧张的情绪中，因此，也就忘掉了疲劳。

穿过山顶的荒凉和残破的路亭，队伍又蜿蜒的向下去了。

山的那边，还是绵延着深谷、莽草和丛林，初升的太阳的炙热的光芒，透过右边高山顶上的密林，减弱了它的威力，向前望去，一带武夷山脉的主峰，隐约地象秋天的奇云样的矗立在辽远的高空里。

这是一个颇合乎理想的地形呀，假使我们要立即开始动作的话。

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彼此的神情在变，似乎都因在等待着统一的号令而默默相望！

走在先头，而又负着一部分领导责任的同志们，并没有忽视这一个机会，他们时时在俯察两边山谷的地形，他们时时在回头看尾随的同志们的冗长的行列。

肃静，百数十个心，都默默地向往着一个目标，紧张地沉浸在一致的肃静中！

两边是山谷，纵使有莽草掩护，但不容易散开！

行列拉得长，尾随的同志们直接控制在压尾的宪兵的枪刺底下！

暴动在这困难的条件下，无法进行！

时间是很短促的，队伍下降到快近山麓了。

“砰！砰！”在前面一两里路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两声盒子枪的声音。

每个人的心，也跟着这枪声砰砰的跳动起来，难道其他的队在进行暴动吗？

“砰！砰！”紧接着盒子枪响，又响起了两声步枪的声音，那么清脆，那么紧密。

接着的，却是静。

“跟上，保持三十米达距离，不许拉开来！”领队的值星区队长吆喝着。

四声枪响，接着的又是静。我们想，一定又有人在行进中间，个别的亡命突围冲走了。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那一天的一幕：

是离开铅山，将近石塘的那一天，有一个队的一位同志，正在行进中间，突然身体一斜，迈开大步，飞跃的从斜刺里冲了出去，出乎意外，宪兵们拉起枪来打了几响，但不追，因为他们晓得，个别逃跑，在这次长途行军中间，理所当然，只要保住集体不出毛病，则个别走掉，是无妨大局的。那位同志，不慌不忙，窜越过几条田埂，奔跃过几亩水田，直抵山麓，然后掉过头来，看看我们，胜利地钻进密林里去，自由了。

不言而喻，今天又是这一幕的重演了，我们默默地欣羡地预祝他这一幕象以前一样：平安地演出。

一出山陇，是一片平地，重上公路。湍急的山涧，依旧跟着公路狂暴地奔流在我们的左边，武夷诸岭，却又离我们较远了。天空是澄碧一片，没有一丝儿云影。太阳以它如火如荼的热力，照着山涧，照着公路，照着原野，照着我们，我们浑身在燃烧着，我们被包围在这一团火热的氛围中间。

一度紧张过去。在热浪的烤炙底下，三点多钟尚未休息一次的疲劳，唤醒了我们，我们觉得口渴，我们需要休息了。

“走不动了！”

“休息休息再走！”

同志们从行列中间提出了要求。

没有回响，队长、区队长等装聋作哑，紧跟着前面的队伍。

“人又不是牛马，天这样热，要休息休息，喝口水才走得动呀！”

“还有二十里路到崇安，”队长开口了，“到了崇安大休息。”

“大休息之前应该有小休息呀！”

“前面的队伍，还不是一样的在走吗！你们偏有花样。”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不准再叫，”队长严厉地命令。“快跟着走！”一面又朝向带队的值星区队长道：

“保持三十米达的距离，跟上前面的第五队。”

“怕什么，我们又不会跑的！”这是尖锐的冷冷的语气。

“老×，”有的同志喊走在最前头的同志：“不管他，走得慢一点。”同时，大家的脚步，都已经逐渐的在缓慢下来。

“快点跟上我，”值星区队长向走在前头的那位同志凶狠地说，“你要走慢，你得注意，我是会不客气的。”

“小不忍则乱大谋”、“忍辱负重”，我们终于放弃了我们的要求，打起精神，顺从地跟上去了。

真是顺从吗？不是的，是怕吗？当然更不是。然而为什么要退让呢？为的是要达成我们的计划，以英勇的突击的举动，来回答这一群想残忍地拖死我们的敌人！

又是一条一条的横过高山，穿过阡陌的漫长的公路，汗流在我们的身上，一分钟又一分钟的增加着我们的疲劳，太阳晒在我们的头上，却又炽热地点燃起了我们的强烈的反抗的火焰。

有的同志，又在低低地哼起集中营里常唱的“黎明曲”来了，

“为生存不怕长期苦斗，要解放只有消灭尽敌人，
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了人间，还怕什么流血牺牲！”

忽然，想起刚才队长说的“到崇安大休息”一句话，一个同志问另外的一个同志道：

“昨天听说，今天到崇安宿营，今天大概十二点多就可到了，你看还会继续走吗？”

的确，这是个新的情况，我们现在离开崇安很近了，此去崇安，据熟悉的人说，沿路已无复杂和险要的地形，因此，假使宿营之说属实，则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的。

我们应该了解这一情况，我们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来及时变更我们的计划，因此，另外那个同志答道：

“我不清楚，利用你和黄分队长的关系，去试探一下他的消息看。”

略等一等，那位同志紧跟上几步，走在黄分队长的身旁问：

“你看今天几点钟可以到崇安？”

“至多不到下午一点钟。”

“大安到崇安多少路？”

“六十里。”

“准备在崇安宿营吧，太疲劳了。”

“时间还早，到崇安休息一下，听说再要赶三十里宿营。”

“走那么远！”那位同志其实高兴，高兴今天竟还有半天行军的时间，来寻找我们集体脱险的机会，但在外表上，却不得不故意显出疲劳的样子，而对之表示惊讶了。

太阳当顶直射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坦阔的平原上望见了崇安城。

崇安是闽北的古城，周围有着残缺的城墙，据说还是内战时候的遗迹，复杂而雄伟的武夷山脉抱着它。在十年内战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期间，崇安一带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地，它在我们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写下过重要的一页，现在却想不到我们竟以“抗日有罪”的“囚徒”的资格来作客了。

跨进崇安城，觉得一种异样的寂静，仅有的点缀是城门口负责检查往来行人的卫兵，和一阵阵打破这死样的寂静的雄鸡的报午的啼鸣，一辆流线型的小包车在这古老的城门洞里疾驰而过，后

面拖了一团团的灰尘，上饶失陷，敌骑深入，是一股战争前线的空气了。

我们在一间大房子里休息了下来，敌人额外地恩赐一餐稀饭，就在事实上证明了继续要赶路的这一个消息，时机不能等待了，我们利用这一个休息的机会，就秘密的磋商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崇安一带过去是我们红军的根据地，在这复杂、雄伟、绵延数百里的山脉中间，可能找到我们的地方关系，万一地方关系找不到，那么也有良好的群众条件来援助我们脱险。

第二，看敌人紧催赶路的样子，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敌人所怀着的恐惧心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行军的目的地已快到达，一到较为安定的后方，则敌人的控制力加强，我们想脱险将更加困难。

第三，这几天来，敌人对我们某些地方的退让，并不是恩典，这乃是敌人实施残酷镇压之前的不得已的退让，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动摇、幻想贪生是死路；生路只有拚死来突围。

我们下定了决心，在汗流浹背的炎热下，争着多吃了几碗滚烫的稀饭，我们要在下午抓紧有利于我们行动的更恰当的时机。

两点钟，我们从崇安出发。

一出城，两边是高大雄巍的武夷山脉，中间是一块坦平的平原，公路就躺在这平原之上，笔直地往遥远的山谷中间伸展进去，下午的太阳比中午放透出它更强的热力，晒得眼睛发花，脚底发烫，每个人的笨重的身体拖得更疲劳了。

近四点钟，全营离开了公路，绕道小路，赶到赤石镇上。

赤石是崇安县属的一个大镇，离崇安十五里，又名新崇安。因为是闽北一个有名的大镇，因此，跟着浙赣线上战争的热烈的空气，第三战区的许多权贵们都陆续地搬到了这里，大镇也从此热闹起来了。

在镇的旁边，紧紧地靠着一道有一百多米达宽的大河，从北向南，清澈的河水，静静地缓慢地流着。河的那边，绵延着四五里路

纵深的丘陵地带，紧靠着高大雄巍的武夷山的一脉，在西斜的日光的照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中间，有着一个有许多参天苍松的最高的山峰。

为了准备渡河，再赶十五里小路到当天的宿营地——下梅，各队都在河边休息了下来。

一阵阵傍晚的凉风，从河的那边吹过来，吹起了水的涟漪，吹动了倒挂的柳丝，吹进了每个同志的炙热的敞开的怀抱，每一个同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舒适地直伸伸地在背包前面的石块上躺着，大家都在领受着这片刻的大自然的抚爱。

各队渡河已在开始，第一、二、三、五队挨次渡河，第四队是女生，在我们后面。渡河之后，队长们各自整理队伍，也不等待，便各自带走了。

这是一个不可再得的暴动时机：

(一)宪兵疲劳；河身宽阔；各队长们的本位观念；因目的地快到而警戒疏忽。

(二)渡河以后，只要跑过四五里路丘陵地带，就是武夷山脉，爬上大山，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三)此时已四点多钟，不到两小时天要黑了。目标隐蔽，搜索困难，便于远遁，黑夜是我们的世界。

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需要的是坚毅的决心和百倍的勇气，放弃这一个机会，就会使许多宝贵的忠实的同志重投入虎口，将是一个历史上无可弥补的大错，将是一个历史上无可赎取的罪恶！

负这一暴动的军事上指挥责任的王羲亭同志，当然估计和考虑到了这一个问题：他是四川人，个子很矮，但非常结实，真称得上称为“短小精悍”四个字，他的两只在抗战初起被炸弹震斜了视线的眼睛，灵活而紧张地在转动着，从他的一股神情上，局中人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在估计和考虑这一个问题。他拿着一根用细竹根做的短烟管，走到一个坐着的同志的跟前，一面借点火，一面低声地问道：

“过河准备动作，你看怎样？”

“好呀！你决定就是。”

“假使宪兵先在我们渡河布置警戒的话，则由在最先头渡河的三区队进行夺枪暴动，假使宪兵随后渡河，则全部不夺枪冲，你的意见怎样？”

“好，就这样决定。”

“那就分别通知他们准备。”

准备工作进行了，每个人都设法买些粽子粉条等零食充饥，有力士鞋的换上脚来，有新草鞋的挂在束腰皮带上，一根无形的红线，牵动着每一个同志的心；紧张、跳动起来了。

六队移到河边，张超前来巡视了。还是和以前一样：左轮枪、长统皮靴，个子太高，因而微微的弯些腰，一面走，一面“唔，唔”的答着队长、区队长等的礼，但不同的是：严肃的脸上，竟略带了些笑容，似乎在说明他对六队到今天一个不开小差表示满意吧！

一百多米达宽的河上，只有一个船和三个竹筏来回载渡，每次的容量，只能渡一排人。

全队开始渡河了，每个人都在交换着眼色，紧张而又兴奋。依次序，第三区队先渡，一区队次渡，二区队后渡，宪兵随后警戒。

太阳渐渐地移到高山那边去了，但穿过山上的松林，还疏落地射出了它炎热的光芒。阵阵的凉风，依旧吹着，减轻了我们唯一的重负——疲劳。每个人的样子是不同的：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戏水，有的在低哼，有的在默察对岸的复杂的地形，但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却都同样强烈地在燃烧着争取这一斗争胜利的英勇牺牲的精神。

三、一两个区队过了河。二区队和宪兵在渡。队长下令值星官整理队伍，全队在碎石砌的大路上面，面对武夷山脉，立正看齐，放下背包，原地坐下。

这时，王羲亭同志站起来了，一面小便，一面向目光急转不停，左右扫射，察看地形，同时紧张而颤动地开始歌唱：

“啦啦啦啦啦啦，……”

这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是约定的开始准备动作的预令，声音好象弹的弦线，颤抖而又沉重的，弹在每个同志的心上，每一个同志都分外紧张而心跳起来了。

有六七个同志，在这个声音的弹动之下，这边那边的站了起来，也在察看地形，准备动作。

二区队坐的竹筏已靠近岸边，宪兵的一船则尚在渡中。

预令过后，王羲亭同志掉过头来，看看后面，二区队的竹筏靠岸了。于是立即又掉过头去，发动令了，紧张有力的一声：

“有！”

在一声动令之后，突然，全队同志，象一个人一样，蓦地一起站了起来，每个人的脸色在变，肌肉在收缩，眼在发红。

因为突然而又太过分的紧张的缘故吧，大家都似乎呆掉了，没有行动！

你看着他，他看着你，逐渐地，大家的视线，转注到了一个方向——王羲亭同志的身上。

紧张！紧张！千百倍的紧张！

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敌人似乎有些觉察了，班长们惊奇地向大家问道：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值星官跟着严厉地下令道：

“坐下！”

茫然不知所从，一部分同志勉强地坐了下去。

二区队的同志陆续在上岸了！宪兵的船跟着要靠岸了！千钧一发，决不容再犹豫！决不容再动摇！

王羲亭同志为了掩饰自己的特殊的神情，突然很快地问一个坐在行列的最右头的一个同志道：

“老×，你有没有黄烟？”

那一个同志将帽子脱下，摇了两摇，答道：

“没有！”

这是加强决心的记号，再不容犹豫，再不容动摇，生死任选择！记号看到了，说时迟，那时快，立刻在王羲亭同志的嘴里，迸裂出紧张、宏亮、急促而有力的一声：

“同志们，冲呀！”

一声令下，万马奔腾，一、二、三区队全体同志，一百余人，突然作一个扇形展开，迈开大步，朝向武夷大山脉，从三方面跨过水田，越过山陂，冲锋突围了！

这是一个突然的行动，是敌人虽曾预料而未料及的，因此，不能不给他一个慌乱和呆顿，但这也只是暂时的，接着我们背后枪声响了，并听到了队长力竭声嘶，呼援求助的可怜的声音：

“你们不要跑呀！还在跑！”

“呼！呼！”枪弹连珠般的发射着，在我们的顶上，在我们的身旁飞过去。

水田留下了我们的深深的脚印，山陂上丢下了我们给泥粘掉的草鞋，莽丛里流着我们个别不幸的同志的殷红的血迹，有的赤了脚，有的腿流着血，有的疲劳得十步三倒，但一切我们都忘掉了，我们拚着死，飞速地向着胜利狂奔！

“呼！呼！”子弹还是密密地在向我们狂飞着。

“不要跑呀！你们还在跑！”还是队长的嘶哑的声音。

的确，我们是疲劳。虽然凭有一股奔向胜利的紧张的热情，但疲劳终究还是生理上必然的反映，有的不辨方向在乱跑；有的跌倒了再不想爬起；有的速率逐渐地在减慢了！

这时，我们的鼓动工作跟着也自发地从各方面响了起来：

“不要怕！慢慢跑！”

“坚持最后五分钟！”

“谁掉队，谁就灭亡！”

“弄清方向，在大山顶上集合！”

“我们疲劳，宪兵也疲劳！”

时间也象我们紧张的心情一样，也在紧张中奔跑着，太阳已渐渐滚近地平线了。

登山涉水，我们到山底下了！枪声也疏而远了！

我们钻进莽草，我们窜进密林，我们象兔子样的时时警觉地回过头去望望那批在呼啸奔跑着的敌人的影子。

“咕、咕、咕……”

“咕、咕、咕……”

我们应着这约定的叫喊的记号，拉藤攀葛，在荆棘中开出路来，奔向我们第一个目标——苍松参天的武夷山顶。

日落时的阳光，透过彩霞，满林满谷，照得深红一片，集合拢来的几十位同志，满脸发出红光，大家热烈地拥抱着，不期而然地一致举起双手，同声叫道：“我们胜利了！”

1944年中秋夜写完

赤石暴动以后

孙秉泰 黄迪菲

—

当第六队两个分队在赤石渡过了崇溪，王羲亭同志高呼，“同志们，冲呀！”

在一天已走了六七十里路的他们，忘记了疲劳，丢掉背包，拚命的跑过山岗，向武夷山的方向冲去。没用的警犬——宪兵，惊惶失措，有跌倒在稻田里爬不起来的，有拿着枪没目标乱放一通的，结果当场牺牲了两个同志。一个是跑不动的，一个是瞿白同志。瞿白同志在暴动队伍的最后，他已难于脱身，于是，他把一个姓夏的分队长扭住想掐死他，但是因为长期的生活不好，营养不良，气力小，大队又去远了，双方的心理变换，瞿白同志反而被扭倒，被石块敲碎了脑壳。

第二天杨万年同志被捉到，宪兵拉他不肯走，身上被戳了几刺刀，满身血污不成人形，倒在山沟里，还是骂不绝口，要他们再给他一枪，以早死为快。

第三天程士先等四同志被捉回，枪毙在马路上，行刑前被毒打过，混身青肿，皮破肉烂，已认不出本来面目。

第四天是最残酷的一天，他们依照国民党上级的指令把所谓“顽固不化”的一齐枪杀。于是在晚饭后集中点名时，把四五十个男女同志骗去编队——补充暴动后的第六队，连日行军中三、六两队捆绑的同志，以及六队捉回的和没有开过河的一个不完整的分队，总共有百多人，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前，一个宪兵挟持一个，押到赤石东南两三里的山凹里，全部残杀，临刑时王之燕、萧正岗

等同志还领导着全体高呼口号：

“打倒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法西斯独裁的蒋介石！”

“抗战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女同志杨瑞莲(瑞年)骂恼了他们，被连打七枪。郭胜等几个顽强的同志被剥得赤裸裸的只剩一条短裤捆在树上，用刺刀戳死。直到第三天还血肉模糊地靠树立着，真是惨不忍睹。

同时遭难的同志姓名，据我们所记得起的有吕明、凌红(鸿)、徐韧、陈月霞、黄兰、徐明(以上女同志)、陈德荣、刘士贵、叶洪章、王铁夫、唐金虎、陈肇增、段其昌、刘毓林、章品芬、胡仁甫、金科中、洪德生、张文良、方影、章子伟、陈冠军、丁苏、史进、白云、曹维新等数十人。

除枪杀外，还剩下十二三个人，另编一个特别班，做的是全队最苦的工作，白天劈柴、挑粪、扛米、挖地，不让他们有一会休息。晚上一个个的捆上手脚，连结在一起睡。碰班长高兴，一夜不知要打醒多少次，说要检查人数。有时更借故一个一个收拾，跪尖棱石子、热铁烙背，指甲插竹签，……一天天的磨折，到现在除逃脱了一两个外；活着的怕只剩吴鲁兴同志等一两个人(我和他同过三次队，是吃苦最多的一位同志)，而且也被拷打得快残废了。

二

雄伟的富饶的被誉为东方阿尔卑士山的武夷山上，时常演出悲壮的惨剧。

靠闽赣边区的一段武夷山脉，在溪涧的小盆地，散住着一千多居民，他们悲惨痛苦的生活，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也无从知道。当我们一群从赤石暴动跑到武夷山的时候，他们愉快灼热的心境是难以描摹的，他们齐声说：“同志哥！你们辛苦了。我们希望了好几年，究竟天老爷还有眼，你们终于来了。”

我们6月30日爬上青竹溪(武夷山上的一个小村庄,在半山的深溪里),虽只是夏天,这里却还很寒冷。检点一下脱险人数,共有三十几个,居民们早晨已得到消息,说是“自家人回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竹棚里架起一堆大火,嚷着、笑着来欢迎我们。妇女们拿来了自己亲人的棉衣夹袄,替我们换下肮脏的衣服。还抬来一桶大米稀饭(在这里米是最珍贵的,婴孩才有大米稀饭吃)来慰劳我们:“同志哥!不要客气,我们这里也有两个青年小伙子参加新四军老五团呢……自家人客气什么?哈哈……”火堆里的光焰照红了我们的面孔,也灼热了我们的内心,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但一想到特务们因抓不到我们一定会对余下来的同志进行更残酷的镇压时,仇恨的心又使我们不安了。

皖南事变后的武夷山,一切都改样了,“往日繁华”消失净尽,只留下一个人间地狱!三月间国民党三战区即进行所谓“毁灭性”的“围剿”、“搜山”,在闽赣边区的一段武夷山脉周围组成了三股反人民的武装(民团)——在武夷山东面福建蒲城约有二百人,西南角上的崇安约有二百多人,北面的甘溪约有百多人。这些民团都受过所谓“特种训练”和连坐法的担保,经常配合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对武夷山人民进攻,修碉堡,烧房屋,破坏庄稼,把无穷的灾难压到边区人民的身上。反动派的军官们说:“闽北老百姓是不怕枪毙的,只怕刺刀刺肚脐。(?)”死在刺刀下的武夷山人民是难以统计的。留下来的过着极困难的生活,他们吃的是苦药菜(形如萝卜菜,味苦,用开水泡后,经炒才能吃)、糯米粘(山草)、龙舌草,虽然在上也种了些包谷,但经常遭受到反动派搜山时的纵火和猴群的损害。至于油盐是根本谈不到的了。

我们到后不久,鉴于浙赣战局节节失利,十万国军,不战而溃,为着不愿做亡国奴和保持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在茅家岭暴动出来的共四十几个人会同当地的游击小组,组成一支“人民抗日救国军”。从匪化溃军手里获得一部分武器,即挺进敌后,直迫上饶、洋口,为民族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容许我们自动起来打敌人的。八月里三战区即调二十六军主力把这支抗日武装迫回武夷山上。九月初，顽军更以一个师一个团的兵力由甘溪、崇安的民团配合大举“围剿”武夷山，指挥部和战地党政委员会（特务组织）设在石塘（在武夷山西北二十五里），并在青竹排、蔡家园、南洋湖建立据点，进行反复“搜山”，企图消灭这支四十几个人组成的抗日武装。统计一个星期里，反动派的“战果”是够“辉煌”的：中棚、明岭、阳关一带的民房家私全部烧毁，两个无力避开的老年人也被捆去，连中棚村前的一株野梨也不能“幸免”！

国民党这支“大军”把武夷山上的几百男女青年人逼得四处逃难，我们四十几个人的队伍也不愿与这二百倍以上强大“友军”作不必要的消耗，都冒了各种难于想象的危险，分批向敌后抗日战场转进了。

浩气长存

秦峰

1942年初夏，日军侵犯浙赣铁路沿线，国民党反动派不战而溃，金华沦陷，继之衢州、江山沦陷，驻在上饶的第三战区的指挥机关惊惶失措，胆战心惊地忙着逃命。江山沦陷的前一天，上饶集中营的特工们还在宣称：我军予敌以重大损失后，已作战略转移至江山，上饶则绝对安全，要我们镇静，千万勿要轻信“谣言”。

6月5日那天，天蒙蒙亮，周田村就吹起了起床号。囚禁在孤山上的“武顽固队”“囚徒”——集中营第三队的同志们，随着号声、哨音和特务们的吆喝声，从蒙眬中起床，接着又听到大小特务气势汹汹地吆喝着：“不要整理内务，快打好背包！”“动作要迅速！”“快点！快点！”同志们在昏暗的角落里，面面相视，知道是要“行军”了。大家各自打好了背包，又被强迫去捆绑特务们的铺盖、箱子、床、桌子、椅子、茶几等家具。不一会儿，“集合”号响了，特务们又是一阵大声吆喝。我们背上了背包，跑步到外面，值星分队长把队伍整理好后，就迫令我们扛他们的行李和家具，两个人扛一堆，每一堆少说也有一百多斤，我和张鸿九同志扛的这堆家具足有一百四五十斤重。

六个队都集合在大操场上，特务头子张超开始“训话”。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装腔作势地说：“我们为了准备万一，保护学员的安全，所以要把你们迁移到福建的安全地带去……”顿了顿，又说，“我们早已知道你们中间有活动，因此，我要警告你们，谁是在这次行军中不遵守秩序和违反纪律，就要当心你们的脑壳，勿谓言之不预！”接着宣布了行军中的六条“纪律”：

一、中队与中队之间须保持三十米距离，不得拉长或缩短；

- 二、不得擅自离开队伍；
- 三、不得掉队；
- 四、休息时如要大小便，须先举手报告，不得随便乱动；
- 五、不得交头接耳；
- 六、沿途不得唱歌、喧哗。

最后，他用那阴险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全场，声嘶力竭地威吓说：“谁要违犯这六条纪律，格杀勿论！”

他叫嚣完后，我们这批抗日“有罪”的“囚徒”，就在特务、宪兵的刺刀、手枪、机关枪森严的监视下，开始了“行军”。

沿途，我们所遇见的是：军队在撤退，三战区一些将军们的小轿车、敞篷汽车载满了他们的三妻四妾和哈巴狗，争先恐后地向福建急驶；军用车、长途汽车和拦截来的民用卡车，运载着那些大官们的豪华家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大哭小喊，一路流浪，向闽赣边界逃亡……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沿途抓丁拉伕，有的儿子被抓了，有的丈夫被拉了，有的小孩在路上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官们吓坏了，弄得人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哭声载道，极为凄惨。我们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突围的决心也更加强烈。尽管敌人监视严密，几乎每个队天天都发生逃跑事件。

在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地方，我们见到许多断垣残壁上还留有红军写的宣传标语，知道这些地方原来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我们在心里默默地说：等着吧，很快我们就会打回来的！

敌人眼看逃跑事件不断发生，又“行军”在老革命根据地，内心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们宁可弃城不守，也不惜调派重兵前来加强警卫，押解我们这一批革命战士。

我们扛的东西一天天加重，肩膀都压肿了，皮肤也磨破了。走到闽赣交界分水关的时候，虽然天气并不太热，可是个个都已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本来走到山岭上应当休息，可敌人怕我们逃跑，不准停下。第三队队长曾恭生，这个残忍成性的家伙，穿着一

身草绿色军装，敞着胸，摇晃着他那矮胖的身躯，满脸横肉杀气腾腾地又重复地念着那六条“行军”杀人纪律。

王之燕和郭胜同志扛着那堆笨重的家具，比我们更累。王之燕同志上过脚镣，刑伤未愈，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郭胜同志也受过酷刑，身体很弱。我们原先在周田计划暴动的事，由于敌人监视严密，无法与周围取得联系而未实现，目前唯一的办法只有寻找机会个别突围逃跑，冲出这罪恶的牢笼。

踏上分水关山巅，眼望着绵延数百里的武夷山脉，峰峦起伏，雄伟壮丽，一片茂密的森林和草莽，我们真想借这个极好的隐蔽场所逃跑。但是敌特警戒甚严，使我们插翅难飞，连晚上睡觉时也不准我们翻身和讲话，愿望不能实现。

从上饶到大安，走了整整十二天。6月17日这天，我们由大安出发，抬着笨重的东西，拖着疲倦的身体，经过漫长曲折的黄土公路，走了七十多里的路程，来到了崇安县的赤石镇。这儿是闽北的一个大镇，离崇安县城十五里，镇西有一条百多米宽的崇溪河。三队依次跟着二队渡河，上岸之后，不准休息，直奔下梅村，到达的时候，已近黄昏了。我们被赶进老百姓的屋里住宿（这儿的老百姓早已被赶走）。晚上点名时，曾恭生匆匆忙忙地赶来了，神色有些异样。只见他换了一身蓝色的农民服装，腰里束了一根布带子，手里紧提着一支驳壳枪。他走到我们面前，把枪一挥，声色俱厉地说：“大家听着，你们要给我老实一点，任何人都不准交头接耳，随便讲话，不准自由行动，一切都要听命令动作，要是你们不听从指挥，敢违抗命令，那就拖出去枪毙！”说完，这家伙又急匆匆走了。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有异，但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猜测着是个别同志跑了呢？还是哪一个队暴动出去了？莫非是当地的游击队知道了情况来接应我们？大家都在注意观察着敌人的每一个动作。

次日清晨，敌人强令我们返回赤石镇。一路上，敌特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山坡上架起了机关枪，每个要道口

都有黑黝黝的枪口对着我们。我们擦身走过五队时，凌红、徐韧、杨瑞年等同志面带笑容，轻声地告诉我们说：“昨天傍晚六队在渡河的时候，就在这里暴动，胜利地出去了！”大家听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都露出了微笑。我们的估计是对的。回想起昨天晚上敌人那种杀气腾腾惊恐万状的丑态，真使人发笑。我们的心情很愉快，忘掉了连日来的疲劳，脚步也变得轻松多了。对暴动出去的同志，大家暗暗地祝愿他们早日脱离险境，重返党的怀抱，重赴抗日前线，挽救民族危亡。

走近赤石河边，听到有人在呻吟，仔细一看，发现在一条叉路口上有一个同志被五花大绑着，满身是血，仰倒在田沟里。大家一见都愣住了：这不是程时轩同志吗？他已是奄奄一息，可还在断断续续地怒骂着敌人：“你们这群法西斯匪徒，我……为了抗日，我死在这……里，死在你……们手里，我死了……会有人……给我报仇的！……”两个宪兵上去一把把他拉起，朝一条小路上拖走了。我们的眼眶都湿润了，愤怒极了，默默地说：“同志，我们会给你报仇的，你未竟的事业，我们会承担，你安息吧！”

回到赤石，街上早已戒严，行人绝迹，空气十分紧张。特务们把我们三队关进一家已倒闭的毛巾厂房里，门口有手持机枪的宪兵看守。曾恭生又大声吆喝，重复着那句老话：“谁要自由行动，就把他拖出去枪毙！”这时他又换上了军装。

茅家岭和赤石两次暴动的胜利，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张超、肖芬、曾恭生这群特务搞得丧魂落魄，胆战心惊。但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兽性大发，丧心病狂地阴谋策划着对我们进行空前残忍的血腥大屠杀。记得还在上饶周田村时，王之燕同志就曾经说过：“三队与六队，这两个队中，必然有一个队要遭到残酷的屠杀，因为敌人已经给我们定名为‘文顽固队’（即六队）和‘武顽固队’（即三队）。如果我们三队先暴动出去，这命运就要落在六队头上，反之，我们就会被杀害。”我们拟议中的周田暴动流产了，而如今六队赤石暴动取得了成功，这命运果然落到我们三队头上了。

永远忘记不了的1942年6月18日(旧历五月初六),下午三时左右,曾恭生睁着满布血丝的眼睛,以重新编队为名,手里拿着名单,点着肖余生、郭胜、路垣、金科中、叶洪章、高路易、王之燕、周楚钦、郑平、李丹、秦夫峰^①、张鸿九、应振有、林开凤等十四个同志的名字。我们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纷纷将自己的东西分送给没有点到名字的同志,和他们告别。王之燕同志当即念了一首诗,以此来鼓励大家的斗争情绪,这首诗是:

浩气永长存, 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 留与后人补!

我们十四个人正要背起背包走,特务们却阻止说:“背包不要拿,六队那里有的是。”

刚刚走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宪兵立刻蜂拥而上,紧张地把我们押解到赤石东南二、三里地的山坳里,通过一片茶树地,踏上山坡,进到半山腰的一座空庙。敌人不准我们随便讲话。四周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风吹动松树叶发出的沙沙响声。一会儿,宪兵提着驳壳枪站在门外,手里拿着名单,一个一个地叫人出去。后来点到我,出门一看,见被叫出去的同志都一个个被反绑着双手,正要开口质问,宪兵不容分说就把我的双手反绑起来,并说:“不准讲话!再讲,看我的刺刀!”我们十四个同志被押解到庙后山坡上预先挖好的土坑边。突然,一个宪兵大声命令:“跪下去!”我们谁也没有理会,个个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昂首挺胸站立在那里。王之燕同志领头高呼起口号:

“打倒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① 作者在集中营里的化名。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正义的吼声，震撼着山谷。同志们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敌人人为之丧胆。宪兵们慌了手脚，在我们的身后乱发枪弹。

“砰，砰！”

“砰砰……！”

同志们怒视着敌人，摇晃着身子，慢慢倒了下去。我后脑中了一弹，痛昏过去，也随着倒下了。宪兵们打过枪后，急忙把我们一个个丢进了坑里。一会，我痛醒过来，知道自己没有被打死，就屏住呼吸，假装死态。敌人看我们都已死去，就吹着哨子，集合了队伍，背上枪走了。

过了些时候，我慢慢地抬起头来，想探听一下周围的动静。刚一抬头，只见对面山坡上有两个狗特务，一个是三队队长曾恭生，另一个是六队队长刘振轲，正朝着我们被害的地点走过来。他们还不放心，走近坑边，嘴里骂着：“哼！他妈的，你们这批顽固不化的家伙，现在，看你们的嘴还硬吧！”他们拿起石块，拼命朝坑里乱砸，有一块击中了我的耳上部，我感到一阵奇痛，眼前直冒金花，又昏死过去了。

半晌醒来后听听，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有的同志嘴里发着“咕……呵……”正在断气的声音。我内心很矛盾，眼看身旁有的同志还没有完全断气，自己跑走吧，又舍不得离开这些共过患难的战友；不跑吧，待一会儿就要被活埋，真不知该怎么办好。后又想，我应该跑出去，我要把这些同志怎样牺牲，死于谁手的情况告诉党和人民，要为死难烈士们报仇。于是我决心跑出去。

我鼓足了勇气，忍住剧痛，蓦地从坑里站起来。野外空荡荡的，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踏在坑里的一块石头上，使劲地往上一跳，跳上了土坑，躲在一棵松树后面。我仔细地看了看，见山坳中还有一个宪兵在那里站岗放哨。为了缩小目标，我卧倒在地，随即滚下山坡。后来我又连滚带跑地走了一阵。这时我的双手还被反绑着，正设法解开绳子，

忽然看到有个割野菜的小姑娘，手提竹篮正朝我走来，真是喜出望外。我多想这个小姑娘能帮助我把绳子解开呵！我跑过去对她说：“小姑娘，谢谢你，帮我解一下手上的绳子！”小姑娘不看我倒罢，一看到我便吓得脸如土色，“哇！”地狂叫着，飞也似的跑掉了。我呆若木鸡地望着她的背影远去，埋怨她真是不懂事。我又跑了段路，看见两间竹屋，屋前有一个老大爷和一个约摸三十来岁的青年汉子站在那儿，便跑过去，请他们帮我解绳子。他们正帮我解着，背后突然响起了一阵排枪，我以为是敌人来抓我的，还没等他们解开，就跑了。跑了一会儿，心一慌，脚一滑，跌进了一条小溪里。这溪有一人多深，清澈如镜，正是一个绝好的隐蔽场所，我就在此隐蔽了下来。

我坐在溪里的石头上，想磨断手上的绳子。我从水中的倒影看见了自己血迹模糊的面孔，才发现自己满身都是血迹，衣、裤几乎全成红色了。难怪刚才那个小姑娘，一看见我这血淋淋的模样，吓得哭喊起来。看她那种惊慌的神态，准会吓出病来的。我耽心地想着，越想越感到过意不去。

我在石头上磨呀磨的，终于磨断了反绑着双手的细棕绳，顿时感到全身轻松。我站起来，舒展了一下已被绑得麻木的两只手。啊，多自由啊！我望着那溪边直立着的树木，迎着晚风，仿佛在那里向我点头欢笑，庆贺我的重生。

我洗去了手上和头部的血迹，喝了几口清甜的溪水，奔向青竹坑找游击队去了。事后知道，在这次空前残忍的血腥大屠杀中，先后几批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就达一百余人。据说第二批押赴刑场的凌红、杨瑞年、徐初、吕明等同志，在临刑时，一起高唱《国际歌》，怒视着敌人，痛骂不遏。宪兵们慌乱地向他们开枪射击。女共产党员杨瑞年同志回过头去，狠狠地向那些宪兵、特务盯了一眼，然后转向同志们，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的血决不会白流，抗日战争一定要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她身上中了子弹，依然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共顽固派！”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敌人又连续向她打了七枪，杨瑞年同志倒在血泊中，还睁着血红的双眼，死盯着敌人。这位女英雄的弟弟杨华年同志，也和他英雄的姐姐一样，赤石暴动第二天被敌人捉回后，英勇不屈，被敌人戳了几刺刀，牺牲在山沟里……

血腥的赤石大屠杀至今过去整整三十七个年头了。我这个大屠杀刑场上唯一的幸存者，每当忆起同志们激昂高歌、从容就义的壮烈情景，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烈士们浩气长存，他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们的革命精神，时刻激励和鞭策着我们前进。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当无限珍惜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为完成烈士们的“生前未了事”而英勇奋斗。

1961年6月初稿

1979年6月修改

抗日囚徒的旅行 干戈 季音

——集中营第三队移闽途中

1942年6月，日军沿浙赣铁路发起了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第三战区的军政机关，象潮水似的由江西向福建逃跑。上饶集中营也在大批宪兵特务的严密押送下，迁往福建。队伍行经福建崇安赤石镇附近时，集中营的所谓“顽固队”之一的六队，胜利地举行了暴动。特务们被吓得惊慌失措，就对另一个所谓“顽固队”的三队，进行了无比残忍的镇压，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遭到了屠杀。这是上饶集中营里，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场生死大搏斗，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罪恶历史上的又一笔血债。

下面记叙的，就是第三队在赤石暴动之后沿途的一些情景。

6月17日

6月17日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这支走得精疲力竭的队伍，终于到了下梅镇。下梅离崇安城三十里，离赤石十五里，如果走水路到赤石仅只十里。下梅围绕在重叠的武夷山脉里。武夷山绵延百余里，来到下梅的这条公路，沿着山坳穿出来，山边是一条河面宽阔的大河，河水湍急，竹筏在河水上起伏着。

到下梅不久就近黄昏，宪兵特务把我们赶到一排三间大的民房里休息。老百姓正忙着准备过端午，宪兵恶声呼斥着，把屋主人都赶到屋后，立即用叉形木板钉住了中门，不让老百姓和我们有任何接触。

晚上集合点名，我们发现今天的气氛特别异样，平时十分骄横的特务队长曾恭生（这位清代名汉奸曾国藩的后代），穿了一身蓝

布农民服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一时几乎认不出来。平时集合点名，他又着腰站在我们跟前，几乎是指着我们的鼻子臭骂。今天他似乎泄了气，远远地站在走廊上，不敢靠近我们，只阴阴地说了几句：“任何人不准交头接耳随便讲话，更不准自由行动，一切听命令行动。”说毕，带了叛徒班长们走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夜间，屋外不时传来枪声，几个叛徒班长紧张地来往着。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今天六队同志在赤石暴动成功，它象晴天霹雳，把这批毫无人性的刽子手吓得不知所措了。

6月18日

一早，队伍就准备移动，大小特务队长们都换上了各色农民服装，脸色惊慌不定，低声交换着短促的对话便匆匆走开。尤其使我们好笑的是：有几个特务分队长腰背上还插着镰刀之类的农具，装得真象个庄稼汉。这些家伙平时那种威风劲头已烟消云散了。想不到我们这些徒手的“政治犯”，竟把这些全副武装的特务吓成这副样子，实在令人可笑。

五分钟喝完稀饭，我们就拖着疲累的脚步，走上尘土弥漫的公路，向赤石进发。沿路的山坡上，轻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向我们指着。路上行人绝迹，只看见密布的宪兵，以准备射击的姿势拿着快慢机守候在每条路口。

我们的心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们快走近六队同志浴血战斗的赤石了。

走到赤石附近，我们看到在一条阴沟里，有一个同志仰卧着，泥浆和血污沾满了全身，夹着浓厚的广东腔在大声呼喊：“你打死我吧！唉！死了痛快，为了抗日，我……死在这里……”旁边两个宪兵看到我们的队伍走近了，就一把拉起他，朝小路拖走了。我们全身发抖，悲愤已极，走了几步回过头去，见那位同志又倒在地上了。

这时，我们看到两旁山巅上不时出现三五成群的兵士，执着枪奔跑着，呼斥着，远远近近，只见山顶上人影憧憧，他们是在做六队暴动后的“搜索”工作。我们逃出集中营以后，才知道当时在武夷山一带对我们的搜索和“围剿”，顾祝同竟动员了一个师（二十六军四十一师）之众。正当浙赣路上日军长驱直入，千百万人民生灵涂炭的时候，国民党不去前线抗日，却在这里动员了万众之师，“搜索”、“围剿”已逃出集中营的抗日战士，这是多么令人愤慨！

我们走到赤石的渡河处，那里躺着两具烈士的遗体，半段浸在水里，双手还背绑着，鲜血已成紫色，头盖和头发凝成一团。渡到赤石的彼岸，又是一具烈士遗体横在草地上。走不多远，田边一大片血迹模糊，但没有尸体，只有无数苍蝇蚂蚁在上面打转。

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赤石街上紧张混乱，宪兵驱赶着居民，老乡们扶老携幼，呼男唤女，哭叫声、吵闹声噪成一片。当我们这支“囚徒”队伍来到街上时，这里已是紧急戒严状态，行人绝迹，宪兵、特务、盒子枪、轻机枪、子弹夹，点缀着赤石街上的寂寞。

我们三队的住房，宪兵早已布置好，是一家倒闭的毛巾厂，火墙高耸，十分牢固。地面是坚厚的松板。我们就分班在地上休息，每班门口架着一挺轻机枪和四名手执快慢机的宪兵，他们不准我们讲话，只听见有病的同志呻吟、疲劳的同志喘气、宪兵换岗时机枪扳得“格格”响的声音。

特务队长曾恭生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农民衣服已经脱去了，换上了军衣。他手执一支快慢机，大声说：“谁要自由行动，就拖出去！”把提枪的手向门外一挥，又露出了他的狰狞相。

我们密密地挤坐在地上，虽然疲困已极，但谁也不想睡，大家默默地互相望着，仇恨在心头燃烧，眼泪在睫毛上闪动，回忆这一天来的遭遇——法西斯特务的凌辱，赤石河边血迹斑斑的烈士遗体，又加上对六队暴动出去的同志们的怀念……一件件事情在同志们心头翻腾，我们怎么能入睡呢？

曾恭生走了不一会儿，外边突然响起了短促的哨子声，叛徒班长一个个窜了进来，嘴里连连嚷着：“快起来，快起来，集合！集合！”我们被匆匆忙忙地赶到外边的场子上，只见曾恭生和几个分队长都在那里，全拿着枪，边上还有好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气氛十分紧张。我们意识到，敌人大概要对我们这个“顽固队”下毒手了！曾恭生看着队伍站好之后，他拿出一张纸，阴阴地说：“叫到谁的名字，谁就站出来。”接着他就一个个的叫道：

“肖余生(肖正刚)、郭声、王之燕、叶洪章、高路易、丁苏(郑玉奎)、方影(方照熙)、胡星(胡正林)、周楚钦、秦夫峰……”

曾恭生一共叫了十四个名字，这些同志在队前站了一长排，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谁也没有神色沮丧的样子，大家对这一天的终于到来，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平日爱唱京戏的河北人王之燕同志，挺着高大的身躯，神态自若。还在上饶的时候，他就说过：“三队与六队，是特务的眼中钉，很可能会对我们镇压，如果我们先暴动出去，他们就会对六队实行屠杀，如果六队暴动成功，特务就会镇压我们三队。”王之燕同志的话，今天不幸而言中了。

十四个同志被拉走以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大房间里死一般沉寂，持枪的宪兵守着房门口，不知道过了多久，赤石街后响起了连续的枪声和隐约的人声，我们的心被撕裂了，眼泪再也忍不住，有人在那里无声的啜泣。“永别了，亲爱的同志！”我们在心里默默呼喊着。

6月19日

清晨，队伍又向建阳行进。我们谁也不说话，心头象铅一样沉重。原来由二十四名伙子挑的特务官长的行李，今天全部压到了我们身上。戴近视眼镜的王闻识同志，是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身体弱，在百多斤的重荷下，喘着气实在抬不动，要求曾魔王减掉一些。曾魔王开口大骂，上去就是几个耳光，把王闻识同志的近视眼镜打落在地上。到建阳后，王闻识同志

在疾病、疲劳与侮辱之下，终于死在集中营。

由于长途的劳累和过重的负担，队伍走得很慢，行至兴镇（离赤石六十里）已暮色四起。兴镇是个小村落，居民稀少，我们被赶到一座较大的民房里又禁闭起来，并从我们中间挑出十几个身体还比较健壮的同志去做公差勤务。出去不到五分钟，屋外连续传来枪声，听到曾魔王在嘶叫着：“外边呀，树林那边……死家伙，你们快追上去，……”我们听着枪声，心里干急，为那位勇敢逃跑的同志默祷安全。晚上用盐汤冲饭吃的时候，人群中不见了南洋华侨吴华光同志，叛徒班长们在门边互相埋怨着，看样子没有把人抓回来，我们才安下心来。

从那晚起，睡觉添了一根绳子。睡觉哨子一响，班长便把我们的手脚捆起来。冯立平同志和黄子让同志是浙江人，平时表现很顽强，于是就连头连脚绑在柱子上。

冯立平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浙江慈溪人，抗战初期，就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他虽然年轻，却象成年人那样成熟。那时我才到三队，受不了那紧张的生活，吃饭时把饭粒掉在地上，逼着捡起来连泥带沙吞下去，整天做苦工，抬两百斤重的大石头，抬不动，死撑着抬，晚上睡前又得在床前“运动”几个钟头，大声地数番号，到嗓子完全嘶哑为止。正因为如此，我刚到三队的几晚，浑身疼痛，无法入眠。

“你刚来不久，特别严，这叫做下马威。”有一次，冯立平满怀深情地对我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我们会出去的！”

三队一个最普通的处罚办法是“跑步”，一跑两三个钟点。当时我没有草鞋，异常狼狈，他脱下脚上穿着的草鞋给我：

“你拿去穿吧，我脚赤惯了，赤脚舒服！”

事实上，赤了脚在满铺碎石子的操场上跑两三个钟点是不会舒服的。

集中营移闽，三队照例是“苦力队”，担负了特务们全部的箱笼物件。我和冯立平抬的是一大箩碗、筷、碟之类，冯立平看我很狼

狈，就把重量都压在他那头，这样我是轻松地到了闽赣边界，他的肩膀却压得红肿了。

冯立平是不会想到自己会死的，在上饶时他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小妹，……告诉母亲不要哭，我就会出来的。”

谁知特务却不放过这样一个善良的青年，他们用各种毒刑逼他“自首”。长途跋涉以后，晚上竟连睡觉还用绳子把他绑在柱上，使他无法休息。结果，冯立平终于在这样的折磨下发疯而死。临死时他在床上转侧着、惨号着，叛徒班长和副班长闻声从门口进来，他突然全身一抖，挣扎着想从床上跃起，两拳紧握，怒视着他们，牙齿咬得格格地响。

那叛徒班长吃了一惊，抖抖地说：

“冯立平，你……”

我们站在旁边，最大的愤怒冲击着我们，只感到浑身热血上涌，班长看着我们神情有点异样，悄悄走掉了。

6月20日

今天终于到了建阳。

到建阳后，人已不能动弹，两肩又肿又紫，天又下大雨，队伍就在建阳停留一天。

三队司务长是曾恭生的小舅子，我们对他的憎恨不亚于曾魔王，盐汤豆渣汤冲饭，大米掺砂子，都是他的杰作。他不知从我们身上刮去了多少血汗。有一天吃午饭，我们发现苋菜叶上面漂浮着很多油花，我们高兴，以为是休息中的“优待”，但吃的时候有点青涩味。到了晚上，大家肚子开始绞痛、水泻。曾恭生假装不知道。第二天，从勤务兵嘴里漏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司务长偷老百姓的油，摸错了油缸，摸到青油缸里，用青油煮了菜。

6月22日

天色开始放晴。自从实用绳子绑了睡觉，病号越来越多，晚

上一片呻吟声。曾恭生走来，用脚踢踢呻吟的同志：“不要装死样。”

又要开始移动了，队伍集合了起来，曾恭生看看我们——铁石人看了也要掉泪的队伍，国民党特务已经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从上饶出发时，一些身体较好的大个子，现在已都成了一把骨一张皮的瘦鬼，身体坏的已陆续死在路上。但是，这些对曾恭生来说是完全无所谓，反而感到很得意，他大声地说：“最后的三十里了，不准一个落伍。”

徐市，在建阳与建瓯之间，在建阳南三十里，建瓯北四十里，四周崇山峻岭围绕着，徐市即在山麓，它比上饶周田村集中营至少要大五倍，庙宇林立，大小十余处，集中营各部就占据了这些庙宇，与居民完全隔绝。徐市被特务们经营已有相当历史了，在附近一带组织的“军民自卫团”，就是特务直接指挥下的一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武装。

十余天的非人生活，给集中营带来了疾病与死亡的惊人纪录。单拿疾病来说，就有恶性痢疾、胃病、伤寒、恶性疟疾、第三期肺结核、夜盲等。三队夜盲患者达二十六人，不几日病死者五人，他们是：许永祥、李伯敏、朱致中、章复权、王闻识。

由于营养极度不良造成的夜盲症最是惊人，起初是入夜不见一物，到后来连阴天也如同瞎子，不能走路了，这使特务们高兴。曾恭生说：“眼睛瞎了，看你们再跑吧。”于是凡是患夜盲症的开始解绳子睡。测验夜盲真伪的方法是：叫你双眼睁大，他把双手在你眼前摆动，大声呼斥，如你的眼瞳仍不动一下，便算合格。

死的死，病的病，苦役还是没有停止。首先是筑操场。眼下正是炎夏，太阳在徐市山麓施威。凡是能咽一粒饭下肚的，就得去做苦工，这是三队曾魔王定下的老规矩，谁也不能更改。冯雪峰同志是国内著名的作家，可是正如曾魔王所说：“不管你外面是怎么样，哼，现在到了这里，可得听我命令。”冯雪峰患了很久的肋膜炎，又加年纪已大，实在经不起苦役，一天，胃病骤然发作，跌在地

上,痛号着,曾恭生视若无睹地说:“班长,把他拖到旁边去。”

这也是三队的老规矩:即使你是病号,只要还能够吃饭,做工出操都得陪着,站不住的躺在地上陪。

不久,操场在我们的眼泪和臭汗下完成了,集中营血腥的旗子,又开始出现在徐市灰色的天空。

集中营在福建

孙秉泰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进窥浙赣线，三战区的那些将军们不战而溃，土地不要了，老百姓不要了，连作为军队命脉的弹药也抛弃得一路都是，大炮弹和飞机炸弹，一站站的堆积如山，无人过问。可是我们这一批已被磨折得半死不活的“囚犯”却被视为“奇货”不能不要。在日军打下浙江江山县的时候，离江西的上饶还有三百里路，三战区的指挥机关就惊惶失措得赶忙将我们的比较负责的干部张正坤、刘波（绪星）、薛克伯等十余同志枪毙；我们就在宪兵团“警卫”下从上饶的上下周田村出发到铅山的石塘，住不到个把礼拜，上饶也失守了，我们又由石塘翻过武夷山到了福建。本来预备住在崇安东南的下梅，但由于日军进展太速（事实上是国民党部队溃败太快）和赤石暴动的发生，以及担心闽浙赣边游击队的进袭，使他们不得不转移住地，于是选就了一个最封建而又地形很好、易于防守的建阳县的徐市镇，作为集中营的新址。

徐市四周多丛山密林，瘴气很重，据老乡们说：“这地方可不是好地方，你们到此地，不过三年都是鬼，熬过了三年才变成了人。”因该地气候不好，又是恶性疟疾和鼠疫流行区域，外乡人进去，非经过长期的锻炼，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所以时疫杂病很多。在那种腐朽的社会里，生了病难得医治，自然要靠天活命，身强力壮的抗过了便活，体质虚弱的自然就被淘汰牺牲了。正因为有病没有医疗，所以只有靠天求神，因此，镇上多庙宇，我们五个队（第六队暴动后又遭枪杀已取消）就被安排在五个庙宇里。我们以刑余之身长途跋涉，本来已经支持不了，再加上闽北山岚瘴气，水土不服，一到就病倒了许多。起先是恶性疟疾，有的七八天一连发高热，烧

得不省人事，接着来的是痢疾，这更使虚弱不堪的身子无力抵抗了。虽然在真武庙里设有医务所，但医药全无（有几百颗奎宁丸，还留着他们自己吃，再多了他们会变卖），里面阴暗、潮湿、污秽、凄凉，一进去臭气逼人，看护班长和看护兵更穷凶极恶，不但不照顾病人，反希望病人早死，好打我们这些病人死后的算盘。因为一条皮带，一支残旧的自来水笔，或是一件汗衫一条衬裤，都是他们所希望弄到手的。有许多许多同志就这样不明不白窝囊地断送了生命。据我所熟悉的就有杨水清、陈再兴、徐文祥、林杏坤、张吉、王闻识、刘梅开、萧凤仪、萧连生、刘复汉、冯辉、张福全、李桐铭、傅水源、张挥等十余人。但这还不过是十分之二三，其余或者不同队，或者不相识，或者日久遗忘了，不能一一记起。其中冯辉同志是冯副委员长玉祥的侄孙，他病了，有钱存在曾恭生那里，可是三番五次讨不来，想买些菜和零食吃都不可能，就这样被拖死了。还有徐文祥同志本无内病，因为害眼病没有药医而双目失明，在医务所没人招呼，日久天长就活活磨折死了。

起初死的同志还可以找老百姓的木板钉个棺材，以后连门板都征发光了，死到供不应求时，就两个人装一口木箱，而他们还在死人头上想法子，把身上的一切剥光变卖，让他赤裸裸入土，吓得同志们以后生病不敢再进医务所。

在这种没药医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不想些最原始的方法来抗拒疾病的侵袭和刑余的创伤。在外科方面我们用烟油涂疮口，外边敷上车前子草叶，有时也能敷好。生疥疮时用河沙硬擦，擦得血肉模糊了，有时也会痊愈。没有内科药，害了痢疾，一个是饿法，一两天只喝水不吃饭，一个是滞涩法，有钱时买些山楂熬水加糖加醋喝下，另一法是用马齿苋熬汤喝也会好的。害疟疾单吃“常山”一味草药或者在脊椎骨第三节上贴上生姜胡椒也有效果。

只要你想保持抗日军人的气节，不填写悔过书，拷打是经常有的事；只要你跑不出这个牢笼，住在虱蚤窝里，疾病总无法幸免。至于生活卫生，在监牢里是一个根本谈不上的问题，可是他们偏特

别讲究形式，每星期日要检查内务。这一天更大倒其霉，从星期六即整起一直到星期日，大家都熙熙攘攘忙个不了，椽子、柱子、窗棂、门板都用清水冲洗，抹布擦拭。窗格墙角有一丝蛛网，都要受处分，地下有一些灰尘都不答应。被子应当用内务板碾压得和台面一样平整，折叠成豆腐块，要造作出十六个棱角。还有一个包袱，规定里面只包一身衬衣，也要做出长方形的块和整齐的角度。另外有一本三民主义读本。这三样东西都分排在铺面上，恭候检查。从早上到午后不准进房间去，恐怕把内务弄坏。等到检查过了，马上又是一塌糊涂。这种专做表面工作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作风，而实际上四年发一次棉衣，一年洗不到一回澡，五尺长二尺来阔的棉被，盖了头盖不了脚，盖着肚皮，盖不住屁股。一个一丈宽八尺长的铺位，硬塞下一班人（十四个）。铺位低得和地铺一样，又潮又湿。这还讲什么卫生？不过折磨我们罢了。他们说，做内务的目的是要“将你们这一起桀骜不驯的家伙，整得慢慢的心平气和，不要说是人，就是有棱有角的顽石，也要使它磨得圆光光的和鸡蛋一般”。他们那些糊涂虫，哪晓得钢铁般的革命思想与意志是永远不会被磨掉的，我们的意志是越折磨越加昂扬，越昂扬就越加坚强。

到福建后没吃过青菜，天天是笋干或是香菇汤，这些东西名义上是高贵的，但没有油水来配合，只是白水和盐去煮，又有什么味道什么滋养呢？米粗糙得一碗饭可以拣出一大手心稗子和谷粒，有时还掺砂故意煮得一餐生一餐焦的。这一餐吃不了，下一餐再给你吃，于是日有余粮，而他们之计得售了。

单扣克还不算，特工老爷们还花样翻新地提出很时髦的“生产”口号来，说什么抗战已到了反攻阶段，生活自然一天比一天艰苦，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得大家参加生产，而生产的三大要素：土地、工具、劳力，他们都十分巧妙地加以“解决”。土地是强占老百姓的（名义上是借他空闲的一季，其实和刘备借荆州一样，一借不还），工具是硬借老百姓的，就是菜秧子烟苗粪灰等也是偷老

百姓的。即使买了一部分菜种，也是由我们伙食费里扣出。至于劳力更不用说了，驱使着我们无休止的去做。而他们却不花钱，不费力的坐享生产成果。好的被盗卖了，或者送到他们公馆吃，我们所能吃到的只是些剩下来的菜梗和黄菜叶。

单纯农业生产还不算，他们还利用我们的技术人员开设理发店、澡堂子、饭馆子、裁缝铺、合作社等来剥削我们，与民争利。一面更借用第三战区集中营甚至国民党中央的大名义附设建国农场，来经营非法的事情。所谓垦荒、农艺、畜牧还是次要的，主要的业务：是由福建运出剥削我们而来的剩余公益，转到鄱阳湖一带高价出售；再由鄱阳湖一带运纸张油米等去浙闽前线资敌。换回来日用品再到后方出售，于是一转手间就获利巨万而囊囊累累了。

他们另外一个拿手杰作是敲诈，动不动就加老百姓一个“私通奸伪”或“思想不正”的大帽子扣押起来，于是你就得花钱或粮食来赎。就在1944年的四五月里，把一个四五十岁连斗大字都不识的农妇陈张氏（农场人员即住她家）抓来，只凭一句口风硬要讹她十担谷，她无故受冤，自然心有不甘，于是就私刑拷打，结果竟异想天开，诬她一个“勾通奸党嫌疑”罪名，送到集中营来“纠正”她的“思想”。事后他们也觉得太不近情理了，万一西洋镜被拆穿，自己也不好看，于是又指使旁人去威吓她，教她写悔过书和保证书，但十担谷子，还是一粒不能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阎王吃小鬼”，正是他们的最好写照。无权敲诈的就实行偷窃，事务长为了揩油，不肯买菜，教采办下士到老百姓田里偷；官长吃的小厨房鸡鸭，也不用买，尽可以随意去抓。徐市附近村庄上的狗，也早已被他们打光吃光。有时甚至借口打狗把老百姓一担左右重的猪也会偷来杀吃。但偷窃究竟不“光明正大”，于是一有机会，就借名征发。有一次，借口修理营舍，就征了老百姓三百根竹子，将老乡的竹园象剃头一样斫个净光，老百姓给匪官长跪下哭着求情（竹子要间伐，不然明年就不出笋子，竹园就废弃了），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一顿臭骂和一顿皮鞋脚尖。竹子用下来有得多，就变价转卖钱落私囊。

在他们凶残、贪婪、丑恶、愚昧的统治下，也有一套所谓“文化娱乐”活动，实质上不过是补奴化教育之不足。演唱“游龙戏凤”、“捉放曹”啦，学打“南派拳”、“北派拳”啦，逼写歌功颂德的八股啦，尽是些落后倒退的玩意儿。不许唱进步的歌曲，就是抗战前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在被禁之列。把“大刀进行曲”里的“抗日的义勇军”词句改为“坚强的正规军”，操场上也唱京戏，拿西皮二簧等来合操场上的脚步。这些愚蠢的事情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做得出来。

他们痛恨我们写简体字，特别是写这个“口”字，一个特工说：“中国有领袖呀！你们为什么中间把它空起来呢？可见你们这批家伙心目中全不知道有中央，有蒋委员长。”说到末了一句他马上很严肃地来一个立正，再看我们还是没精打彩满不在乎的站在那里，他便破口大骂，真使人看了可怜也复可笑。

从江西到福建，我们在集中营中过了四年了。四年的岁月，世界已经大变，世界上法西斯的魔王们已经快到最后死亡阶段了。中国法西斯徒子徒孙们所学来的集中营这套残忍丑恶的镇压人民的方法，还能令其继续存在吗？

特 别 班

吴可仁

1942年6月22日,是敌人赤石大屠杀的第三天。天刚亮,特务区队长汪光复就带了特务班长程应权、陶芳椿和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来到赤石禁闭室,手拿名单凶神恶煞地叫着。第一个被叫到的是田金炜,接着是李桐铭、章福全、章立、陈再兴、余庆福、孙贤义、刘金标、吴必成、鲁兴^①。我们十个人到门口排好了队,汪光复又仔细点过一遍,便叫程应权带走。

我们不知道特务要搞什么鬼名堂,跟着从一条小巷里穿出,来到崇安至建阳的公路上,按命令站在路旁边等着。约等了半个小时,其他难友也陆续过来。大家见我们面部血迹斑斑,身上伤痕累累,衣衫破烂不堪,一个个光着脚歪立着,都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有的还把自己备用的草鞋递给我们穿。二中队上来了,汪光复叫我们插进去跟着走。

路上,我们十位同志趁敌人不注意,互相做了进一步的认识。章立、刘金标和我原都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集中营里又先后同编在三队和六队,这次暴动时他们在二区队没有来得及跑掉,我是跑了后被敌特宪兵们追捕抓回的。孙贤义也是暴动后被抓回的,与我一起受刑同时关进禁闭室。吴必成没有与我同过队,我在周田村看见他戴了脚镣,敌特对他极为严厉。余庆福是玉山中学教员,地下党员,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章福全1940年参军时还是个少先队员,这时他还只有十五岁,是集中营“囚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但他人小胆大,灵活机敏,爱唱抗战歌曲,每遇战友受刑打伤,他都送饭送水,热情照料,同志们都很喜欢他,叫他“小福

^① 鲁兴是作者在集中营的化名。

音”，而敌特则称他为“小顽固”。

在武夷山脚过了渡，下午五时左右到了兴田。这时，我们身子骨象塌了架一样，不由自主地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我和孙贤义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大家早上也都没有吃饭，饥饿、炎热与伤痛交迫，一个个困苦不堪，但大家咬紧牙关忍受着。

终于等到开饭了。汪光复向着我们叫：“特别班，来领菜！”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十个人被编成什么“特别班”了。饭后，章立同志说：“什么‘顽固队’，什么‘特别班’，任凭他们诡计多端，花样翻新，同样吓不倒我们。生是过程，死是归宿，我们生死都是为着革命事业，只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他扶着我上厕所，问我身体能否支持。我说伤是很痛，但骨头还好，可以走。他鼓励我拿出最大的勇气来，坚持下去，走到目的地（敌特在今天早上宣布：谁在路上走不动或借故不走，就地枪决）。我对他说：“你不要管我，路上有机会就跑吧；如果为我放心不下，到那时再跑就更加困难了。”只见他眼中涌出泪水，没有再说什么。

天黑不久，特务程应权和陶芳椿便恶狠狠地把我拖到庙中戏台上，问：“你现在还敢不敢那么顽固？”没等我回答，他们就挥起特务中队长刘仕澄用藤头制的“文明杖”拚着死力打我的脚。没打几下，那藤头杖就裂开了。陶芳椿叫声“糟糕”，程应权也担心起来，因为这藤头杖是上司用的东西，弄坏了是不好交待的。这样他们才住了手，叫我回去。

这次毒打，也是程、陶两人对我的报复。他们都是叛变革命当上国民党特务走狗的。还是在集中营初期，有一次我在小溪边洗衣服，见他们两人走来，手上戴着特务头子发的一双黑手套，令人恶心，便说了句：“人不做做狗，手都变黑了，成了黑爪牙，干脆放下四只脚一起在地下爬好了。”当时我没与他们共队，他们对我没有办法。现在他们管着我了，报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他们是想把我的脚打坏，路上不能走动好枪杀，以便向上献功请赏。

我拖着被打得红肿和流着血的双腿回到班里，同志们见了我

这种状况，痛恨不已。章立同志起身解小便，章福全和刘金标等同志用破布片沾尿帮我擦伤。就这样忍痛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队伍从兴田出发。我们十个人相依为命，互相照顾，克服了难言的痛苦和困难，走完了六十里路程，于下午五时到达建阳。途中我们曾听到枪声，以后听说是四队女同志汪洋（原名朱平）因来月经走不动，被特务头子张超亲自枪杀。大家听了，悲愤万分。

一到建阳，汪光复严令我们不准接近群众，不准和群众说话，不准离开住房的范围，并威吓说，违犯了就要枪杀。

我们被押进一间民房，等着吃晚饭。这时很多群众围上来，同情地问我们是什么人，哪里来的，到什么地方去。李桐铭不理敌特那一套，上前和群众搭话。正说着，外面传来女房东的叫声，说晒在门外的衣服和鞋子不见了。接着，后面屋子里也有人叫东西没了。我们心里早就有数，因为这一路来，敌特们不知拿了老百姓多少东西。听到群众叫喊，汪光复来到我们面前，故作姿态地说要查查看，还叫了二队几个人进来，叫从我们这里开始搜查。结果，查到挂在柱子上一个干粮袋里有一条裤子和一双球鞋。汪以为这下抓到了我们的把柄，便大骂我们是“土匪”，并叫道：“哪个人的干粮袋？站出来！”章福全同志站出来反驳他说：“我们十个人什么东西也没有，进赤石禁闭室时，你汪区队长是很清楚的，这两天路上走，大家也看得清楚，我们哪里有什么干粮袋？我们本是光明正大的抗日部队，素来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哪个是土匪，请各位把他查清楚。干粮袋是谁的，谁就是土匪！”汪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说：“一定要查出究竟是谁的干粮袋！”结果原来是陶芳椿的。陶在赃物面前抵赖不了，只得承认，群众哗然。我们说：“现在人证物证俱在，谁是土匪，不就很清楚了吗？”搞得汪光复十分狼狈，拿出手枪叫嚣要打死我们。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是不敢妄动的，只好打了我们几个耳光，夹着尾巴滚走了。

这儿离徐市还有三十里地。虽然路程较短，又是平路，但对我

们来说也是很不易的。大家挣扎着使出了最后一把力气。

到了徐市，二中队住进东岳庙，我们特别班关在庙内一间厢房里。厢房靠天井的一边墙壁是木板做的，一个半人高，上半截是空的，有柱子通屋顶。房内地下潮湿不堪，还有许多癞蛤蟆跳来跳去。没有稻草铺垫，我们就睡在地下。上半夜，特务们进来查了两次，下半夜没有来查，站岗的人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门外柱子上挂着的那盏油灯一闪一闪地发着昏暗的光亮。章立同志悄悄地爬起来，攀上屋顶。当他跳到墙外面地上时，发出了响声。警戒的敌人发觉了，忙叫喊“有人跑”。汪光复冲进我们房里，凶恶地叫我们站起身，发现少了一个人，于是一面叫人到外面搜查，一面痛打我们一顿。他又叫程、陶两人把我和田金炜用绳子捆起来，站到凳子上。汪问：“章立为什么逃跑？他跑你们为什么也不响？”我们不理他，一声也不吭。然后他叫程、陶把捆着我们的绳子另一头结在屋梁上，又将凳子踢翻，我们被吊了起来。特务们拿铁条拚命地抽打我们，田金炜的肋骨被打断两根，我也被打得昏迷过去。

章立是位好同志，一路上关照我们，直到把我们扶到徐市后他才跑。他起身时我们是知道的，因怕被敌人发觉，我们没有作声，只默默望着他爬上屋顶，暗暗祝愿他逃跑成功。但他此次是否逃脱，至今没有音讯，很可能没有逃出魔掌而牺牲了。

次日，我们被移到天后宫厅旁边的一个房间。这里四面墙壁，没有窗户，漆黑一片，进去好象进棺材一样，且又垃圾满地，毒气熏人，加上蚊叮虫咬，确实使人无法安身，而我们还得睡在潮湿的地上。即便如此，狗特务程、陶两人还抱来一大捆绳子，把我们九个人分三节绑在一起，颈部绑一节，两手向后腰间绑一节，脚上绑一节，绑得紧紧的，叫人动弹不得，稍一动就会勒死人。李桐铭同志患慢性痢疾，大便只得拉在裤子里。我们要小便也只有拉在身上。到白天，那两个特务拿进几根十几公分长的木桩和许多细绳子，将木桩打在地上，上端对半劈开，把我们每个人的十个指头用细绳绑在木桩上端。接着，他们又用上宽下尖的木楔子打进木桩的裂开处，木

桩胀大，细绳子嵌进了我们的手指。十指连心，痛苦难以言状。以折磨人取乐的狗特务还得意地把这种酷刑美其名曰“猴子搬桩”。

如此夜以继日地摧残，狼心狗肺的野兽们还不肯罢休。过了几天，又把我们叫到外面当众打屁股，直打的整个大腿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他们以为这样会起到杀鸡惊猴的作用，结果是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慨。外面的同志设法买了烧酒和黄纸给我们治伤，不时还送来黄烟等东西慰问和鼓励我们。

敌人也发觉打的办法没有收到他们想象的那种效果，于是又 came 了一着，在饭米里掺谷粒。先掺得较少，后来愈掺愈多，叫你吃不下，吃下也消化不了，这样来慢慢毁灭我们的生命。再则叫我们做苦工，除了锯木劈柴挖厕所外，还叫我们到码头上搬盐。当时，日军占领了浙赣线，江西和闽北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盐贵如金。张超等大小特务头目，趁机大发国难财，搞盐巴走私买卖，于是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他们。把盐搬往船上时，就高高地丢下，使盐包破裂，流出盐巴；在路上抬时，就把绳子放长些，使盐包在地上拖，既省力，又会使盐包漏出盐来，让群众跟在后面扫。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又改变了方法，半路休息时，趁敌特不注意，在盐包上挖一个洞，一次就漏出一些盐来，让群众扫去。我们为了答谢其他许多不知名的难友对我们的关怀，每天都用面布包盐藏在衣服里带回送给他们。记得有一次到徐市镇公所抬米时，就送给还在禁闭室关着的林植夫等同志好多盐。

没过多久，章福全同志胃病发作，送到医务室没两天就死了。狗特务连付薄板棺材也不给，荷枪实弹地押着我们用破门板把尸体抬到山脚去埋掉。墓穴挖好，临下葬时，程应权还剥下章福全同志身上的棉衣，而当我们提出要到田里拿一些稻草垫底时，他却不肯。我们愤恨至极，横起心来说：“既如此，我们愿与章福全同志一同下土！”他看来势不妙，才叫陶芳椿到田里拿了几把稻草铺垫底下，上面放着破门板。这种悲惨情景，令人永世难忘。

不到两个星期，陈再兴和余庆福同志又患病倒下了。我们大家

亲如骨肉，精心护理，夜以继日。班外其他同志知道后也送来了怀山莲子等，作为他们的补养品。但因敌人摧残过重，陈再兴病情不见好转，胃部不断出血，几天都处于昏迷状态。新换来当班长的一个姓林的特务押着吴必成同志送陈再兴同志到医务室去“治疗”，不到两天，陈再兴同志就死了。

吴必成同志送陈再兴到医务室后，找了个机会跑掉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暗暗为他祝愿。几天过后，没有听到其他意外的消息，我们才最后解除了心上的忧患。姓林的特务班长因此而被撤换，仍由程、陶两人来当班长。他们故恶重施，要我们拆掉搭起才几天的铺板，仍睡地铺。余庆福已是奄奄一息，田金炜和李桐铭也不能起床。我们大声质问狗特务：“你们这些黑心肝的人，折磨死章福全、陈再兴不算，现在余庆福、田金炜、李桐铭都倒下了，难道你们想把我们特别班的人全部折磨死吗？！”狗特务虽然凶恶残忍，但也知道全死了也不好向主子交待的，于是只得允许我们睡铺板。不几天余庆福同志送医务室了，但很快就传来他的死讯。

这时，特别班只剩下五个人。不知从哪里钻出个叫康达的特务，时常找我们去谈话，说什么：“你们这样年轻，父母养你们这么大，应该懂得一点道理，高人过矮门，头稍微低一些就过去了，何苦硬碰硬？”还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起初我们没理他，后来，我们就拿他的话回击他说：“是啊，父母养我们这么大，我们要做人，要过人的生活，不能做禽兽，过禽兽不如的生活，否则，怎能对得起父母？”讲得他再也无话可说。

到了1943年春节，田金炜和李桐铭病倒了，送进了医务室。敌特们将余下的我们三个人分散编到各队，“特别班”就这样结束了。不久，徐市发生鼠疫，集中营搬到崇安，田金炜和李桐铭两同志又相继死去。

我们经受了一切苦难，直到1945年11月，按照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我们才获释放。我们自由了，又投入了新的斗争。

1979年10月

重返党的怀抱

陈 平

1942年6月17日，端午节的前一天，是集中营很不平凡的日子。

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到达崇安县赤石镇崇溪河边，等待渡河。我们被敌人称为“顽固队”的六队渡过河后，就开始了盼望已久的大暴动。

“同志们，冲啊！”

象是堤坝决口，滚滚洪流奔腾向前，势不可挡！不管面前田埂有多高，稻田里烂泥有多深，山坡上的碎石、草荏子刺破赤着的脚，子弹在头上呼啸，都不能阻挡我们飞越前进！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挣断锁链、获得自由解放更可贵！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们互相鼓舞，并肩前进！

我随着同志们奔向大山的方向。爬过一人多深的水沟，越过第二座小山，我的两条腿不大听使唤了。猛然间被杂草绊倒，只觉得周围在旋转，站立不起来。眼看同志们已走远，山南面还响着枪声，我连滚带爬地到达山下。山脚边有条水沟被野蔷薇密密覆盖着，我弯腰钻进去，发现沟边有个洞穴，棺木板露出水面。在生死关头，能摆脱追敌就是胜利，我索性躺在洞里的板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人也要克服一切困难，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去寻找组织和同志们。

夜幕降临，我从水沟里出来。脚底被刺破的伤口踩着砂粒特别痛，我只好帽子、裹腿布将脚包扎起来，在星光下朝着北极星

的方向走去。

路是走出来的。我踉跄地在黑夜里爬山坡，穿田埂，摸索着前进。饥渴了就喝几口水涧流水；困乏了就在路边躺下打一下瞌睡。天将亮，才上山钻进茂密的灌木林里，在离泉水不远的地方隐蔽起来。

端午节的早晨约九时过后，两侧山上传来了稀落的枪声，至下午约四时才停息。大概是敌人在进行绝望的搜索。傍晚，我到山上一户贫苦农妇家里，买了一碗饭充饥；又承她的好心帮助，给了破衣服、旧草鞋、旧笠帽，这些可以使我扮成难民模样。夜，是逃避敌人行动的好时机，偏偏我的夜盲症又发作，在漆黑的林荫道上，更是寸步难行，只好在树下露宿。

在山高林密的山区，想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径直走是不可能的，我盘绕了一天，没能穿越出去，又在山上饿了一天。经过盘算，认为非冒点风险不可。

暴动后第四天，下着滂沱大雨。我下山走到崇安城边，看到离桥头二三十步外的屋子里，有一个带枪的人面对着崇河上的大木桥，看来是一个哨兵，由于避雨，站到屋里去了。这样我顺利地穿过桥头，向西北走去。黄昏，在山村一户人家的大门上发现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油印《红旗报》，字迹清晰。这个发现证明离开县城不远的地方，也曾是我们党和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这样的宣传品才能保留下来，我心中暗喜。在村边，我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求宿，她见我衣衫褴褛，形容消瘦，就问道：

“你是难民吗？”

“是啊，从这里过路，想借住一宿。”我们的口音不一样，还勉强可以通话。

“出门人，苦(台)!苦(台)!”老妈妈颇表同情，但面有难色，她说家里狭小，没地方可住。我指着草棚下一个打稻子的木桶对她说：

“让我睡在那里，有件蓑衣遮盖就可以了。”老妈妈没有拒绝，

默然同意。

老妈妈的屋里有锅灶，四壁熏黑，仅有一桌两凳，也是摇摇晃晃的；里屋大概是她居住的地方。这样的简陋陈设可以肯定是穷苦人家。那晚我成了她家的客人，她端出两碟干菜和一大碗米饭让我吃；我有点不忍心吃她的，但老妈妈的盛情难却，一定要我吃下去。她还喃喃说些什么，我听不清楚。

经过几个夜晚的风餐露宿，能够躺在木桶里，又有稻草垫底和蓑衣遮盖，格外感到温暖、安静，睡得又甜又香。早晨，我向老妈妈辞别时，她拿着四个粽子对我说：

“出门人，苦(台)！拿去路上吃吧！”

这个善良可敬爱的老妈妈给我留下了永远不忘的深刻印象。我怀着欣喜感激的心情离开了山村。但是事情并不顺利，午后我却被黎口乡公所的民团关进拘留室了。

拘留室是个阴暗、狭小石砌的房子，只有一扇门，无窗，白天只能用从石头缝透进来的一点亮光来识别室内的东西。地上铺着稻草，草上放着一副木足枷。团丁打开脚枷，恶狠狠地对我说：“把脚伸进去！”

不容分辩，我的脚刚放在下枷半圆形孔眼上，上枷就闸上锁住，再也无法站立起来了。

事不宜缓，要设法迷惑敌人。我当即大声喊冤，诉说自己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下逃出来的难民。过了一阵果然有效果，那个肥胖的乡长来了，打开牢门问：

“你真的是难民吗？”

“我是从浙江金华逃出来的难民啊！”我编造了一套难民曲，自称是跟随叔父在金华开钟表修理店的，浙赣路战事发生后逃到上饶，在一次大轰炸中失散，流落到崇安来。为了证明身份，我把一支钢笔送给那个胖乡长。这一着很起作用，乡长立即改变腔调说：

“你既然是修钟表的，就别上枷，明天再说。”那家伙眯着眼睛看钢笔，吩咐团丁打开木枷，然后锁门。

第二天,我从拘留室放出来,但指定不准走出吃饭的地方。午后,团丁拿来了乡长的两只旧闹钟对我说:

“你会修闹钟吗?”

我答应试试看,向他要了一把小刀、一把钳子和一小瓶火油。经过拆洗、装配,不到两个小时,一只闹钟走动了。从此,他们把我当做真的钟表修理匠了。我的处境很快得到改善,可以在乡公所内走动,和团丁同吃同住;三天后可到隔壁的小学替老师修怀表,五六天后可随团丁上街了。

乡公所会客室的墙上有一张崇安县详图,标出了从崇安北部进入上饶县磨盘岭的道路。磨盘岭是暴动前指定的集合地点之一。这点发现对我太重要了,目的地的方位找到了。当没有人在会客室时,我就站在地图前熟记那条路所经过的村庄、桥梁和里程。

当时传到黎口乡公所的消息很纷杂。有一则消息说每天有不少人参加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现在已发展到一千多人和一千多条枪了。乡公所里的人关心的不是国家大事,不是浙赣路的战局;使他们局促不安的是山那边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情况。有个年轻人问我,他的父亲曾参加过赤卫队,后来又当了民团,红军游击队来了会不会杀他?我不能暴露自己,只是说“不知道”。虽然传说不可靠,却说明了边界那边确有我们的队伍在活动。

我本来想搞到一张路条再逃出去,可是狡猾的乡长推托要请示区里,不肯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六月下旬的一天,我理了发,中午饱餐了一顿,换上新草鞋,上街溜跬,看看后面没有“尾巴”,就走出村外,然后上山隐蔽下来。天黑之后,走上通往磨盘岭的大道。途中要避开一个民团的据点,我就从山上小路绕过去,多花了一天时间。

入夜,雷雨交加。我从一座木桥过河,但突然从桥边的路亭里喊出:

“哪一个?口令!”

“老百姓！”我撒腿往回跑，又回到河这边。

大雨之后河水流急。我沿河边徘徊，找不到浅滩可涉水，于是就到一家破屋的侧门，坐在门槛上避雨、打瞌睡。黎明，河面上看得清楚，我就在远离桥头的地方涉水过河，上了大道。

松了一口气，才觉得饥饿。我已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在路边小铺子里吃了一大碗饭，趁雨大赶路。直到闯过最后一个村庄，才慢慢走上武夷山上的明阳关。这个隘口没有建筑物，也没有界牌，过了口子，开始走下坡路。

进入上饶境内，景象萧条，没有饭卖，只有卖苦叶菜和薯粉拌成的糊糊，吃了两三口，就很难再咽下去。磨盘岭不是一个集中的居民点，沿山沟大道住户零落分散，碉堡里已没有驻军；靠路边的草房子稻草散落在地上，看样子大兵才过境没有几天。我打定主意要在那里找到亲人。

太阳偏西了，我走进离大道稍远点的独户人家，一个年轻人在烧饭。我向他要求借宿，说关节酸痛走不动。但年轻人一味拒绝。然而我也赖着不走。正在纳闷，年轻人的父亲回来了。老人一进门就紧盯着我，上下打量。他问我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还是用难民的经历来回答他。

“你不是难民，是新四军！”老人这种单刀直入的话使我怔了一下。我望着他家的门牌上所写的户主姓名，头两个字与集中营的一个难友的姓名相同，便问：

“有个叫×××的，住在这个地方吗？”

“唔，他是我的弟弟。你怎样认识他的？”

闷葫芦打开了，我把他弟弟在集中营的情况告诉了他，说明我是暴动出来的。老人高兴地告诉我，组织上已通知，在几个关口要接待暴动出来的新四军同志们；并说已有十几位同志到达了。

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组织上迅速采取了行动，使我很受鼓舞。晚上，我与老人同床畅谈，又兴奋，又感动。经过十几天的艰苦生活，终于找到了亲人！

早饭后,老人带我到山坳里,指点我上山的道路,并告诉我山上村子里都是自己人,放心走就是了。山区树木、竹子长得很茂盛,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两个村子,就到达青竹坑。一排房子坐落在半山上,住着三四户人家,那里就是游击队的联络点。我受到同志们热情接待。当时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买不到粮食,他们以稀粥来招待我就很可贵了,而他们还觉得过意不去,这使我很受感动。

半夜里,同志们都来了,屋子里很热闹。有茅家岭、赤石暴动出来的同志,也有当地游击队的同志,不管是熟悉的还是初次见面的,大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兴奋地叙谈暴动后经历的种种惊险。

七月初的一天,秦扶锋同志意外地来到了青竹坑。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赤石暴动后两三天,反动派在赤石镇附近对未逃跑的同志们进行了大屠杀!尤其是六队参加暴动被搜捕的同志和被认为顽固不化的三队同志大部分惨遭敌人枪杀,连同其它各队一些同志,这次被屠杀的约有一百四十人。扶锋同志在三队,他是被成批枪杀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反动派滔天罪行的见证人。他从死人坑里的血泊中逃出来,在老区群众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我们。在纪念“七一”的晚会上,我们愤怒控诉了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战、屠杀共产党人和新四军革命战士的血腥罪行,发誓要为牺牲了的同志们报仇。

二

先后从上饶集中营参加暴动或个别越狱跑到山区来的同志已达到四十多人。于是我们重新编队,由地方党指定了临时政委、队长,建立了临时党支部。队伍分成两部分,体弱有病的编在休养组,安置在密林深处;健壮的编在行动组,有二十多人。我们的行动受地方党和游击队党支部的领导。初期我们的武器不多,仅有六七支长短枪,几颗在茅家岭暴动时向敌人夺来的手榴弹。这样

一支力量与山区人民结成了鱼水之情，战斗在一起，使反动派心惊肉跳。

日军进攻浙赣路，反动派几万军队不战而退，龟缩到福建山区。但是他们却念念不忘“反共”、“灭共”，对山区实行封锁、围困，阻止物资交流，切断粮食来源，人民生计陷于极端困难境地。面对敌人的罪恶阴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抗战，我们决定联合山区人民对反动派进行必要的打击，来解决吃饭问题。

我们活动在武夷山区的崇安、上饶、铅山等县的边境地区。为了防备反动派的民团突然袭击，我们经常夜间行动，转移住地。竹林、石洞、偏僻村庄、独立房屋经常是我们的宿营地。竹子对我们用处很大。在山区有大片的竹林，是我们建造临时营房的好材料，也是主要的燃料，刚砍下来就可以烧火，还可以当锅烧饭。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能以苦叶菜充饥，有时挖一些野百合煮着吃，能够吃上稀粥、玉米饭就算很不错了，吃饱米饭的日子是少有的。

八月的一天，游击队在山区人民的配合下，翻越五府岗高峰，袭击了铅山县境内反动派的一个军械库。没有花什么代价，我们缴获了一批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我们手中的武器充实了，也就相应地增强了战斗力；理所当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惊恐。

八月底，日军撤离上饶地区，反动派的军队不去追击日军，却集中了约两个师的力量，对闽赣边大举围攻。九月初的一个傍晚，反动派的部队闯进了我们的中心区——禹溪村（在上饶的南部）。形势急变，闽北特委书记急忙赶到我们设在禹溪山上的营地。他向游击队的全体同志（包括休养组的同志）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指出能够行动的同志要立即突围到建、松、政地区去（即建瓯、松溪、政和三个县），或到广丰去恢复老区的工作；体弱不能参加行动的同志，由地方党组织负责安置。

参加突围的有二十多人，基本上都配备了武器。特委书记指定五位同志组成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队的行动，并指定原游击队队长负责带路。时间紧迫，趁着黑夜我们二十多人立即

出发,从山间小道向崇安方面转移。走在前面的同志负责侦察、引路,后面的同志负责掩护、修路(把路边草的倒向从我们前进的方向转过来,使追踪的敌人产生错觉)。一路上鸦雀无声,静悄悄地保持距离向前进。

翻过武夷山脉,来到高山上一个独立房屋。屋内只有一位老人住在那里,那是一个联络点。原游击队长询问了情况,就安排大家休息。天蒙蒙亮,我们都醒来,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把用具、家俱照旧安放,使人看不出是刚住过人的屋子。我们还反复检查有无可疑物散落地上,如香烟头、碎纸片等,然后转移到附近深沟右侧的树林里埋伏起来。我们的哨位设在灌木林里,在枝叶的掩护下监视独立房屋的动静。

提高警惕,谨慎防范,在严重时刻尤其重要。上午八九点钟,十几个敌人居然大摇大摆沿着我们夜里走过的小道,包围了那个独立房屋,里里外外搜查了半个多钟头,才从来路回去。这告诉了我们情况紧张,敌人搜索行动在扩大。据老人说,敌人在路上拾到一个小圆镜子,怀疑有什么人来过,所以搜查得特别认真。我们辞别了老人,迅即上路,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深入崇安县岚谷乡境内。一大片竹林,三十里内没有人家,我们停下来做饭,每个人用砍下的竹筒当锅,放进米和水架在火堆上烤,等到青竹皮烧焦了,筒里的饭也熟了。那一天,对这餐竹筒饭大家感到别有风味。

夜里,我们到达半山腰的一个村子,由原游击队长到村里去联系交通员。由于情况紧急未接上头,于是我们顺着山间小路,摸到了一个做棺材板的工棚。由于天下着毛毛雨,打火石的引火纸受了潮点不着火,因此每一个人自己去摸板材凑合躺着睡。

没有交通员,是继续前进还是停留下来,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原游击队长说,到建、松、政的道路他不熟悉,无法带路,还表示不愿到那里去。矛盾暴露了。大多数同志认为应坚决执行特委书记的指示,尽快东行。那时正好传来消息说,那个独立房屋在我们离开后不久就被反动派烧了,这更说明形势紧张,不宜迟缓。

临时工委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做了决定，除两位同志自愿留下来跟着原游击队长外，其他同志继续东进。经过一个晚上的行军，黎明前到达崇安与浦城交界的山上。林中有一个孤立的祠堂，因没有人住，我们翻墙进去，便成了我们合适的宿营地。

按照原游击队长的介绍，交界处有一个交通站。我去侦察了一下，房屋的特征都对头，还有菜园子，但是门锁着，找不到人。

周围环境对我们这批外来战士是很陌生的，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一本袖珍分省地图，但要在山区夜间行动是没有用处的。有人提出为了能白天行军，来个大胆尝试，冒充一支追捕军事要犯的小分队。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于是规定必须注意的事项：服装穿得整齐，少说话，不要脱帽，对乡民的动作要粗暴点等等，总之，要装扮得象反动派军队那样来迷惑敌人。我们还搞了“苦肉计”，把两位同志捆绑着，伪称是押送军事“要犯”，以便更有利于公开行动。

这出戏扮演的很逼真，在浦城境内走了两天，通过大小村庄，找了乡保甲长派饭、住宿，穿过敌人驻军的营地，都未曾引起猜疑。我们伪称是“第三战区特务连”的，吃了饭只留下一张条子，要保甲长向上面算账去。我们还声言，为了要把“要犯”速送陆军监狱，要抄小路，走捷径，以避免在大路上可能撞上反动派的军队。

到了离浦城——建阳公路不远的的一个乡公所，我们照样办理，吃了午饭，留下一张便条就上路。在山上挨到傍晚才下平川，插上公路向南疾去。走惯了崎岖的山路，上了平川大道，心情特别高兴。

“口令！”黑暗中突然发出了喊声，接着传来子弹上膛的声响。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班哨在等着我们。因为他们接到西边乡公所转来的电话，说有一个部队吃饭不给钱，要查问是何道理。我们的临时队长也是东北人，熟悉东北军的情况，于是上前打招呼，拉起老乡关系，显得很亲热，并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从浦城来的，不是从西边过来，是乡公所搞错了。那个班长留我们住一宿，等隔天把事

情弄明白了再走。为了麻痹敌人，将计就计，我们答应住下来。

这里是浦城南边的交通要道——石陂街。东北军因逐步向北移动，部队都住在附近的村庄上，街里只住一个班。那个班长在街中叫开了一家店铺，让我们住在那里。

决不能等到天亮，必须利用夜间迅速行动，脱离险境！临时工委一面寻找店铺有无后门，一面派岗哨去侦察敌人的动态。店主人说，斜对面有条小巷，直通公路，往南二十里就是渡口。侦察的同志回来说，那个班正在屋里开饭，门口未设哨。机不可失，工委立即通知做好战斗准备，子弹上膛，枪上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子，然后一个跟一个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出店门，经过那个班驻地门口，没有一点惊动。穿过小巷，我们上了公路，放开脚步，向南疾去。大约走了六、七里路，刚转上西边上山的小道，石陂街方向传来了枪声。大概是敌人发觉后已无可奈何，放几枪好向上交代。

白天，我们隐蔽在树林里。东面的山区稀落的枪声响了一天，也许是敌人以为我们东去，在那里搜索吧。因为离公路近，这一天不能烧饭，每个人只吃一把生米。

估计敌人已注意东边，我们的动向有所暴露，因此决定改变方向往西走。

我们每个人的米袋已经空了，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补充食粮。解决的办法只有向地主去“借”。于是侦察、选择好对象，制定了具体明确的行动计划，任务落实到每个成员。这件事执行得迅速利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的米袋又装得满满的了。

几天行军，我们又回到岚谷山区的木工棚，遇见了十几天前从那里出发时看到的工人，他们告诉我们，三天前反动派的部队、民团还在这里搜山呢！我们留下的人，一个被打死，一个被俘，一个跑掉。无疑，我们的行迹敌人有所发觉，他们围攻中心区还未放松，我们东进又受阻，于是只有实施第二个方案，到广丰地区去，如有可能，再相机插过浙赣铁路到皖南去。

我们朝着广丰与浦城交界的二度关走去。沿途村落被敌人烧

劫后一片凄凉景象，有的废墟上余烬未息，还冒着一缕缕青烟，田里的黄豆、玉米熟了没人收割。有些老人、妇女发呆地望着废墟的颓墙残柱，看见我们走过来，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看来老百姓也是把我们当做反动派了。当时，我们只能把对反动派的仇恨吞进肚里去。

离二度关不远，我们又打听到山下村庄驻了许多敌人的部队。根据情况，估计要插进广丰困难很大，而且我们完全不熟悉情况。接受石陂街的教训，多数同志认为不宜盲目前进。这样就从原路折回。在岚谷境内翁坑附近的一栋空房子里，临时工委召开最后一次全体游击队员会议，讨论行动计划。

当时形势是：敌军仍在围困，而我们却失掉闽北特委的领导，与群众没有联系，人地生疏，人少战斗力弱，觉得很难坚持下去，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化整为零，分散回到抗日根据地去。当时选定三条路线：一条经江西至皖江地区；一条南下到广东东江纵队；一条经浙江去苏北。各人可自行选择，组织起来；个别有可靠办法的，可单独行动。

三

分散的方案确定了，我们仍扮演押解“重要逃犯”的小分队，准备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再分手。一天早晨，我们从翁坑出来只走了三、四里路，突然发现穿黑衣服的民团已占据前面山口的制高点，拦住了去路。

“你们是哪个部队？从什么地方来的？”对方提出问题。

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敌人居高临下，路的两侧是稻田，没有可隐蔽的地方，我们完全暴露在射击圈内；如果稍有惊慌失措，立即会招致严重后果。我们保持镇定，只稍稍拉大间距，厉声责问对方：

“我们是长官部派出来执行特别任务的。你们是什么部队，胆敢阻拦我们的去路？”

民团怕“正规军”，看到我们不慌乱，说硬话，就软了下来。我们的队长从容不迫地上坡交涉。敌人提出：

“为什么不带臂章符号？”

“怕坏人冒充，臂章符号集中保管，要看就到下面来。”队长态度坦然，敌人找不到其它口实，又不敢下山来看证件，只好放我们过去。

“呐，真捉到两个逃犯！”当我们通过民团面前时，敌人在交头接耳说着。我们暗暗发笑。

离敌人远了，我们迅速转到一个山岗上。一夜行军，天将明，我们钻进村庄边的芦苇丛中。在那里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作了分散前的准备工作。有的化装为难民，有的化装为被遣散回家的铁路工人，还有的伪装成请假回乡的军官等等。

中秋节后第三天的夜里，皎洁的月亮照着沉静的山区。我们二十几个亲密战友聚集在山间大道上的凉亭里。两个多月来，我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但为了迎接明天更大的胜利，终于要暂时分离了。大家依依不舍，互祝后会有期。

我们把枪背到山上树林里，天亮以后挖坑、剥杉树皮，将枪身与扳机分开掩埋，上面用沙土、砾石、落叶覆盖着，以“消灭”地面上的痕迹。那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能有一天把这批武器挖出来交给自己的同志①。

我和几个同志打扮成工人模样，继续在山区流动，打听到敌军还在围困中心区，才放弃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最后希望。于是我们重新精心制作了铁路工人遣散回乡的“证件”，一路上通行无阻，闯过了敌宪兵、军警、民团的检查、盘问，甚至到乡公所要饭吃，索取难民救济费。

分散后五、六天，我们下山走浦城到浙江龙泉、丽水的公路。

① 埋藏山上的枪支，1977年12月已由崇安县委组织公社同志挖出来了，计步枪十三支、冲锋枪一支，木柄已腐烂，枪身尚完好。

在丽水、温州、闽浙边界，我们又分头去找党的关系。终因浙江情况起了变化，没有能够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才在1942年年底前离开丽水、温州，经宁波、上海于1943年1月到达苏南根据地。

暴动后经过半年多的战斗生活，我们终于胜利地重返党的怀抱，为民族解放战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踏上新的征途！

1979年2月

流浪散记

叶钦和

一 别了武夷山

1942年6月17日“赤石暴动”后，我们四十多个胜利者，在闽南武夷山上分散成游击小组，以游击斗争来对付敌人狞恶的“搜索”。在暮秋10月中旬的一个黄昏，我们一行三个人——陈紫戈、黄蝶飞和我，毕竟和相处三个月的武夷山告别了。

啊，武夷山！在你的山石上有着我们奔突的足迹，留下我们光荣的骄傲。

临行前，我们和共同在闽赣边区坚持游击的地方党邱同志告辞，他费尽了力量弄得几十个青瘡的小梨子送给我们当干粮，握别时，他郑重地说：

“祝你们沿途珍重，安全到达军部。”

摆在我们面前的虽是遥远的途程，但那是我们归去的所在——我们革命的家，一种坚强的归去的信念牵引着我们。

在苍茫暮色中，我们踏上荒芜的山头，微风吹拂着枯黄的野草，野花已经萎谢，蟋蟀在草丛中唧唧奏乐，它们在欢送我们。走完了浓密的竹丛和树林子，又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天色已经渐渐的暗黑下来，象一个凶猛的怪物张开了巨口，把一切景物都吞噬了。夜虽已深，但我们还是脚不停歇地踏着崎岖的山路，伴随着我们的是天上的星星，脚下的山溪。通过了几处敌人的封锁线，穿越过闽赣交界的威灵关，当我们到了江西境的山巅时，东方已渐渐发白了。

经过一夜的奔波，疲乏极了，我们正休息下来用早餐，隐约听

到远处山村传来的起床号声。黄蝶飞幽默地说：

“我们进餐，国民党反动派还给我们吹号啊！”

我们继续进发，走上人迹绝少的大山，一边是危岩峭壁，一边是黑漆漆看不见底的深渊，翻滚的瀑布水花飞溅得我们满脸满身，我们沿着陡峭的山石，在深潭和瀑布旁边一步一拐地前进。

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宿营于金竹坝的山巅上，夜半醒来，满天的繁星和半圆的月亮照射着阴冷的群山，山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经过三昼夜的艰辛跋涉，到达了真正的最高峰五府岗的山顶上了。俯览四周，可以环视闽赣边界的五府（大概有广信、浮梁、崇安等府，记不清了），南通福建的武夷山脉，东联上饶广丰的风景山脉，浙西而下，就是江西铅山境界了。

我和陈紫戈同志正在争论判断方向地形时，突然一阵狂风吹来，乌云四起，顷刻弥漫天空，大雨如注，我们无处躲避，只好蜷曲着身子躲在松树下面，雨越下越大了，山上的流水也象潮水般汹涌而来，虎虎之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相互紧紧的搂抱着，象青蛙一样缩成一团，大家都冷得发抖了，牙齿颤抖得格格作响，四肢乏力，全身都麻木了。

夜深，风雨更剧，雷电交加，狂风呼啸，冷气刺入骨髓，我们难受得真不易熬忍，但是，除了相互搂得更紧些，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雨才停止，淡黄的阳光，不久也从东方出现了。遍山的松树在晨风中飘摇，我们才现出胜利的愉快。

把地形和方向判断清楚，我们便向铅山进发，到山麓时已近黄昏；刚巧山麓下有一户人家，即求宿于此。

当晚，主人端出雪白的大米饭叫我们吃，每人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大碗，连主人两口子的饭都给我们吃得精光，因为我们已经几天没有见过饭了呵！

二 抓去当壮丁

当我们到铅山县时，情形非常混乱，国民党在浙赣路上不战而退，军队到处流散，炮弹与枪弹，一堆堆杂乱地被丢在公路旁边。

陈紫戈留在铅山，我和黄蝶飞赶去河口出售过去在海外购来的纪念物——挂表。将近河口时，就给两个盘查哨扣留了。我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他恶狠狠地回答：“是军政部的！”

我听了是军政部的，心胸突然跳起来，因为军政部的军队，在三战区只有一个特务团，特务团曾在七峰岩看守过我们的，如果被他们发觉，那就完蛋了。

我们被监视坐在路旁，旁边有一个卖花生的小孩，似乎害怕哨兵听见，轻轻的对我们说：

“你们真倒霉，这事情头几天没有的，因为师管区跑了壮丁，他们是抓壮丁的。”

我听到是师管区的倒很放心了。我们被送到连部去，一踏进门槛，里面象囚犯似的脸黄肌瘦的“壮丁”都聚拢了来，互相议论着：

“又抓来两个。”

“谁倒霉，谁就碰到这批冤鬼！”

师管区训练壮丁的情形，也无异于三战区的集中营，出操上课有机枪看守，大小便要集体去，饭吃不饱，挨打挨骂，这一切都是极平常的事，所不同的，可以自由说话而已。在这种情形下，逃跑是困难的，这里的环境，虽不致涉及政治问题，然而这种生活长此下去却不是办法，而陈紫戈在铅山等待我们一定很焦急，我们商讨结果，决定打报告请求释放，报告送上去不久，值星排长就找我们去谈话了。

“你们不是逃兵，究竟是做什么的？说作生意吧，又没有什么证明。”值星排长说。

“我们是在金华做生意的，现在那里已经是前线了，情况紧急

的时候政府下令疏散,也来不及发什么难民证,商会发给我们的会员证明书,已在路上给散兵抢劫去了。”我回答了他的询问。停了一会,我又进一步说:

“依照兵役法规定,在四十五岁以上的免役;在壮丁年龄内近视眼五百度以上的也免役;我现在很快已经五十岁了,我的侄子的近视眼已经在一千度以上了,不能当兵的人送到前方去打仗也是没有用的啊!”

值星排长允许将我们的报告转给连长考虑。

那晚我们睡在草堆上,旁边睡着一个青年,在暗淡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面貌,他在地下挣扎了好久,好容易翻了一个身,带着十分悲怆的口吻,叙述他的不幸的遭遇:

“啊……老倭,我是三代独丁,一生下来父亲就死了,我母亲千辛万苦把我抚养这样大,那天我象绑上刑场似的与她分离,她哭得那么伤心……,我到区署后,母亲还到区署哀求区长放我回去。唉!不但没有结果,反被他们毒打一顿,她怎么受得了?现在……现在不知道她是生还是死了……”说到这里,他因过分的悲愤而抽噎起来……。沉静了一会,他突然变得很激动的说:

“为什么当兵的都是我们穷人?我们同庄上一个大地主有四个儿子,每次抽丁都没有抽到,每次政府派捐也只有穷人分摊,天下为什么这样不公平?”他被高度愤激的情绪所激动,把声音提得很高。

“老倭,你不要难过,你生的什么病?”我只得这样安慰他。

提起病,他的两颊突然涨红,眼睛睁得大大的,悲愤更统治了他:

“我哪里是生病!我因为日夜惦念母亲,这里的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下去,在一个月前的一个黑夜里我开小差走错了方向,又被他们抓回来,打得我死去活来,什么刑罚都用过了,不能起床也已有一个多月了,又不给药吃,唉!每个月总有几个人在这里死去的,我……也难保……”他又呜咽了。停了一会,他又说:

“老倭呀！唯一的希望只有补充到前方去，到了前方再想办法开小差，不然，只有死在这里了呵。”

听了壮丁的话，翻来复去，再也不能入睡。国民党的腐败和这种残酷无耻的行为，已在我脑海里织成一个有系统的故事，这故事此时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不禁又重温了一下国民党在我们中间出奇野蛮的暴行，这故事活生生的被我所体验过，过分的激动制服了我的疲劳，我睁大着眼睛对着无边的黑暗直到天明。

三 困守在安洲

我们释放了出来，把表卖了，匆匆折返铅山，正与陈紫戈商讨怎样走的问题，碰着刚从师管区逃出的另一个江西老倭，邀我们到他那里去做生意。他住在铅山与河口中间的一个小村庄——安洲。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他的店就是他的家，门口贴一张红纸“罗义民小食店”，里面摆着两张桌子，几张长板凳，两口锅灶，大概卖些面食之类的东西。

我们决定和这位罗老板合股做生意，把一百块钱作为合股经营的资本，留下的零钱打电报到大后方去“请求援兵”，立即发了重庆、桂林、曲江、赣州四个电报。我们想利用这个关系暂住下来，为了今后要走长远的路程和弄个路条，电报往返大约须一个月，“援兵”一到就可启程。

平平淡淡的生活约莫过了一个月，我们所期望于大后方的渐感失望了。有一天黄蝶飞往铅山去采办货物，竟整日不回，一天、二天、三天，也不见回来，一周之后才接到他自河口寄出的信，信上说：“我又给师管区抓去了，现已补充到预备第五师，就要出发前方，请即来河口一晤。”

我赶到河口时，他们已在队部门前大场上集合待命出发了，我急忙跑上去叮咛他：

“你现在随同他们出发后，找机会开小差，在一个月以内我们一定等你回来一起走，除了万一我们碰到‘熟人’（特工）只好走，如

无这种特殊情况发生,后方钱到了时也一定等你一块走的。”

值星的哨子无情地响了,前排队伍开始移动,黄蝶飞掉转头来望着我,他的眼泪已夺眶而出了,我低下头不忍再看他一眼,等我抬起头来,他的身影已在远处消逝了。

我没精打彩地走回安洲,把这情形告诉陈紫戈,他也只得摇头叹息。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终日依赖于大后方的援助宣告失望了。罗老板对待我们已不如以前,尤其是那位老板娘,常常指东骂西的讥刺我们;使我们实在片刻不愿停留了。

陈紫戈同志已经病了半个月,大概是急性关节炎,开始那一天痛得昏了过去,幸亏罗老板娘的土办法,用一个铜板在痛的地方刨了一会,才渐渐止痛;关节炎愈后又染疟疾,每次发热后我总设法弄几毛钱买红糖冲开水给他吃,没钱买药,吃了红糖水心里可以好过些。

我们处在贫病交迫境地,走又不能,留又不得,困守安洲已有两个月了。有一天,罗老板脸上充满笑容走来和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在石塘小学当校长,昨天路过此地,我已和他说好介绍紫戈到石塘区署去当书记,明天就可以去。”

到区署工作是带有危险性的,但是我们目前所处困境只得去冒险一下再说,同时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到区署后可解决路条问题,陈紫戈病才好,不得不去尝试一下,那文弱的样子,倒很象一个小书记呢。

四 流浪河口

陈紫戈走后,我也离开罗老板家,到河口去找活做。河口是江西三大市镇之一,面临信江支流,也是水陆交通的要道,我弄到一副扁担,开始出卖劳力。第一天就替一个客人挑一担五六十斤重的东西,约有二十里的路程,走了一半便觉得透不过气来,两肩已疼痛不堪,实在不能支持了,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又不得不拚着

命捱到目的地，担子放下时，肩膀上已是紫血斑斑了。

十几块钱，仅仅维持两天的生活，我一个人静悄悄坐在郊外坟墩上沉思，忽然从我背后传来一声大叫：

“老头子，你在这里想什么？”

把我吓了一跳，掉过头看时，原来是卖报青年小王，他是安洲小店里经常的顾客。我很欣喜地说：

“啊！小王，你到哪里去？”

“报纸卖完了，出来外面走走，我们到茶馆喝茶去。”他即刻拉我起来，并很诧异地问我：

“你不在安洲做生意了吗？”

“本钱统统吃光了，不做生意已有好几天了。”

“我不到你那里已有一个多月了，以前隔一天要到铅山去取报纸的，经过安洲总要到你店里坐坐，吃点东西，现在报纸由报社直接运到河口，我不必两头跑了。你现在有事做吗？和我一起卖报好吗？我每天可以赚十几块钱，明天我们一同去卖。”他热情地对我说。

报纸卖了两天之后，我仔细考虑一下，觉得卖报是有相当危险性的，因为报纸销路全靠茶楼、酒馆、旅馆，而这些地方常是特工活动的场所，为了慎重起见，只好不做这行买卖。

报纸不卖，小王即刻介绍我在一家旅店当茶房。做了几天，因为旅店也同样常有特工出入其间，不得不又把茶房辞掉了。

踉跄街头已好几天了。关帝庙东边的墙壁已经倒坍了一大半，从半边墙角上射进一丝暗淡的月光，我躺在墙根的稻草堆中，凝视这一线可贵的光明。在西北角上的另一草堆中，有两个早已熟睡的讨饭人，一个露出一只脚，另一个露出一个头在外面。

早晨细雨迷蒙，庙里的空气比先前冷得多了，那两个讨饭的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捉着虱子，捉到一个便猛的丢进嘴里咬得啾啾作响，我正看得出神时，忽然远远地好象有人喊着“老——头——子——”，不一会，报贩小王蹦蹦跳跳地进来，他有点埋怨我：

“老头子，你害得我好苦，我到旅店去找你，说你已辞工不做了，找了两个难民所都见不到你，我想你一定在这里，总算给我找到了。”

停一会，他又说：

“我问你，为什么又不在旅店做工呢？这样又不做，那样又不做，难道还想做官么？可惜你没有福气。”

为什么不做工宁愿饿肚子，他是难以领会的，而我也说不出理由，只好随便搪塞几句：

“不错，我是没有福气做官的，象这种敲榨穷苦百姓的官我是不愿意做的。”

他的脸色突然沉下来，眉毛象鬃毛样竖了起来，眼睛睁得圆圆的，愤慨地说：

“对！我如果做了大总统，我一定要把这批猪官狗官杀光！”

“你说我没福气做官，你倒想做大总统了。”我们都笑了，连那两个讨饭的都把眼睛笑成一条线，小王拉着我的衣袖更笑得俯仰不止。他忽然触着了什么似的惊奇地说：

“你只穿两件单衣，十二月了，不冷吗？”

“还好，不十分冷。”我勉强说。

“哼，不冷，不冷，你为什么又发抖呢？”

小王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样冷的天气，不冻死也会冻病的，总要想个办法才好：他想起前几天一家豆腐店要请一个人，不知请进了没有，要我等一等，他马上去问。小王的关心，使我感到流浪中难得的友情，只有穷人才会怜惜穷人。约莫过了两个钟头，他兴高采烈地跑来说：

“老头子，豆腐店老板答应了，快去，快去，我带你一起去。”

到了豆腐店，小王向老板作了介绍。老板是个秃头的家伙，四十多岁，肚子大大的，轻视地把我打量一番。

“你来做工是可以的，工钱每月九十元，每天要磨两斗四升豆子，夜晚磨一斗六升，白天磨八升，半夜就要起来，磨完一斗六升差

不多天快要亮了，天一亮把店门板拆卸，各处打扫好，就挑一担豆腐上街去卖，卖完回来吃早饭，上午再磨八升豆子，做完这锅豆腐吃中饭，下午要挑二十多担水，挑水的地方不很远，吃过晚饭，洗过碗筷、锅灶就没事了，这样的工不很费事，你能做吗？如果做得来，你就做，做不来，我另外请人。”

我听完他这一串话，这种工作，自然是吃不消的，但是不做的話，目前生活如何解决？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能做”，一面带着哀怜的声调说：

“老板，我做做看，能做就做下去，不能做，做一天算一天工钱，好吗？”

“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老板娘翘着猪肝似的嘴唇，斜着三角眼睛插嘴说。

“好吧，你来吧，能做就做下去，不能做也随你的便。”老板无可奈何似地说。

我当天就上工。小王见我有了安身之所，也好象很宽心似的，临走他说：

“老头子啊！你要好好做下去，不要做几天又不做了。”小王这种天真纯洁的心情，太使人感动了，我唯唯答应他好意的帮助。

做了几天，实在有些吃不消了，最困难的是一天挑二十多担水，肩膀已经红肿了，晚上浑身骨头都感疼痛，但这样繁重的工作，不得不咬紧牙关熬忍着，这样又过了半个月。可是有一天下雨，路上泥泞不好走，刚走上埠头石级，脚一滑，扑通一声，连人带水翻到石级后面了，爬起来时已跌得头破血流，水桶也打烂了，回来告诉老板，不但没有得到他的同情，反而挨了一顿臭骂，老板娘更是尖起嘴，骂得嗷嗷不休的：

“你做不来，你就不要做呀，买一对水桶要一百多元，你一个月的工钱还不够赔……”

于是我又辜负了小王的好意，辞工了。

大家已经怨声冲天了，我忍不住，就暗中鼓动几个积极斗争的车伏：

“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要求队长给我们吃饱饭，如果饭吃不饱就不推车子，只要大家一条心，队长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愤激地响应。

“对，我们团结起来，现在马上就干。”

“老李，你去第一排，老陈，你去第二排，我去第三排。”

他们临走时，我又告诉他们：“我们一面要求队长给我们吃饱饭，一面大家签名做报告到县长那里去，报告队长怎样贪污的事情。”

老李说：“没有人做报告呀！”

我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警察局当书记的，我去请他做一张呈文，大家在上面签了名，寄到县政府去，不过县政府有人来调查，我们大家都要一致的。”

我向他们扯了谎，做好了呈文，老李拿去叫他们签名，呈文递去不久，县府派员来调查了。

这位“钦差大臣”来后约有一星期光景，队长撤职了，新队长也跟着来接任了，全队的车伏对这位新官都抱着热烈的希望，以为今后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了。新队长一上任就召集全队车伏训话：

“你们大家要安分守己，服从命令，如有调皮捣蛋，我是不客气的，饭，自然会给你们吃饱的……”

车伏们感到失望了，老李走来和我说：

“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坏家伙。”

新队长到任不久，车伏陆续走了许多，每走一个，队长照例要召集训话：

“你们跑，跑到哪里去？如果给我抓回来统统枪毙！”

队长的吓唬，并没有吓倒他们，队上开小差的越来越多了。

* * *

我正在忙着煮饭，有一个车伏跑来告诉我：“外面有人找你。”

原来是患难与共的黄蝶飞同志回来了。我欢跃得几乎发狂，真想把他抱起来亲吻一下，但我终于强抑住沸腾的感情，只轻轻地说：

“啊！你回来了……”我让欢喜埋在心里。

我们走向伙伙房，黄蝶飞告诉我别后经过：“河口别后，一路都没有机会开小差，到了金华附近，我编在通讯连当通讯员，连长是广东同乡，不多久他叫我在连上当文书，后来他介绍我到军需处当少尉军需，升了官约有一个月，我就开小差了。我到安洲去找你，知道你在这里，罗老板还说陈紫戈在石塘区署，我想明天去看他。”

“没有必要的事情，还是不要去找他，免得暴露目标，前一个礼拜他来信要我去，我好不容易请了两天假，去看了他一次，我给了他一点零用钱，他身体已好多了，我们马上写封信给他，说你已经回来，免得他日夜挂念着你。”

我还告诉老黄：“我已经积蓄了五六百元钱了。你暂时也在这里，明天找保长介绍，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月就可以走了。”

在古历除夕前，家家户户大门上都贴上了春联。我们伙伙房是在姓费的一个老头子家里，我们都叫他“费老伯”，他买了两张大红纸，预备找人帮他写对联，但是找遍了几个村子都找不到人会写，他愤愤地把两张纸丢在桌子上。

我一时感情冲动起来，带开玩笑地说：

“费老伯，你不要急，我帮你写。”

“你会写吗？那好极了，请你就写吧。”他立刻去队部借了笔墨来。

我把对联写好，他一面看一面说：“写得真好，真好。”还叮嘱他的家人说：

“你们以后不要叫他伙伙了，要叫他广东先生了。”

我一听他叫“广东先生”才醒悟起来，自己暴露目标了。

第二天，果然队长找我去谈话了，我很不安，马上匆匆告诉黄蝶飞：

“事情糟了，如果谈得不好可能被扣留的，我身上的钱都交给你，万一我被扣，你立刻赶去告诉陈紫戈，你们两个赶快离开此地，以免意外，假使暴露了本来面目，那我就准备牺牲了，事情也许不至如此，但不得不从最坏的方面打算。”

我到了队长那里，他正伏在桌上写东西。

“队长叫我做什么？”

“厨房门口的对联是你写的吗？”

“是的。”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我没有在什么学校毕业过，只在私塾读过几年书。”

“哼！我不相信，看你写的字，不是大学生，就是高中生。”他狡猾地对我狞笑着。我苦笑着说：

“我父亲是个秀才，我从小父亲就教我读书，后来又读了几年私塾，象我现在五十多岁的人，小时候的洋学堂只有省城京城才有，我们乡下人哪里读得起什么学堂呢？”

“我看你并没有五十多岁，如果把胡髭剃掉，还可看作三十多岁。”

“我今年确实五十一岁了，我老婆五十岁，先几天，她还向我借钱做生日，为了钱，我们还吵了一顿，队长如不相信，可以派人同我一起去我家问的。”

他听我说完话，从座位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右手捏着下颚，好象在思索什么似的。我趁机说：

“队长还有事吗？我还要煮饭呢。”

“不要忙，你要老实告诉我，我想调你当文书。”

“如果队长肯栽培，不但我感激，我老婆也出头了，她日夜求菩萨希望我高升。”

“明天就要过年了，过了年再调你到队部来，现在你回去吧。”

“是！”我好象囚犯得到了赦免令似的出来。

黄蝶飞提心吊胆地在厨房焦急着，我回来就告诉他：

“根据刚才谈话情形，虽然不会马上发生意外，但已被他们发觉我是知识分子，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了，你现在即刻赶往石塘找陈紫戈，叫他把路条打好，当天赶回来，和他约好地点，我们后天就走。”

正是大年初一，夜半飘起了微微的雪花，天还未明，我们挑着破棉被，踏着茫茫白雪又开始走上绵长的征途，雪花马上把我们的脚印盖上了。天明时，村野响彻震天的爆竹声，好象在欢送我们，我们充满着愉快的心情，离开这数月来浪尘寄迹的所在。

六 潦倒沪滨

从河口启程经上饶、玉山、江山、衢州、寿昌、建德、桐庐、富阳，虽然走了个把月，一路都很顺利；可是，在钱塘江畔的一个小镇——和尚店，我和黄蝶飞竟被伪军的盘查哨所扣留，陈紫戈走在前面，见势不妙，机敏地溜掉了。我们被送到大队部，经过问话之后释放出来，但不知道陈紫戈的去向。我们患难与共的战友就此失散了一个。

我们搭沪杭路上午九点钟的快车，下午两点钟光景就到达上海。

在西站下了车，到马路旁的饭摊吃了饭。走了好久才找到拉都路××村，在第六号的门前扣门，探问久别的亲友；可是门庭依旧，人事已非，求告邻居都说不知道。接着我们又找了几处亲友的住所，又都是搬迁已久，无法找寻，所有上海的社会关系完全绝望了。我们没精打彩地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踱步，阳光晒在马路上，把脱叶树影拉得长长的。我凝视着前面，所看到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也不是高楼大厦，而是透过云天的深处有我希望所寄之处，只有它能给我这受难脱险归来的孤儿得到母亲的抚慰。凭着这个信心，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天色已黑，囊中已空，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和黄蝶飞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找同乡会。”

“不知同乡会在哪里？”

“找同乡会只要找广东店，如果店门口玻璃橱窗里挂着叉烧、香肠之类的当然是广东馆子，再问同乡会在哪里就知道了。”

到了广东同乡会的门口，外面停满了汽车、三轮车，真是车马盈庭。一个门房很快走过来阻止我们说：“里面有要人在开会，你们不要进去。”

我们说明了来意，就要求管事的给我们一些钱，他们为着同乡的情面和不屑麻烦的缘故，就拿出一百二十元钱来。我进一步要求发给我们临时市民证，他们就告诉了同乡会的干事，写了一张临时难民证。我们兴高采烈地出来，去找寻小客栈，找了好久才在新闸路一家××旅店开了一间每天八元四角的房间，马上解决了食宿问题。

在旅店住了两天了，仍是一筹莫展，这一天我们很少说话，整天都深因愁城似的。黄蝶飞坐在一张靠椅上，侧着头望着窗外出神，我脱下一件破烂的内衣，百无聊赖地捉虱子。外面好象有说家乡话的声音，我走出房门去看，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身材不很高，黝黑的脸孔衬在白发里显得更加黑，我和他打了一个招呼，请他进我们房间里来聊天。

他问我们的来历，我们告诉他，日本人怎样进攻金华，我们怎样逃到上海，编造了一套经过。他也告诉我们，他到上海已经十多年了，他很同情我们的遭遇，要我们有空到他那里去坐坐，他就住在隔壁弄堂里的××号。

他走后我同黄蝶飞说：

“这位老乡是一个忠厚的长者，将来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错过机会。”

囊中又空，不得不离开旅店了。在一家瘪三旅馆又住了两天，这是相当狼狈的，每天晚上要到九点钟以后才能进去睡觉，天一亮老板就把我们撵走了。破棉絮上的虱子比我们身上还要多千百倍，多到简直无法形容。但是最后，就连这样每晚一元二角的瘪三

旅馆也住不起了。

第一晚睡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的水门汀台阶上，地下是冰凉，北面吹来的寒风刺心肺，两个人勉强蜷缩在那里。深夜，突然感觉头上被猛击一下的疼痛，蒙眬中睁开眼来，一个巡捕拿着木棍站在面前，凶恶地说：

“瘪三！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快滚！”

被逼离开那里，深夜踟躕街头，又恐惹眼于资产阶级豢养的忠于职守的奴才，我们在这几家大公司外面兜了一夜圈子。

第二天，我们开始讨饭了，两人分头出发，一整天只讨到八角钱。我们的对象是穿着笔挺西装的阔少们和摩登小姐们，但往往跟着跑了几十家店面还是不屑掷下一角钱，偶然碰到一两个慷慨的，也是因为免得紧跟在后面嚼苏，掏了半天皮夹，才掏出一角钱来，睁大眼睛恶狠狠地把它丢在地上，并且说“真讨厌！”这样我就来不及去看他（或她）的表情，只顾赶快去拾取那可贵的一角钱，随即又注目于第二个对象了。有时不幸跟了几十家门面碰到一毛不拔之辈，心里的难过，比千万个蚂蚁在心窝上爬还要难受。在五光十色所闪耀的都会景物底下，终日角逐于老爷阔少们的背后哀声乞怜，头目为之昏眩，心境是够迷乱的。

黄蝶飞讨了一天，宁愿饿死再也不愿讨钱了。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黄蝶飞同志在任何艰苦环境或任何残酷斗争中都是非常勇敢的，惟独向人讨钱就没有勇气了。为了肚子饿，我不得不鼓起勇气遭受人们的冷眼，同时鼓励黄蝶飞也同样忍受一时，我说：

“今天我们的困难是空前的也是最后的，目前除了讨钱外别无他法，只有讨钱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为了实现我们崇高的理想革命事业，为了保留生命，做乞丐讨钱也是光荣的。我们要克服困难战胜环境，我们已经经过残酷的斗争，经过几千里艰苦的历程，今天完全脱离了政治危害安全到了上海，何况到新四军军部这一点路程？渡过这一难关，我们的前途就是光明的。”

我们又鼓着勇气，拖起疲乏的步伐，含着悲怆而又带着一丝希望的心境，走到静安寺路转角，黄蝶飞又开始向人讨钱了，跟了几步，他刚伸出手来，勉强开口：

“先生……先生……”

仅仅叫了“先生”两个字，他的眼泪就象珠子似的，一串串地滚下来，我看了这种情景，内心也有说不出的凄惨，我自言自语道：“想不到我们的同志，会受到这样的遭遇。”

我走过去安慰他几句，想不出什么更妥当的话来，我说：

“你休息一会，不要讨吧，……”于是我继续去讨，但是讨来的钱两个人吃，当然吃不饱的。

后来一个摆摊字摊的人告诉我们一个讨钱的方法，叫做“告地状”，我想这方法比伸手开口要钱好得多，于是花了三角钱买了一支粉笔，在南京路国际饭店旁边告起地状来了，把编成的一篇历述苦境的“地状”写完，四周已围起了一大堆人，可是，一个外国巡捕跑来：

“瘪三，这里不是讨钱的地方，滚，滚……”

没有办法，只好恨恨地走开，又在另一条马路告了一天，结果分文无着，我们抱着很大愿望的讨钱方法又告失望了。

我们睡在修理马路阴沟的新的沟渠筒里，由于肚子饥饿，更觉寒冷难当，水门汀制的沟渠筒冷气逼人，常在半夜冻醒。后来发现马路旁边的自警亭，到了十二点钟以后，自警团全都站岗完毕回家了，我们象发现新大陆般高兴，躲在小小的四方的亭子里比沟渠筒好得多，也暖和得多。

在上海所有马路上，瘪三、乞丐、讨钱与抢东西的不知多少，在一天之内，冻死饿死于街头巷尾的也不知几许。我们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感到这种伤心惨目的遭遇，长此下去将要轮到自己头上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别的办法来解决。

我们想到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到T城A同志家，一是到S城W镇C同志家。T城是个大城市，A同志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员，如

果A同志没有回来，他的父亲一定不会相信儿子有这样的乞丐朋友，这条路不大妥当。W镇是一个乡村的集镇，即使C同志没有回来，在乡村总比城市好得多，同时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公正士绅，我们部队以前在他家乡一带活动时，他都尽过很大的力量帮助的，去W镇的条件比较有利得多。

于是商讨的结果，决定作S城之行了。

七 重回上海

在那广东老人好心的济助下，我们获得了去S城的车资；怀着一种不可预知的命运的心情，挤上自北站开出的京沪特快车三等车，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我们只好站在车厢的门口，让初春犀利的风刮着我们单薄的破衣。上海郊外一片荒凉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阳光里，急速地从火车后面旋转过去，这种风光，倒好象和我的心境一样地迷茫。

到了S城，下车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月台上一个个被检查着出去，我们挨到出口处时，因为没有市民证，被警察赶了回去，好容易得到行李伙的帮助才带我们绕道走出车站。

到处询问W镇的所在，都说不知道，后来问轮船公司才知道W镇离城还有六十里。我们身边的钱已所余无几了，想找家旅馆住宿一宵，又因为没有市民证，没有一家肯容纳我们。天色渐渐黑下来，且下了毛毛雨，不得已找到一个小菜场的肉台底下蹲着，雨却越下越大了，肉台遮不住风雨，我们的衣衫又打湿了大半，只得离开那里。找了不久，发现一个公共厕所里面的角落里有一堆稻草，我们喜出望外，高高兴兴地坐下来。谁知忽然来了一个乞丐，他穷凶极恶地呼喝我们：

“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你们是哪里来的瘪三，敢抢我的地盘，还不快滚？”

我们不知说了多少哀求的话，他竟毫无同情心，终于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狼狈到连乞丐都能撵走我们的地步，结果，在一家旅

店的屋檐墙角下躲了一夜，天明时全身衣服都已湿透了。

到了W镇，探听得C同志尚流浪在外，使我们对此行的热望冷却了一半。我冒充着C同志的岳丈去找他的家人，他们半信半疑的招呼我们进去住宿，从他的母亲处得知C同志的安全消息，使我们更宽怀的是他不久就要回来，我们曾经患难与共，一同在国民党集中营斗争过来的战友不久就可以见面了。第二天，他的母亲送给我们三百元钱，于是我们又折返上海，再度一时流浪生涯。

* * *

回到上海后，还钱给广东老人，他坚决不要，并且还容纳我们在他家里住宿，对待乡谊真是仁至义尽了。于是我们开始做起小买卖来——卖大饼油条，每天能够维持我们不致再受冻饿的生活。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小菜场兜着圈子做生意，黄蝶飞哭丧着脸急匆匆地跑来：

“我……我泻肚子，裤子上都是大便，怎么办呢？”

“你的大饼油条给我卖，先去找个有水的地方洗干净，不要急，不要难过……”

我看到他这种情景，真有说不出的难受，在上海什么滋味都尝过了，现在我们过的是上海最下层市民的生活，每天在马路旁边小饭摊上吃着那种由各家菜馆饭店剩下来的脏菜脚，这是上海最便宜的东西，每碗只用三角钱，稀饭倒要八角钱一碗，那么泻肚子是当然不可避免的了，在这样的景况下，还说得上什么卫生？

我捧着黄蝶飞和我自己的大饼油条，正在沉思我们目前的生活是这样凄楚的遭遇，同时也使我们亲身体味到下层市民的生活。

突然一群小瘪三象虎狼般拥上来，把我的大饼油条撒得满地，我当时疯狂般叫喊：

“瘪三！瘪三！你们为什么抢我的东西？我要靠着它活命的，你们怎么这样没有良心？”他们当然不理睬我的叫声，抢着嚼着就逃了，围上来的是一堆看热闹的男男女女，有一个中年妇人同情地说：

“这个老头子真可怜，这样的瘪三太没有良心了。”

我一边拾起剩的掉在地上的大饼，一边想：“良心是唯心的东西，饥寒起盗心，他们肚子太饿了，难怪他们要抢来吃，我要活命，他们也为的要活命啊！”我只能深长地叹了一口气。

在那位广东老人家中，我和黄蝶飞是冒充着一对父子的，他看到我们忠厚老实，不但不讨厌，而且更加亲密了起来，他的几个孩子叫我叔叔，叫黄蝶飞哥哥，逢时逢节总叫我们在他家吃饭。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已经过了清明和立夏，我们已由严冬过渡到初夏，生活简单了许多，日子也好过了些。但是焦急着C同志尚无回来的信息，归队的心随着日子的延长更迫切了。

那一天，黄蝶飞忽然失踪了。开始总以为他会回来的，但是二天三天都不见回来，我可实在着急，认为一定又出了什么乱子。我当时估计，我们在此并无熟人，绝对不致涉及政治问题的，再说我们已由广东老人领出了市民证，他身边又有了“护身符”；但是他不是厌烦这样的生活了？他会去做冒险的事情吗？做强盗？不会的，他会投黄浦江自杀吗？这可能性较大。我万分担忧他的安全，生意也没心思去做了，四处找他又无下落，使我神情恍惚，寝食不安。想到在武夷山上时，党交给我两个同志，陈紫戈同志在初到沦陷区时就失散了，现在黄蝶飞又告失踪，我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同志？回到军部时叫我怎么向党交代？怎么回答首长呢？我内心的难过，蕴藏多年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了。黄蝶飞失踪后，广东老人和他的家人，每天总要来询问几次，他以为我骂了自己的儿子了，十分诚恳地对我说：

“他回来时你不要再骂他了，有我在这里，你的生活我总设法帮助的，我可以担保不会饿死你们的。”

象这样萍水相逢的人尚且这么亲切关怀，何况我们共患难的战友，他们每来询问一次，总是更增加我的悲伤。

到了第四天的黄昏，黄蝶飞手里提着一个洋铁桶回来了。我连忙跑上去抱住了他。

“你怎么搞的？害得我日夜不安。”

“那天清晨，我在一个自警亭旁边拾到一个女人的皮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日本军用票，我高兴我们的穷根从此可以解决了，不料后面追来一个巡捕抓住了我，说我是撬手，偷人家的，皮包给他夺了去，连我身上几十元本钱都搜了去，后来又送我到炮台湾去做苦工，今天我才设法逃回来……”他把做苦工的水桶一掼，告诉我这又一意外的遭遇。

之后，这困苦难堪的生活又过了几个月。C同志终于回家了，写信要我们去他家里，潦倒沪滨的几个月流浪生活才告结束。

我把蓄了三年的胡须剃去，恢复了我的本来面目。到C同志家时，因为我上次去曾假冒说是C同志的岳父，因此，他的母亲还带开玩笑地说：

“叶先生，我的儿子回来了，可惜媳妇没有带回来，你的女儿究竟在哪里？现在我要向你要媳妇了。”说得大家把身子都笑软了。

1943年的冬天，我们一行人，经江南十六旅回到了军部。

囚徒浪迹，悠悠三载，辗转跋涉，颠沛流离，重入怀抱，欣喜若狂！

脱稿于1944年暮秋的夜晚

1945年4月重抄

哀施奇同志

叶钦和

1942年的春天，紫红色的杜鹃花开遍了满山满谷，金黄色的油菜花也同样的开遍了田野。清明节的早上，我被一个提着亮晶晶的快慢机的宪兵监押着，从集中营穿越过一座小桥，踏着荒芜的山头，走尽几条弯曲的田埂，那作为收拾我们伤病的同志们命运的所谓医务所的房屋便出现在眼前了。

医务所距离集中营的宿营地约有两三里路，是在一个与人众完全隔离的小小的山腹上。主任姓吴，刚从医官升任没有多久，他虽然已经公开地私饱了所遣医官的缺额的薪俸，但连那每月所规定的极有限度的医药费，也给他贪婪地吞光了。所以他虽然没有象刽子手们——特工那么狰狞凶恶，可是，却同样地是一个吸吮我们血的恶魔。

那三间房子，中间比较大的是为我们三四十个被酷刑受伤或生病的同志安排下来的地方。我踏进了医务所的门，便望见屋子里那种悲惨的凄凉的情景，同志们全是脸孔消瘦了。有的辗转床第，痛苦呻吟，有的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我凝视着每个同志的脸孔，心里充满着愤怒与憎恨。

在右边的房子里，被安排着一个遭受轮奸受伤的女同志，她名叫施奇，是过去在皖南机要科工作的。皖南事变时被反动派五十三师轮奸蹂躏后送到集中营的。

施奇同志被送到集中营之后，反动派特务为强迫她自首，曾威胁利诱，用尽一切无耻的手段。最后即以将她眼前的问题获得解决向她引诱与威胁，即以治好被轮奸而创伤的子宫，作为她投降自首的条件。假如她肯在“自新”的条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生

命便可以获得解救，从而身子亦可以得到自由。可是我们的施奇同志却不肯这样做，她情愿死，她情愿熬住着这人间最凄惨的苦痛，不愿在思想上或斗争途程上丝毫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即不愿意在敌人的面前低首屈服。因之那惨重的创痛一直被耽擱着未经治疗。狗儿们竟亦乐于把人命当作玩具耍弄。我们的施奇同志便在这样的得不到一点看顾地煎熬在这人间的地狱中。

我张望着这个漆黑房间，怀着怜悯的心情跨进了门槛。里面仅仅从那很小的窗口射进了一丝丝的阳光，房子里面空无一物，四壁萧条地仅有一张七歪八倒的木床，床的旁边堆着一堆肮脏的衣服，床底下放着一个便桶，床中间留一个洞，因为她的下体溃烂，大小便都要从床上流进便桶里去。房子里空气是万分混浊而充满了污腥的臭气，使人作呕。跑到床边，一眼望见床上躺着一个人，盖着一张污秽不堪的棉被，里面的棉絮结成一团，她的头发犹如深秋的枯草，紧闭着眼，更显得凹了进去，脸颊瘦了，显得两颧更加高耸，脸如黄纸，这简直是一层皮盖着一堆枯骨，我怀疑了，我不相信这个人就是过去身体健壮的施奇同志。

她过去是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青年，她那追求真理的精神，丰富的理论，强毅的工作能力，确实是我们一个模范工作同志，同时，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不到半年竟变成这样的一个枯萎的躯壳了。

我咬紧了牙关，忍着悲痛的心情走上前去，用颤抖着声音轻轻地呼唤一声：

“施奇同志。”

几分钟之后，她才从蒙眬中睁开松倦的眼睛，向我看了一下，但随即自然地闭上了。我继续说：

“施奇同志，你还认得我吗？”

她仅仅颤抖着声音微弱地吐了两个字：“认得！”

不久，她的眼帘费力地睁开了来，目不转睛的张望着我，嘴唇虽在动，但却没有说出话来，最后才很沉痛的仍是微弱地说：

“叶钦和同志，你也生病吗？”

我说：“队上派了我的公差，到杨家湖抬米，二个人抬一包二百多斤重的米，你想，从来没有抬过东西的，哪里吃得消？果然抬到半路的时候，我的腰脊压伤了。但是，在皮鞭的抽打下，只好忍着痛，拚着命抬回来。回到队上以后，我的腰脊痛楚得不能站直，简直是一个睡倒的虾子，无可奈何，我要求了好几次，一直等到昨天才送到医务所来。唉！”

她听我说完上面的话，她的眼睛好象发出了一种仇恨的怒视的光亮，深沉地叹息着。片刻之后，她忽然显得很愉快，精神亦振作了许多。她的青春似乎复活了，露出一丝微笑对我说：

“我虽然受着无可补偿的创伤，但许多同志也同样受着，这都是为了多数人们的利益与人类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的。每一个革命者与共产党人，所遭遇到的这些磨难，其实也是所必经的实际锻炼。因此，我们现在虽在刽子手的血掌下生存着，我觉得还是愉快的，……”

她的声音提得很高，但却变得嘶哑了，最后那微弱的声音已几乎听不见，但这高度激动情绪在脸上表露着，她的话语引起了我不限的感奋与敬佩。为着对她表示关怀与安慰，我问她说：

“你的病怎样了？”

提起此事，即刻引起了她的悲痛，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可怕，一种悲惨与无限哀痛的心绪统治着她的身心，她以颤抖的声调悲愤地说：

“我的病你们大概都知道了，在被捕时，就被十几个凶残横暴的兽性豺狼们所强奸，他们将我的衣服剥光了，四个野兽捉住手脚……”她一面呜咽抽泣着，一面向我诉说当时被蹂躏的情形。

“我当时虽然拚命的挣扎……，但是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已经失去了知觉昏迷过去了，到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家老百姓的屋子里了。我被送到集中营（第五队）的时候，他们——反动派，要我办完手续——自首——后，可以送我到外

面的医院去医治,但是我已经拒绝他们了。”停了一会,她又说:

“我从第五队送到医务所时,我们一道被囚禁的王大夫——王聿先同志,来看过我一次,他说:‘病是可以医治的,但在这样的环境,是没有办法的。’……我……我……我已经准备……”

说到这里,她呜咽抽泣得更加厉害了,话语也紧缩得不能再说下去了,满眶的热泪一滴一滴的流得满脸,她的话语是从内心所激发出来的,我被感动得全身的血液汹涌起来了,眼睛冒着愤恨的火花,但是愤恨只能埋藏在心底里,始终说不出适当的话来安慰她,很不自然地说出一句:

“你不要难过,你休息一下……”

她的手好象在被窝里握着拳头挥动,脸颊呈露着一点微红,眼睛也睁得大大的,嘴唇咬得紧紧,好象在想什么。瞬息之后她继续说:

“叶钦和同志,你如果能够脱离这里的环境,假如能回到……军部的话,请你将我的情形告诉我们的党和……首长。”

她仍是不住的啜泣着,声音变得更嘶哑了:

“我是一身清白的,我已决意准备牺牲了,只要我们的党和首长知道我是为党而牺牲的,那么我……我死了也是很感愉快的事。……大概我们的革命胜利,是等不了好久的……”

她想从被窝里伸出手来,在被窝里挣扎了半天,才把那瘦弱得如枯木的手颤抖地伸露出来,握着我的手,紧紧地握着,那亏损了血脉的手掌有如暮冬的冰块一样的冻冷。然而透过这手掌之内的心头却是多么的火热呀。

她含着无限的悲痛的心情说:“叶同志!我们恐怕不能再见了。……”

我尽力的抑制着感情,但此时已无法强抑多年来未曾出眶的热泪,在我的内心里燃烧着万丈的愤焰,被压迫者的反抗怒火猛烈地熬煎着我的心头,但眼前同志不幸的悲惨遭遇,也同样程度地引起我无限的哀伤。这时候房外忽然发出一声似豺狼般的凶暴

的喊叫：

“谁在里面讲话？快滚出去！”接着是一阵猛击门板的音响。

无可奈何，只得被迫离开这房子，与我们敬爱的施奇同志告别，我紧握着拳头，抑制着难以抑制的愤怒，向她点一点头说：

“你的病是不要紧的，切不要过于难过，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设法帮助你，你要好好的休养，我们再见吧！”话虽如此说，可是眼眶不禁抛下不能抑制的真挚的泪珠，我依依不舍地慢拖着步倒跨出门外，看着她的黑影，直至在黑暗之中消失为止。

施奇同志！我终于逃出这人间的地狱了，挣断那沉重的枷锁，重回到革命的母亲的怀抱了，你现在是生与死，我们可不得而知，但我还是这样希望你尚能在人间，倘然你是已经与世永别的话，请你好好的安息吧！你也用不着担心了，你的未竟的革命事业，让我们踏着及一切牺牲的同志们的血迹来完成！

1945年

所以还没有也不必要把这情形告诉他，但他却略已风闻，因之而表示不满了。

有一天，他在一个同志的跟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他们现在有了钱，就只管自己，不要我们了，你有办法的话，给我一部分钱，我准备走。”

“他们哪里来的钱呢？”那一个同志是晓得我们的情形的，因此就追问他这么一句。

“是从苏北汇来的！”

那位同志知道误会了，笑了一笑连忙说：

“没有，信还不通，哪来钱呢，你不要怀疑。”

“不是怀疑，真的，你若有钱的话，给我一部分，不然，我去另想别法。”

“好，让我去设法借给你！”那位同志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这样答复他，并将这情形告诉了我。

为了解释这一个误会，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一方面说明事情的经过，一方面批评了我自己，同时也批评了他。他回了一封信给我，内容诚恳地批评了自己，并提出了今后须要积极改造的方向。从此，误会消除了。我知道他除了上述的品质之外，竟还有一个好的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必不可少的品质——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样，我们间的感情更进一步的巩固和融洽了。不久，支部组织更动，他当选为支部委员，我们间又加上一层密切的工作关系了。

* * *

性格是不容易一下就改造过来的，何况他这鲁莽、急躁的性格，更融和着对敌人的高度的仇恨，对党对民族的忠贞和倔强在里面呢！而这一性格的特点，也终于在另一个斗争的事实上，高度地表现出来了。

1941年冬末，当集中营四周的山坡上，积雪尚未完全融解，周田的莽原上，还时时刮着卷雪的寒风的时候，有一天，照例集合了做游戏的晚上，为了介绍一位新入牢笼的同志的履历问题，他又

辱骂了王寿山所宠爱的另一特工——黄寄生。在公开场合上，对这样得宠的特工加以辱骂，还是第一次，这对特工群是一个绝大的打击，因此，争吵虽当场因我们阻止了孙锡禄而告结束，但黄寄生吐出了如下的威胁的语句：

“我老早晓得你们是有组织的，一向同你们很客气，现在爬到我的头上来了，好，给你们颜色看看！”

果然，第二天早晨，当队伍站齐，点名完毕，列队向大操场出发时，孙锡禄和两个特工——钟剑英、黄寄生，奉队长命留下了。这手段，本可想象得到，但因快，总觉有些突然。我似乎隐约地看到那残酷的场面，一条黑影爬上了我的心头，我所热爱的孙锡禄同志，从此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后来听说，他被留下以后，由五六个特工，把他捆到一座山坡上，在卷着残雪飞跑着的寒风里，剥光了衣裳，用劈开了的树柴，浑身毒打。

打了一会之后，旁站监视着的王寿山才开口问了：

“你讲，你们里面有组织没有？”

“我不知道。”孙锡禄头也不抬，强硬地回答。

“你讲，你讲了以后我不打你！”

“我不知道。”不仅强硬而且愤愤的了。

“好，你这样顽固，替我再打！”

树柴片又在浑身上下出力的飞舞了。但见树柴落处，皮肤顷刻间就发紫而且肿起来了。

寒风刮过枯槁的树梢，刮过山石莽丛，发出了呼呼的不平的怒鸣，方升的红色的太阳，也愤怒地将遮掩它的浮云赶走了。

王寿山用手一抬，停止了打手，又开口问：

“你讲，你们里面有组织没有？”

孙锡禄咬着牙齿，转过头来，斩钉截铁地答道：

“没有什么可讲的。”

“真的没有什么可讲吗？”

有的意见是：“我们被关得很久了，身体弱，敌人的防卫力量既强，封锁亦密，暴动怕无把握。”

在当时茅家岭那样的层层包围，警卫森严的条件下面，要进行夺枪暴动，不仅须要有最坚强的决心，而同时，更须要有周密的计划和机敏来相配合，因此也的确难免会有一些彼此分歧的意见的。

而孙锡禄同志，当时他就是坚持着第一种意见中的一个。他急躁和愤怒地驳斥了后面的两种意见，坚决主张暴动，终于，大家都同意了。

5月25日下午四时，茅家岭的伟大英勇的行动开始了。孙锡禄担任了领导暴动的军事组织的班长之一，他夺了一挺轻机枪，带了一部分同志，冲出去了！但此后也就不知他的下落了。

6月17日赤石暴动之后，有一位突围出来的同志，途遇两位当时参加了茅家岭暴动的女同志，问起孙锡禄的情形，她们说：

“他冲出来后，因武器损坏，故不得不流浪于闽赣边境，听说曾先后再被地方捕去三次，他也因此而继续进行了三次越狱暴动，至于真实行踪，则又不明。”

这是可能的，因为凭他的忠贞、勇猛和倔强的品质来说，就是头断了，他也是决不会屈服在敌人的枪刺下面的。他是一团火，是一团永不会绝灭的火！到哪里，哪里立即会被点燃起被压迫者的反抗的火焰来的！

* * *

离开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已经有两年多了。而锡禄呢，至今仍音信杳然，想起当年同甘苦、共患难时的一切，怅触殊深。假使他还在人世的话，那么我相信，他是会带了许多奇迹回到党的怀抱里来的，但假使已不在人世的话，那么，锡禄从此别了！

孙锡禄，原名孙镜波，锡禄是他的化名，东北辽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4年9月15日